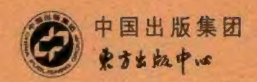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津巴布韦史

布莱恩·拉夫托帕洛斯 A.S.姆拉姆博 著 张瑾 译 何曙荣 校

Becoming Zimbabwe



Becoming Zimbabwe


ISBN 978-7-5473-0621-5

9 787547 30621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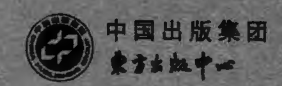
定价：36.00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津巴布韦史

布莱恩·拉夫托帕洛斯 A. S. 姆拉姆博 著
张瑾 译 何曙荣 校

Becoming Zimbabwe



上海市版权局合同登记：图字 09-2013-6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津巴布韦史/(津巴布韦)拉夫托帕洛斯，(津巴布韦)姆拉姆博著；张瑾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10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0621-5

Ⅰ.①津… Ⅱ.①拉… ②姆… ③张… Ⅲ.①津巴布韦-历史 Ⅳ.①K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1444 号

责任编辑：赵　明
责任印制：徐儒静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　　话：021-62417400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20.25
字　　数：278 千
版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621-5
定　　价：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缩 略 词

AAG	平权行动组织
ACP	非洲、加勒比海以及太平洋国家(非加太集团)
AEU	联合工程工会
AIPPI	信息使用和隐私保护法
ANC	非洲人国民大会
BSAC	英属南非公司
BSAP	英属南非警察
CAS	摩羯座非洲学会
CCJPZ	津巴布韦天主教正义与和平委员会
CHRA	哈拉雷居民联合协会
CIO	中央情报组织
CYL	城市青年团
DSA	地区安全助理
ESAP	经济结构调整计划
EU	欧盟
FBAWU	布拉瓦约非洲工会联盟
FLS	前线国家
FRELIMO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

FROLIZI 津巴布韦解放阵线
IBDC 土著商业发展中心
IBWO 土著商业妇女组织
ICFTU 国际自由工会联盟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RA 跨种族协会
JMO 联合市场组织
LDO 土地开发官员
MDC 争取民主变革运动
MK 民族之矛
NAM 不结盟运动
NCA 全国制宪大会
NDP 民族民主党
NEPCO 国家促进出口委员会
NGO 非政府组织
NIBMAR 先组成由非洲人代表占大多数的政府然后准许独立
NLHA 《土著畜牧法》
OAU 非洲统一组织
PF - ZAPU 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
POSA 公共秩序与安全法案
RAR 罗得西亚非洲步枪团
RENAMO 莫桑比克全国抵抗组织
RF 罗得西亚阵线
RICU 工商业工人改革联盟
RRAEA 罗得西亚铁路非洲员工协会
SADC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DCC 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
SRATUC 南罗得西亚非洲工会大会
SRBVA 南罗得西亚班图人选民协会

TILCOR	部落信用土地发展公司
TTL	部落信托土地
TUC	劳工联合会议
UDI	单边独立宣言
UFP	联邦联合党
UN	联合国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VIDCO	乡村发展委员会
WADCO	辖区发展委员会
WOZA	津巴布韦妇女崛起组织
ZACU	津巴布韦非洲工会大会
ZANLA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
ZANU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ZANU(PF)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
ZAPU	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
ZCTU	津巴布韦工会大会
ZIPA	津巴布韦人民军
ZIPRA	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
ZLC	津巴布韦解放委员会
ZNLWVA	津巴布韦民族解放战争退伍军人协会
ZWW	津巴布韦女作家组织

年 代 表

约公元600－900年	兹佐族移居并统治林波波河地区。
约900年	豹丘族取代了兹佐族,兹佐族向西迁往喀拉哈里沙漠,形成了托兹维莫迦拉文化。
1220－1290年	第一个具有国家特点的豹丘定居点马篷古布韦建立并繁荣起来。
1325－1450年	大津巴布韦取代了马篷古布韦,并在赞比西河南部建立起了一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
1450年	大津巴布韦被西部的卡米和东北部的莫塔帕这两个同时期的国家取代。1490年托尔瓦统治者篡位,四年后他又被奇库约·奇萨马伦谷废黜。
1506年	葡萄牙人来到莫塔帕国。
1515－1530年	沙契特夫·尼亚慕达在东南部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阻断了沿海葡萄牙人和莫塔帕国之间的贸易。
1550年	文达语在林波波河地区全面使用,该语言结合了一些索托语和绍纳语的元素。
1569/1577年	葡萄牙人试图侵占莫塔帕国。
1600年	戈巴人迁到赞比西河和萨尼亚蒂河的汇流地带。

1606—1609 年	莫塔帕的鲁瑟里·迦兹年间，马图臧赫叛乱。
1629 年	莫塔帕的姆汗德·马夫胡拉签署了投降书，开始了穆罕他帕的傀儡政权。
1663—1704 年	莫塔帕的穆克姆布韦·卡姆哈拉帕苏收复了穆罕他帕傀儡统治时期丧失的土地，击退了葡萄牙人，将其驱逐出境并且重新划分了土地。
1684 年	昌加米尔的多姆博在马温戈韦之战中打败了葡萄牙人。
1690 年	罗兹韦王国和昌加米尔王朝在西部建立。
约 1700 年	姆贝尔和布赫拉居民开始大规模外迁。
1720 年代	赫伦格韦族在东南部建立，影响了内地和伊尼扬巴内的贸易。
1750 年	罗兹韦王国的内战达到高潮。
约 1750 年	部分罗兹韦族从中心国迁出，在林波波河的西北部建立了纳米比亚王朝，在南部建立了辛戈王朝。
1768 年	希亚族企图入侵罗兹韦王国。
1824—1832 年	几个恩古尼族族群进入津巴布韦高原，与罗兹韦王国开战。
1838 年	恩德贝莱国在西部建立，有效地取代了罗兹韦王国。
1857 年	恩德贝莱成功降服大部分绍纳酋长。
1870 年	洛本古拉签署了塔蒂租界法令。
1878 年	葡萄牙军人资本主义者帕维德安德拉德探寻以莫桑比克公司的名义将沿河海的莫桑比克省变成覆盖整个津巴布韦高原的帝国。
1879 年	在和绍纳人的尼彦英维奇维战争中，恩德贝莱第一次遭到惨败。
1884—1885 年	德国宰相俾斯麦主持了柏林会议。

1886 年	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发现了丰富的金矿。
1887 年	洛本古拉签署了格罗伯勒条约。
1888 年 2 月	洛本古拉签署了莫法特条约。
1888 年 3 月	洛本古拉签署了路德租界法令。
1889 年 10 月	英格兰女王将皇家特许状颁发给罗德斯。
1890 年 9 月	先遣部队占领了马绍纳兰,在索尔兹伯里升起英国国旗。
1893 年	英国-恩德贝莱战争/马塔贝莱战争或第一次营法座战争。
1894 年	开始征收棚屋税。
1894 年 9 月	制定马塔贝莱兰枢密令。
1894 年	创立噶伊及善噶尼保护区。
1895 年 5 月	英属南非公司正式采用南罗得西亚这一名称。
1896 年 3 月	恩德贝莱起义爆发,也称安祖克拉·沃库区拉或第二次营法座战争。
1896 年 6 月	绍纳起义爆发或称第一次解放战争。
1898 年	英帝国政府承认南罗得西亚枢密令为统治罗得西亚的工具。
1903 年	殖民立法委员会成立。
1903 年	《主仆法案》颁布。
1905 年	建立 60 个保护区。
1910 年	南罗得西亚本国法规颁行。
1912 年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
1914 年	设立保护区委员会。
1914 年	恩格文亚组建非洲国内传教会。
1919 年	马塔贝莱保卫家园运动恳求国王归还出让的恩德贝莱土地。
1923 年	责任政府继承英属南非公司的统治。
1923 年	南罗得西亚班图选民协会成立。

1924 年 任命莫里斯·卡特委员会。
1927 年 《本土事务法》颁行。
1927 年 南非工商业工会在罗得西亚设立分会。
1930 年 《土地分配法案》成为《土地分配法》。
1931 年 《土地分配法》生效。
1931 年 《玉米管控法令》出台。
1934 年 南罗得西亚班图选民协会下属的妇女联合会成功抵制啤酒店。
1936 年 南罗得西亚班图国会成立。
1943 年 豪曼委员会报告发表。
1945 年 铁路工人罢工。
1945 年 在汤普森·桑康戈牧师帮助下非洲民族会议重新启动。
1946 年 查尔斯恢复改良的工商业工会(RICU)。
1947 年 《城区法令》颁行。
1947 年 本杰明·布罗博成立非洲之声协会(非洲之声)。
1948 年 大罢工。
1951 年 通过《土著畜牧法》(NLHA)。
1953 年 加非德·托德成为南罗得西亚的总理。
1953 年 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联邦成立。
1954 年 南罗得西亚的工会代表大会成立。
1955 年 城市青年团成立。
1956 年 索尔兹伯里市抵制公共汽车运动。
1957 年 组建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
1959 年 《工业调节法》颁行。
1960 年 组建民族民主党。
1960 年 《蒙克顿委员会报告》发表。
1961 年 民族民主党被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取代。埃德加·维迟德牵头制定新南罗得西亚宪法。

1962年3月	罗得西亚阵线成立并在12月取得选举胜利。
9月	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被禁止活动。
	南罗得西亚非洲工会大会成立。
1963年	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联邦解散。
8月8日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成立。
	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开始将新兵送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军事训练。
1964年	伊恩·道格拉斯·史密斯成为罗得西亚的总理。
1965年11月11日	签署单边独立宣言。
	英国对罗得西亚部分商品实行制裁。
1966年	英国对罗得西亚实行全面贸易禁运。
	联合国对罗得西亚实行石油禁运。
	英国采取先组成由非洲人代表占大多数的政府然后准许独立原则。
	在奇诺伊战争中,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游击队迎战罗得西亚军队。
1967年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和非洲之矛的军队参加万基战役。
1968年	联合国对罗得西亚实施全面制裁。
1969年	《英国-罗得西亚协议》制定了新的宪法,扩大了某些群体的公民权。
1971年	权力斗争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瘫痪,津巴布韦解放阵线成立。
	在阿贝尔·穆佐雷瓦领导下,新非洲民族会议成立,抵制《英国-罗得西亚协议》。
1972年	皮尔斯委员会发起是否接受《英国-罗得西亚协议》的全民公投,结果为“否”。
1973年	赞比亚关闭与罗得西亚接壤的边界。

1974 年	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津巴布韦解放阵线和非洲民族会议在前线国家领导人的压力下成立非洲民族联合委员会。
	作为反叛乱的措施，成千上万的村民被迁移到茨威舍和马德瓦的部落信用领地。
	基于消除积怨的精神，被拘留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被释放。
	恩哈瑞叛乱动摇了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基础。
1975 年	奇特坡·赫伯特被暗杀。
	莫桑比克获得独立后立即封锁了与罗得西亚接壤的边境，同时允许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借道潜入罗得西亚。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人西索尔被罢免，罗伯特·穆加贝取而代之。
	津巴布韦解放委员会成立，致力于联合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津巴布韦解放阵线及非洲民族联合委员会。
	津巴布韦人民军成立，致力于联合津巴布韦人民解放军、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的战斗力量。
1976 年	爱国阵线成立，这是前线国家为了联合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又一倡议。
	日内瓦会议，磋商黑人占多数统治事宜失败。
	在莫桑比克的恩亚迪祖尼亚，罗得西亚军队屠杀1 000 多名津巴布韦难民。
1977 年	在莫桑比克希莫尤和滕布韦营地，罗得西亚军队屠杀津巴布韦平民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游击队战士。

1978 年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发生动乱,“瓦沙第”群体控诉领导层有资产阶级倾向。
	在赞比亚自由营地和姆库希,数百津巴布韦难民被罗得西亚武装力量屠杀。
	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游击队击落了一架飞往卡里巴的罗得西亚民航飞机。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放火焚烧了索尔兹伯里市的储油罐。
	史密斯、穆佐雷瓦、西索尔和齐劳进行内部协商,就少数服从多数的选举达成一致。
1979 年	埃布尔·穆佐雷瓦在内部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罗得西亚成为津巴布韦-罗得西亚。
	罗得西亚客机被游击队击落,54 名乘客和 5 名乘务员遇难。
	兰开斯特大厦会议达成宪法解决方案,结束了战争。
1980 年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赢得英国监视下的大选。津巴布韦获得独立,穆加贝担任总理。
1982 年	在布拉瓦约和圭洛附近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所属房产内发现私藏武器后,许多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独立人民革命军的领导人被捕,包括乔舒亚·恩科莫在内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领导人被逐出联合政府,紧张局势升级。
1982－1987 年	古库拉洪迪大屠杀。马塔贝莱兰和米德兰两地 2 万多平民被杀害,主要死于政府军之手。
1982－1992 年	政府部署了近 1.5 万名军人保卫从莫桑比克通往津巴布韦的石油管道,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士兵并肩作战对抗南非支持的莫桑比克全国抵抗组织。

1987 年	修改宪法废除了白人选举票单列的规定，采用执行主席实现中央集权。
1987 年	联合协议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形成，结束了暴力，有效地摆脱了只有一个反对党的局面。
1988 年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彰政府在向农村家庭供水和提供卫生设施方面取得的成就。
1989 年	大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政府滥用国家权力和腐败，导致大学独立以来第一次被关闭。
1990 年	前任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秘书长埃德加·特克雷组建津巴布韦统一运动。
1990 年	本土商业发展中心成立，更多的黑人参与经济活动。
1991 年	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开始实施。
1992 年	第一次津巴布韦工会大会游行抗议政府的经济改革计划。参加人数不多，但遭到警方的严厉镇压。
1992 年	颁布《土地收购法案》，使得政府能强制征地以便重新安置。
1994 年	成立平权行动组织，开展更加激进的运动，让当地人获得外国公司拥有的土地。
1996 年	独立后的津巴布韦发生了最大规模的公务员罢工。
1997 年	退伍老兵施压政府支付预算外的退休金，导致货币贬值。
	大罢工迫使政府放弃了向工人征税的新方案。
1998 年	哈拉雷发生大暴乱，其他城市的粮食价格飞涨。
	津巴布韦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兵。
	津巴布韦工会大会组织了三次全国大罢工。

	全国制宪大会成立。
1999 年	争取民主变革运动成立。
	政府未能偿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债务。
2000 年	政府在宪法草案的全民公投中失败。
	土地占领运动，亦即所谓的第三次解放战争开始。
	为反对国家暴行举行大选，争取民主变革运动赢得近半的议会席位。
2002 年	在暴力频发的环境下，穆加贝在竞争激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
	颁布《公共秩序与安全法案》和《信息使用和隐私保护法》。
2002－2008 年	对执政党内侵犯人权的部分官员实施“针对性”制裁的级别上升。
2007 年	警方殴打并逮捕了争取民主变革运动和民权运动的领导人。
	在南非总统姆贝基领导下，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开始调停。
2008 年	争取民主变革运动在 3 月的选举中获得议会大多数席位，茨万吉拉伊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获胜。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最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后，穆加贝在总统复选中“获胜”。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同盟(爱国阵线)签署《全球政治协定》，两个民主变革运动组织为政治经济的稳定创造条件。
	霍乱爆发，加重了人道主义危机。
2009 年	联合政府成立。

前　言

——艰难的建国之路

津巴布韦资深的民族主义领袖、"国父"乔舒亚·恩科莫(Joshua Nkomo)在其自传中感谢殖民定居者"为我们一次性划定了国界"：

xvii

> 这片土地上各民族的领地只是按惯例来界定的：领地界限不清，导致为了抢夺牛、食物或女人的侵袭和反侵袭不断发生。现在我们再也没有理由不团结、不去树立无可争议的国家认同。[1]

在1950年代后期，恩科莫认为领土完整对民族独立运动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看法是非洲大陆大多数民族主义精英的共同立场。这些精英渴望带领他们的国家进入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中。他们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任何其他领土组织的形式，尤其是基于民族基础上的，"不仅完全行不通，而且政治上具有爆炸性"。[2] 然而，正如恩科莫的生活经历所验证的那样，在反殖民斗争和殖民后的政治时代，争取"无可争议的

---

① Joshua Nkomo, The Story of My Life (London: Methuen, 1984), p. 7.

② Crawford Young, 'Nation, ethnicity and citizenship: Dilemmas of democracy and civil order in Africa', in S. Dorman, D. Hammett and P. Nugent(eds.), Making Nations, Creating Stranger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7), p. 245.

国家认同"的运动被证明是一个危险的幻想，这个幻想不能掩盖津巴布韦历史上民族、阶级、性别和种族方面的不完善。那些将已经存在的反对殖民统治的思想和政治组织迅速动员起来的提议，是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团结"和霸权都是可能出现的，都是建立在不同身份认同、不同社会力量和不同战略联盟的互相影响的基础上的。[①]

库珀(Cooper)写道，殖民政权是特定物质、社会和文化条件下的"斗争目标"。在这些条件下，"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结构"，他们"需要通过特定的行动重新构建"。在白人的殖民统治下，国家高压统治及对种族和文化差异的主张，是与强加的不同类型的"分权专制"相结合的。[②] 在这种"分权专制"[③]中，"习惯"和"传统权威"既是管理形式也是争论和辩论的舞台。[④] 此外，强制接受殖民者的统治发生在殖民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生产关系和土地所有权的关系，导致了新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出现。

xviii

本书提供了一个从殖民前时期到当代的津巴布韦历史概貌，并探究在此期间关于国家归属感和公民权的看法。在这些宽泛的参数中，我们还要着手探求国家统治的本质、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轮廓及国家在区域和国际层面上的历史。因此，本书的中心目标是分析"津巴布韦建国"的进程、挑战和持续的斗争。

殖民前时期到 1930 年代

1977 年，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写了一篇关于津巴布

---

① 关于此类动态发展有趣的理论讨论参见，S. Hall, 'Gramsci's relevance to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ity', in D. Morley and K-H. Chen,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411-440.

② F. Cooper,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③ M. Mamdani, 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 Ru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④ D. S. Moore, Suffering for Territory: Rate, Place, and Power in Zimbabwe (Harare: Weaver Press, 2005).

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对殖民前津巴布韦看法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借用布贝(Bhebe)和兰格(Ranger)的话语，力图提出自己的立场——“一个自然的‘绍纳’国家，一直在争取保卫自己的自治权”。[1]穆加贝引用他所阅读的蒙胡莫塔帕(Munhumutapa)帝国的史料：

> 我们民族的特征、我们文化的一致性、我们生物和基因的同一性、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地理和我们的历史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国家认同，共同塑造了我们这个民族充满活力和积极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一以贯之，得到了传承和发扬。[2]

马扎瑞(Mazarire)所写的第一章对上述说法提出挑战，并提出另一种解释：

> 津巴布韦殖民前的历史通常被认为是一部帝国的兴衰史——一部大津巴布韦、莫塔帕(the Mutapa)、托尔瓦(the Torwa)、罗兹韦(the Rozvi)和恩德贝莱(the Ndebele)等王国此兴彼衰的历史。这些大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是如果认为在这些国家之前或者之后，在这些国家疆域之外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那是会令人误解的。大多数土著居民生活在更小的族群里……

xix

根据大卫·比奇(David Beach)和特伦斯·兰格(Terence Ranger)等历史学家的研究，马扎瑞总结说，“绍纳人”(Shona)是一个预示种族语言、文化和政治特征的字眼，19 世纪后半叶之前，绍纳人也不知道他们自己被如此称呼，即便在当时也有瓦尼亚伊(vaNyai)、阿贝查比(abeTshabi)、卡伦加(Karanga)或霍里(Hole)等各种称呼。就恩德贝莱人来说，1840 年后他们定居在津巴布韦高原西南部。由于 19 世纪

---

① N. Bhebe and T. O. Ranger (eds.),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Zimbabwe Publications, 2001), p. xxv.

② 同上，p. xxvi。

南非的姆法肯动乱(Mfecane),祖鲁王国一个不大的库马洛(Khumalo)家族外迁,通过征服、同化和合作发展成为更加多样化的国家,由罗兹韦(Rozvi)、卡兰加(Kalanga)、比尔瓦(Birwa)、通加(Tonga)、纽比(Nyubi)、文达(Venda)和索托人(Sotho)组成。[①] 在强调改变种族划分是静态的、原始的这种观点的必要性时,兰格提出,"部族身份并非是必然的、一成不变的、与生俱来的,而是人类创造力的产物,它可以被重新发明和完善,再次成为开放的、建设性的、灵活的,服从于其他君主和联盟",展现这一点十分重要。[②]

在早期的殖民统治下,自19世纪末的绍纳和恩德贝莱起义遭残酷镇压后,新兴的资本主义开始改变这片土地上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在早期的煤矿和乡镇,新型的社会斗争和社会身份开始出现。如萨贝洛·西乌伊尔(Sahelo Ndlovu)的第二章所写,这些变化源于过去民族身份的变化不定、教会势力和帝国公民身份的模糊不清、一小部分黑人精英对更加受人尊敬的"文明"地位的诉求,以及早期劳工斗争的需要。迈克尔·韦斯特(Michael West)这样描写1930年代发展"民族意识"的困难:

> 南罗得西亚特定的非洲身份,也就是津巴布韦非洲民族意识的出现,以1950年代末兴起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为标志,已经萌发了很长一段时间。非洲精英"国家归属"在1930年代中期有重要转变,以班图人大会的建立为顶峰。班图人大会是第一个代表全非洲殖民地人民的政治信号,尽管它的主要活动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尽管他们斗志坚定,但在追求国家代表性时却把早期的抵抗团体排除在外,这些团体的组建基本上以区域或种族为基础。[③]

---

① S. Ndlovu-Gatsheni, 'Dynamic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mong the Ndebele in Zimbabwe, 1818 - 1934'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Zimbabwe, 2003); T.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ibalism in Zimbabwe (Gweru: Mambo Press, 1985).

② T.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ibalism in Zimbabwe, p. 19.

③ M. West, The Rise of an African Middle Class: Colonial Zimbabwe, 1898 - 196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3 - 34.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60年代

阿洛伊斯·姆兰博(Alois Mlambo)所写的第三章表明,大规模民族主义的出现必须要解决1940年代到1960年代的一系列相互抵触、重叠的政治和身份主张。在农村,参加众多的组织和机构,与包括教师、农民、酋长、基督徒、传统主义者和工人等政治活动家共事是很常见的。乔斯林·亚历山大(Jocelyn Alexander)认为,农村政治的多面性强调了避免将非洲政治文化单一化的观点,"以及将传统与现代进行严格区分,这在官方话语、社会分析中经常有具体表现,且在将国家特征描述成技术专家治国型(technocratic)、有异域特征型和传统的农村社会中也有表现"。[①]

同样,在城区,想象"一个指定国家及其社会界限"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种族、地域、性别和劳动意识等身份认同互相竞争、相互补充。[②] 这种斗争也以非洲人争取拥有城市居民身份权利的斗争为中心,反对白种纳税人更具选择性、更激进的要求,[③]同时也将地方的要求与产生提摩斯·斯贾尼驰(Timothy Scarnecchia)所说的"至高无上的工人阶级公民权"这一更宽泛的诉求相结合。查尔斯·米兹格力(Charles Mzingeli)是争取这种公民权的中心人物。米兹格力"为穷人和工人阶级的权利而战斗,使他们免受殖民种族社会的不公正待遇和非洲精英政客的歪曲。"[④]这种对政治、土地和公民权的更广泛的要求,使用了一种或另一种殖民意识形态,也被政治家、工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政治家所采用,他们将自己的要求置于

---

① J. Alexander, The Unsettled Land: State-making and the Politics of Land in Zimbabwe: 1893 - 2003 (Harare: Weaver Press; Oxford: James Currey, 2006), p. 9.

② E. Msindo,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urban colonial Zimbabwe: Bulawayo, 1950 - 1963',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48, 2007, pp. 273 - 274.

③ T. Ranger, 'City versus State in Zimbabwe: Colonial antecedents of the current crisis', Journal of East African Studies, 1(2), 2007, pp. 161 - 192.

④ T. Scarnecchia, The Urban roots of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Zimbabwe: Harare and Highfield, 1940 - 1964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8), p. 14. See also T. Ranger, Voices from the Rocks (Oxford: James Currey, 1999).

更为公众所普遍认可的指示对象范围内。安斯·托勒(Ann Stoler)和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写道,“语言普遍性给下等的群体一个把手,将他们置于直接权力关系之外,去甄别地方暴政,提出全球性的权利诉求”。[1] 但显然,这种通用语言的有效性取决于该语言在地方或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基础以及使用的程度。[2]

直到1950年代后期,许多非洲精英对非种族原则基础上的多种族政治和精英管理抱有希望。通过诸如摩羯座非洲协会(CAS)和南罗得西亚跨种族协会等组织,他们试图实现多种族和睦相处的承诺和殖民国家政治包容的梦想。经过这一时期,多种族政治的局限性在更趋强硬的白人殖民政治面前变得越来越明显。在这样的情形下,在非洲大陆风起云涌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中,民族主义的“团结”呼声与对被民族主义领导人妖魔化的“叛徒”和“傀儡”的骂声夹杂在一起。在此过程中,民族主义运动的团结成为凌驾于所有其他非洲协会之上的同义词。[3] 特别是,它强制忠诚于单个组织,破坏了工会运动等组织机构的自主性。当新兴的工会联合会在劳动权利方面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团结时,民族主义领导者立即就将这种行为贴上外部利益干涉民族利益的标签。这就开始了民族主义和工会运动之间的长期冲突,这种冲突以1990年代双方的决裂而告终。[4] 同样,当非洲妇女“试图摆脱男权控制和殖民镇压”时,[5] 1940年代末与1950年代初,米兹格力的改良工商业联盟政策虽然理解“女性在城镇生活中的中心角色”,但屈服于民族主义者的施压。他

---

① A. Stoler and F. Cooper, 'Between metropole and colony: Rethinking a research agenda', in F. Cooper and A. Stoler (eds.), 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 35.

② F. Cooper, Decolonisation and African Society: The Labour Question in French and British Afric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67.

③ T. Ranger, 'Introduction to Volume Two', in T. Ranger (ed.),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Zimbabwe, Volume Two: Nationalis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Harar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s, 2001), p. 5.

④ B. Raftopoulos, 'Labour internationalism and problems of autonom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Southern Rhodesia, 1951 – 1975', in Ranger (ed.),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Democracy.

⑤ T. Barnes, 'We Women Worked So Hard': Gender, Urbanisa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Colonial Zimbabwe, 1930 – 1956 (Oxford: James Currey, 1999), p. 160.

们认为这是“男性为女性尊严进行辩护，而不是赋予其更多的平等”。[1]这种观点对确立父权主义的民族主义政治有着长远的影响。

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壮大，它借鉴了本地、非洲大陆和全球意识形态的复杂组合。当创造国家形象的过程涉及服饰、饮食、音乐、戏剧、政治口号以及祖先祈祷时，[2]民族主义运动要求保留更多的民族元素。萨贝洛·西乌伊尔在描述这个过程时写道，民族主义

> 是由殖民地环境下复杂的当地斗争、历史和社会所激发的，而这种环境的基础是正在逐渐衰退的殖民前的历史、神话和记忆。谈到“上述”因素塑造了民族主义时，我们指的是当地的组织和诉求对非洲大陆和全球的意识保持开放的态度，因为它们被认为是符合并推动当地事务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民族主义将黑人分立自治主义(Garveyism)、黑人性(Negritude)、马克思主义、黑人主义、基督教、泛非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自由主义等外部意识形态加以吸收融合，并将它与诸如土地权这样的本土资源相结合。[3]

单方面宣告独立的年代及解放斗争

在单方面宣告独立的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黑人和白人之间关于“美好国家的愿景”方面似乎存在着不一致。约瑟夫·梅提(Joseph Mtisi)、穆亚茹帝兹·恩雅库迪亚(Munyaradzi Nyalcudya)及特丽·巴纳斯(Terri Barnes)在他们所写的第四章中认为，这个总结毫无疑问可以理解为“政见更加多样性的环境”。因此，当种族必然成为人民生活

---

① T. Scarnecchia, The Urban Roots of Democracy, p. 85.

② T. Turino, Nationalists, Cosmopolitans and Popular Music in Zimbabw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 174.

③ S. Ndlovu, Do Zimbabweans Exist? Nation-Building Violence and Citizenship (Oxford: Peter La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9 [forthcoming]).

和经历的核心形态时，[①]白人罗得西亚及非洲民族主义政治和身份的形成仍是一个复杂而有区别的发展过程。

就白人殖民者而言，[②]探索通过种族和民族身份来建立白人社区非常重要。这种社区“基于种族主义以及将大部分黑人排斥在外的国家观念”，[③]但是阶级问题和不同民族的起源问题使罗得西亚身份的出现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就姆兰博所观察到的，

xxiii

> 尽管表面团结，但无论如何，白人罗得西亚社区因种族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而严重分裂。这种种族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主要来自英国血统的殖民后裔，引起国内其他白人群体如南非布尔人的强烈反对。[④]

姆兰博还指出，罗得西亚白种人的人口统计显示，他们是“一个移民和过客的社会，他们大部分都不会在这个国家待很长时间并扎根此地”。[⑤] 而且，这种以种族为基础的脆弱的统一还必须不断同竭力保护自身利益的定居群体进行抗争。[⑥] 在试图确立自己的“种族”身份时，专有的文化概念被用来证明殖民时期种族化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这种文化概念的一大主要特征是“白人礼仪”。因此，舒特(A. Shutt)写道，成为罗得西亚人“并不是简单假定种族优越模式与低

---

① 该观点选自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极具创意的文章，‘Race, articulation and societies structured in dominance’, in Unesco, Sociological Theories: Race and Colonialism (Paris: Unesco, 1980), pp. 305 - 343.

② 这一关于白人身份的讨论选自：B. Raftopoulos, ‘Introduction: Unreconciled differences: The limits of reconciliation politics in Zimbabwe’, in B. Raftopoulos and T. Savage (eds.), Zimbabwe: Injustice and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Cape Town: 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2004), pp. viii - xxii.

③ K. Alexander, ‘Orphans of the empire: An analysis of elements of white identity and ideology construction in Zimbabwe’, p. 195.

④ A. S. Mlambo, ‘“Some are more white than others.”: Racial chauvinism as a factor in Rhodesian immigration policy, 1890 - 1963’, Zambezia, 27(2), 1998, p. 140.

⑤ A. S. Mlambo, ‘Building a white man's country: Aspects of white immigration into Rhodesia up to world War Two’, Zambezia, 25(2), 1998, p. 124.

⑥ P. Godwin and I. Hancock, ‘Rhodesians Never Die’: The Impact of War and Change on White Rhodesia, c. 1970 - 1980 (Harare: Baobab Books, 1995), p. 19.

等的非洲人对立的问题。粗暴的种族主义不应得到保护，因此新移民必须要学会种族礼仪的微妙差别"。[1]

种族礼仪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同种族间的熟悉程度破坏了白人与黑人保持社会距离的传统，这反过来又威胁白人统一体的巩固"。[2]在齐斯·旦拉姆加(Tstisi Dangarembga)的小说《不》(The Book of Not)中，就白人对社会距离的关注有充分展现。书中描述了一些白人女生如何厌恶她们的黑人同学，甚至一想到与黑人同学打交道就会恶心。黑人孩子不小心撞上白人女孩，在描写白人女孩的反应时，旦拉姆加明显带着伤痛的心情

> 发生这种事的时候，她们——一类特殊的女孩——会有一种特殊反应。碰到你的时候，她们会收起优雅，即便是你遮挡了太阳的影子也不应该与她的身影交织一起。要是身影不经意地碰上了，她们脸上会泛起惊恐的表情，这往往会让你环顾四周，看看到底是什么可怕的怪物把她们吓成这样，之后你才会明白这个怪物就是你。这些女孩可以忍受跟我们一起上学，那是因为修女给她们优质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特殊的女孩可以忍受与我们接触的念头和现实。[3]

xxiv

旦拉姆加在小说中进一步写道："你来到学校，经常不得不掐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是否真的存在。证实你在之后，你往往会希望你没在那里。所以你躲躲闪闪，以免遇到别人。"[4]非洲人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意识会从这些遭遇中萌发，便很容易理解了。

面对这种脆弱的白人统一体和对罗得西亚身份所萌发的专有情

---

① A. Shutt, 'Matters Make a Nation: Citizenship in Southern Rhodesia, 1945 - 1963', paper delive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History, University of Zimbabwe, May 2004, p. 6.

② 同上，p. 6。

③ T. Dangarembga, The Book of Not (Banbury: Ayebia Clarke Publishing, 2006), p. 58.

④ 同上，p. 114。

感,伊恩·史密斯(Ian Smith)的《罗得西亚前沿》为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政策寻求更通用的参考。史密斯和他的意识形态追随者们在冷战政治中也发现了这一点,即如昂斯洛(Onslow)所观察到的,成了"一场在家门口的战斗",反共产主义、反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国际主义的结合使罗得西亚成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前线"。在描述这种论述对罗得西亚政治的影响时,昂斯洛认为,

> 罗得西亚处在"反共产主义斗争的前线,而一批坚定分子设法保持西方文明的标准"。这种看法已远远超越罗得西亚的前线政治家们。此外,罗得西亚阵线政治家所使用的反共言论和宣传削弱了白人社会中自由元素的民主空间。这是一种保持欧洲人团结的手段,并被用来作为超越种族的工具,即一种将罗得西亚阵线团结在一起的黏合剂,因为罗得西亚阵线作为群众运动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稳固。[1]

xxv 尽管面对的顽抗微不足道,白人殖民政治、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试图建立另一个统一的国家,这至少是一个愿望,可以将所有国家层面以下的种族身份和政治活动都囊括进去。艾博·曼达拉(Ibbo Mandaza)将新兴民族主义者的这种乐观看法描述为

> 抛开原始的忠诚的自决,如果有很多这种原始的忠诚的话;摒弃土著的和部落的种种联系,缔结尽管不是很明确的社会契约,建立民族主义的联合。昔日的部落首领正在成为未来民族主义的领导者。[2]

然而,这样的转变与其说是基于多层身份相结合的民族主义政治,

---

① S. Onslow, 'The Rhodesia/Zimbabwe Conflict, 1974 – 198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Oral History Conference: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Cold War, Post 1974, Monash University Johannesburg Campus, 29 – 31 January 2009.

② I. Mandaza, Race Colour and Class in Southern Africa (Harare: SAPES Books, 1997), p. xxiv.

倒不如说是一种目的论的希望，这种政治是一种多变的意识形态，有着多变的内容、不同的途径及不断变化的象征性资源。[①] 因此，民族主义的话语和政治与种族性的话语和政治并不是对立存在的，而是交叉重叠、相互抵触的，从相同的历史基础上获得可调配资源。[②] 殖民前的文化、社区、归属感等元素被包含、重新解释并写入民族主义政治的现代主义观点中，对种族政治的操纵并不是以其原有的种族身份为基础，而是基于对过去的记忆、象征符号和道德经济的重新组合。[③]

马斯普拉·西索尔(Masipula Sithole)关于津巴布韦民族主义政治中种族斗争的研究表明，在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内部的恩德贝莱、卡兰加、泽祖鲁(Zezuru)斗争中，以及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在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内部卡伦加、泽祖鲁、曼伊卡(Manyika)和恩达(Ndau)之间的类似冲突中，种族斗争的因素依旧重要。因此，在描述 1970 年代的津巴布韦民族主义斗争时，西索尔注意到："津巴布韦解放运动已经因部落主义和区域主义而四分五裂，但领导阶层和我们所谈论的组织很少公开承认这一点，而宁愿采用渺茫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④]尽管西索尔的文章没有解释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起源，但它的确表明了其对民族主义政治和西乌伊尔所说的"非洲民族主义是政治和身份的重新部落化"这一方式的持续影响。[⑤]

xxvi

除了种族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紧张，津巴布韦政治中动员土著居民拥护民族主义目标，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命题。因为虽然殖民统治的暴力、耻辱以及殖民占领的不公正为选择想象中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强大的基础，但是这种选择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仅仅建立在一致同意

① Young, 'Nation, ethnicity and citizenship', p. 246.

② S. Dorman, D. Hammett and P. Nugent, 'Introduction: Citizenship and its casualties in Africa', in Dorman, Hammett and Nugent (eds.), Making Nations, p. 3.

③ B. Berman, D. Eyoh and W. Kymlicha (eds.), 'Ethnicity and Democracy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B. Berman, D. Eyoh and W. Kymlicha (eds.), Ethnicity and Democracy in Africa (Oxford: James Currey, 2004), p. 3.

④ M. Sithole, Zimbabwe Struggles within the Struggle (Salisbury: Rujeko Publishers, 1979), p. 10.

⑤ S. Ndlovu, Do Zimbabweans Exist? p. 119.

的基础上的。诺玛·克瑞格(Norma Kriger)的文章已经表明,津巴布韦的农民参加独立战争不仅因为他们想去除白人殖民统治的歧视性政策,他们还与游击队结盟来改变乡村受压迫的状况。此外,克瑞格还认为,因为农民社区事务矛盾重重,游击队员动用乡村资源的重要举措是实施高压政策;正如迟提友(T. K. Chitiyo)所说,第二次非洲解放战争更像是一次内战而非民族解放斗争。[①]

虽然解放斗争的经历根据区域内的地理、政治、宗教机构以及融入殖民政治经济的程度而不同,克瑞格的文章还是指出了民族主义的暴力这一核心问题,这将成为殖民后国家的主要特点。这种解放运动中的暴力也被用来压制反对的声音。1970 年代初,围绕津巴布韦民族联盟(ZANU)中激进的津巴布韦人民军团体(ZIPA)展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斗争就是如此。据大卫·摩尔(David Moore)所言,津巴布韦人民军队面临的挑战"涉及解放战争意义的核心深处",并"自从正在成形的津巴布韦统治阶级初始阶段起一直在发展"。[②] 这种民族主义政党间的暴力对抗发生的背景是津巴布韦民族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主要解放党派之间的长期敌意和斗争,这种敌意和斗争只是在爱国阵线期间暂时被抛开,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再次爆发。解放斗争中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对民族主义政治中久拖不决的性别问题也有影响。妇女从来只是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的一小部分,她们被招入解放军队,主要充当"炊事员、护士,当然首先是勤杂和搬运工"。此外,厨司长和老兵"性侵许多女兵,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试图利用'习惯法'和基督教的教义,详细说明清教徒关于性关系和婚姻的清规戒律"。[③]

xxvii

① N. Kriger, Zimbabwe's Guerrilla War, Peasant Voi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T. K. Chitiyo, 'Zimbabwe's military historiography', Southern African Diaspora Review, 1(Summer), 2006, pp. 117 - 121.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nationalism, see B. Raftopoulos, 'Problematising nationalism in Zimbabwe: A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 Zimbabwe, 26(2), 1999, pp. 115 - 134.

② D. Moore, 'The Zimbabwe People's Army: Strategic innovation or more of the same', in N. Bhebe and T. Ranger, Soldiers in Zimbabwe's Liberation War (Harar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s, 1995), p. 5.

③ J. Nhongo-Simbanegavi, For Better or Worse? Women and ZANLA in Zimbabwe's Liberation Struggle (Harare: Weaver Press, 2000), p. xx.

然而，尽管民族主义政治被打上了政治胁迫和暴力的标签，民族主义的承诺和价值观仍然成为社区对政党和殖民后国家需求的重要参考。亚历山大、麦格雷戈(McGregor)和兰格引用他们在马塔贝莱兰的工作，写道：

> 在尚迦尼(Shangani)，就地方和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实践的道德争论不断指向民族主义的承诺和理念。民族主义的价值经常在与腐败和排他性的“部族主义”实践的对比中得以彰显。“种族”和“民族主义”在此不能互相包容或交替使用。
>
> 任何一方都有独立的历史并演变出不同的含义。我们这样认为并不是说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只是说它可以被用作广为诟病的殖民后政府一些做法的道德平衡物。[1]

因此，到了1970年代末，解放斗争的成果依然很不明朗。其特征是经历了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差异的殖民统治，并且支持带有胁迫与妥协痕迹的民族解放斗争。[2] 建立殖民后国家的强烈期望必须与这些分歧和差异做斗争，必须与改变殖民遗留下来的结构性不平等这一艰巨挑战做斗争。

殖民后时期[3]

xxviii

1979年，《兰开斯特大厦协议》(The Lancaster House agreement)结束了津巴布韦的解放战争，一部宪法由此产生。随之而来的是一系

---

① J. Alexander, J. McGregor and T. Ranger Violence and Memory: One Hundred Years in the 'Dark Forests' of Matabeleland (Harare: Weaver Press; James Currey, 2000), p. 7.

② I. Phimister, ' The combined and contradictory inheritance of struggle against colonialism', in C. Stoneman (eds.), Zimbabwe's Prospects (London: Macmillan, 1988), pp. 8 - 27; C. Sylvester, Zimbabwe: The Terrain of Contradictory Developmen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S. Ranchod-Nilsson, ' Gender politics and the pendulum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Zimbabwe',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32 (1), 2006, pp. 49 - 67.

③ Parts of this section are drawn from Raftopoulos, 'Unreconciled differences'.

列对少数人的权利的妥协,特别是对未来国内土地所有权的保障,对白人在议会中有代表名额的保证。实际上,该宪法赋予白人资本一段长达十年的巩固期。在这期间,彻底解决经济不平等遗留问题的工作事实上是被搁置了。《兰开斯特大厦协议》是迫于国内、地区和国际的联合压力而签署的,参照了罗伯特·穆加贝宣布的和解政策。和解政策体现了国家建设这一任务的脆弱性,因为它要缓解少数白人和国际社会的恐惧感,同时又要巩固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联盟(解放阵线)控制并拓展国土、为大多数人民提供资源改善民生的决心。[①] 和解的语言是慷慨的、包容性的邀请,邀请宿敌加入新兴的国家。用穆加贝的话来说:

> 从此以后,无论是心智上还是精神上,你和我都必须努力适应政治变化的现状。大家要用同志的友谊如兄弟般团结一致。如果昨天我打你、把你当敌人,今天你已经成为我的朋友,我们为共同的国家利益、忠诚、权利和义务而同舟共济。如果昨天你恨我,今天你我都无法回避相互间的友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要把过去的创伤和积怨翻出来不是愚蠢的吗?我们必须尽释前嫌,既往不咎![②]

然而,正当新的执政党着手给津巴布韦的政体烙上自己的印痕的时候,很快人们发现和解政策要以反对派政治力量的服从为基础。津巴布韦国家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暴力中诞生,这已成为国家政治合法化的中心因素,因此这个国家的"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迅速显现。1980 年代中期,马塔贝莱兰(Matabeleland)和米德兰(Midlands)的古库拉洪迪大屠杀(the Gukurahundi massacres)显示出一些征兆。这些征兆是 2000 年之后专制的中央集权的特征,"即过分强权的国家,本身在许多方面直接继承

xxix

① I. Mandaza, 'Introduc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in I. Mandaza (ed.), Zimbabw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1980 - 1986 (Dakar: Codesria, 1986), pp. 1 - 20.

② R. Mugabe, 'Independence Message', The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Documents of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Zimbabwe 1975 - 1980, Volume 7, December 1979 - April 1980 (Hamburg: Institute for African Affairs, 1984).

了罗得西亚的传统,对民族主义有特定的诠释”。[1] 如理查德・韦伯纳(Richard Werbner)所言,这种“准民族主义”,是受到“单一民族国家”之前的神话所鼓舞,但它仍然是“单一民族国家争夺权利和道德权威的产物”。[2] 这种冲突的结果是 1987 年统一协定的签订。该协定结束了马塔贝莱兰的暴行,有效地遏制了当时的主要反对党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并明确了马塔贝莱兰的区域从属地位。因此,当执政党用和解的语言来构建其与白人精英和国际资本的关系时,它还是采用了强势的词汇——“团结”来控制政治上的反对派。综上所述,在独立的第一个十年间,新生的国家通过对领土控制的主张和暴力手段的垄断,通过推行改善民众生计的发展计划来确立其统治。[3]

在 1990 年代末的经济自由化后期,正如詹姆斯・姆佑迪亚(James Muzondidya)在本书第六章中描述的那样:“悬而未决的种族问题以及种族对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所有权问题成了主要的话题。”结构调整计划的局限性变得越来越清晰,对民盟(解放阵线)治国理念的政治挑战变得越来越严峻。首先是通过工人运动对执政党执政才智和机制挑战;然后对国家提出宪法和民主改革的需求。这些挑战对更民主的公民权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种公民权强调人民主权这一中心,国家的合法性应以此为根基。这两个过程都产生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在后殖民时期首次对执政党掌权以及获得的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构成威胁。

正如布莱恩・拉夫托帕洛斯(Brian Raftopoulos)在本书第七章所写, xxx

---

① Alexander et al., Violence and Memory, p. 6; S. Eppel, ' "Gukurahundi": The need for truth and reparation', in Raftopoulos and Savage (eds.), Zimbabwe: Injustice and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pp. 43 - 62.

② R. Werbner, ' In memory: A heritage of war in south-western Zimbabwe', in N. Bhebe and T. Ranger(eds.), Society in Zimbabwe's Liberation War (Harar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s, 1995), p. 197; R. Werbner, 'Introduction: Multiple identities, plural arenas', in R. Werbner and T. Ranger (eds.), Postcolonial Identities in African (London: Zed Books, 1996).

③ 主权和发展问题的有益探讨参见:T. Blom Hansen and F. Stepputat, 'Introduction: State of imagination', in T. Blom Hansen and F. Stepputat (eds.), States of Imagination: Ethnographic Explorations of the Post-Colonial Stat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 - 38.

这些新的动态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讨论在前些年民盟(解放阵线)与津巴布韦人民“协商”达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契约”，也要求重新考虑国家归属的条件。此外，在讨论执政党的合法性时，通过重申其他社会力量在反殖民斗争中的贡献，质疑执政党专政历史，对过去的解放运动提出了种种疑问。在 1997 年发表的一篇“介绍”津巴布韦劳工运动历史的文章中，时任津巴布韦工会秘书长的摩根・茨万吉拉伊(Morgan Tsvangirai)表达了“更加开放和批判地撰写津巴布韦历史”的需要，并“提醒政治舞台上的胜利者，独立斗争是一个宽泛的、不平坦的过程，有着许多无名英雄和意想不到的结果”。而且，他表示“一个国家建构的历史，不应被压缩成一部分特定英雄的历史，而应该是一个有包容性、持续的质疑和重新审视的过程。在劳工运动中，我们主张我们的历史是这样一个过程”。[①]

在 1998 年和 2008 年间，津巴布韦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动乱，由此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国家在更加独裁的民族主义基础上重新组建，“通过民族和国家获得主权”[②]催生了一系列排外事件，把一些公民从执政党所建的“正统民族”中排除。这些排外事件是通过联合运用法律、滥用国家机构以及由国家领导和支持的暴力措施等来实施的。这种国家重建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围绕多主题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复兴，这些要素包括：土地的集中、解放历史有选择性地再现、白人的集体形象、西方、争取民主变革运动、民运及将民运支持者列为“国家敌人”和民族的局外人。兰格将这种独有的话语解释为“爱国历史”，因为这种解释将复杂的民族主义历史压缩为一系列的革命抵抗运动。兰格试图将这一新的历史与“歌颂抱负、现代化和抵抗”的更悠久的民族主义史学区分开来，[③]但是很明显，虽然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异，“爱国历史”还

xxxi

① M. Tsvangirai, 'Introduction', in B. Raftopoulos and I. Phimister(eds.), Keep on Knocking: A History of the Labour Movement in Zimbabwe 1900 - 1997 (Harare: Baobab Books, 1997).

② T. Blom Hansen and F. Stepputat, 'Introduction', in T. Blom Hansen and F. Stepputat(eds.), Sovereign Bodies, Citizens, Migrants, and States in the Postcolonial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6.

③ T. Ranger,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patriotic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The struggle over the past in Zimbabwe', Journal of South African History, 30(2), 2004, p. 218.

是从它先前的历史中汲取了一些象征性的资源。不过，兰格明确指出，他所描述的"非常片面的、狭隘的、制造分裂的""爱国历史"具有严重的局限性：

> 它的重点在于三个暴力斗争阶段——1896 至 1897 年的第一次解放战争，1960 年代末和 1970 年代的第二次解放战争，21 世纪初的土地回收即第三次解放战争，很多历史并未包含在内。它没有包含城镇，例如整个黑人工人斗争的历史。它省略或忽略了大多数非洲妇女及其为美好生活所做的斗争。它还淡化或贬低了民族主义者在漫长的解放战争岁月里以及在日常的生存和反抗中对历史所作的贡献。它沿用了冲突时期的"英雄"和"背叛"这样的字眼。冲突时期，非洲抵抗分子同武器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在第三次解放战争中，内部"敌人"根本没有武装，然而，公开言论有时将全国几乎一半的人定义为"叛徒"。[①]

在"津巴布韦危机"以及作为危机一部分的一连串人口迁移过程中，这个地区产生了新的认同和团结，这进一步引发了有关民族、公民身份以及主权等问题。尽管津巴布韦宣布了其泛非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立场，但是争取民主变革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需要不同形式的团结和主权，并以此作为运动的中心——争取公民民主权利。民盟(解放阵线)强调其纠正殖民时期土地问题愿景的重要性，反对派则同时要求对解放斗争中人权问题上存在的问题予以同等关注。[②]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不断重申其与津巴布韦国家的团结，南部非洲的劳工和民间组织呼吁扩大与被压迫的民族主义的受害者的团结，并呼吁限制国家独裁行为，这种独裁使公民权受制于与日俱增的压迫、排斥和

① Cited in G. Mazarire, E. Chipembere and T. Ranger, 'What History for Which Zimbabwe?' (Harare and Oxford: Unpublished paper, 2008).

② 关于此类问题紧张局势的最新讨论参见：S. Jacobs and J. Mundy (eds.), 'Reflections on Mahmood Mamdani's "Lessons of Zimbabwe"', Concerned African Scholars Bulletin, 82(Spring), 2009.

"例外情况"。[1]

xxxii

在解放战争快结束时,1980 年津巴布韦独立时的首任总理罗伯特·穆加贝曾呼吁民族和解。执政党与反对派经过数十年的斗争于2009 年建立联合政府。新总理摩根·茨万吉拉伊像穆加贝那样提出了新的请求,要求给这个"承受了这么多暴力的国家"进行全国性疗伤。[2] 此外,2008 年 9 月 15 日经南部非洲共同体商定的《全球政治协议》要求结束津巴布韦的政治僵局,其中一段条款要求联合政府"考虑设立一个机制,就独立前后政治冲突中的受害者该采取何种必须、可行的措施以促成国家团结提出建议"。[3]

这一条款的增加,回应了民间团体长期以来对"从过去的冲突中进行可信的、独立的真相调查"的需求。[4] 它也表明了津巴布韦殖民时期和殖民后历史中长期存在着暴力和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是津巴布韦民族和国家构建进程的标识。作为津巴布韦人,无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大批散居在外的,都在寻找成为津巴布韦公民的新的、更民主的方法,为此他们必须面对很多复杂的国家历史遗留问题。种族,民族和性别的细分,错综复杂的城乡斗争,过去殖民时期复杂的紧张局势和社会融合,这些仍是津巴布韦目前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真相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是调查滥用人权的个体事件及其受害者,往往会回避追查历史进程中更广的真相以及结构性经济暴力。[5] 此外,这些委员会使用的方法,受制于"区分相关真相和无关真相":哪

---

① G.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Tsvangirai calls for reconciliation', Zimbabwe Times, 23 Feb. 2009.

③ 'Agreement between the 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 Patriotic Front (ZANU-PF) and the two Movement for Democratic Change (MDC) Formations on Resolving the Challenges facing Zimbabwe', 15 Sept. 2008.

④ Zimbabwe Human Rights Forum, 'Transitional Justice Options for Zimbabwe', 14 Oct. 2008. Also 'Civil Society and Justice debate in Zimbabwe', see S. Eppel and B. Raftopoulos, Prospects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Zimbabwe (Pretoria: IDASA, 2008).

⑤ M. Mamdani, 'Reconciliation without justice' Southern African Review of Books, Nov./Dec. 1996; M. Fullard and N. Rousseau, 'Uncertain borders: The TRC and the (un) making of public myths', Kronos, 34(November), 2009, pp. 215-239.

些注定是侵犯人权范畴的,哪些是要从民族历史中剔除出去的零碎事件。[1] 这样的方法是不适合更深入地探究历史事实的。但有这样一个委员会来处理侵犯人权这一核心问题当然是必要的,撰写批判性的津巴布韦历史也是迫切需要的,以便"用可替代的、多样的方法解读过去"。[2] 在这个过程中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研判民盟(解放阵线)自身的历史,这段历史已对津巴布韦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个政党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对其殖民后表现的批评,不得不依靠对过去文过饰非的狭隘观点立足,以避免对自身历史有危险的批判,这也许并不足为奇。由于缺少这种历史交战,津巴布韦人原先不得不认可执政党关键成员的个人经历,如今却开始对执政党有所质疑。[3] 反对派同样需要对自己的过去、对自己在冲突中无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表现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同时谨记没人能够保证将来不做坏事。我们认为,批判性地面对津巴布韦的过去,面对其过去的方方面面,是"建立更好的津巴布韦"的必要部分,是超越霍勒斯·坎贝尔(Horace Campbell)所说的劳民伤财的家族式解放模式的必要部分。[4] 本书是对这一进程的一个小小的贡献。

本书的历史

写这本书的想法始于 21 世纪初。当时有些人想在津巴布韦大学成立津巴布韦历史协会,该协会的首要任务便是撰写新的津巴布韦史。当时没有一本单卷的史书能够提供津巴布韦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概貌。这个协会存在的时间很短,编写这样一本书的任务也尚未完成。

---

① L. Buur, 'The South African Truth Commission: A Technique of Nation-State Formation', in T. Blom Hansen and F. Stepputat(eds), States of Imagination, pp. 149 - 181.

② Mazarire, Chipembere and Ranger, 'What History'.

③ E. Tekere, A Lifetime of Struggle (Harare: SAPES Books, 2007); F. Chung, Reliving the Second Chimurenga: Memories from Zimbabwe's Liberation Struggle (Harare: Weaver Press, 2006).

④ H. Campbell, Reclaiming Zimbabwe: The Exhaustion of the Patriarchal Model of Liberation (Cape Town: David Philip, 2003).

2006年,编写史书一事再次启动,当时布莱恩·拉夫托帕洛斯加盟开普敦的司法与调解研究所,在那里他可以参与研究所的"转折点"校史工程项目。2007年着手编写时,津巴布韦仍处于可怕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中,而且看起来早日解决危机的机会渺茫。2009年初该项目完成之时,解决危机有了新的希望:2008年底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主持的调停下,签署了并不可靠的政治协议。本书以2009年初争取民主变革运动进入联合政府作为结束,而最初设定只写到2008年。以2009年初作为结尾从编史的感觉上更为合适,因此便有了"一个漫长的2008年"。

这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很多个人和组织的帮助。首先,我们要感谢所有的作者,他们花了两年的时间献身写作。我们要向那些在津巴布韦最困难和最紧张的物资和后勤条件下完成各自章节写作的作者们表示特别的敬意。我们还要感谢兰格和伊恩教授。他们两位是津巴布韦历史领域的先驱。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他们答应与作者进行批判性的对话。他们对各章节的评论和贡献是非常宝贵的,他们的工作带来的影响贯穿全书。福特基金会慷慨资助该项目。我们要感谢爱丽丝·布朗(Alice Brown)和她在南非福特办事处的团队的支持和耐心。开普敦的司法与和解研究所为该项目提供了管理服务。我们要感谢研究所新所长凡尼·杜·图特(Fanie du Toit)博士和津巴布韦项目官员舒维·农尼(Shuval Nyoni)的支持。布莱恩·拉夫托帕洛斯要感谢团结与和平信托基金对他在项目中担任的角色的支持,让他有时间和场地开展这一项目。最后,我们要感谢纺织者出版社的艾琳士·丹顿(Irene Staunton)和默里·麦卡特尼(Murray McCartney),感谢他们对本书的编辑工作以及他们对本书在津巴布韦发行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谨以此书献给津巴布韦人民以及一代又一代的历史人物,他们推动了"津巴布韦建国"的漫长历程。

布莱恩·拉夫托帕洛斯(Brian Raftopoulos)

A. S. 姆拉姆博(A. S. Mlambo)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殖民前津巴布韦的反思，850 年前后至 1880 年

戈拉德・奇科左・马扎瑞
(Gerald Chikozho Mazarire)

引言

1

我们所了解的这一段津巴布韦史一直在被重新解读。今天我们所说的殖民前津巴布韦的历史是学术理论的产物，也是民族斗争期间及其后流行看法的产物，因此有必要反驳当前对非洲认同的偏见，让争取独立的斗争在拥有自我判断和自主知识的理想范畴内开展。在非洲其他国家是这样，在津巴布韦也是这样。其实，从最近对领土主权、土地开垦、回归传统以及反帝国主义等主张可以看出，津巴布韦把殖民前的这段历史视为建国的主要起点。

人们通常认为殖民前津巴布韦的历史是一部帝国兴衰史——大津巴布韦、莫塔帕、托尔瓦、罗兹韦、恩德贝莱等帝国此兴彼衰。这些大国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将在这一章予以讨论，但不能误以为在这些国家之前或者之后，在这些国家疆域之外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大多数土著居民生活在更小的族群里，比起 20 年前，我们现在对其社会生活的了解要多得多。许多津巴布韦人引以为豪的是曾经有强盛的

“帝国”抵御外敌入侵,不过,很多拓荒的族群在津巴布韦那些贫瘠土地上开疆拓土的事迹也同样应该让人骄傲。

这一章将讨论不同居住环境下的几个族群——有的居住在森林里、有的在河谷、有的在高原或低地上——,然后逐一剖析其社会是怎样形成的。读者会碰到很多相同的基本用具和概念——涉及性别、牲畜、雨水、祖先、庄稼、工艺品和贸易——不过它们都有些重要的变化。

这些小社群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拓荒者迁居某地后,与先前的族群保持着联系。人们离开小社群去贸易、狩猎、朝圣或者去向神祇祈雨。更大的国家出现后,这些小社群不得不与其友好相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莫塔帕与罗兹韦帝国那样。但是在我们谈论居住环境之前,有必要再指出一点:许多作者简化津巴布韦历史,仅仅讨论一些特有的种族——如绍纳、恩德贝莱、文达、通加等。但本章不是绍纳及其成就的历史。19 世纪以前,绍纳这个词还没被使用,即便后来使用了,也是一种侮辱性的称呼。这是敌人对其对手的蔑称,没有人会把自己想象成“绍纳”。的确,这里曾经是一片广袤的区域,比现在的津巴布韦要大得多,一直延伸到现在的南非、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区域内的语言、信仰、制度大致相似。在这区域内,人员、商品和思想不断交流,大量不同身份认同的民族混居其间。

2

学者们倾向于以相当一致的语言来描述殖民前的津巴布韦。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的兴起、衰落,有时重新兴起是直线型的。这在全世界是一种普遍发展趋势,但在津巴布韦,需要加以特别修正。考古学家所说的从“原始”到“复杂”的社会转型,比如全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复杂性,是一套有趣的理论。然而,从任何视角看,哪怕是最小的部落,“复杂性”也不见得是最终成就;通常发展的连续性是基于“复杂”国家制度的分裂而得以延续的。大津巴布韦之后的历史尤为如此,这一时期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要素分裂瓦解,通过模仿、复制和修改传播到整个南部非洲。考古学家往往把这一过程称为“津巴布韦文化的衰退”,如果仅就建筑,就石头城(大津巴布韦)的质量而言,的确如此,其他的则

不然。[1] 在意识形态上——也许在政治上——这些文化变得更加有活力、更加复杂；与之相关的人们勇敢地生活在更加广袤的区域内，有趣的是，他们的语言也趋于实用，富有创新性。

津巴布韦殖民前的历史最受关注的是"转折点"部分，那些王朝的建立和分裂的过程已写入国家的"兴衰史"中，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民族认同出现，旧的则被改造、让渡或转而适应新的形势。这就要求对殖民前津巴布韦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修订。因为第一种假象就隐藏在"被遗弃"国度的故事中，这造成了南部边陲人烟稀少的印象。那里的人口在过去几百年间一直向北迁移，从林波波河流域迁到赞比西河，直到18、19世纪该地区才有罗兹韦、卡伦加部族定居。当然，没有气候和环境的数据足以证明这样一个理论，但是人们假定这种定居模式是由于商道的变化而引起的[2]。口述史、语言和文化等形式的人类证据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相关解读得依靠残存的器皿和骨骸。[3] 大津巴布韦和马篷古布韦(Mapungubwe)消亡后，我们对当地留存人群的情况，以及对继续向南迁移人群的情况知之甚少。

第二种推测与"绍纳"这个术语有关。这是一个集合名词，汇集一个民族语言、文化和政治上的特性，而这个民族直到19世纪晚期才知道自己叫绍纳，即便当时对他们还有"瓦尼亚伊"、"阿贝查比"、"卡伦加"或者"霍里"等各种称呼。[4] 绍纳人被认为是津巴布韦先祖的后裔。其传统可以追溯到豹丘民族(the Leopard's Kopje people)。在现代意义上，绍纳只不过是指一种方言，在政治语境下，它却指的是人口更多的族群。

"津巴布韦高原"，它的民族和器皿

大多数殖民前的活动发生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根据其环境和地

---

① 在这里，"文化"指的是部落认同，通常由考古学家根据陶器的风格予以界定。

② G. Pwit, 'Trade and economies in southern Africa: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Zambezia, 18, 1991.

③ D. N. Beach, zimbabwe before 1900, (Gweru: Mambo press, 1984), ch. 1.

④ F. W. T. Posselt, Fact and Fiction (Bulawayo: Books of Rhodesia, 1935), p. 12.

形被称为"津巴布韦高原"。"津巴布韦高原"这个词经大卫·比奇的推广而普及,用以表述一个"巨大的T字形"的区域,"它狭长地带向东伸向大海,另一端则向西伸向卡里巴湖(Kariba),主干部分向西南部延伸"。[①] 到后来它成为一个既定的概念,该地区居住的人口被塞夫河谷分开,"呈巨大的新月状分布",由此便有了比奇比奇那广受争议的"大新月论"(Great Crescent Theory)。[②] 随后的研究在讨论津巴布韦时好像只把它当做一个高原。然而,即便大新月论能像它所说那样被接受,它也表明人是权力更重要的交换品,超过贸易和环境。考古学家倾向于根据出土陶瓷的风格来界定殖民前津巴布韦的民族及其所处的时代。尽管津巴布韦的语言与陶瓷风格之间的关联性一直有争议,但这种关联性在南部非洲考古学界却被广为使用。在津巴布韦,产生了一种被称为"津巴布韦文化"的现象。这种文化融合了共有的建筑、空间和其他象征特征等。[③] 这种文化身份可以追溯到"豹丘文化",它的方言众多,与说现代绍纳语族群的先祖有广泛的联系。这群移民多多少少与班图迁徙有关,代替或改变了林波波河流域业已存在的属于"兹佐文化"(Zhizo Culture)的土著族群。这些土著反过来迁移到卡拉哈里(Kalahari)沙漠的边缘,形成托兹维莫迦拉文化(Toutswemogala Culture)[④]。豹丘文化民族被假定为会讲古代卡兰加方言,他们的后裔在语言和陶瓷风格上有关联,这些语言和陶瓷在总体上极为相似。因此它们符合考古界关于"绍纳"或"津巴布韦"陶瓷文化的类属描述。它又可细分为古曼耶(Gumanye)、哈拉雷(Harare)和穆森格孜(Musengezi)等次文化。这可以被认为是代表着绍纳语系的传播。[⑤]

---

① D. N. Beach, Zimbabwe before 1900, p. 7.

② D. N. Beach, The Shona and their Neighbours(Oxford: Blackwell, 1994), p. 12.

③ 有关该文化的专述请参见 Pikirayi, The Zimbabwe Culture: Origins and Decline of Southern Zambezian States(Walnut Creek: Atamira press, 2001).

④ 同上, chs. 3 and 4。

⑤ T. N. Huffman, The Leopard's Kopje Tradition(Salisbury: Trustee of the National Museums and Monuments of Rhodesia, 1974), p. 130.

绍纳这个名字带给现代历史学家太多的挑战。不仅是年代上的问题,而且我们正在讨论的民族被自己和外人大多数情况下称为卡伦加。[①] 对卡伦加这个名称的由来也有各种理论:"太阳的子民(卡兰加)"、"小妾的儿子(穆卡伦加)"等。[②] 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卡伦加"指的是今天津巴布韦南部所讲的一种绍纳方言,现在这一地区居住的民族是 18－19 世纪从津巴布韦高原的北部和东部迁移过来的。他们的迁移被错误地称为"卡伦加迁移",并以此来解释其现代的身份,这既是一个误称,年代上也不符。[③] 毋庸置疑的是,在公元 900 年以后,相同的一些人生活在同一区域里,几乎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身份会因为区域内外的交流而产生变化。"大津巴布韦"(1290－1450)的卡伦加也许是西北部的"通加瓦"(1450－1690)、杜面丹德(Dande)地区和赞比西河流域莫塔帕(1450－1902)的一部分,以及后来西南部的罗兹韦(1690－1830)的一部分。1750 年前后,卡伦加人口在津巴布韦中部和南部再度兴起只不过是演变过程中的又一阶段。　5

无论是语言学还是考古学都很清楚,"高原"绝不可能被当做一个分析概念,为这些津巴布韦民族的居住模式和分布情况提供所有的答案。[④] 这里并不是唯一可选的定居地,也不见得是最理想的定居场所。新一轮的考古研究力图换种方式来使用"复杂性"这个概念,以此来解释什么叫"复杂的体系"。这一现象接受了史前社会自我适应的成长周期,允许它们"崩溃、重组、更新与重建"。[⑤] 在沙市(Shashi)——林波波　6

---

① S. I. G. Mudeng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Mumhumutapa (Harare: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 1988), p.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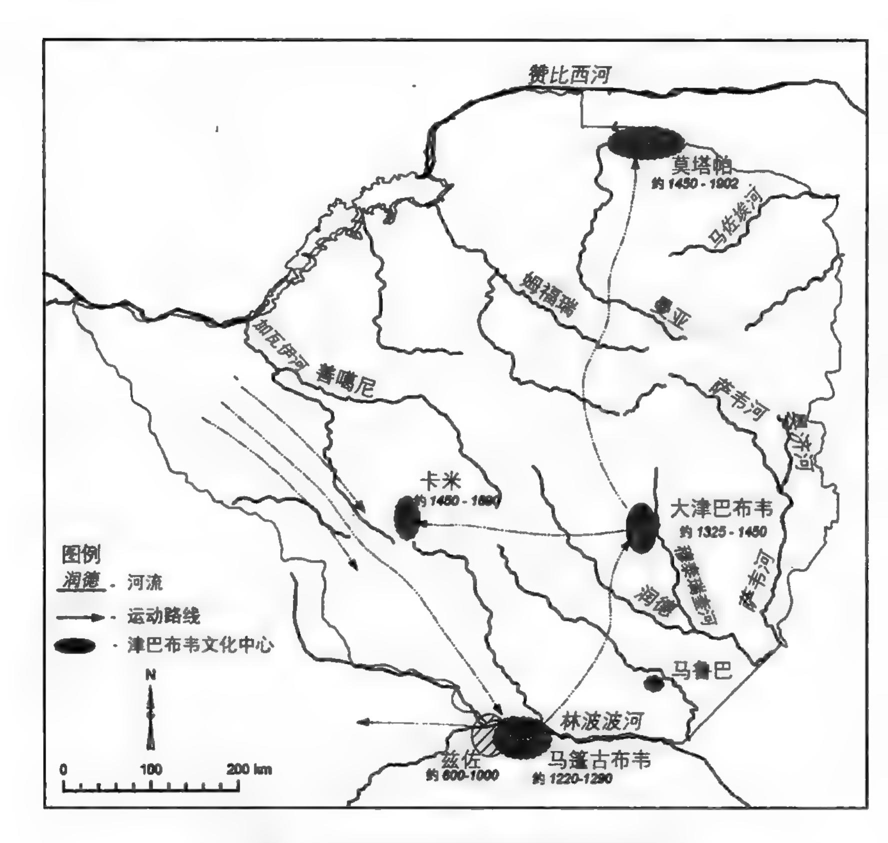
② G. M. Theal,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before 1795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1910), III, p. 225; posselt, Fact and Fiction, p. 137.

③ For example, Pikirayi, The Zimbabwe Culture, ch. 8.

④ 参见 the critique by I. Pikirayi, 'David Beach, Shona history and the archaeology of Zimbabwe' Zambezia, 26(2), 1999, pp. 135－144。

⑤ M. Manyanga, Resilient Landscapes: Socio-Environmental Dynamics In the Shashi Limpopo Basin, Southern Zimbabwe c. Ad800 to the Present (Uppsala: Studies in Global Archaeology, 2007), p. 15.

5



地图 1.1 津巴布韦高原上豹丘文化的发展

（该地图以及本章的其他地图由津巴布韦大学历史系考古所的希克·卡特斯玛丹噶[Seke Katsamudanga]绘制。）

6 盆地，此概念得到认可、使用，晚期豹丘文化据说开启了重组和创新的新机会，使得山谷继续有人居住。在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后的 40 多年里，切特·兰卡斯特(Chet Lancaster)根据居住地地理分布对津巴布韦殖民前民族构成的研究一直在进行。[①] 尽管研究重点是赞比西河谷中游的通加王朝，但其理论把该地区“绍纳”的传播与根据居住模式来界定的独特的种族身份演进联系起来。因此这就有可能将居住在河

① C. S. Lancaster, ‘Ethnic identity, history, and tribe in the middle zambezi valley’, *American Ethnologist*, 1(4), 1974.

谷/低地的民族与居住在高海拔地区的民族区分开来。

语言学方面,"戈巴"(Goba)或"戈瓦"(Gova,湿地、河谷之意)等词汇与居住在低地的绍纳人所说的方言群有联系。该词曾被广泛用于北部赞比西河流域的低地和南部的林波波河周边地区。吉尔伯特·皮威提(Gilbert Pwiti)更早时候曾对赞比西河河谷一些戈巴人的居所选择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他们的生存经济决定着其定居点的选择,并指出15世纪以来他们迁移居所的行为是有连续性的。[①] 一大群"瓦戈瓦"(VaGova)民族居住在延伸到南非索特潘斯堡(Zoutpansberg)地区的南部低地草原,他们的情况可能也一样。如下文所述,后来的语言学和人种学研究表明他们有共同的"绍纳人"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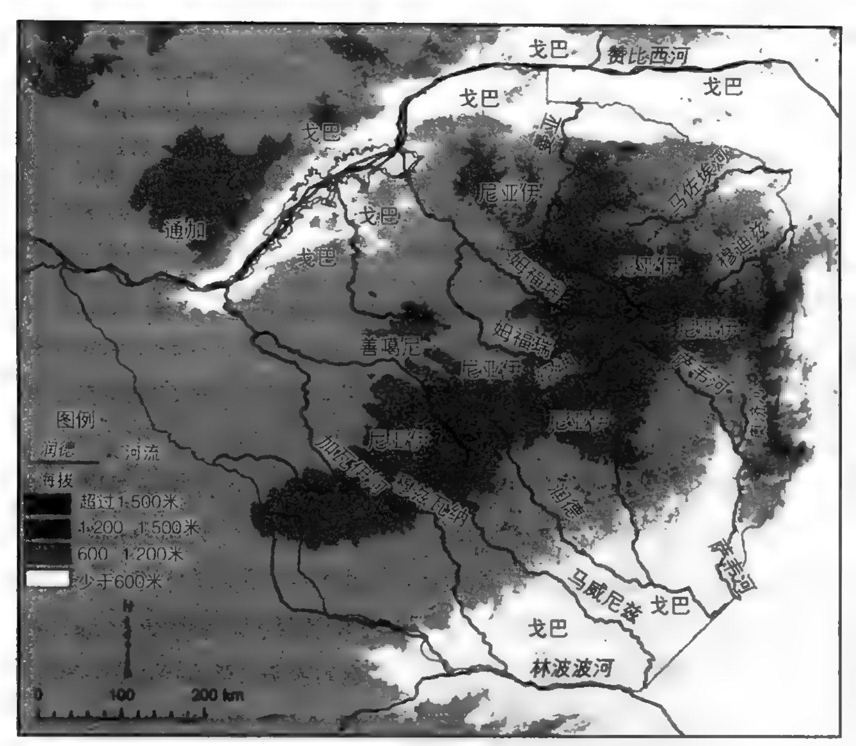
相似地,"尼亚伊"这个名称除了指"随从"外,还有高地居民的意思。它通常指居住在高原上的"绍纳人"。这片高原成为南罗得西亚英属殖民地后,早期的猎人、旅行者、牧师称此地为"巴尼亚伊兰"(Banyailand),这也就不足为奇了。[②] 这种见解有待人种学进行深入研究。对这些因其居住地域而不断得到描述的民族,有这样的假设:要么是环境不适宜人类居住,要么是居住此地的人只能被叫做"绍纳人"。第一个假设源于迁移的连续性和定居行为的适应性,这引发了由来已久的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因为居住在高地、低地、山区、平原、河谷以及干旱地带的人们获得了他们自己的民族标识。[③] 第二个假设要探寻处在各种环境下的民族交流及其产生的结果。最后,我要解释那些界定或重塑这些民族意识形态、语言、政治、社会组织的因素。如果这一分析从"大津巴布韦"开始,就会变得更加清晰,因为大多数关键概念很容易追根溯源。

7

① G. Pwiti, Continuity and Change: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Farming Communities in Northern Zimbabwe (Uppsala: Studies in African Archaeology13, 1996), pp. 140 - 141.

② F. Coillard, On the Threshold of Central of Central Africa(London: Frank Cass, 1897), pp. 22 - 30.

③ W. Beinart and McGregor, History and Aafrican Environments (Oxford: James Currey, 2003).



地图 1.2 戈巴人和尼亚伊人的定居模式概貌

（根据兰卡斯特《民族认同》第 714－719 页的第一、第二张图表修订而成）

8

约 1450 年之后低地上的民族分布

南部低地：戈瓦人和文达人的起源与扩散

一些有价值的成果来自对“大津巴布韦”以南口头传说、语言和考古的共同研究。这些研究共同展示了这座古城消亡之后，其南部地区人口的命运。杰尼·罗伯斯(Jannie Loubser)在马篷古布韦发现了陶瓷年序与口头传说之间的关系，这揭示了两个与绍纳人相关的居住地之间的连续性。有证据表明，1450 年前后，有“绍纳人”迁入索特潘斯堡以北地区，这些人主要是“大津巴布韦”的支系。然而，这个地方已经有当地的“绍纳人”和索托人定居，因此到 1550 年，他们之间的交流产

生了文达语。[①]

学者们试图将现代文达的民族志与古代“大津巴布韦”口头传说联系起来,这产生了很多学术争论,但是大家一致认为文达族有自己的起源,来自林波波河以北。[②] 文达的口头传说确定了居住在山区的恩戈纳(Ngona)、姆贝兹(Mbedzi)和里姆比图(Rembetu)部落,这些部落“因为害怕敌人侵袭,用大石头建造村庄”。[③] 1969年,拉鲁塞(Ralushai)和格雷(Gray)在索特潘斯堡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了隐居山林的恩戈纳族,他们至今仍然居住在其祖先津巴布韦人势力可及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口头传说“令人失望,非常贫乏”。[④] 在仔细分析了其图腾(mitupo),并将其图腾与姆贝兹等其他土著部落的口述史进行比较之后,我们清楚地发现恩戈纳与姆贝兹族对今天文达族的身份和语言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至于里姆比图族,我们对其语言和居住地有更多的了解。语言学家认为,里姆比图语属于绍纳方言群的戈瓦语或戈瓦哈(Govha)语,这些语言主要在布比河(the Bubi river)下游的津巴布韦东南部使用。[⑤] 从更广的意义上说,这些语言融合了更为现代的方言,如图瓦曼巴语(Twamamba)和罗姆韦(Romwe)语。温特泽(J. P. Wentzel)等语言学家认为“这是方言味最少的(绍纳语),正趋于消亡”。1950年代瑞典传教士哈拉尔德·冯·斯卡德(Harald von Sicard)收集的人种学证据表明,图瓦曼巴语来源于“古里姆比图语”。[⑥] 最近考古

---

① J. Loubser, Oral Traditions, Archae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Venda mitupo, African Studies, 1990, pp. 26, 28.

② T. N. Huffman, Snakes and Crocodiles: Power and Symbolism in Ancient Zimbabwe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③ M. M. Motend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Venda And the Lemba' (Pretoria: Department of Native Affairs, 1940), p. 51.

④ N. M. N. Ralushai and J. R. Gray, 'Ruins and Traditions of the Ngona and Mbedzi among the Venda of the Northern Transvaal', *Rhodesian History*, 8, 1977, p. 3.

⑤ P. J. Wentze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nda and Western Shona(Pretoria: Unisa Press 1983), vol. II, p. 40.

⑥ H. Von Sicard, The origin of Some Tribes in the Belingwe Reserve, NADA, 27, 1950, p. 10.

学家汤姆·霍夫曼(Tom Huffman)根据文达族与恩戈纳族陶器的相似性,重新构建了文达族的身份。这也表明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马蓬古布韦人的后裔,而有些则是索托-茨瓦纳(Sotho-Tswana)人的后裔。[1] 这种考古学与语言学结合的模式符合霍夫曼自己的语言伞状分类(umbrella classification)。这种语言上文已突出强调,是豹丘文化民族所说的"古卡兰加语"。



图 1.1 Belingwe 保护区内伦巴(lemba)村庄风光

(来源: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

从大津巴布韦再往西南,津巴布韦文化模式沿着塞夫河谷一直传播到莫桑比克沿海地区,那里各种类型和规模的津巴布韦人,甚至可以追溯到马达加斯加。在 16 世纪葡萄牙人的文献记录里,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确认为卡伦加王朝典型的子民。其中之一是现代索法拉镇(Sofala)附近的甘巴(Gamba)酋长国,其都城曼伊科尼(Manyikeni)已被考古学家发掘。发掘结果显示它明显与大津巴布

[1] T. N. Huffman, Handbook to the Iron Age: The Archaeology of Pre-Colonial Farming Societies in Southern Africa (Scottsville: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 2007), p. 419.

韦王国[1]处于同一时代。另外一个是基特夫(Kiteve)，在葡萄牙人的文献里有详细记录。基特夫与莫塔帕的一个叫尼亚慕达(Nyamunda)的叛军首领有关。下文有关于此人的详细介绍。[2]

北部低地：戈瓦人与“通加人”

在北部，“戈瓦”这个名字再次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它也用来指生活在赞比西河两岸低地上的居民。[3] “戈巴”这个词则是用于指说绍纳语的民族居住的那一段赞比西河谷。该词首见于公元 1600 年前的历史记录，当时那里的居民从赞比西河谷西迁，来到赞比西河与萨尼亚蒂河(Sanyati)的交汇处。[4] 在通加族等非戈巴人的口头传说中，认为戈巴难民是为了逃离南部绍纳王国通过战争和贸易进行的掠夺。通加人看不起这些外来移民，因为他们定居在该地区最贫瘠的地方，生活极度贫困。[5] 他们被看做是从南方绍纳王国迁移到此的第一波移民，从其到达北部低地的时间可以推断他们来自大津巴布韦。

到 1690 年代，这些移民与通加人全面融合，因此一些历史学家称他们为通加/绍纳人。我们的兴趣不是对“绍纳”这个集合名词产生误解，而是要说清楚这些北方的“瓦戈瓦人”(VaGova)。兰卡斯特表明绍纳人传统上倾向于指那些居住在河谷的人，或没有明确酋长的部落，如通加和戈瓦。不过，兰卡斯特很快又指出，这些民族标识似乎可以互相替代，这表明了种族传承上的同质性。[6] 然而，通加人的起源一直存疑。也许我们可以确认被称为“原始通加人”(proto-Tonga)的民族。他们兴起于公元 9 世纪，在卡夫河周围的草原上蓄养牲畜，然后逐步下

---

① P. J. J. Sinclair, Space, Time and Social Formation: a Territorial Approach to The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Zimbabwe and Mozambique (Uppsala: Societas Archaeolgica Upsaliensis, 1987), p. 69.

② M. Newitt, A History of Mozambique(London: Hurst, 1995), pp. 41 – 44.

③ Lancaster, Ethnic identity, pp. 714.

④ D. N. Beach, The Shona and Zimbabwe(Gwelo: Mambo Press, 1980), p. 72.

⑤ Lancaster, Ethnic identity, pp. 715 – 716.

⑥ 同上，p. 709。

迁到赞比西河流域，定居在格温贝河谷(Gwembe valley)，“所到之处，吸纳早期铁器时代更小的部落”。[①] 如果说现代通加人是来自莫塔帕和罗兹韦时期晚期“绍纳人”和“原始通加”人的混种，那很可能15世纪起逐步迁居此地，说绍纳语的早期民族来自大津巴布韦。[②]

对当地土地神以及津巴布韦土地神龛的研究表明，这些人的祖先与“早在15世纪中期”从(大)津巴布韦迁移至河谷的第一波移民有关。[③] 这些巴尚古(basangu)，或王室神灵与以前的国王、征服者、通加河谷商人的活动有关。由于南部有文达人，通加人有两次由于“绍纳人”入侵而迁往河谷的移民潮。第一波在15世纪(见上文所述)。第二次由贸易和掠夺奴隶引发，移民大部分来自克里克里(Korekore)(如莫塔帕)以及赞比西河下游。[④]

总之，有这么一个与豹丘文化有关的独特族群，他们喜欢在低地与河谷地带寻求安全居所，能够比较容易地用戈瓦人或戈巴人的名字加以识别。他们通常是早先的土著部落，但随后被外来民族所代替，这些外来民族并不一定是绍纳人。不过，在外来移民的征服过程中，这些土著经常利用先民的重要性，求取对土地、神灵、祈雨的所有权。这个过程在低地进行，在高地也一样。

高地和高原周围的人口分布：依附主义和尼亚伊的崛起

尼亚伊人组成了高地“绍纳”的另一个部落。尼亚伊这个词通常指的是莫塔帕国的士兵。在有关1760年代莫塔帕甘亚巴德兹(Mutapa Ganyanbadzi)与班高玛(Bangoma)王子争夺继承权战争的描述中，斯坦伊斯劳·穆登格(Stanislaus Mudenge)提到“班高玛以及他的一些卡伦加和瓦尼亚伊随从”被葡萄牙部队囚禁。他谈及这一事件时好像卡

---

① Lancaster and K. P. Vickery (eds.), The Tonga Speaking People of Zamibia and Zimbabwe: Essay in Honor of Elizabeth Colson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7), p.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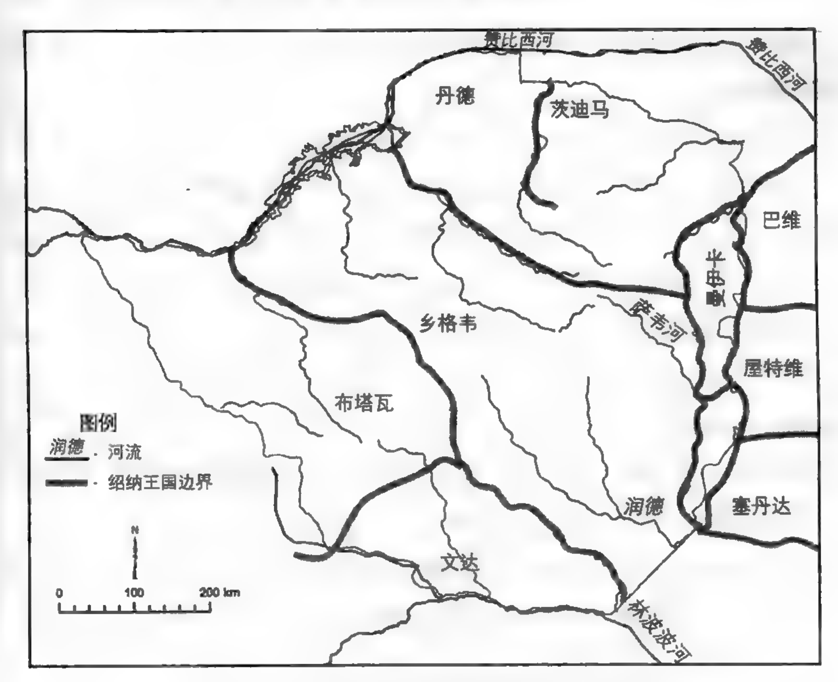
② Pwiti, Continuity and Change.

③ Lancaster, 'Spirits of the among the BanaMaomga on the Shona-Tonga frontier', p. 38.

④ 同上。

伦加和瓦尼亚伊是不同的部落。[①] 另一方面，比奇(Beach)将这个词的使用追溯到 1696 年，当时它指的是莫塔帕国的年轻士兵，不过后来在高原南部地区它指的仅仅是罗兹韦昌加米尔(Changamire)的臣民。[②] 有趣的是，弗里茨(Fritz Posselt)提到了瓦罗兹韦(vaRozvi)： 12

> 他们也以瓦罗兹威(Varozwi)著称，有时被称为“巴尼亚伊”(Banyai)。据一些当地人说，这个名字来自曼博(Mambo)两个觊觎王位的儿子的争吵。吵输的一方叫“巴尼亚伊”(据说是下人或奴隶的意思)。其他提供消息者说这个名字的起源年代无法追忆，它的意思是“信使”，通常专指酋长的送信人。[③]



地图 1.3 公元 17 世纪绍纳王国的大致分布

(来源：穆登格《莫诺莫塔帕政治史》)

---

① Mudeng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Mumhumutapa (Harare) pp. 134 – 135.

② Beach, The Shona and Zimbabwe, p. 150.

③ Posselt, Fact and Fiction, p. 135.

于是我们会看到一个有趣的情况，长期以来一个民族标识贯穿了高原地区的历史。如果我们接受“绍纳”这个术语其实是一种误读，而“卡伦加”很可能指的是同一些人，这就表明“瓦尼亚伊”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但这与现有的证据又不一致。有必要解释一下其起源，弄清楚这个术语的意思。最近所做的这方面的工作是上文提到的兰卡斯特的研究。该研究将尼亚伊的起源置于高原居民的社会系统中，那里的“大人”会给独立的年轻人安排入赘婚姻。这种婚姻模式在现代绍纳族叫“库特玛乌伽里里”(kutema ugariri)，富有的男人因此可以将自己的姊妹或女儿许配给年轻男人，换取其劳动力。这些年轻男人转而也与其岳父家建立了依附关系，拓展自己的活动领域，成为亲信、卫士、办事人员、间谍，或随着其岳父家族势力范围的扩大，成为其幕僚(makota)。[1]

13

我在其他文章里讨论过19世纪南部津巴布韦领土防卫结构的发展。通过联姻，家族首领把他们那些通常来自其他图腾崇拜部落的女婿(vakuwasha)封为幕僚，并将他们同族的亲属封为玛亲达(machinda)或地方官员(governor)。家族首领将自己领地上的土地分封给越来越多的卫士，结果地方长官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些地方长官负责保卫家族首领控制的政治中心。[2] 这个模式被广泛复制，从乡村到地区到省级，每一个层面的人数都在增长。[3] 兰卡斯特关于尼亚伊身份起源的解释与一种说法相似：在国内，“当地叫做瓦尼亚伊或克塔克塔(kotakota)的年轻人”的贡献超出一般想象，变得非常重要。尼亚伊在高原地带，对人的控制变得越来越重要，超过对物资资源的控制。除了履行日常职责，这些瓦尼亚伊伴随首领左右。年迈之后，这些瓦尼

---

① Lancaster, Ethnic identity, pp. 714.

② R. M. G. Mtetwa,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Duma(D.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Rhodesia, 1976), pp. 164 – 165.

③ See, for example, J. G. Storry, 'The settlement and territorial expansion of the Mutasa dynasty', Rhodesian History, 7, 1976, pp. 24 – 25, and Mtetwa,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Duma', p. 164.

亚伊会分封到在保护主领地外围的土地，这样他们也可以成为小首领，并逐步成为自己的瓦尼亚伊的头领。兰卡斯特描写了卡夫河汇流地区戈巴族的这种情况：

> 家庭层面，年长者和他的瓦尼亚伊是村长的瓦尼亚伊。村长是近邻村落头领的瓦尼亚伊，这个头领管辖数个村庄，是个小酋长。再往上就是当地的酋长和最高首领。每一个下级部落是其上一级的瓦尼亚伊。每当统治结构出现不稳定局面时，不时会发生冲突。[①]

在兰卡斯特研究的戈巴人中，居住在汇流区的叫瓦尼亚伊，是尼亚伊南部高地首领的部属；而根据早期人种学家的研究和殖民管理者的记录，"尼亚伊"不知怎的变成了一个"部落"。不管怎样，赞比西河南部的民族可能是莫塔帕帝国直到上述时段的瓦尼亚伊，这些瓦尼亚伊到1690年代罗兹韦王朝兴起时成为一支重要力量。让我们逐个来看一下这些高地瓦尼亚伊的分布。

北部高原的莫塔帕/克里克里

莫塔帕王国似乎是通过尼亚伊制度兴起的，它至少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变迁阶段。国家似乎也体现着尼亚伊人变迁的进程。[②] 第一阶段是政治巩固期，通过逐步的扩张和酋长制度的不断完善来实现。第二个阶段是这个附庸国面临国际商业资本入侵的困境。这些资本来自欧洲，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向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输出。最后一阶段反映的是这种困境对封建附庸国"统治阶层"的影响，不时发起的反封建斗争最终产生了罗兹韦，它的种族身份具有阶级性，其先祖是武士。

---

① Lancaster, Ethnic identity, p. 718.

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莫塔帕"这个词有三种用法，有时指莫塔帕统治者，有时指莫塔帕民族，但更多的时候指莫塔帕国家自身。

其实,如果像“穆托塔”(Mutota)传说中那样,那些从大津巴布韦王国北迁的民族是受到“乡格韦(Shangwe)东北部充裕的岩盐”的吸引,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这批人从来没有选择定居在戈奎(Gokwe)?为什么要忽略土地更肥沃、岩盐储量更多的塞夫河谷?[1] 即使如此,新生的莫塔帕王国利用北部塔瓦冉(Tavara)/通加部落权力分散的特点稳固了政权。通过与这些部落的联姻、建立经济关系以及对其继承权纠纷的政治干预,卡伦加确立了自己的控制权,扩大了其影响力。[2] 就这样,恩佐-山姆山阳伽(Nzou-Samsanyanga)王国也得以建立。它有一个庞大的附庸国网络。这些附庸国通过征服和镇压将其势力扩展到整个丹德高地,通过对极为重要的穆斯林贸易的控制,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莫塔帕的首领(通常认为是穆托塔)通过分封土地、认可近亲结婚礼制、创建神圣的王权来巩固他的统治。统治者想把自己的亲属变成臣民时,政治机制与意识形态的相互依存就显得十分必要。随着莫塔帕影响力的扩大,其社会结构被封建附庸国仿效、传播。可能是这种趋势将莫塔帕首领及其追随者当作了瓦尼亚伊。这个当地的称呼指的是高地民族,在那里这种生活秩序极为常见。莫塔帕民族不会轻易贴上任何地理性的标签,因为其后任统治者经常将都城从河谷迁进迁出。不过克里克里方言却成为莫塔帕王国稳定的组成部分。[3]

15

莫塔帕的尼亚伊对外扩张时,可以看得出三个区域有新兴的势力出现:通加瓦(Togwa)王朝统治着西部的格鲁斯瓦(Guruuswa)/布塔瓦(Butwa)地区;北部地区通过征服赞比西河谷的通加/塔瓦冉部落进行扩张;东部更远的地方是巴维(Barwe)和曼伊卡(Manyika)。在正南方,莫塔帕取代了尤特夫(Uteve),并且成功地进行统治。莫塔帕建国初期经历的困境是统治阶层的不稳定造成的。1490 年左右,一个名叫

---

① L. Mutema, Salt making, myth and conflict in Chireya, Zimbabwea, 4, 1996, pp. 44 – 53; Mudeng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Munhumutapa, p. 39.

② Mudeng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Munhumutapa, p. 39.

③ Pikirayi, The Zimbabwe Culture, ch. 6.

昌加米尔的通加瓦人杀死了在任的莫塔帕统治者穆克姆博洛(Mukombero)，成功篡夺莫塔帕王位。但是昌加米尔统治四年后就被穆克姆博洛的一个儿子奇库约·奇萨马伦谷(Chikuyo Chisamarengu)废黜。[①] 与此类似，莫塔帕派驻尤特夫的首领宣布独立，开始与莫塔帕竞争，争夺尚未被征服的曼伊卡高地。南方强大的首领(文献记载称为尼亚慕达)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有效地阻断了莫塔帕与索法拉方向沿海地区的直接联系。

到了 1515 年前后，莫塔帕面临更为激烈的反叛，难以应对，很快它必须在多条战线平叛。有一些反叛者结成强有力的联盟进行抵抗，如沙契特夫(Sachiteve)尼亚慕达和通加瓦的昌加米尔就是这样。[②] 一直到 1530 年前后尼亚慕达衰亡，并且将穆斯林商人排挤出去后，葡萄牙人才得以进入莫塔帕。再往东，像尤特夫一样，曼伊卡王国在 15 世纪晚期脱离了莫塔帕，控制了布齐河(Buzi)北部的土地。这一带处于邻邦尤特夫扩张分子和北方强大的巴维统治者的夹击之中。尽管是莫塔帕的附属国，曼伊卡王国的统治者契刊伽(Chikanga)在大多数时候享有自治权。曼伊卡的历史由当地的历史学家杰森(Jason Tichafa Machiwenyika)记录。[③] 杰森将王国的起源追溯到尼亚幕布凡比尔(Nyamubvambire)，他推翻了早期一个叫穆庞达(Muponda)的王国。此外，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觊觎王位者勾心斗角、互相争夺，曼伊卡的历史充满这样的政治传说。[④]

16

与此同时，在北面的核心地区，莫塔帕王国把一个新兴的民族叫做克里克里。根据迈克尔·布尔德伦(Michael Bourdillon)的记叙，真正的克里克里人是莫托塔的后裔；他们大多数被发现定居在赞比西河谷

---

① Mudeng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Munhumutapa, p. 49.

② 同上，pp. 52 - 53。

③ H. H. K. Bhila, Trade and Politics in a Shona Kingdom (Harlow: Longman, 1982), pp. 10 - 13.

④ D. N. Beach, Oral Tradition in Eastern Zimbabwe: The work of Jason Tichafa Machiwnyika, university of Zimbabwe, History Department Seminar Paper no. 99, 1997.

和马夫胡拉·马汗德德哈(Mavhuradonha)山脉的北部,因此也叫“河谷克里克里人”。[1] 在北部的地位逐渐稳固后,穆托塔成功地吸纳当地属于恩哈里·尤那恩度罗(Nhari Unendoro)图腾崇拜的塔瓦冉/通加女巫兹娃姑鲁(dzivaguru)和卡露娃(Karuva),使她们发挥各自优势,向一个已经相当复杂的世俗体系里注入强大的宗教元素。莫塔帕/克里克里的民族身份由这个世俗体系来界定。实际上,葡萄牙人最终来到莫塔帕时,他们必须面对这种稳固的体系;他们与莫塔帕的关系,无论是贸易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其实都脱离不了宗教。葡萄牙人希维拉(Fr Goncalo da Silveira)之死,以及后来葡萄牙人为他报仇进行的报复性远征并最终征服莫塔帕就是以此为背景的。葡萄牙人进入这个精密的政治社会体系的唯一方法是靠他们的高尚信仰(nobility),尤其是靠使王室成员皈依基督教。国家饱受内乱,朝廷又受谋反、政变阴谋困扰,莫塔帕王国显然摇摇欲坠,但葡萄牙人 1569 至 1577 年对莫塔帕的入侵却因远征军备的缺陷而告失败。

很快,后任莫塔帕们开始接受葡萄牙人的支持以确保其掌权。1586 年成功登上王位的莫塔帕迦兹·鲁瑟里(Gatsi Rusere),遭遇了很多挫折,其中包括卡帕姆博(Kapambo)和契刊达(Chikanda)领导的马拉维族(Maravi)入侵。这些加速了莫塔帕军队的分裂,并最终导致包括将军(mukomohasha)在内的军队高级将领的反叛。这些反叛也得到一些贵族的支持。马图臧赫(Matuzianhe)叛乱标志着莫塔帕与葡萄牙关系的转折点:叛乱不仅废黜了迦兹·鲁瑟里,而且还迫使莫塔帕接受葡萄牙的支持。1606 至 1609 年,葡萄牙人迪奥戈·西蒙斯·马德拉(Diogo Simoes Madeira)在迦兹·鲁瑟里三年流亡期间给予其支持,并帮他从马图臧赫手中夺回王位。作为谢礼,迦兹·鲁瑟里不仅放宽了葡萄牙人进入莫塔帕的条件,还将金、银、铜矿赠与马德拉,并允

17

[1] M. F. C. Bourdillon, The cults of Dzivaguru and Karuva amongst the north-eastern Shona peoples', in J. M. Schoffeleers(ed.), Guardians of the Land(Gwelo: Mambo Press, 1979), p. 236.

许葡萄牙人修建教堂,传播福音。迦兹·鲁瑟里逝世后,争夺继承王位的危机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两个竞争者马夫胡拉·姆汗德(Mavhura Mhande)和尼亚姆博·卡帕拉里兹(Nyambo Kaparari dze)为争夺王位发动战争。马夫胡拉在葡萄牙人的支持下获得胜利,这使他与葡萄牙人的关系更为紧密。作为回报,葡萄牙要求马夫胡拉签署莫塔帕隶属于葡萄牙王室的条约。[1] 实际上,1629 年马夫胡拉被任命为蒙胡莫塔帕时就签署了"投降协定"(capitulation),将莫塔帕王国抵押给了葡萄牙王室,自己沦为傀儡,可以签字将更多的特许权、矿藏和土地出让给葡萄牙。不过,在讨论这种情况被逆转前,让我们看看其邻国布塔瓦的情况。

西部的布塔瓦/通加瓦民族和卡兰加口头传说

我们已经知道,在 1490 年代,一位来自通加瓦的名为昌加米尔的首领篡取莫塔帕王位达四年之久。他的儿子继承王位,与莫塔帕奇库约·奇萨马伦谷之间的战争时断时续,最终在林波地区(Limpo)销声匿迹。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关于西部统治者的消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这些通加瓦人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建造了卡米(Khami)。这是一座津巴布韦古城,位于布拉瓦约(Bulawayo)以北几公里,毁弃于 17 世纪初的一场大火。葡萄牙文件关于卡米的记录使人想起一场内战。1644 年,一个葡萄牙军阀在返回东北部之前,曾帮助一个通加瓦的篡位者夺取王位。虽然没有其他明确的关于任何一位通加瓦的统治者的线索,但是我们知道一些通加瓦的房子极为高大,比如吞巴里(Tumbare)和赤浑杜鲁(Chihunduru)/其温杜拉(Chiwundura)的府邸,这是因为他们在罗兹韦王国是非莫约(non-moyo)罗兹韦统治精英的一部分,有相当大的权利。这些房子,与下文所示的马胡德兹-沙瓦(Mavhudzi-shava)以及尼尔万德-索可(Nerwande -shoko)的房子一

---

[1] Based on Mudeng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Munhumutapa, chs. 6 and 7.

起,是罗兹韦阶级身份形成的关键物证。[1] 不过,通加瓦似乎与卡兰加有紧密的联系,而且17世纪卡米也成为卡兰加统治者恩德姆巴(Ndumba)的领地。[2] 如果我们认可霍夫曼(Huffman)关于豹丘文化民族说古代卡兰加语的观点,如果通加瓦人是大津巴布韦王国最直接的继承者,那么通加瓦的统治者可能是卡兰加人。然而,历史学家却刻意忽略这个时期卡兰加的口头传说。马索拉·库米尔(Masola Kumile)收集的口述史披露了很多通加瓦的史实,也有它最终为瓦尼亚伊所灭的历史,后来瓦尼亚伊就成了该地区罗兹韦的统治者。很有趣的是他所有的记录里,罗兹韦这个名字从来都不是主角。[3] 这些传说要将卡兰加国王的血统追溯到夏姆耶达兹瓦(Xamuyendazwa),也就是蒙胡莫塔帕和马兰博兹瓦(Malambodzibwa)的前辈那里。

卡兰加人传统上也称自己来自遥远的赞比西河流域。而更具体的、可供参考的资料表明,他们与莫塔帕的关系涉及卡兰加后期的统治者玛德哈勒(Madabhale),亦称传奇人物赤邦杜尔(Chibundule)。与迦兹·鲁瑟里打完仗,并在莫塔帕马夫胡拉(Mavhura)登上王位之后,赤邦杜尔"脱离"了莫塔帕。一大帮人追随他,成为赤邦杜尔的幕僚,如尼梅尔(Nimale)、弗兰威(Flung-we)、威科诺(Zwikono,)、温纳马库里(Vunamakuni)、恩卡米(Nkami)等。据说他们曾经定居在现在的马塔贝莱兰(Matabeleland)一带,但发现那里已被布须曼人(bushmen)占领,于是他们向(大)津巴布韦拓展领地,之后又迁移到文达国的林波波河流域,最远一直到卡拉哈里沙漠盐场。[4] 不过,现存的卡兰加口头传说表明,通加瓦和莫塔帕持续地互动,使得效忠莫塔帕或与莫塔帕有血缘关系的分支成为通加瓦/卡兰加最有权势的部落。这个部落就是赤邦杜尔的部族。同时,莫塔帕王国内,随着莫塔帕王室改革派力量的兴

---

① Beach, The Shona and Their Neighbours, p. 94.

② Beach, The Shona and Zimbabwe, p. 193.

③ P. J. Wentzel, Nau dzabaKalnga: A History of the Kalanga (Pretoria: Unisa Press, 1983), vol. 1.

④ 同上, pp. 11 – 16。

起,“傀儡”蒙胡莫塔帕时代的衰落也到了尽头。

尼亚伊的变迁以及阶级在塑造罗兹韦身份中的作用

1650年代,整个高原以及莫塔帕王国自身的情况都不容乐观。葡萄牙人势力增强,将自己变成间接的统治者。莫塔帕要通过葡萄牙在关口派驻的首领向其交纳库如瓦税(kuruva tax),而不是葡萄牙人向莫塔帕缴税。葡萄牙人被授予大量的土地权,他们的房地产(parazos)扩展到内地,进入莫塔帕的中心区;他们把当地民众当作奴隶。1663年卡姆哈拉帕苏·穆克姆布韦(Kamharapasu Mukombwe)被任命为莫塔帕国王之后,这种情况得以扭转。1663至1704年期间,穆克姆布韦和他的继任者发起反抗葡萄牙的战斗,成功将葡萄牙人驱逐出其私人领地。他获得了赞比西河谷通加瓦人的支持,曼伊卡的茨干噶(Chiganga)也随后加盟。[①] 在那之后,穆克姆博威的主要成就似乎就是在他解放的土地上重新安置各类莫塔帕家族。近一个世纪的内战之后,此举巩固了莫塔帕的统治,也复兴了传统的尼亚伊依附主义。在被葡萄牙的重商主义扰乱之前,这种依附主义是莫塔帕王国的立国之本。这次复兴伴随着尼亚伊人自身理想的转变。以昌加米尔·多姆博(Changamire Dombo)为首的一部分尼亚伊人发起这种转型,这促成了罗兹韦国家的形成。

19

多姆博成名于1684年7月,那时他叛离了莫塔帕,在马温戈韦战役(Maungwe)中击败了葡萄牙人,也将前来惩罚他的莫塔帕军队击垮。多姆博慢慢地在西部原由通加瓦/卡兰加控制的布塔瓦(Butawa)稳固自己的地位,后来又控制了曼尼亚伊的领地以及莫塔帕本土的商贸中心。[②] 在一些广为流传的传说中,西部的卡兰加认可多姆博的征服,这表明了赤邦杜尔酋长的没落。传说中,多姆博被称做奇里桑胡鲁

① Beach, The Shona and Zimbabwe, pp. 133–134; Pikirayi, The Zimbabwe Culture, p. 230.

② Mudeng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Munhumutapa, p. 287.

(Chilisamhulu)或尼查斯科(Nechasike),他是尼亚伊的首领,奇怪的是,他来自"文达国"。尼查斯科有一帮重要幕僚,他们中有恩哈勒(Nhale)、吞巴里(Tumbale)和众多首领之父——尼讷姆布韦(Ninembwe)。[①] 多姆博多次想征服赤邦杜尔,可是都被他葫芦里的魔法化解。只有在多姆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赤邦杜尔后,尼查斯科和他的瓦尼亚伊才掌握了魔法的秘密,最终建立了对赤邦杜尔卡兰加的统治。[②] 多姆博是罗兹韦王国七位国王中的第一位,所有其他国王都是他的直系后代,来自信奉莫永迪佐(moyondizo)图腾的部族。

在即将出版的关于关罗兹韦的新书中,穆登格(Mudenge)就罗兹韦王国建国靠的是昌加米尔·多姆博的勇猛这一说法做了一些修正。对布塔瓦以及西部内陆民族的征服、镇压、同化结束之后,就要进行社会治理。对统治者来说,显示自己的尼亚伊的军人身份,成为统治精英"罗兹韦",与被统治者区分开来变得十分必要。因为没有一个图腾部族敢说自己全是精英,于是恩戈万德索科(ngwande shoko)、马胡德兹沙瓦(mavhudzishava)和吞巴里贝丕-莫约(Tumbare Bepe-moyo)同样被接受成为罗兹韦,到现在还是这样。[③] 这种做法并不少见,特别是在被征服的国家,如在西非伊斯兰圣战中建立的国家,索科哈里发(Sokoto Caliphate)由奥斯曼·丹·福迪奥(Usman dan Fodio)建立。社会管理机制建立之后,其统治精英将自己转变为豪萨族(Hausa ethnic group)。同样,在当代非洲政治中,对于以前的民族解放来说,独立之时去军事化并吸收公民担任公职非常必要。因此,很有可能是罗兹韦的统治精英在政治上掌控着国家的核心区域,而国家的外围区域由其尼亚伊臣民占据。这些人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并没有被排除在"罗兹韦"成员之外。

现在我们有必要来看一下这个过程,看看罗兹韦势力在该地区的

---

① Wentzel, Nau dzabaKalanga, pp. 51 – 77.

② 同上。

③ S. I. G. Mudenge, A History of the Rozvi Empire, forthcoming.

影响。首先,我们知道在布塔瓦,多姆博战胜并且容纳了一些托尔瓦酋长,让他们在罗兹韦朝廷担任要职。其次,应该承认的是罗兹韦的扩张主要是非莫约因素的影响。扩张始于西北部的布塔瓦,这个罗兹韦索科(shoko)王朝向北一直拓展到代卡(Deka)与加瓦伊河(Gwai river)流域,然后进入赞比西河谷,建立了霍万盖(Hwange)领导下的纳姆比亚(Nambiya)。在塞本圭(Sebungwe)和马丰加布西(mafungavutsi)高原,由奇拉亚(Chireya)领导的沙瓦王朝(Shava dynasty)在罗兹韦极盛时期控制了这块区域。[①] 在南方,通加瓦一部迁移到林波波河谷,成为索维拉(Thovela)/文达族,并在德扎特(Dzata)建立津巴布韦。[②] 在其他地方,罗兹韦统治阶层通过任命地方"长官或代表"来维持瓦尼亚伊制度,并对这些任命官员进行定期"查访",尤其是对那些没有按时纳贡的封地首领。[③] 其他非莫约的罗兹韦散居在布塔瓦核心区外,也是封建王国的一部分。这包括居住在津巴布韦中央分水岭南侧的大多数民族,例如辛地(Shindi)领导的那博威族(尼布韦尼),他们最终定居在润迪河(rundi)与图戈韦河(tugwi)的交汇处;还有尼亚洪都族(nyamhondo),他们去了姆贝伦戈瓦(Mberengwa)。[④]

第三,罗兹韦最伟大的成就当然是其附属结构规模的扩大,这应该得到认可。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瓦尼亚伊人被升格为罗兹韦,他们要自己控制一帮瓦尼亚伊人的野心开始膨胀。就这样,建立罗兹韦政权的这种制度也成了罗兹韦国家分裂的根源。如果维持罗兹韦传统制度的团结机制(cohesive mechanism)受到损害,或者是罗兹韦统治精英中的世俗领导与宗教领袖发生冲突时,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⑤] 昌加米尔卢潘达汗迦(Rupandamanhanga,疯子国王)的独裁统

① Matthews, Notes on the pre-colonial history of the Tonga, pp. 16 – 18.

② Beach, The Shona and their Neighbours, p. 97.

③ S. I. G. Mudenge, The role of foreign trade in the Rozvi empire: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5(3), 1974, p. 383.

④ Beach, A Zimbabwean Past, pp. 138 – 143.

⑤ N. M. B. Bhebe, 'Some aspects of Ndeble relations with the Shona in the 19th century', Rhodesian History, 4, 1973, p. 32.

治进一步瓦解了罗兹韦封建制度，各集团内部以及集团之间的争斗天天发生。因此，尽管奇里桑胡鲁(Chirisamhuru)成功登上昌加米尔的王位，他也是九死一生，躲开了穆廷希马(mutinhima)、马胡德兹、尼尔万德等部落的联合谋杀。后来，这些部落与吞巴里部落一起开始迁离罗兹韦王国的中央区域，而另一些显然没有首领的部落则在高原流荡，寻找新的机遇。1820 年代，恩古尼人(Nguni)的到来加速了罗兹韦族的外迁，这些人最初由恩戈尼(Ngoni)和斯威士(Swazi)武士领头。

我们此前讨论了纳姆比亚和尚威(ShangWe)部落的北迁。18 世纪罗兹韦的南迁更为重要，其使得占领恩泽乐乐河谷(Nzhelele valley)的辛勾王朝(Singo dynasty)兴起并成为文达的一部分。据广为流传的辛勾口述史回忆，这场迁移源自先祖的故地马通格尼(Matongoni)，也许就是曼亚伽(manyaga)。他们离开丹蒙贝(Donamonbe)后，这个新的都城就被昌加米尔和他的百姓入住了。然而，由于这些口述史是从文达的视角讲述的，里面涉及很多与次夫希(Tshivhi)等尼亚伊首领斗争的生动细节，而其纪年顺序也不太可靠。[①]

第四个问题涉及当罗兹韦中央权力得不到保证时，如何面对管理外围的罗兹韦依附结构这一挑战。在东南部的塞夫河谷和布齐河(Buzi river)之间，兴起了一个独特的纳都(Nadu)民族，很生动地展示了这一挑战。如上文所述，在这个过程中，四个罗兹韦附属国位于中部地区，该地区以前在沙契特夫·尼亚慕达统治之下，他切断了沿线地区与莫塔帕的贸易。到了 1590 年，尼亚慕达的儿子控制了特维(Teve)的南部，统治了一个叫色丹达(Sedanda)或丹达(danda)的新兴半独立国家。色丹达在特维灭亡时得以幸存，后来成为罗兹韦的附属国。然而，当罗兹韦处于困境时，它趁势寻求独立。色丹达被外来的充迦族(Tsonga)的“兰德姆斯人”(landims)占据，这些人成了赫伦格韦

22

① E. Mudau, Ngoma Lungundu, in Warmelo(ed.), The Copper Mines of Musina, pp. 109 – 132.

(Hlengwe),我们将在下文予以讨论。①

第三个国家是个“先驱”(outrider),由昌加米尔建立。1680 年代和 1690 年代,在建国初期,它臣服于昌加米尔罗兹韦。这个国家叫桑格(Sanga),葡萄牙人叫它奎桑格(quissanga)。它在 18 世纪获得独立,这正好是罗兹韦国家开始分裂之前。桑格由穆特玛(Mutema)统治,他建都位于山地防御区内的恩戈纳(Ngaone),这里位于现在的齐平戈(Chipinge)镇以北几公里。根据 J. K. 兰尼(J. K. Rennie)的研究,“恩达”成为民族术语是在桑格形成时期。特维的进一步瓦解促使第四个“二等”国家乡迦(Sanga)得以形成。这个国家极好地展示了成为恩达国家的行政制度的本质——由一大批领地首领或尼亚姆桑戈(nyamasango)进行统治,他们掌握实权,更为特别的是,通过司法管理和代替其封建主向百姓收税等反映了其意识形态。②

这些恩达国家给罗兹韦的依附关系概念加入了新的含义,因为权力不再局限于民族内部。随着国家分化进程的深入,“权利”越来越具有领地的含义,这种趋势在加萨恩古尼(Gaza. Nguni)酋长的统治下一再显露。大卫·休斯(David Hughes)将这一过程与追寻“科丕托非安”(Kopytoffian)疆界的观点联系起来。他追踪大量离开罗兹韦中心区域的莫约图腾崇拜的部落(moyo clans),发现他们一直向东迁移,征服了居住在塞夫河谷的迪兹瓦(dziva)与索克(soko)部落③。正如我们所知,在这些征服者中,最成功的当属穆特玛(Mutema),但要是没有早期的定居者,它就不能成功。这些早期居民有尼亚木色塔瓦(Nyamusetwa)的穆斯卡万胡(Musikavanhu),他掌控着复杂的“祈雨祭祀”;还有玛庞万那(Mapungwana)的坦坡

---

① J. K. Rennie, Ideology and state formation: Political and communal ideologies among the south-eastern Shona, 1500 - 1890, in A. Salim(ed), State Formation in Eastern African (Nairobi: Heinemann, 1984), p. 168.

② 同上,pp. 168 - 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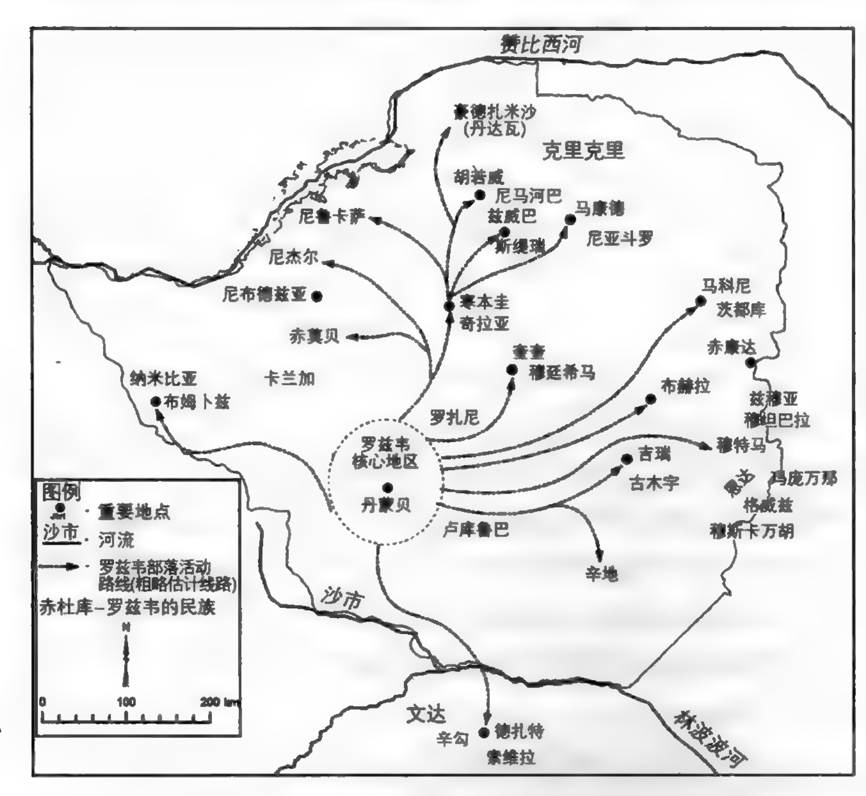
③ D. M. Hughes. From Enslavement to Environmentalism: Political on a Southern African Fronti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p. 24.

(Tembo)，他似乎是在穆克姆布韦时期或此前不久从莫塔帕国家迁移出来的。不管怎样，莫约王朝完全控制了塞夫河谷，而穆坦巴拉(Mutambara)的加维(Garwe)控制了尼安亚德兹河(Nyanyadzi river)的北部，尼乌绍马(Newushoma)的穆乌萨(Muwusha)控制了更为南部的地区。①

1824 年的动乱之后，因姆法肯动乱而四处避难的罗兹韦族众到处可见。根据学者比奇记载，当恩德贝莱人到来时，罗兹韦人很容易识别并招致攻击。大多数主要的罗兹韦族群知道这一点，选择了退避。穆

23

廷希马(Mutinhima)的王宫曾经高耸在玛伦戈瓦尼山上(Malungwane



地图 1.4　1690 年前后至 19 世纪晚期罗兹韦王国的扩张

① Beach, The Shona and Zimbabwe, pp. 170 – 171.

hills),位于王国中部附近的丹蒙贝,现在这里成了奎奎(Kwekwe)和奇卢姆汗祖(Chirumhanzu)地区比较易生事端的地方。[①] 穆廷希马曾被当作有足够实力对抗昌加米尔王朝的人,恩德贝莱人也将其视为眼中钉。他们遵照马自利卡兹(Mzilikazi)国王的命令追捕穆廷希马,要将其心脏挖出来送给国王。穆廷希马逃离故土,在布赫拉的麦亚瓦何若山区(Mai yaVaHera hills)流亡。[②] 另一方面,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吞巴里、马胡德兹、尼尔万德、赤浑杜鲁王族也向西北撤离;其他的罗兹韦王族在现在的马科尼(Makoni)地区寻求避难,发展成为茨都库(Chiduku)坦迪(Tandi)民族。[③] 在南方,古木宇(Gumunyu)和吉瑞(Jiri)王族在比及塔(Bikita)的杜马族(Duma)寻得一席之地。最后撑住罗兹韦局面的是托维奇皮(Tohwechipi),亦称"次巴汉姆巴汉姆"(chibhamubhanmu)。他当上昌加米尔,使用火器多次将恩古尼人打败,直到1866年他被征服。尽管如此,他依然以传统的分封土地的方式赢得了附庸跟随。

24

总而言之,罗兹韦封建制度崩溃的原因在于它自身不可持续的组织体系,"寄生的"姆法肯部落不断增加的压力,以及它自己追求扩充人口、增加成员的做法。如果维持世袭制度与组织体系的平衡,罗兹韦王国是否会灭亡,这是值得讨论的。即便罗兹韦灭亡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罗兹韦体系"被随后的所有部落效仿,并且经常被后来兴起卡伦加作为其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基础。

意外的权力真空以及南部的"卡伦加"定居点

有一个显著的进展与罗兹韦王国解体同时发生,那就是新建立的王朝重新占据了这个国家的中部和南部地区。这些王朝占领的大多数地区现在属于卡伦加方言区。人们可以认为这些族群利用了罗兹韦撤

---

① Beach, The Shona and Zimbabwe, p. 240.

② Posselt, Fact and Fiction, p. 148.

③ T. O. Ranger, Tradition and travesty: Chief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in Makoni District, Zimbabwe, 1960－1980, Africa, 52(3), 1982, p. 21.

离后留下的权力真空，然而实际上从17世纪晚期莫塔帕穆克姆布韦采取行动以来，这样的占领就已经是一种趋势。先看一下这些定居点的情况是很明智的。就穆克姆布韦重新占领的情况而言，受到土地分封的王朝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这个小王国有关，它在罗兹韦解体时重新占据了南部地区。一个明证是那姆比尔(Nembire)索克-胡兹节那王朝(Soko-vhudzijena dynasty)，最初它占据了路亚(Ruya)地区的戈尔(Gore)，后来产生了姆贝尔雅思沃思维族群(Mbire YaSvosve cluster)，17世纪后期的南部占统治地位的很多王朝都起源于此。[①] 另一个信奉坦坡图腾(tembo totem)的族群，在东部高地和现在的奇卢姆汗祖地区形成了一些王朝。[②] 当代葡萄牙的记录表明，穆克姆布韦时期的莫塔帕中央地区的人口在减少，然而这也很难将这些迁移与重新定居的动机联系起来，但必须指出的是，它们利用葡萄牙人撤离的机会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安置期。[③]

25 利用这段权力真空期的方法之一是军事掠夺。对于那些没有资金不能靠经济奖励吸引追随者的部族，在传统的尼亚伊依附关系下，军事掠夺是经常采取的手段。18世纪中期之后，这种做法对高原地区的潜在政权被证明是有效的。赞比西河流域出现了摆脱奴隶身份的茨坤达(Chikunda)，这也许是这种转型在时间和顺序上的最好例子。[④] 在南方，希亚-达兹瓦(Hiya-dziva)(联盟)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代表。他们最初是规模更大的达兹瓦族群的一部分，定居在现在布赫拉附近的如坦噶(Rutanga)。由于意识到罗兹韦内战带来的损害，他们于1768年入侵罗兹韦，却被罗兹韦成功击退。但是他们并未气馁，在玛特玛(Matema)的领导下继续征战直到1790年左右。它们所经之处，明显

① Beach, The Shona and Zimbabwe, pp. 135 – 137.

② I. M. Zvarevashe, Dzinza ravaGovera vaChirumhanzu naMutasa (Gweru: Mambo Press, 1998).

③ Beach, The Shona and Zimbabwe, p. 137.

④ 参见 A. F. and B. S. Isaacman, Slavery and Beyond: The Making of Men and Chikunda Ethnic Identities in the Unstable World of South-Central Africa, 1750 – 1920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2004)。

以罗兹韦外围的同族附属国为攻击目标。[①] 随着恩古尼民族的到来,希亚的侵扰可能也就随之结束。恩古尼人采取相似的做法,但在军事上更加先进。不过,此时,一些希亚人已经在润德河与图戈韦河之间获得土地,建立了恩戈瓦-达兹瓦王朝(Ngowa-dziva)。[②] 然而,这个区域远离贸易点,无法接触到枪炮以及现代战略的创新成果,难以维持军事文化,而现代火器正是新来的恩古尼民族的制胜王牌,这也许可以解释希亚的消亡。

成功的部落要么能将其众多的优越性与超凡的领导力和神圣的权利相结合,要么全凭运气。姆贝尔雅思沃思维族群产生了很多这样的首领。他们按照这种方式建立王朝,统治着南部地区。尽管不是一次迁移的结果(如现在很多的口头传说所示),现在大多数统治南部高原的舜巴王朝(shumba),如姆哈日(Mhari)、吉茨德兹(jichidza)、尼亚坤胡瓦(Nyakunhuwa)、查卢比阿(Charumbira)可以声称自己来自姆贝尔。[③] 南部王朝的第二大来源是是乌赫拉(VuHera),涉及好几个族裔,他们都声称自己是姆比如·尼亚沙努(Mbiru Nyashanu)首领的后裔或与其有亲缘联系。尼亚沙努是该地区两个沙瓦-赫拉(shava-Hera)图腾族群的创始人之一(另一个是马兰吉的摩查[Marange's Mocha])。他们属于更大的大羚羊(mhofu)图腾族群。尼亚沙努是罗兹韦王国的臣属,但与很多有他这样地位的人一样,一旦罗兹韦开始有难,他就开始寻求独立。罗兹韦非常想用惩罚性的袭击来控制尼亚沙努和他的追随者,或通过支持恩间迦(Njanja)等外来移民阻止赫拉(Hera)的扩张。如果从长远来说这样做取得了成效,也可能有助于乌赫拉的分裂,但这并没有阻止尼亚沙努其他方式的扩张,尤其是通过其后代人口的增加。乌赫拉以北,马萨里拉比部落(Masarirambi)建立了日后我们所熟知的穆特柯德扎王朝(Mutekedza dynasty);再往北,尼亚沙努后代的部落建立了霍瓦塔(Hwata)与茨威舍王朝(Chiweshe)。

26

① Beach, A Zimbabwean Past, pp. 152 - 153.

② M. M. Hove, Notes on the vaNgowa tribe, NADA, 20, 1943, pp. 41 - 45.

③ C. Bullock, The Mashona (Cape Town: Juta, 1928), pp. 86 - 90.

这两个王朝受到博查(Bocha)后代——色科(seke)领导的同族人的欢迎。博查是这个地区的先祖。[1]

在南方,尼亚沙努族群的扩张似乎更为激烈。首先,尼亚沙努与他的祈雨巫师妻子生下儿子玛如姆比·卡日沃阿(Marumbi Karivara)。在避难期间,玛如姆比在德乌热河(Dewure river)流域马博瓦哲·古图(Mabwazhe Gutu)的土地上建立了穆亚热德兹王朝(Munyaradzi)。他们采用了新的图腾——沙瓦-沃坎诺诺卡(Shava-wakanonoka),形成非常有影响力的祈雨祭仪。[2] 其他的族群保留了原来的图腾及其对它的赞誉之名:姆霍发/恩胡卡-穆斯亚姆瓦(mhofa/nhuka-musiyamwa),像玛腾塔(matenda)一样进一步向南扩张。玛腾塔在现在的兹非沙瓦内(Zvishavane)附近找到了土地。尼亚沙努的另外两个儿子,穆屯哈库文达(Mutunhakuwenda)和穆缇乍然(Mutizira),与大津巴布韦南部纳赤山噶(NeChishanga)的索克罗兹韦王朝(Shoko-Rozvi)兵戎相见。击败敌手之后,南部赫拉邦联组织体系下的玛盘祖里(Mapanzure)、穆辰乌戈瓦(Muchenugwa)、穆赤巴瓦(Muchibwa)、加帕尔 (Gapare)等派系纷纷产生。进入 19 世纪之时,南部由玛盘祖里的一个王室统治,赫拉邦联组织体系瓦解。[3] 最后一个认为来自乌赫拉地区的族群是兹木托(Zimuto)的恩加拉-戈夫瑞(Ngara-Govere)王朝,它在齐卡托(chikato)的土地由流浪中的罗兹韦曼博·托维奇皮(mambo tohwechipi)分封而得。不久,王朝分裂成两个派系。兹木托保留了现在戈科米尔(Gokomere)周围的土地;另一派由邦巴(Bamba)领导,在更远的南部地区建立了纳玛乌哲王朝(Nemavuzhe),紧邻尼亚杰纳(Nyajena)的臣属领地。这在下文将予以述及。[4]

---

① Beach, The Shona and Zimbabwe, pp. 74 – 77, 289 – 2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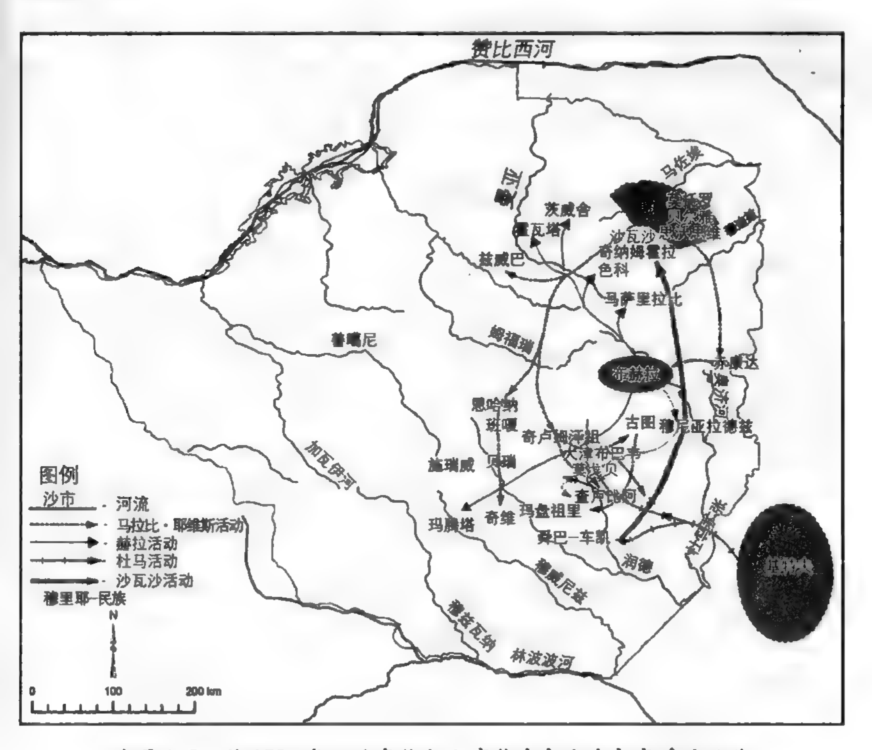
② M. Daneel, The God Of The Matopo Hills (The Hague: Mouton, 1970).

③ G. C Mazarire,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shanga c. 1750 – 2000 (Draft d.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Zimbabwe, 2008).

④ National Archives Of Zimbabwe, File Reort, Nemavuzhe Chieftainship And Community 1965.

19 世纪早期，南方的政治也受杜马(Duma)崛起的影响。杜马兴起于帕芙巴杰纳(Pfupajena)统治下的基特夫(Kiteve)。杜瓦族的一个后代穆瑞耶(Murinye)成为穆提瑞克威(Mutirikwe)地区的统治者，将土地分配给他的两个儿子穆加贝(Mugabe)和尚巴·车凯(shumba-Chekai)。为争夺大津巴布韦王朝周边的控制权，前者与土著马瓦部落(Mamwa)的争斗旷日持久。后者接管了奇纳姆霍拉(Chinamhora)的沙瓦沙人(Shawasha)留下的土地，几乎没有受到当地萨瓦-恩希尔人(Shava-Nhire)的抵抗。[1] 若不提及尼亚杰纳，南部的政治迷局是不全面的。尼亚杰纳与希亚相当，但其规模更小，也许更不善使用暴力。

27



地图 1.5　约 1750 年以后卡伦加人穿越中部和南部高原的迁移

---

[1] Mtetwa,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Duma; on the Shava-Nhire.

尼亚杰纳是莫约的后代，与杜马没有关系。他巧妙地将罗兹韦风格的附属国网络和外交资源进行结合，在润德河（Runde）与姆克希河（Mukosi）之间建立了代理政权（surrogate polities）。他的名望在于他有能力按照自己的要求安顿罗兹韦的难民和南方新来的移民。属于罗兹韦一脉的尼布韦尼（Nebgwine，即辛地）王族与另一个戈洛洛（Gororo）领导的恩达族（Ndau）新来部落争夺土地。争端对尼亚杰纳有利，因为辛地兵败后在尼亚杰纳国内流亡，被迫与其结成通婚联盟。尼亚杰纳已经与其他像辛地这样处境的部落达成此类协议，如马德兹威里（madzivire），结果证明这种结盟非常有效。随着尼亚杰纳实力的增强，他的同族亲属互相争宠。尼亚杰纳一开始让他们去袭击温德扎（Wedza）的雇佣军武士，打败他们的进攻，留下硕果仅存的派系，将土地分给他们。因此，在1820年代至1840年代期间，戈洛洛、辛地、马德兹威里等王朝在动乱中得以幸存，并通过蚕食尼亚杰纳的国土保持自己的领土。[①]

28

瓦壬巴（VaRemba）与赫伦格韦

像卡伦加人在主分水岭南部地区定居一样，两个不同的部落从高原的两端加强了这种人口定居。它们是：瓦壬巴，起源于塞纳国（Sena）附近的赞比西流域；充迦族的赫伦格韦，起源于林波波河谷。一些学者，如雷奥·弗兰伯米厄斯（Leo Frobemius）、亨利·朱诺（Henri Junod），特别是津巴布韦的瓦壬巴学者韦哈兰德·冯·斯卡德（Harald von Sicard）等提出了瓦壬巴与地中海文化或埃塞俄比亚的黑人犹太教（Black Jews of Ethiopia）存在联系的理论。[②] 然而，现已证实瓦壬巴身份中的犹太元素是假想的。大多数瓦壬巴人信奉他们的祖先是那些曾经掌控莫塔帕国贸易的穆斯林巡游商人——瓦姆温耶（vaMwenye）或瓦山姆哈德兹（vaShamhadzi）。伊法连·曼迪温噶（Ephraim

---

① NAZ, S2929/8/2 Delineation Reports for Nyajena, Gororo, Shindi, Mazdzivire and Mawadze, 1965.

② H. A. Junod, The Balemba of the Zoutpansberg (Transvaal), Folklore, 19(3), 1908, H. von Sicard, Lemba Clans, NADA. 34, 1962.

Mandivenga)指出,他们是这些穆斯林的后代。葡萄牙人到来之后,他们与沿海的贸易被取代,于是他们只好进一步向内地渗透。[①] 他们从塞纳国向南迁移的过程中,瓦壬巴人分成 12 支不同的小部落。其定居点北面远至故古鲁夫(Guruve)与温德扎,那里是布赫拉的一部分;南面一直到大津巴布韦以南的地方。查玛考法(Chamakofa)领导的一部分显然加入了从其曼雅迦(Manyaga)的首都迁移到索特潘斯堡的罗兹韦部落,后来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辛高王朝(Singo dynasty)。不久之后,一个瓦壬巴酋长奇诺达(Chinounda)决定带领他的子民返回塞纳,但结果他们被迫定居在姆贝伦戈瓦地区,于是便有了莫珀斯王朝(Mposi dynasty)。[②] 大部分在南方有领地的族群,如古图(Gutu)的册库里(Chekure)和哈曼迪舍(Hamandishe),布赫拉的查特拉(Chatora)以及现在马斯文戈(Masvingo)一带的马吉里(Majiri)和塔德则巴(Tadzemba),都与莫珀斯核心王朝有这样或那样的渊源。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事实:自从大津巴布韦王朝消亡后,林波波河北部一直是边疆地区,文达人在那里来回迁移了几百年,那么我们有可能理解,在辛高的口头传说中,为什么瓦壬巴人总是被描写成跟着文达人迁移——他们在停留左特潘斯堡(Zoutpansberg)和经过"瓦尼亚伊国"期间,负责"运送王室的所有辎重"。[③] 瓦壬巴人在 18 世纪晚期罗兹韦王国的动乱导致了辛高族外迁,跟随文达使瓦壬巴人获得必要的安身之所。大多瓦壬巴人都冒险进入了卡伦加人居住的领地。在那里,他们利用其著名的特殊技能,如医学知识(chiremba)和铜矿开采技术,与新兴的政权结成联盟。所以,大多数居住在大津巴布韦周边的瓦壬巴人,依靠杜马邦联(Duma confederacy)统治者建立的长期盟友关系获得便利;时至今日,瓦壬巴人保有一个令人敬畏的"玛卓德泽"

29

---

① E. Mandivenga, The history and re-conversion of the vaRemba of Zimbabwe, Joural of Religion in Africa, 9(2), 1989, p. 109.

② D. C. Chigiga,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Lemba in Rhodesia (University of Rhodesia, History Department Seminar Paper, 1972), p. 5.

③ Mudau, Ngoma-Lungudu, p. 19.

(Mazodze)头衔，这个官职负责为杜马首领加冕。[①] 然而，这些瓦壬巴部落的迁移、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其他的土著部落、其他新来移民的关系，是又一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赫伦格韦是林波波河下游地区人口，尤其是特松加族(Tsonga)人口的一部分。他们被描绘成一个非军事化的民族，其展示的大多数特点与一个世纪以后兴起的恩古尼民族有联系。从1720年代起，他们的活动中断了与伊尼扬巴内(Inhambane)的沿海贸易，致使塞丹达(Sedanda)的恩德奥国衰亡。他们在塞夫河流域建国，随后又北迁进入津巴布韦高原。[②] 赫伦格韦的祖先与火(chauke)图腾有关，似乎是聚居在靠近圣戛纳(Shengane)的林波波河东岸一带，从他们那里开始向北扩张。[③] 他们顺着塞夫、润德、齐拉兹(chiredzi)、穆提瑞克威等河流前行，他们的大部分历史与先前统治这些地区的部落争夺领土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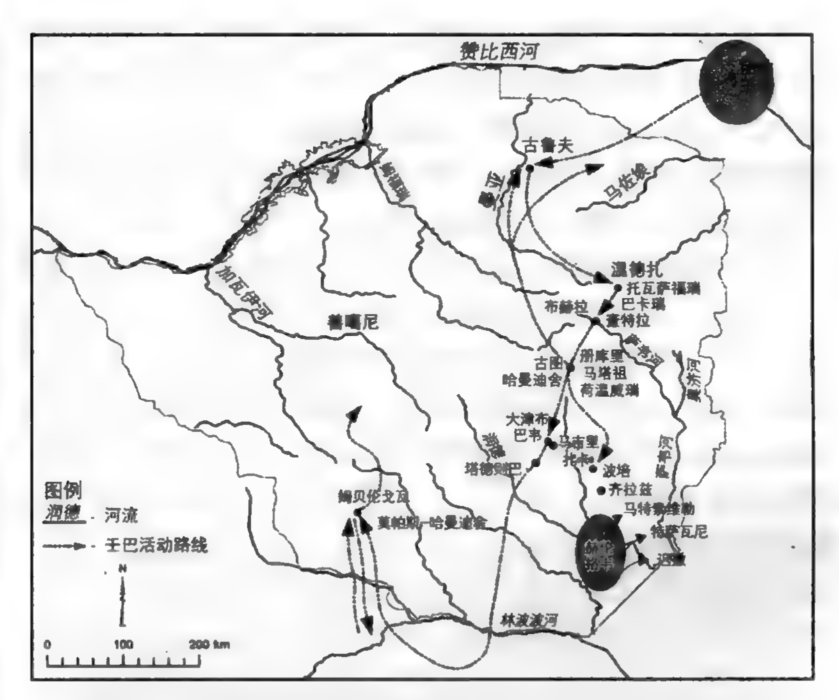
第一个这样的部落是索诺(Sono)，他们是"人口减少"时期从莫塔帕中央外迁主要移民的一部分。这个部落被击败，其中的一些人被赫伦格韦吸收，另一些人则留在印度洋沿岸。赫伦格韦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是在与定居在南方的瓦尼亚伊人争斗的过程中形成的。持续不断的冲突造就了一位影响力超凡的人物扎里(Zhari)。在当地的口头传说中，他是众所周知"一直与尼亚伊人战斗的大勇士"。是他征服了瓦尼亚伊的大片土地，成为遍布当今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主要赫伦格韦王朝祖先的国父。这些王朝有迟撒(Chisa)、特索瓦尼(Tsovani)、马华威(Mavhuwe)、萨兰尼(Salani)、马特索维勒(Matsovele)、希米瑟(Ximise)、马库鲁尼杰(Makulunje)等。[④] 不同于瓦壬巴，赫伦格韦遭遇尼亚伊的过程中涉及很多胜利的征服。马兴高(Mhingo)的迟撒是

① Douglas Mudhosi, The Lemba People of Tadzembwa (Masvingo):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ir Beliefs and Practices And Their Areas of Conflict with The Non-Lemba (Ba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Religions Studies, University Of Zimbabwe, 2003), p. 18.

② Rennie, Ideology and state formation, p. 168.

③ J. H. Bannerman, Hlengweni: The histoy of the Hlengweni of the lower save and Lundi river from the late 18th century to the mid-20th century. Zimbabwean History, 12, 1981, p. 6.

④ 同上，p. 8。



地图 1.6 18 世纪晚期起壬巴与赫伦格韦人在津巴布韦高原上的迁移

所有赫伦格韦王朝中最成功的征服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它使穆嘉齐(Mujaki)与茨温嘉(Chivonja)的莫约部落连同索克(Shoko)王朝的一些土著臣服,横扫塞夫河流域,将势力拓展至现在三角地带的姆夸西尼(Mkwasine)地区。另一个王朝特索瓦尼跨越奇雷济河(Chiredezi)与润德河,侵占了杜马的领土。直到这两个赫伦格韦部族反目成仇,迟撒部被打败之后,这种扩张才收缩。[1] 到 19 世纪初期,赫伦格韦掌控着南部地区的水系是可以肯定的,姆法肯移民到来后其领地稍微有点改变。

31

姆法肯与恩德贝莱和迦沙的定居

1826 至 1838 年间,该地区大部分地方承受着林波波河南部姆法

[1] J. H. Bannerman, Hlengweni: The histoy of the Hlengweni of the lower save and Lundi river from the late 18th century to the mid-20th century. Zimbabwean History, 12, 1981, pp. 10 – 11.

肯动乱激发的难民潮的压力。这些族群对当地人会造成何种影响也引发了种种猜测，特别是它使得“绍纳”王朝不时外迁，造成当地具有姆法肯特色的动乱。在短短的时期内，至少有五个恩古尼(Nguni)部落途经此地或在此定居。有这样一种传说，这些恩古尼的敌对派系带来了巨大灾难，使人口骤减，这不仅因为每个派系会反过来攻击罗兹韦王国，而且因为他们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尽管恩古尼人靠土地为生，但在迁移过程中或在定居的早期阶段，他们更需要的是人力和牛群而不是土地。[1] 最终只有恩德贝莱与迦沙族永久定居在津巴布韦高原的两端，另外一个恩古尼部落1838年已经越过了赞比西河流。索沙迦尼(Soshangane)的迦沙族对赫伦格韦的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他们经常被外界误称作乡迦尼人。[2] 有趣的是迦沙人从未长期定都一地，对其子民施加重要影响。在早期统治阶段，索沙迦尼不仅易受其同族的恩古尼人攻击，而且到了1845年以后可能又受到葡萄牙人与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的联合进攻。这种局面造成一种焦虑的氛围，转而引发危机；索沙迦尼的两个儿子姆子拉(Mzila)与马维维(Mawewe)开始了激烈的冲突，整个1860年代暴乱横行。[3] 不过，迦沙族的武士一直袭击到内地的穆提瑞克威河地区，收取贡赋，侵入恩德贝莱人自认为的势力范围内。[4]

问题在于，尽管大多数瓦尼亚伊/卡伦加部落有复杂的社会、政治组织体系，这些移民部落的国家是怎样让它们俯首称臣的？很显然，恩古尼民族引进了一个新的封建寄生制度(feudal parasitism)，并通过武力使它成为可能。这些部落没有一个相信统治者会对其附属部落发动全面战争，考虑到这些部落的人口发动战争也不太可行，但是暴力成为

32

---

[1] S. J. Ndlovu-Gatsheni, 'Dynamic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mong the Ndebele of Zimbabwe, 1818 – 1934', (D.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Zimbabwe, 2003), p. 62.

[2] Beach, Zimbabwe before 1900, p. 57.

[3] G. J. Leisegang, Aspects of Gaza Nguni history, Rhodesian History, 6, 1975, pp. 3 – 5.

[4] Beach, War and Political, p. 32.

促进新的生活方式的有效手段。为了生存,旧的"尼亚伊"组织体系必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在前朝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尽可能多地吸纳前朝的百姓作为其社会组织的财富,在种族出生的基础上强化阶级等级。除了行政与阶级/种族进行二分法管理外(class/ethnicity dichotomy),恩德贝莱国家一切都与罗兹韦相似。罗兹韦人本质上是瓦尼亚伊人的一个阶级,他们统治着还没获得社会地位的其他部落,但罗兹韦不是民族实体。另一方面,恩德贝莱人中的"赞希"(Zansi)统治精英是个种族联盟,他们设法通过对赞希男人有利的族内婚姻使自己转变成为一个阶级。在描述恩德贝莱社会结构的时候,根据社会等级(castes)建立恩德贝莱国家的说法无法深究,这是原因之一。



图1.2　恩丹高地区(Ndanga)税收期间尚迦纳族的舞蹈
(来源: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

恩德贝莱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建立霸权。首先,我们要知道,1826至1838年间,恩古尼人(Nguni)在高原上的交通运输给当地的社区带来深远的影响。恩古尼人不仅拆除了罗兹韦统治精英的中心,而且把他们的派系分散到各地,让每一位王位继承者与其子民一起流亡。本质上,尼亚伊人的附属社会结构已经从上层崩溃。一些瓦尼亚伊人仿效恩古尼人的模式和做法,也取得了一些成功。敦布塞亚人(Dumbuseya)的事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开始,他们是在尼亚杰纳

33

挑选出来的一群当地勇士，后来被招募进入恩加尼人恩格瓦纳·马塞克(Ngwana Maseko)的军队中，接受恩古尼人的作战训练。在恩格瓦纳·马塞克与兹万更达巴(Zwangendaba)的部落在马佐威山谷(Mazowe valley)发生冲突之后，他们脱离了恩格瓦纳·马塞克的军队。此后，他们在图戈韦河与恩盖济河(Ngezi river)之间流浪，袭击一些部落，也为需要兵员的部落充当雇佣军。最终，在"辉煌"的强盗生涯之后，他们退居兹非沙瓦内(Zvishavane)的温德扎地区，像他们之前的希亚人那样。[①]

其次，为了取得成功，恩德贝莱人必须重视现有的统治模式。因此，在恩德贝莱建国初期，姆兹里卡兹(Mzilikazi)的当务之急就是挫败或吸纳现有的罗兹韦王族，以及那些有迹象替代或想替代罗兹韦王族的势力。玛姆博·托维奇皮同时也发起运动，把霍瓦塔(Hwata)与茨泽玛(Chizema)这样的新兴势力置于控制之中。到了1857年，他们把罗兹韦的其他王族，如卢库鲁巴(Lukuluba)与思瓦巴斯威(Svabasvi)统治下的部族征服或并入恩德贝莱，这项任务得以完成。1860年代，该运动的进一步深化，在恩德贝莱人将注意力转移至更小的或者更次要的部落时，迫使尼亚沙努(Nyashanu)与恩间迦屈服。[②] 在所有的事件中，恩德贝莱非常谨慎，没有去侵扰非世俗的组织体系(non-secular structure)，有时他们还把被击败的罗兹韦人请回来，让他们当顺民。因此，即便他们在高原上来来回回追逐敌人时，也没有停止对姆福瑞(Mupfure)和曼亚(Manyame)绍纳巫师(spirit mediums)的崇拜，并向其纳贡。同样，后来姆兹里卡兹的儿子、他的继位者罗本古拉(Lobengula)为了使自己成为至关重要的祈雨巫师(rainmaker)，加强了与姆瓦瑞教派(Mwari cult)的关系。[③]

第三，对恩德贝莱来说，重要的是适应罗兹韦王国庞大的规模，并

---

① Von Sicard, The Dumbuseya.

② Beach, War and Politics, pp. 21－32.

③ N. M. B. Bhebe, 'The Ndebele and Mwari before 1893: A religious conquest of the conquerors by the vanguished', in Schoffeleers (ed.), *Guardians of the Land*, p. 291.

让它受新制度的影响;这个策略已经被证明,特别是在国家边远的北部地区。布姆卜兹(Bumbuzi)的纳姆比亚人是明显的攻击目标,他们被迫逃向赞比西河流域,向沿河的通加族寻求避难。[1] 到 1850 年代,恩德贝莱的统治覆盖了赞比西河、马丰加布西高原(Mafungavutsi plateau)与戈奎维(Gokewe)等地,有奇拉亚、特亚希(Tjahi)、帕舒(Pashu)、恩科卡(Nkoka)等酋长向其纳贡。[2]

34



图 1.3　恩德贝莱:因贝兹(Imbezi)军团

(来源: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

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让一些历史学家得出结论:恩德贝莱对其臣民的政策是直截了当的,提供给他们的选择要么是纳贡,要么被侵袭。但是这种情况也有些变化,尤其是到了 1879 年后,当时的恩德贝莱政权受到绍纳国的严重威胁。由于南部绍纳部落逐渐使用枪支,采取更加先进的防御策略,恩德贝莱武士接连被打败。不过,在恩德贝莱国,

---

① J. McGregor, 'Living with the river: Landscape and memory in the Zambezi valley, northwest Zimbabwe', in W. Beinart and J. McGregor (eds.) *Social History and African Environments* (Oxford: James Currey, 2oo3), pp. 89 – 92.

② J. R. D. Cobbing, 'The Ndebele under the Khumalos'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Lancaster, 1976), p. 139.

袭击、抢掠也并不是有严密组织的。新的证据表明一些流浪的部落转向强行抢劫，而恩德贝莱厄姆哈索(umhaso，由小酋长们发动且不受惩罚的侵袭)的观念也无法对这种行为进行很好的管理。[①]

恩德贝莱人在津巴布韦出现的最终结果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从"尼亚伊"理想盛行时期封建附属组织体系下的生活方式，转变为更加注重安全意识与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不是说归顺部落因易受恩德贝莱部众抢掠而惊慌失措——如早期传教士和殖民文学所描绘的那样，而是转变成一个对现存危险有警觉的社会，一个不断地采取办法来解决这些危险的社会。

35

津巴布韦殖民前的经济和社会

到此为止，我试图说明殖民前部落的起源与定居情况，并想展示它们的互动是怎样塑造当地政治的。不过，大致谈一下在此期间社会经济的情况也是很有必要的。津巴布韦史前国家的早期分析是这样描绘这些部落的：主要从事农业活动，使用铁器后对农业进行了现代化革新，与其先辈相比，耕种面积更大了。他们也是牧民，蓄养牲畜。牛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占中心地位，因为牛是财富的重要指标，也是维持附属关系的重要方式。通过将牛分配给忠实随从、归其使用的制度，一些牛群的拥有者将自己的财富转变成权力。同样，牛在宗教仪式中也占有特殊地位，它们是亡灵的归宿，或是敬献祖先的祭品。在婚娶中它们还是重要的聘礼。[②]

有证据表明，大约从公元 9 世纪起，豹丘文化的定居者开始统治津巴布韦西南部，并且"吸纳"了当地更早的居民兹佐人(Zhizo)。畜群的扩大促进了这一过程，富裕的养牛国家一直延伸至博茨瓦纳东部。允许建立"等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得以奠定，将穷人和富人区分开来，即便

---

① I am grateful to Sabelo Ndlovu for making this suggestion to me in a debate in 1999; this argument was further developed in Mazarire, 'Defence consciousness as way of life'.

② Mudeng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Munhumutapa*, p. 163.

是在定居点的安排上也是如此。在这样一个社会，牛是财富的象征；牛群最为集中的地区，比如博茨瓦纳的托兹维莫迦拉(Toutswemogala)，成为第一个显示我们所说的“国家”特征的地方。[①] 有很多证据显示，10 世纪以来牛群的数量在增加，由此我们也发现这种“国家”系统也在逐步转型，不断复杂起来。当然，牛群拥有者比一般的农耕者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有必要的财富来奖励随从，或支付其劳动报酬。他们也可以同时兼顾农业与畜牧业，但这往往在很基层的地方才有。马篷古布韦是 12－13 世纪与豹丘文化有联系的一个早期国家，它显露出多样化的迹象，其居民也更趋向于在一个地方居住更长的时间。[②]

然而，一些早期国家的考古学证据也表明经济上的转型，从一开始全力满足当地需求的生存经济，到生产额外商品用于交换，并寻求更多地参与对外贸易。[③] 一些学者认为，对外贸易是大多数津巴布韦殖民前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④] 这个论点长期以来受到挑战，然而有个情况不容忽视：有对外贸易时，当地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也会相应地成长。[⑤] 同样，印度洋沿岸的贸易安排变化似乎对内陆高原有溢出影响(spillover effect)。例如，大津巴布韦和基尔瓦(Kilwa)之间有特殊的关系，前者是输往沿海货物的供应商，后者是贸易商品的进口港。大津巴布韦王国的崩溃有很多原因，而不仅仅是与基尔瓦的关系受影响所致。[⑥] 强调“贸易刺激论”淡化了其他的原因，比如环境因素的影响。大津巴布韦地区是一个多样的生态区：热带环境遍布今天的莫根斯特教堂(Morgenster Mission)一带；长年不断的雨水浇灌着姆迪瑞科威河(Mtirikwi)流域；津巴布韦的花岗岩造就了当地的微观气

36

① Pikirayi, *The Zimbabwe Culture*, pp. 109－110.

② 同上，p. 112。

③ Pwiti, 'Trade and economies', p. 123.

④ An extreme version of this argument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is D. Chanaiwa, 'Politics and long distance trade in the Mwene Mutapa empire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5(3), 1972.

⑤ Pwiti, 'Trade and economies', p. 125.

⑥ 同上，p. 127。

候;图戈韦以及尼亚杰纳一带长着蕨类植物的小溪是金矿沉积区。所有这些也许都对大津巴布韦成为一个重要国家起了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发展到接近城市中心的程度后会给生态带来压力,导致生态环境被破坏。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农村社区的复兴,这些微环境正在恢复;因为这些社区人口密度虽然大,但社区分布极为稀疏。[1] 同样,学者伊安·弗米斯特(Ian Phimister)表明,铁器时代大津巴布韦王国的人们,利用城镇附近布满蕨类植物的小溪上的沉积矿和冲击矿提炼黄金,他们的生活水平受到沿海穆斯林的影响。[2]

我已经说明了大津巴布韦及其以外地区的政治发展情况,表明每次在这一中心区域的人口外迁过程中,各部落占据着不同环境的地域,适应了新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比奇表明这些持续的迁移形成人口的“大新月”形(Great Crescent)分布,随之而来的定居模式随着黄金带的扩大而变化,形成了“黄金新月”(Golden Crescent),横贯整个高原。[3] 实际上,是黄金吸引了葡萄牙人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来到津巴布韦内陆,使以定期集市(ferias)为基础的贸易新模式复苏。在集市里,葡萄牙人用他们的商品交换黄金。[4] 根据穆登戈的研究,当地金矿开采受津巴布韦高原上务农人员的影响。这些人选择在农闲月份,或是雨水冲刷造成矿区泥石流危险比较小的时候来到金矿打工。[5] 然而,淘金全年可以进行,是矿业的支柱。当地的统治者企图垄断采金业,并力求控制黄金贸易。就对黄金以及后来的白银的控制是如何决定其本土政策、影响其与外界势力关系的本质而言,莫塔帕国提供了典型的案例。

37

---

① J. H. Bannerman, 'Ecological and Other Factors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Zimbabwe Stat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Zimbabwean History,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Zimbabwe, 23 - 27 August 1982, pp. 4 - 5.

② I. R. Phimister, 'Ancient mining near Great Zimbabwe', *Journal of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74(6), 1974, p. 236.

③ Beach, *The Shona and their Neighbours*, p. 76.

④ H. Ellert, *Rivers of Gold* (Gweru: Mambo Press, 1993), p. 41.

⑤ Mudeng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Munhumutapa*, p. 170.

津巴布韦高原的经济以农业为基础,这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高原的粮食能否提供经济安全保障受当地农业是否歉收的影响,也就是说人们无法靠某一种经济方式生存,需要借助其他方式。这些方式从狩猎、采集、捕鱼到对外贸易不一而足。[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论断受到质疑,特别是考虑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完全依靠一种或两种生产方式的经济确实存在:赫伦格韦人以狩猎为生,在兹非沙瓦内地区以采集各种野生蔬菜为生;瑞姆卡(Rimuka)的社区靠开采金矿为生。[②]

特定环境的特殊性以及更多殖民前时代经济的细节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例如,很难理解,在北部低地草原,就在马丰加布西(mafungavutsi)高原下,恩约卡(Nyoka)的瓦尚威人(vaShangwe)是如何发展赚钱的烟草业的?蚊子与采采蝇滋生的地方,不利于牛群生长,更不用说人类了,但瓦尚威人却在那里生存。有报道称他们不种植任何谷物,而是靠用烟草交换货物使他们得以在那里长久生存。[③] 同样,尽管 1890 年前恩德贝莱人主要的特征是靠掠夺性经济生存,依靠抢劫牛群、谷物和人口为生,然而朱利安·考宾(Julian Cobbing)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恩德贝莱人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农耕,其主食是谷物而不是牛肉"。[④] 然而,现实情况是,在该地区恩德贝莱人的确拥有最大的牛群。[⑤] 征收贡赋(Tribute-collection)增强了已在运作的经济,不过这更多的是对臣民实施政治控制的手段,而不是生存的方式。

38

---

① D. N. Beach, 'The Shona economy: Branches of production', in R. Palmer and N. Parsons (eds.), *The Roots of Rural Poverty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1977), pp. 37 - 65.

② D. N. Beach, 'Second thoughts on the Shona economy: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Rhodesian History*, 7, 1976, p. 4.

③ B. Kosmin, 'The Inyoka tobacco industry of the Shangwe people: The displacement of a pre-colonial economy in Southern Rhodesia, 1898 — 1938', in Palmer & Parsons (eds), *The Roots of Rural Poverty*, pp. 271 — 273.

④ Cobbing, 'The Ndebele under the Khumalos'.

⑤ Beach, *The Shona and their Neighbours*, p. 135.

结论

没有一个单独的章节能把一个国家1000年的历史说透,也没有一个单独的章节能向先前所有的学者表示敬意。本章的目的只是提供殖民前津巴布韦的全景式概况,包括它的民族、疆域与思想。本章以各种新旧资源为基础,对其进行加工处理,这些资源进一步阐明了已知的知识;但是还有太多其他的传说有待去发现,这对于现有典型的神话传说来讲是挑战,这些传说让历史学家透过个体身份的三棱镜去研究历史。神话传说让我们全方位地看待这些民族,从别人怎么看待他们的视角,而不只是他们怎么看待自己。希望这种单元叙述(meta-narratives)的只言片语能开启新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要理解所有的分析归类,允许进行更广泛、多元的观点表达和解读。

第二章　文化碰撞和殖民遭遇，1880 年代至 1930 年代

萨贝洛·西乌伊尔（Sabelo J. Ndlovu-Gatsheni）

引言

39

这一章将以多个主题，按时间的顺序叙述、分析 1880 年代至 1930 年代间西方殖民主义在津巴布韦高原上的发展脉络。这个过程的主要特点是欧洲殖民者强制实行的殖民统治以及随后的巩固措施，而不是 1960 年代流行的简单的“统治与反抗”的模式。[1] 这一章将以更细微的方式来理解这一点。这个过程是复杂的，其中包含了争论与对话、拒绝与接受、谈判与妥协。[2]

本章首先将讨论殖民主义的力量与机构，特别是基督教传教士、商人、寻求特许权的人以及他们背后想要建立帝国的赞助商的活动。这

---

① F. Cooper, conflict and connection: Rethinking colonial African histoy. in J. D. Le Sueur(ed.), The Decolonization Reader(New York: Routedge, 2003), p. 24.

② L. Rusell, Introduction, in I Ruseel (ed.), Colonial Frontiers: Indigenous-Europpean Encounters in Settler Societ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 - 7.

些寻求特许权的人向非洲的统治者施压，使其"签订"欺骗性的《路德租让书》，并用这个条约来为1890年代占领、征服津巴布韦并实行殖民统治进行辩护。然后我还会分析1890至1897年之间导致非洲人被征服的事件以及他们的反抗。这一时期，恩德贝莱人在善噶尼河（the Shangani river）、莫贝姆贝斯河（the Mbembesi river）、普普（Pupu）等地方抵抗帝国势力，这就是众所周知的1893年英国-恩德贝莱战争，也被称作马塔贝莱战争（the Matabele War）。

1890年代，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对早期殖民统治挑衅性的干涉进行了猛烈的反击，史称1896至1897年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的反抗，即第一次解放战争。恩德贝莱人对于早期殖民者的反抗是不是有统一的组织、宗教在其中起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争论。特伦斯·兰格（Terence Ranger）最先认为这些反抗是有组织的统一的运动，而大卫·比奇和朱利安·考宾则持修正的观点，颠覆了这些运动的统一性、协调性以及宗教的主导地位。

40

早期罗得西亚国家的形成过程比较复杂，并且有其自身的推动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早期白人殖民者不断地尝试使自己"本土化"，而非洲人则通过各种方法给自己作为被殖民者群体重新定位。早期殖民统治的常规化以妥协与强制的微妙平衡为基础。殖民前的酋长制度重新被用来为殖民者的利益服务，由非洲酋长担任当地事务部门最底层的职位。在另一层面，英属南非公司管理层推行空间与社会两个方面的种族隔离政策，并将这种政策作为殖民统治的一部分。殖民者对于殖民统治的模糊性与矛盾性，激起了非洲人同样模糊与矛盾的反抗行为。这一章将分析这些问题。

殖民化的背景

津巴布韦的殖民化是欧洲瓜分非洲即将结束时比较引人注目的一部分。[1] 殖民化的推动因素包括西方的推力，特别是英国的经济危机，

---

① R. Blake, A History of Rhodesia(London: Eyre Methuen, 1977).

激发了英国在其他地方寻找新的市场、新的原料产地、新的工作机会的需求。约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很详细地分析了这些推动因素,提出了"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交替出现的观点。① 此时占领津巴布韦领土的殖民者主要是葡萄牙人、阿非利卡人(即南非白人)与英国人。钻石及黄金先后被发现,使林波波河南部成了殖民扩张主义在南部非洲发展的舞台。来自津巴布韦高原的非洲人也被这些矿产吸引至此,因此林波波河也成了非洲区域间联系的纽带。

开普殖民地是英国人向南非内地以及后来的林波波河北部扩张的补给站。英国人与阿非利卡人在这里互相竞争。葡萄牙人也威胁着英国人的利益。葡萄牙人的出现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当时他们与莫塔帕王国建立了关系,但是他们却没有成功在津巴布韦实行有效的殖民。大卫·比奇认为葡萄牙人取代了穆斯林,"但是葡萄牙人与穆斯林的最大区别在于:从 1560 年起,一些葡萄牙人占领津巴布韦是以攫取金矿为目的,而不仅仅是为了贸易"。②

总之,津巴布韦的殖民化非常复杂,它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包括在开普、纳塔尔(Natal)、兰特(the Rand)和伦敦的资本家的利益,在开普的英国驻外办事处、殖民政府、总督、高级专员的利益,还有传教士、南非白人和葡萄牙人的利益。③ 南非白人和葡萄牙人最终被击败,英国成为 1890 年代的殖民霸主。

41

但殖民化这部戏并不只是白人在唱。它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主角既有白人,也包括黑人。他们都希望能先了解对方并从对方身上得到好处。用戴安娜·杰特(Diana Jeater)的话说:"他们缺少相互的认知和理解,这些从善意或者敌意的行为表现中都可以看出来。'对方'是一个潜在的同伴,但也可能是潜在的敌人或者野蛮人。双方的交往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他们从相互交往中学到

①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48).

② D. N. Beach, The Shona and Their Neighbours(Oxford: Blackwell, 1994), p. 108.

③ A. Keppel-Jones, Rhodes and Rhodesia: The White Conquest of Zimbabwe, 1884 - 1902 (Pietermarizburg, University of Natal Press, 1983).

一些东西。"[1]过分依赖殖民文献记录的研究倾向于欧洲中心论，这种研究认为，在非洲事务中白人统治者比黑人拥有更多的特权。言下之意就是，非洲人是白人文明的传播目标，而不是理性的、积极的历史参与者。

基督教传教士是西方帝国最早的代表，而帝国最终在1890年代末征服了恩德贝莱与绍纳。约翰和琼·考玛洛芙(John and Jean Comaroff)认为"传教士不只是基督教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传递者，更是西方世界观的传播者。他们的任务是让非洲社区进入用象征性和物质性交易编织的网，从而将他们安全地与殖民文化捆绑在一起"。[2]

伦敦传道会(LMS)是最早从事将非洲人皈依基督教的基督教组织之一。它在马塔贝莱兰的传教很活跃，因为恩德贝莱的开国国王姆兹利卡兹·库马洛(Mzilikazi Khumalo)在1820年代与罗伯特·莫法特(Robert Moffat)建立了私人友谊。莫法特是最早进入南部非洲的传教士之一，他在索托-茨瓦纳(Sotho-Tswana)之间一个叫库茹曼(Kuruman)的地方建立了传教站。[3] 当恩德贝莱人在高原的西南部定居时，莫法特于1854年走访了他们，并于1859年在因亚斯(Inyathi)建立了第一个伦敦传道会教堂。[4]

早在16世纪，葡萄牙人就将基督教传入了马绍纳兰。[5] 在葡萄牙耶稣会会士法·岗卡罗达·席尔瓦(Fr Gonçalo da Silveira)在1560年

---

① D. Jeater, Law, Language and Science: The Invention of the Native Minad in Southern Rhodesia, 1890 – 1930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2007), p. 2.

② John L. Comaroff and Jean Comaroff, Of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The Dialectics of Modernity on a South African Frontier: Volume Tw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③ J. P. R. Wall(ed.), The Matabele Jounrnals of Robert Moffat, 1829 – 1860(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2 vols, 1945); R. Kent Rasmussen, Migrant Kingdom: Mzilikazi's Ndeble in South (Cape Town: Rex Collings, 1978).

④ N. M. Bhebe, Christianity and Traditional Religion in Western Zimbabwe (London: Longman, 1979).

⑤ Blake, A History of Rhodesia, pp. 11 – 12.

代被谋杀之前,他成功地使一名莫塔帕改信基督教。[①] 然而真正在津巴布韦的殖民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随后的一些传教士,包括查尔斯·海姆(Charles D. Helm)和约翰·史密斯·莫法特(John Smith Moffat)(罗布特·莫法特之子)。

传教士的活动并没有直接挑战恩德贝莱与绍纳人的政治自治权。但是"基督教化"的本质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它承载着用西方文化的公理和美学影响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的意识并将其"殖民化"的任务。[②] 恩葛瓦比·波赫比(Ngwabi Bhebe)向我们展示了整个 19 世纪 80、90 年代,在西方殖民者用暴力征服恩德贝莱地区之前,恩德贝莱人是如何抵抗基督教的。[③] 基督教教义强调个人只对上帝负责,正是这一观点破坏了非洲意识形态在政治、司法、宗教等各方面的神圣统治。[④] 基督教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包括了恩德贝莱人的俘虏。恩德贝莱的社会等级制度上层是赞西贵族,中间的社会阶层是恩哈利人(the Nhla),另外还有受到歧视的霍里人(the Hole)以及俘虏。[⑤] 非洲人将上帝崇拜视为异教,同时将古代的圣灵(amadlozi/vadzimu)贬为邪魔恶鬼,而基督教传教士摒弃了这种做法。[⑥]

然而,非洲人对传教士活动的回应依然是矛盾的,因为这些活动带来了益处,也带来了灾难。恩德贝莱人想要枪支,传教士能确

---

① H. H. K Bhila, Trade and politics in a Shona Kingdom: The Manyika and Their Portuguese and African Neighbours, 1575 – 1902 (Harare: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 1988); D. N. Beach, The Shona and Zimbabwe, 900 – 1850 (Gweru: Mambo Press, 1980).

② S. J. Ndlovu-Gatsheni, 'Re-thinking the colonial encounter in Zimbabw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33(1), 2007, pp. 173 – 191.

③ Bhebe, Christianity and Traditional Religion.

④ S. J. Ndlovu-Gatsheni, The Dynamici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mong the Ndebele of Zimbabwe, 1818 – 1934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Zimbabwe, 2004), pp. 230 – 250.

⑤ S. J. Ndlóvu-Gatsheni and F. J. Ndhlovu, Twilight of patriarchy in a southern African kingdom: A case study of captives and women in the Ndebele state of Zimbabwe, UNISWA Reasearch Journal, 19, 2005, pp. 59 – 71.

⑥ The London Missionary Record, xxviii, 1864. 在恩德贝莱的传教士开始无视恩德贝莱的一些神圣的节日,如因瓦拉(inxwala)。

保供应。[1] 现代医药治好了痛风之类困扰姆兹利卡兹和洛本古拉两位国王的疾病。而在非洲社会中受到压迫与剥削的非洲人发现基督教的福音很有吸引力。然而,无论在恩德贝莱还是绍纳,很多改信基督教的人被控以巫术惑众,然后被处死;传教士努力解除人们对"巫术"的指控,使基督教对被指控者更具吸引力。因此最初皈依基督教的是那些对自己社会的一些文化或传统持批判性观点的人,或是那些认为自己在文化方面受到压迫的人。[2] 例如有些女性憎恶包办婚姻、抵押孩子、杀死双胞胎等习俗,于是基督教传教站成了她们最好的避难所。[3]

白人商人也间接地让人们为即将到来的殖民主义做准备。"帝国的商品"——令人沉醉的酒精、糖、镜子、茶叶、小饰品等改变了非洲居民的品位,并且吸引着他们更加接近帝国的现金经济。当时的商人有阿拉伯-斯瓦希里人、葡萄牙人、布尔人(Boers)、英国人。[4] 在他们之后到来的是更具危险性的寻求特许权的人。在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之类的帝国主义者的赞助下,他们下定决心要剥削非洲人民、掠夺非洲的自然资源。早期来到这的人,如约翰·史密斯·莫法特、弗里德里克·赛卢斯(Frederick Selous)、查尔斯·海姆等成为恩德贝莱和绍纳的"专家"。例如约翰·史密斯·莫法特是这样描述恩德贝莱的:"一群好战分子……一个杀人犯的国家,他们与任何人为敌。"[5]一些传教士滥用非洲人对他们的信任,暗中勾结这些寻求特许权的人。托马斯·摩根·托马斯(Thomas Morgan Thomas)的《在中部非洲的

---

① B. Mahambaba, Women in the Histoy of the Ndebele (MA thesis, Uni).

② Ndlovu-Gatsheni, The Dynamic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mong the Ndebele.

③ Mahamba, Women in the History of the Ndeble, pp. 20 – 25, and L. Decle, Three Years in Savage Africa (Bulawayo: Books of Rhodesia, 1974).

④ H. H. K Bhila, Trade and politics in a Shona Kingdom; Mudeng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Mumhumutapa; Beach, The Shona and Zimbabwe; N. Bhebe, Ndebele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African, 1(2), 1974; Bhebe, Christinaity and Traditional Religion.

⑤ National Archives of Zimbabwe Historical Manuscripts MO5/1/1, John Smith Moffat to Mary Moffat, August 1854.

11 年》用诋毁的语言描述非洲,称他们的统治制度是未开化的、专制的,是漫漫的野蛮长夜。[①] 殖民被认为是向这个"黑暗大陆""传播文明的使命"。当时的非洲人不识字,他们没有办法用文字反驳白人的观点,因此他们也没有留下对早期白人看法的公开记录。

寻求特许权的人与殖民代理

卡尔·莫驰(Karl Mauch)与亨利·哈特利(Henry Hartley)于 1860 年代在乌姆富利河(the Umfuli river)附近发现了黄金,随后当地大批淘金者涌入赞比西与林波波河之间的地带。[②] 1870 年洛本古拉签订了《塔蒂租让书》(the Tati Concession),将金矿开采权给予伦敦和林波波矿业公司,该公司的代理人是马塔贝莱兰的约翰·史文朋爵士(Sir John Swinburne)。淘金行为因此达到高潮。后来,洛本古拉与探险家托马斯·拜因斯(Thomas Baines)签署了类似的租让书,将北部的开矿权给予南非黄金勘探公司。[③]

与此同时,由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主持的柏林会议于 1884 至 1885 年召开,会议的目的是欧洲列强瓜分非洲,这极大地激发了"争夺"非洲的狂潮。[④] 在这种激进的殖民策略面前,恩德贝莱和绍纳无法生存;而此时塞西尔·罗德斯已设法从非洲首领那里获得特许权,并保障所签协议的实施。在此期间,勘探者、商人、冒险家代表着公司、个人以及政府进行活动,加大获取采矿特许权的力度。

---

① T. M. Thomas, Eleven Years in Central South African(London: Routlege), 1971 [1873]. 关于殖民前治理的不同观点,参见 S. J. Ndlovu-Gatsheni,《挖掘非洲本土治理思想:20 世纪的恩德贝莱国家案例研究》, Indilinga: African Journal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4(2), 2005, pp. 449 - 470。

② 卡尔·莫驰对于关于发现金矿一事作了很多报道,而且他关于俄非财富的无稽之谈也被德兰瓦士·阿格斯大肆宣传,同时关于津巴布韦有金矿的谣言也被广泛传播。

③ Blake, A History of Rhodesia, pp. 24 - 26.

④ P. Nugent and A. J. Asjwaju(eds), African Boundaries, Conduits and Opportunities (London: Pinter, 1996).



图 2.1　洛本古拉：选自《生活》中的一张照片，摄于 1893 年

（来源：http://tbn0.google.com/hosted/images/c?q=0567a9a04c8133f_large）

1886 年，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发现了金矿。一年后，德兰士瓦(Transvaal)总统保罗·克鲁格遣使向洛本古拉施压，要求签订"友好条约"。使者皮埃特·格罗伯勒(Piet Grobler)有个人野心，他想当德兰士瓦驻恩德贝莱的大使，因此 1887 年所签的条约被称为《格罗伯勒条约》。[①] 当这份条约公之于世之后，罗德斯已准备好剪除南非白人帝国主义野心的翅膀了。[②]

罗德斯派遣当时在贝专纳兰(Bechuanaland)担任西德尼爵士专员助理的约翰·史密斯·莫法特去与洛本古拉协商。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因为洛本古拉与莫法特彼此认识。洛本古拉称莫法特"乔尼"(Joni)，因为他们的父亲是朋友，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乔尼"是为了攫取恩德贝莱利益而来的。[③] 洛本古拉不知不觉地相信了"乔尼"，因此"乔尼"轻而易举地让这位恩德贝莱国王在 1888 年 2 月 11 日签订了众所周知的《莫法特条约》(Moffat Treaty)。条约要求洛本古拉时期不再出让任何特许权，不准在"事先不知情或没有女王委任的南非最高专员批准的情况下签订任何条约"。[④]

---

① 根据柏林会议要求，那些对所宣称的势力范围拿不出协议或实际活动证据的帝国主义者，要冒领地被其他人拿走的危险。

② S. Samkange, The Origins of Rhodesia(Heinemann, London, 1968).

③ Ransford, Rulers of Rhodesia, p. 156; Blake, A History of Rhodesia, p. 39.

④ P. R. Warhurst, Concession-seeker and the scramble for Matabeleland, Rhodesiana, 29, 1973, pp. 55 - 64.

为什么恩德贝莱国王会签订这些条约并给出特许权呢?人们在提到《拉德租让书》时普遍会问到这个问题,《拉德租让书》在《莫法特条约》几个月之后签订,并且成了恩德贝莱与绍纳殖民化的证明文件。约翰·史密斯·莫法特和查尔斯·海姆说动洛本古拉签约,给他的印象是:恩德贝莱将会像其邻邦恩瓦托(the Ngwato)的卡哈玛(Khama)一样得到英国人的保护,在马塔贝莱兰采矿的白人不会超过 10 个,不过这个口头承诺没有写进条约。一位自己不识字、只能靠翻译沟通的国王注定是要上当受骗的。当时洛本古拉正承受着来自寻求特许权的各种群体的巨大压力,他认为英国最强大,也是最有能力为其提供保护的。[①] 比奇认为

> 尽管事实上有很多利益群体试图欺骗洛本古拉,他还是同意了给出各种特许权和签订条约,这主要是为了使外国资本家对自己国家及周边的影响力最小化。他尝试着各种可能避免与白人全面开战的方法,因为他知道一旦开战,他不可能赢。[②]

根据波赫比的记载,1880 年代,恩德贝莱社会分成顽固的保守派、好战分子以及少数和平主义者(这些人希望变革)。年轻士兵团体(amajaha)想对白人开战,而和平派想通过谈判获得和平。这使洛本古拉左右为难,他除了采取拖延战术之外几乎无计可施。[③]

46

与此同时,欧洲正在大肆宣扬非洲大陆的经济资源,包括林波波河与赞比西河之间的俄非(Ophir)财富传奇,这些极大地刺激了帝国主义

---

① Samkange, The Origins of Rhodesia; R. Brown, Aspects of the scramble for Matabeleland, in E. Stokes and R. Brown (eds), The Zambesian Past: Studies in Central African Hist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63 - 93.

② Beach, The Shona and their Neighbours', pp. 166 - 167.

③ R. Brown, Aspects of the scramble for Matabeleland; T. Ranger, Revolt in Southern Rhodesia, 1896 - 1897: A Study in African Resistance (London: Heinemann, 1967).

者的殖民行为。[1] 1886 年人们发现在兰德有丰富的金矿，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的第二个兰德金矿神话更是让津巴布韦高原被称为“巨大的黄金矿脉”。[2]

尽管洛本古拉极力反对，英国政府仍然在 1889 年 10 月 29 日颁布《皇家宪章》，授权罗德斯创建英属南非公司(BSAC)。这个公司模仿了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是一个经济政治实体，它注重开采黄金、钻石等经济资源，也关注政治权利，为拓展英国金融资本扫清道路。它有建立自己的警察部队的特权，可悬挂自己的旗帜，可建造公路、铁路、电报系统、港口，可建立银行，可开矿并将所获领土纳入版图。[3] 简而言之，它享有帝国主义进行殖民的全部权力。即便洛本古拉拒绝签约，殖民化也无法避免。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非洲大部分地区沦为殖民地；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只有埃塞俄比亚与利比里亚得以幸存。[4]

殖民化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文化碰撞，其特点是通过相互贸易以及将非洲人转化为基督徒的方式进行，后来就转变为暴力殖民。英属南非公司的创立、入侵非洲的武装力量的组建都显示了西方势力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摧毁非洲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马克沁机枪对白人的殖民入侵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白人具有了显著的武力优势。杰拉

47

德·马扎瑞(Gerald Mazarire)认为土著居民与布尔人最初的关系是建立在枪支贸易上的，这种贸易“随后在内地形成枪支文化，导致局部战争和死亡明显增加”。[5]

---

① I. Phimister,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Zimbabwe, 1890 - 1948: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London: Longman, 1988), p. 5.

② Rose Blennerhassett and Lucy Sleeman, Adventures in Mashanonaland (Bulawayo: Books of Rhodesia, 1969[1893]), p. 26.

③ Blake, A History of Rhodesia, p. 54.

④ A. A. Boahen, African Perspectives of Colonialism (London: Currey, 1989), pp. 38 - 45.

⑤ Gerald C. Mazarire, Memories and Contestations of the Scramble for Zimbabwe: Chivi (Mashonaland) c. 1870 - 1892, in f. j. Kolapo and k. o. Akurang-Parry (eds.) African Agency and European Colonialism: Latitudes of Negotiation and Containment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7), p. 62.

先遣部队与占领马绍纳兰

先遣部队对马绍纳兰的入侵标志着白人侵略者对津巴布韦高原占领的开始。军事化的堡垒成为林波波河与赞比西河之间道路的重要标志,其中很多从林波波河流域通往现在哈拉雷的道路标着“此路往北”。① 军事堡垒是推进殖民化的象征;例如维多利亚堡最终在1893年成为攻击恩德贝莱的军事补给站。

绍纳社区对此反应迟缓,因为很多绍纳人认为先遣部队只不过是一支来贸易和找黄金的队伍,一旦商业目的达到就会离开,同以前的葡萄牙人和其他的商人一样。这种缺乏直接抵抗的现象让亚瑟·科佩尔·琼斯(Arthur Keppel-Jones)认为白人殖民者“占领”了马绍纳兰,然后又“征服”了马塔贝莱兰,②这种观点忽略了绍纳人对强征劳役和收税的零星抵抗。③ 绍纳人认为英属南非公司的要求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兰格写道:

> 在马绍纳兰,英属南非公司能够看见,事实上也的确看见了自己在支持白人经济活动拓展方面所起的主要作用。在早期公司对自己的定位仅仅是殖民力量的外延部分,其活动局限于通过惩罚性探险与强制应征劳力的手段支持殖民者……由于公司管理无能,而绍纳领导人认为自己并未被征服并且仍拥有武力,公司出现了严重的混乱。④

---

① Gerald C. Mazarire, Memories and Contestations of the Scramble for Zimbabwe: Chivi (Mashonaland) c. 1870 - 1892, in f. j. Kolapo and k. o. Akurang-Parry(eds.) African Agency and European Colonialism: Latitudes of Negotiation and Containment(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7), p. 63.

② A. Keppel-Johns, Rhodesia and Rhodes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89.

③ Ranger, Revolt in Southern Rhodesia, ch. 2, Provides details on how the BSAC made great efforts to treat the Shona as subjects and how the Shona resisted this treatment thoughtout the 1890s.

④ 同上,p. 87。

英属南非公司在马绍纳兰建立统治，伴随着商品化的加速；由于白人殖民者需要农作物和牲畜，一些人对新的市场做出了反应。[①] 他们用农作物和牲畜跟白人交换衣服、珠子、威士忌、盐、枪械和糖。殖民的特点不只是暴力和损失，它同时也引进了新的资本积累模式并且导致了一些非常富有的非洲群体的出现。[②] 然而，费米斯特(Phimister)认为：

> 商业资本不健全的发展过程调整了已有的社会关系，但是没有给社会关系带来决定性的改变。然而无论是投机资本的利益还是特许管理部门极其有限的资源都不要求，也不允许当地社会形态产生深刻的变革。原始积累主要靠掠夺，用斗争将直接生产者与将来的生产方式分离。[③]

这些都反映出了殖民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殖民地边界延伸的不均匀性。

1893至1897年，暴力殖民征服与非洲人的反应

一直到1893年，先锋部队未能在马绍纳兰找到丰富的黄金矿源，之后英属南非公司决定将寻金活动拓展至马塔贝莱兰，这里被一些人认为是“第二个兰德金矿”。但是尽管先锋部队失败了，罗德斯仍把土地分给这些先遣队员，兑现了对那些参与占领马绍纳兰的人的部分承诺。[④]

1893年英恩之战及1896至1897年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的起义之后，对恩德贝莱和绍纳的“有效殖民化”才真正开始。英恩战争的准备工作包括鼓励绍纳人停止向恩德贝莱缴纳贡赋。为了搜寻两名被指

---

① P. Fitzparick, Through Mahonaland with Pick and Pen (Johanesburg: Argus, 1892, Harper, 1973 reprint), p. 45.

② R. G. M. Mtetwa,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Duma People of South-Eastern Rhodesia,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Rhodesia, 1976).

③ Phimister,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Zimbabwe, p. 17.

④ A. Lenard, How We Made Rhodesia (Bulawayo: Books of Rhodesia, 1896), p. 20.

控偷了洛本古拉牲畜的厨师,洛本古拉的军队在玛甘达迪(Mgandani Dlodlo)和曼叶乌(Manyewu Ndiweni)的指挥下进攻了维多利亚堡,并越过了由英属南非公司所划定的边界。[①] 这件事立即被那些想要攻击恩德贝莱的人,如利安得·斯塔尔·詹姆士(Leander Starr Jameson)和棱迪(Lendy)上尉等拿来大做文章。这刚好就证实了传教士的报告,说恩德贝莱"嗜血成性",他们靠掠夺邻居谋生,破坏人类生活。[②] 布莱克(Blake)指出:"事实上,在攻击恩德贝莱之前,罗德斯和詹姆士一直在等候机会。他们并不想首先开战。"[③]

49

白人殖民者以"维多利亚堡事件"为借口,与一些居住在恩德贝莱的绍纳族群联手摧毁了恩德贝莱国。[④] 由于白人先遣部队手中的武器精良,这场征服活动很快就结束了。恩德贝莱在善噶尼河与莫贝姆贝斯河进行了抵抗,战败之后,洛本古拉放火烧掉了他的都城,向北逃亡,从此销声匿迹。但在普普,在马塔贝莱兰战役的最后一战中,恩德贝莱人消灭了艾伦·威尔逊(Allan Wilson)手下的巡逻队,这些巡逻队是前来追捕他们国王的。悲剧却是,恩德贝莱人赢得了一场战斗却输了整个战争。[⑤] 入侵之敌已经占领布拉瓦约,国王弃城而逃。但是朱利安·考宾(Julian Cobbing)认为普普之战的胜利是一个重要的暗示,说明1893年恩德贝莱的军队并没有完全被击败。他们的国家,尤其是军

---

① 詹姆士(Jameson)认为这个边界主要是穆亚提(Munyati)和沙色河(Shashe river)一线。具体细节参见:S. J. Ndlovu-Gatsheni, The Dynamci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mong the Ndebele, and J. R. D. Cobbing, The Ndebele under the Khumalos, 1820 - 1896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Lancaster, 1976).

② J. D. Omer-cooper, The Zulu Aftermath: Revolution in Bantu Africa (London: Longman, 1966).

③ Blake, A History of Rhodesia, p. 102. See also Ndlovu-Gatsheni, The Dynamic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mong the Ndeble, ch. 6.

④ Anne Dorey, The Victory Incident and the Anglo-Matabele War of 1893 (Salisbury: Central Af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Local Series No. 16, 1966).

⑤ 这些事件最新的研究,请参考:B. Lindgren, Power, education, and identity in post-colonial Zimbabwe: Representation of the fate of king Lobengula of Matabeleland, Af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pp. 46 - 67. See also P. Nyathi, Mthwakazi: Imbali YamaNdebele 1820 - 1894 (Gweru: Mambo press, 1995).

事制度保持完整,因此他们才有能力在1896年发动另一场战争。[1]

1896年3月和6月,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发动起义,猛烈抗击英属南非公司。这场起义最终奠定了群众性民族主义以及将来独立的津巴布韦国家的基础。[2] 而对于起义的原因,学者们也达成共识:牛瘟、干旱、蝗虫等自然灾害爆发,当地人自然地将此归咎于白人的存在;此外还有白人殖民者的暴行,包括强征劳力、强奸、抢劫以及早期殖民的强行课税,如1894年的房屋税。[3] 到了1895年,国家处于警察的统治下,其特点是镇压、无法无天、极力侵犯恩德贝莱人与绍纳人。[4]

50

因为恩德贝莱-绍纳起义很重要,接下来我们将总结三位重要学者的分析,他们分别是:特伦斯·兰格、朱利安·考宾和大卫·比奇。

特伦斯·兰格认为起义是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

兰格的《南罗得西亚的反抗》一书第一次全面地研究了恩德贝莱-绍纳起义。[5] 他在一篇评论中对这本书进行了总结:

> 这本书中,作者声称1896年的起义充分利用了恩德贝莱和绍纳文化的创造力。起义由绍纳酋长和恩德贝莱的因都那

---

① Cobbing, The Ndebele under the Khumalos, pp. 340 – 345.

② 马塔贝莱兰人对1893年的英恩战争有详细记录,称为Imbali Yokuqala(Mfazol)。英恩战争也是恩德贝莱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这是因为恩德贝莱人在保卫自己的王国,是自己的事情,而一些绍纳人甚至希望它被摧毁。

③ M. Tsomondo, Shona reaction and resistance to the European colonisation of Zimbabwe,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Affairs, 2, 1977, pp. 11 – 31.

④ Ranger, Revolt in Southern Rhodesia, analysed deeply what he termd the administration of Mashonaland and Matabeland and revealed all the issues that caused the risings of 1896 – 1897.

⑤ 《南罗得西亚的反抗》写作出版于1967年。20世纪60年代的"改变之风"(winds of change)导致了非洲的去殖民化。20世纪60年代的罗得西亚,不仅是民族主义的大量崛起,但是也因ZAPU(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与ZANU(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冲突,而日益紧张。特伦斯·兰格是NDP(国家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与ZAPU的成员。

> (indunas)领导，同时著名的宗教人物也借助其影响力对“传统”进行了预言性、有创造性的修改。这些起义对非洲殖民前历史进行了“总结”。同时，它们包含的一些元素在整个殖民时期的群众性抗议中始终能得以体现。1896 年的起义和 1960 年代早期的抗议运动期间连续发生的抵抗运动，通常都周期性地显示了群众的情感和热情。这种情感和热情并没有采取武装反抗的形式，而是利用了一些习语，这些习语充分展现了 1896 年起义者的献身精神。[①]

早期殖民者在马塔贝莱兰和马绍纳兰是如何统治的，英属南非公司的统治是如何激起恩德贝莱人与绍纳人反抗殖民主义的，兰格对此都提供了详细的分析。比奇称其著作是“对殖民化进程本身的出色记录”，认为“兰格对白人社会的洞察力，佐以殖民者自身的例证，非常有说服力”。[②] 兰格也提供了一个殖民前历史的概貌，表明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的关系绝非如殖民者历史记录描述的那样糟糕。

51

他注意到，在 1896 年 3 月和 6 月，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攻击白人殖民者时在战术上完全是出人意料的，尽管他指出恩德贝莱人在 3 月首先起义，随后绍纳人在 6 月发动袭击。兰格认为“绍纳起义”本质上是恩德贝莱起义的延伸。由于詹姆士对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发动袭击，很多殖民者的兵力被抽调走，绍纳人选择白人兵力空虚的时机发动了袭击。[③]

兰格的分析中最具争议的部分是关于非洲传统宗教权威所扮演的

---

① T. Ranger, The people in African resistance: A review, Jou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Special Issue on Protest and Resistance, 4(1), 1977, pp. 125 – 126.

② D. N. Beach, Review article: Revolt in Southern Rhode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Studies, 13(1), 1980, p. 108.

③ S. J. Ndlovu-Gatsheni, The First Chimurenga, 1896 – 1897: Considerations of Ndebele Military Strategy and Tactics (BA thesis, University of Zimbabwe, 1992). The Jameson *Raid* was a disastrous military adventure ranged against the Transvaal Boer Republic.

角色。据说这些宗教领袖为恩德贝莱和绍纳不同民族间的团结协作做出了贡献。兰格发现了两个主要的指挥中心：恩塔巴兹卡马姆博(Ntaba zikaMambo)和马萨雅莫姆贝(Mashayamombe)。在1896至1897年，当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同白人殖民者交战时，姆瓦里(Mwari)教派的姆卡瓦提(Mkati)，绍纳姆宏多罗(mhondoro)教的卡古威(Kaguvi)这两位宗教领袖联合了非宗教界领导人以及一些不太重要的宗教领袖共同抗敌。[1]

兰格引入意识形态问题来解读恩德贝莱和绍纳的起义。宗教在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成为统一的意识形态。1978年，《南罗得西亚的反抗》重印，兰格在新写的前言中承认了别人对此书的一些批评，但他同时强调，1896年是危机之年，它让人们求助于先知先觉的宗教领袖。简而言之，兰格保留了他对宗教权威在恩德贝莱-绍纳起义中所起作用的看法。[2] 据兰格所言，宗教领袖在非洲殖民前有特定的地位，他们承诺在缔造太平盛世的过程中，创建一个没有白人的新社会。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穆任噶(Murenga)或穆楞噶(Mulenga)出现了。他掌握战争神药的配方，能让恩德贝莱和绍纳的起义军刀枪不入。穆任噶是一个巫师，他许诺同白人殖民者作战的战士对子弹有免疫力。[3] 在民族主义史学中，1896至1897年的非洲人抵抗运动被通称为解放战争(Chimurenga)，这一灵感来自穆任噶。

像姆卡瓦提这样的宗教领袖是如何组织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抗击白人殖民者的？在分析这样的问题时，兰格指出姆卡瓦提使用了信使。他派茨赫瓦(Tshihwa)、邦达(Bonda)等信使前往马绍纳兰，鼓舞义军将起义推进到绍纳中部地区。[4] 姆瓦里教派的“官员”和姆宏多罗教的

52

---

① Ranger, Revolt in Southern Rhodesia, pp. 212 - 218.

② T. Ranger, Voice from the Rocks: Nature, Culture and History in the Matopos Hills of Zimbabwe (Harare: Baobab Books, 1999) is in fact a restatement of the centrality of religion in politics.

③ Ranger, Revolt in Southern Rhodesia, pp. 217 - 220.

④ 同上，pp. 202 - 205。

巫师将马塔贝莱兰和马绍纳兰的起义连成一片，以至于特许区最终成了“绍纳起义军的温床”。[①] 姆布娅·娜含妲(Mbuya Nehanda)是兰格记录的另一位重要宗教领袖，她在玛佐威(Mazowe)地区宣传起义。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小说作品中，娜含妲都有崇高的地位，因为她是强烈反对殖民主义的著名女巫。在恩德贝莱-绍纳起义即将结束时，她被施以绞刑。据说她在被审讯期间曾预言，终有一天她的骨骸会崛起，再次抗击殖民主义。[②]

兰格对1896至1897年起义事件的解释开创了民族主义历史学。他为1960年代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图案丰富的镶嵌画，使他们在想象殖民后的国家时，也可以画上男男女女的英雄人物。[③] 兰格的书出版之时，民族主义已经扎根，民族主义者很容易将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团结起来同殖民主义做斗争。在对兰格《南罗得西亚的反抗》的书评中，大卫·比奇提出了以下问题：

> 《南罗得西亚的反抗》给它的非洲读者提供了什么？首先，他们了解到了他们有丰富且令人自豪的过去：兰格带来了很多有关大津巴布韦、莫塔帕、昌加米尔的可信史料，展示了它们的文化传统如何在绍纳“主权”下生生不息，这些遗产绝不像罗得西亚史学家所说的是令人厌烦的残迹。兰格以一种同情的笔调描述恩德贝

---

① Ranger, Revolt in Southern Rhodesia, p. 202.

② S. Mutswairo, The Picture of Nehanda and Kagubi, in P. Halesy, G. Morlan and M. Smith(eds.), If You Want to Know Me(New York: Friendship Press, 1976). pp. 18 – 19. L. Vambe, From Rhodesia to Zimbabwe (London: Longman, 1976). Yvonne Vera 也写了一本关于娜含妲的书来强调她的英雄主义，书名是：Y. Vera, Nehanda(Harare: Baobab Books, 1993)。

③ B. Raftopoulos, Problematising Nationalism in Zimbabwe: A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 Zambezia, 26(2), 1999, pp. 115 – 134. 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所说的重要著作有：T. O. Ranger, The African Voice in Southern Rhodesia (London: Heinemann, 1970); N. Sithole, African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E. Mlambo, The Struggle for a Birthright (London: C。Hurst1972); L. Vambe, An Il-Fated People (London: Heinemann, 1972).

莱的过去，尽管这段历史有些不愉快，但是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的关系也绝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坏。[①]

53 兰格在向非洲读者展示令人骄傲的英雄历史时，也为他日后批判的受政府支持的"爱国历史"的统治地位播下了种子。[②] 兰格提供了1896至1897年恩德贝莱-绍纳起义的情况，为民族主义者构想津巴布韦奠定了基础。作为1960年代早期的民族主义政治活动家，兰格尝试将"早期反抗"与1960年代大规模民族主义运动联系起来。[③] 在民族主义者的圈子里，他的成就在于他为国家的构想发掘了很多必要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包括姆卡瓦提、娜含妲、马萨雅莫姆贝、马科尼(Makoni)、昆锥·恩研多若(Kunzvi-Nyandoro)、姆鲁古鲁(Mlugulu)、希金亚马茨(Siginyamatshe)、姆珀茨瓦纳(Mpotshwana)等。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兰格关于1896至1897年事件的评论，遭到了修正主义学者的严厉批评。

宗教缺席：朱利安·考宾关于1896年恩德贝莱起义的研究

朱利安·考宾是第一位质疑兰格著作中心理论的修正主义学者。他的质疑以他对恩德贝莱历史的全面研究为基础。考宾对姆瓦里教派在组织、协调马塔贝莱兰起义中所起的中心作用表示怀疑，不予接受。他从相关问题开始批评：

当起义的本质以及非洲人斗争的方式能够密切反映参与起义

---

① D. N. Beach, War and Politicals in Zimbabwe, 1840 – 1900 (Gweru: Manbo Press, 1986), p. 119, 书中作者长篇引用了他1979年所写的《南罗得西亚起义》的书评(see fn. 59)。

② T. Ranger, Historiography, patriotic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The struggle over the past in Zimbabwe,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30(2), 2004, pp. 215 – 234.

③ Ranger, The people in African resistance: A review; and T. O. Ranger, Connexious between 'primary resistance' movements and modern mass nationalism in east and central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9(3/4), 1968.

> 的政治团体的结构时,是否有必要假定这个"协调因素"或者翻找战争的"秘史"呢?[①]

兰格认为恩德贝莱国家在 1893 年马塔贝莱兰战争后严重分裂,以至于恩德贝莱人及其领导者屈服于姆瓦里教派的哄骗,然而这一观点未能使考宾信服。[②] 虽然恩德贝莱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国王和都城,但是由酋长带领的其他政治组织仍然发挥着其应有的功能,使得恩德贝莱的贵族在 1896 年 3 月再次发动另一场战争。虽然"1895 年恩德贝莱的居住模式极有可能跟 1893 年战争之前是一样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恩德贝莱王国的军事制度并没有完全解体。[③] 考宾正确地指出,英属南非公司的势力在比布拉瓦约和交通主干道以外的地区很弱。[④] 考宾的分析要点是:世俗酋长利用他们殖民前在各省的势力和影响力,发起、领导和组织了马塔贝莱兰起义。1896 年 3 月 20 日,对散布在高德瓦约-菲拉布斯地区(Godlwayo-Filabusi)的白人殖民地发动了首次攻击,这是由酋长马度那・马弗(Maduna Mafu)和马拉亨尼・马弗(Mahlahleni Mafu)领导的。这一事实证明了该分析的合理性。这些事实使考宾得出如下结论:

54

> 恩德贝莱王国在 1893 年没有被消灭,而是继续存在、伺机再战。君主制也没有被消灭,毋庸置疑,恩德贝莱空前地团结在恩古尼族旗下再次开战。在洛本古拉的大儿子尼亚曼达(Nyamanda)

---

① J. Cobbing,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Rebellion of 1896 and 1897,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8(1), 1977, p. 63.

② T. Ranger,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Rebellion of 1896 and 1897: Part one: The Rebellion in Matabelan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n People's Conference, Rhodes Livingstone Institute, Lusaka, Zambia, 1963.

③ Cobbing, The absent proesthood, p. 63.

④ NAZ, Historical Manuscript c. 8547, Report of Sir Richard Martin on the Native Administration of the British South African Company, 1897.

被推选为王位继承人后，国内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1]

事实上，起义并非像兰格所说的那样由姆瓦里教派的教士发动和组织。恩德贝莱的众多酋长，如姆鲁古鲁·库马罗(Mlugulu Khumalo)、费泽拉·库马洛(Fezela Khumalo)、德里素·马瑟玛(Dliso Mathema)、斯库莫博·穆古尼(Sikombo Mguni)、姆坡特沙瓦那·恩迪温尼(Mpotshwana Ndiweni)、曼叶乌·恩迪温尼(Manyewu Ndiweni)、卡兰加的玛耶乍(Mayeza)以及尼亚曼达(王储)等都曾在马塔贝莱兰积极地指挥过战斗。[2] 洛本古拉幸存的王妃们也参与战斗。颇有影响力的洛兹赫利·多洛多(Lozikheyi Dlodlo)甚至加入起义军并在战争初期分发弹药。[3]

考宾认为，兰格强调宗教在组织恩德贝莱起义中的中心作用可能是受英属南非公司的"巫医"宣传的影响。这种宣传突出"神秘的宗教狂热"，包括了这样一种信念，子弹在神力的干预下可以转变为水。[4] 而关于绍纳人参与起义，考宾这样认为：受恩德贝莱发展势力影响的"附属国"被恩德贝莱的酋长们发动起来，而一些绍纳人跟恩德贝莱人一样憎恨英属南非公司的殖民统治。在分析绍纳参加起义的主要民族时，考宾认为"尽管英属南非公司不断指控，但王国并不是6月绍纳起义的直接组织者。"[5]绍纳主要的起义部落在"附属国"之外，主要集中在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特许权区、哈特利区(Hartly)。这些部落的特别之处是他们从葡萄牙人那里获得了枪支，并用这些枪支抵御恩德贝莱人的袭击。考宾对于马绍纳兰起义增加了两点重要的看法。第

---

① Cobbing, The absent priesthood, p. 65.

② Cobbing, The Ndebele under the Khumalos, pp. 80 - 85. See also NAZ, Historical Manuscript L05/6/2, Report of W. E. Thomas from Nyamandlovu, 18 July 1896.

③ NAZ Historical Manuscript L05/6/6, Gielgud to Chief Native Commissioner, 19 October 1896, who described Lozikheyi as the most dangerous woman because of her active role.

④ Cobbing, The absent priesthood, p. 62.

⑤ 同上，p. 77。

一,大约30%的参加起义的绍纳人在1896至1897年承受着欧洲人的巨大压力。第二,他指出,

> 在英国人的势力被严重削弱之后,绍纳加入战争,宣布独立。4月末,比尔上校(Beal)的部队被派去增援布拉瓦约时,马绍纳兰的白人警察和士兵的兵力已十分空虚。[①]

这个看法很重要,因为它与兰格的观点完全不同。兰格认为在姆福瑞河谷(Mupfure valley)的马萨雅莫姆贝酋长国,有一个与姆瓦里教派有联系的中心,在姆卡瓦提的指挥下,这个中心将起义传播到马绍纳兰。考宾总结到,人们普遍相信的姆瓦里教派组织、协调起义的作用是虚构的,他还补充道:

> 当恩德贝莱在进行内战时,一些重要的绍纳头领却在同英属南非公司合作,可见起义的主旋律是不团结,各自为战的。恩德贝莱人缺乏团结策略,而绍纳人则更甚:这两次起义之间根本就没有战略性的联系。[②]

在考宾看来,姆卡瓦提、卡古威(Kaguvi)、娜含妲等宗教人物是当地绍纳政权的从属者,而不是超越民族的太平盛世的缔造者。[③]

是多次解放战争(zvimurenga)而不是一次解放战争(chimurenga):大卫·比奇就1896至1897年绍纳起义的研究

和考宾一样,比奇对兰格关于恩德贝莱-绍纳起义的主要观点也持批判态度,尤其反对将传统宗教的领导看做是联合恩德贝莱和绍纳建

---

① Cobbing, The absent priesthood, p. 78.

② 同上,p. 84。

③ 同上。

56 立非洲民族阵线的重要因素。比奇介绍了两个与兰格观念相反的重要观点。首先是逐步起义的概念，即起义的传播像波浪一样，从一个地区推向另一个地区。例如，卡古威和马萨雅莫姆贝是“在向姆卡瓦提购买蝗虫药的途中参加起义的，直到这时他们才对恩德贝莱取得胜利的消息有所反应”。[①] 其次，比奇提出多次解放战争而不是一次解放战争的观点，以此作为那段时期马绍纳兰历史特点的正确写照。由卡古威和马萨雅莫姆贝开始，比奇认为他们“是不团结的，有时是竞争对手，而不是联合指挥官”。[②] 通过这两个论点，比奇严厉地批判了兰格的论点。他说道：

> 仅就绍纳人通讯和技术的局限性而言，起义也不会是“同时”或“几乎同时”发生的，也不会像以前认为的那样是预先安排好、有统一组织的。因此，起义需要一个“宗教”或“政治”组织来统筹的说法站不住脚，我们也需要大幅修正对1896年绍纳社会和政治情况的理解。[③]

比奇还介绍了1890至1896年间对起义爆发有重要影响的事件，绍纳人以各种形式反抗殖民统治，包括上班开小差、面对殖民者收税和征劳役放弃家园、故意残害牛群等。通过这种方式，比奇按照时间顺序对起义进行了新的描述。比奇全面介绍了有关绍纳反抗的细节。从1895年的特许权区开始，本地事务部前去收税的警察受到恩德贝莱人的炮击和鞭笞，这使得绍纳中部进入“异常紧张的状态”，预示着1896年3月至6月间全面战争的爆发。这种紧张氛围的特点是：对殖民地警察发动没有组织、零散的攻击、拒绝交税以及进行暴力威胁。[④] 1895

---

① Beach, Review Article: Revolt in Southern Rhodesia, p. 107.

② 同上，p. 107。

③ D. N. Beach, Chimurenga: The Shona Rising of 1896 – 1897,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20(3), 1979, p. 401.

④ 同上，pp. 403 – 404。

年和1896年夏天的蝗灾,给受可怕的旱灾(shangwa)困扰的绍纳人带来真正的威胁,气氛更趋紧张。对比奇而言,1896至1897年的绍纳起义"一开始是局部战争,各个酋长在自己的领地内各自为战,直到他们被赶出领地"。[①] 比奇总结道:"总而言之,1896年绍纳中部的解放战争是由很多局部战争构成的,这些战争有相同点、不同点,可能有相互合作,可能没有"。[②]

考虑到恩德贝莱和绍纳最终被白人殖民者击败的方式,我们有理由接受考宾和比奇的观点:恩德贝莱和绍纳的起义是"不团结的",而不是"团结的"。在绍纳起义期间,恩德贝莱与白人殖民者在马托波斯(Matopos)单方面和解,这一现象确证了"不团结"的观点。和非洲人的不团结一样,高超技术在镇压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

到了1990年代,比奇仍在批判受"民族主义者"影响的历史叙述,他甚至将民族主义者所尊敬的姆布娅·娜含妲描述成一个普通的"无辜妇女,受到了不公正的控告"。[③] 比奇对娜含妲的描述堪称是"不爱国的",尽管这具有讽刺意义,但是与之相反的是玛庞德拉(Mapondera)却被描绘成英雄人物。[④] 兰格并没有强调玛庞德拉在1890年代的政治作用。直到1998年逝世前,比奇还在继续写作;他写的东西听起来越来越像是马绍纳兰王国的历史;殖民前的津巴布韦历史是"部族"的各种故事,有巫术、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种族内部和种族间的仇恨、迁移、种族通婚、亲属关系和各种部落的名称等。[⑤]

比奇和考宾对兰格的修正批判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他们所谓的

---

① D. N. Beach, Chimurenga: The Shona Rising of 1896 - 1897,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20(3), 1979, p. 416.

② 同上,p. 419。

③ 比奇的著作似乎是要推翻非洲的英雄主义,这一点在他的书中表现得很明显。Beach, An innocent woman, unjustly accused: Charwe, medium of the Nehanda Mhondoro spirit and the 1896 - 1897 Shona rising in Zimbabwe, History in Arica, 25, 1998, pp. 27 - 54.

④ D. N. Beach, Mapindera: Heroism and History in Northern Zimbabwe, 1840 - 1904 (Gweru: Mambo press, 1989).

⑤ Beach, The Shona and Zimbabwe; D. N. Beach, A Zimbabwean Past (Gweru: Mambo press, 1994).

1896至1897年战争期间的“抵抗者”与“合作者”。在马塔贝莱兰，伽马普·斯索勒(Gampu Sithole)是主要的“合作者”；他让白人援兵进来救援被恩德贝莱军队包围在布拉瓦约临时营地的同伙。1896至1897年恩德贝莱-绍纳起义，史学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它仍然从那些被认为是爱国者的角度去解释这段历史，没有人试图去思考那些站在白人一边的人是怎么想的。在一场看似“黑人跟白人的战争”中，当地的情况与环境使非洲人站在不同的立场，这些值得我们从头开始深入研究。

58

毋庸置疑，比起修正主义者的解释，兰格对恩德贝莱-绍纳起义的解释在津巴布韦大众中传播得更快。津巴布韦历史依然充满民族主义者的观点，而兰格的观点恰好与津巴布韦历史上连续上演的解放战争“同步”：1896至1897年的起义是第一次解放战争，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民族主义解放斗争是第二次解放战争，而21世纪有争议的快速土地改革被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首次定义为第三次解放战争。

早期罗得西亚的殖民情况

对马绍纳兰和马塔贝莱兰的占领，为白人统治者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征服的权利”，证明白人对非洲人的统治是合理的。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为新发现的殖民地命名。塞西尔·约翰·罗德斯喜欢用“赞比西亚”，而利安得·斯塔尔·詹姆逊更喜欢“特许权地”。但是这两个名字都没有影响力。相反，第一份在1892年的索尔兹伯里(即现在的哈拉雷)出版的报纸自称为“罗得西亚先驱报”(Rhodesia Herald)。于是1895年5月英属南非公司正式采纳罗得西亚这个名称，但是英国政府直到1898年南罗得西亚枢密令的颁布才承认这个名字。[1] 直到1923年责任政府成立，1898年的枢密令一直是治理罗得西亚的工具。这是英国与英属南非公司利益妥协的结果。[2] 像在澳大利

---

① Blake, A History of Rhodesia. p. 114.

② C. Palley,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and Law of Southern Rhodesia, 1898－196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0－16.

亚和加拿大一样，殖民者在这里建立的殖民地具备以下主要特点：土地被没收，殖民人口不断涌入，殖民统治对内进行种族隔离，白人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①] 卡莱琳·埃尔金(Caroline Elkins)、苏珊·佩得森(Susan Pederson)正确地指出，移民的殖民行为表现为四个主要团体之间持续的协商和斗争。这四个团体一个是“帝国首都”，国家主权的所在地；一个是本地行政机关，主要负责维持秩序和权威；一个是土著居民，其众多的人口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不容小觑；另一个是要求很高、人脉很广的白人团体——他们希望通过控制非洲人获取利益。[②]

59

英属南非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稳定的殖民统治形式，在不会引发非洲人进一步暴力抵抗的情况下，实现帝国的规划，满足当地移民人口的需求。英属南非公司是一种非常不牢固、非常脆弱的殖民形式。它要在人员招聘、来自非洲人反抗的威胁、来自伦敦政府以及股东远程控制之间进行妥协，并且不得不依靠与非洲当地权威人士及缺乏耐心且永不满足的白人移民结成的联盟。[③] 英属南非公司要想建立殖民霸权，就不得不完成很多任务：快速学会当地的语言，了解各种土著文化和非洲人的世界观，然后刻上霸权主义的痕迹。戴安娜·简特(Diana Jeater)认为在非洲建立殖民霸权一般会遇到如下困难：

> 在殖民地推进霸权计划通常需要被殖民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参与，以维护资本家企业的利益和工业投资的价值，支持合理化改革和发展。但是，非洲本地这样的资产阶级势力在19世纪很弱小。[④]

---

① Russell, Introduction, pp. i - x.

② C. Elkins and S. Pedersen, Introduction: Settler colonialism: A concept and its uses, in C. Elkins and S. Pedersen (eds.), Settler Coloni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ojects, Practices, Legac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4.

③ Jeater, Law, Language and Science, p. 4.

④ 同上。

尽管英属南非公司的力量非常薄弱，但它依旧通过“等级制”(caste)来区分殖民者(罗得西亚白人)和当地土著(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从而建立殖民国家。这种等级制将不同的种族在经济、政治、法律上加以区分。在经济和政治层面，这种做法体现为白人享有占用土地的特权，而非洲人被拒绝加入正在形成的政治机构。从一开始，殖民国家的制度就明确规定了人种和种族差异，并将其制度化。这种做法的实际结果是罗得西亚的公民身份被种族化，罗得西亚人被分为“公民和臣民”。[1] 人口按照人种和民族被分为欧洲人、亚洲人、有色人种以及本地人。本地人又进一步被分为原始土著和殖民土著；马绍纳兰土著和马塔贝莱兰土著。[2]

殖民者清楚地知道他们想要建立的制度是什么，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实现它。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不得不考虑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的反应，因为当地人不仅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也是潜在的敌人，很容易起来反抗外国人干涉其生活。[3] 因此，将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转变成富有生产力的劳动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英属南非公司自始至终采取特殊的统治方式，通过建立警察巡逻队、任命德高望重的人物担任本土委员会委员来组建当地政府。除了“平息”当地人小规模的反抗之外，早期殖民国家不得不收买恩德贝莱的首领为其效忠，并利用他们进行地方管理。这些收买人心的政策包括归还部分掠夺来的牛群，那些在1896年强烈反抗殖民者的人也分到归还的牛。[4] 1898至1902年，在罗德斯的最后几年，他在马托波斯英达巴

---

① M. Mamdani, 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R. Holland, Introduction, in R. Holland(ed.), Emergencies and Disorder in the European Empires after 1945 (London: Frank cass, 1994), pp. 210 - 219.

② Southern Rhodesia, Statute Law of southern Rhodesia: Volume 7 (Salisbury: Government Printer, 1963).

③ A. J. Will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rd. edn, 193).

④ 同上。

(Matopos Indaba)伪装成和平人士,向恩德贝莱人许诺殖民者将放下他们的武器,这使得一些恩德贝莱人将他描述成将两头斗牛分开的人(umlamlankuzi)。[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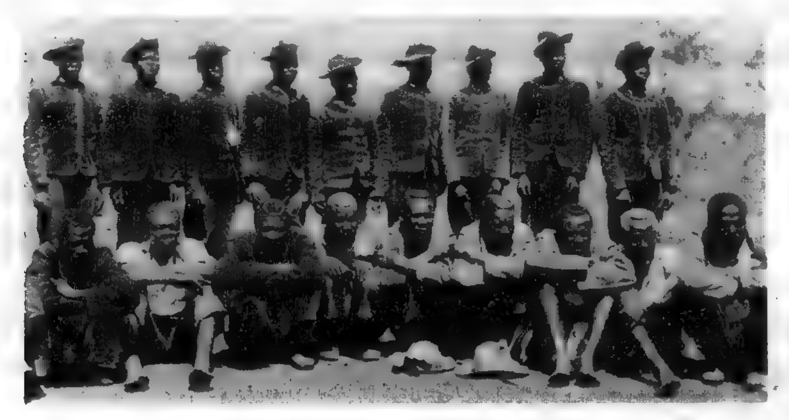


图 2.2 恩德贝莱首长与当地警察,马塔贝莱兰
(来源:津巴布韦国家档案局)

61

埃里松·沙特(Allison K. Shutt)写道,"挑战在于用创造性的权威进行治理。事实证明这比白人殖民者建议的用政治和军事权力进行治理要难得多"。[2] 大肆寻找一种代价更低的剥削方式来治理非洲人成为众所周知的"本地问题"。"本地问题"涉及如何定义和确立白人殖民者与当地人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由此产生的殖民社会里种族间平等与不平等的问题。早在 1887 年 6 月 23 日,罗德斯就告诉过开普议会,他的政策是将非洲人看做"臣民",让他们服从通过的法律以及和平保护法令。"只要非洲人继续处于野蛮状态,维持土地公

---

① S. J. Ndlovu-Gatsheni, Grappling with rhe ambiguities of the colonial encounter and the nationalist paradigm in Zimbabwe, Association of Concerned Afrcian Scholars(ACAS) Bulletin: Special Issued on Race in African-Past and Present, 72. 2005/2006, pp. 14 - 20. 可登陆网站查询 http: //acas. prairienet. org/bulletin/bull72 - 04 - Ndlovu-Gatsheni. html; NdlovuGatsheni, 'Re-thinking the colonial encounter in Zimbabwe', pp. 177 - 181.

② A. K. Shutt, The natives are getting out of hand: Legislating manners, insolence and contemptuous behaviour in Southern Rhodesia c. 1910 - 1963,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n Studies, 33(3), 2007, p. 655.

有终身制”，罗德斯就要求“白人做他们的主人”。他甚至还规定黑人不许喝酒。[1]

白人对“本地问题”的构想和思考所体现的理念被罗纳德·韦泽尔(Ronald Weitzer)称为殖民者“面对土著居民时处于上位”。[2]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早期的殖民地，殖民者通过“最终决议”解决“本地问题”，包括清除部落和强迫迁移，为殖民者建立社区开路。[3] 而在津巴布韦，殖民者使用的方式是马胡穆德·马姆丹尼(Mahumood Mamdani)所称的将殖民地两极分化。在这种统治方式下，“直接统治”以城市公民权的方式出现，剥夺非洲人的各种民权和自由。非洲人受制于“间接统治”，这种统治的前提是非洲人的习惯秩序。[4] 马姆丹尼向我们展示了殖民国家被严格二分为“公民”和“臣民”的画面，然而有资料显示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跟早期殖民者相互作用，这说明有一条竞争性的边界，黑人和白人都可以跨越并加以利用。早期殖民国家引进很多方式，努力创造有白人城市点缀的、有种族差异的殖民地。

62

早期的城市化和城市斗争

拉夫托帕洛斯和尤希库尼(Yoshikuni)确切地将早期殖民城镇中心的特征描述为“斗争场所”。[5] 先锋部队所建立的堡垒，如图丽堡(Fort Tuli)、维多利亚堡、查特堡(Fort Charter)以及索尔兹伯里堡等成了殖民城镇的摇篮。因此，早期城市定居点具有拓展中的“殖民营地”的特征：

---

① S. Samkange, What Rhodes Really Said About Africams (Harare: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 1982), pp. 15-25.

② R. Weitzer, Transforming Settler States: Communal Conflict and Internal Security in Northern Ireland and Zimbabw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25.

③ “最终决议”包括将土著美洲人以及澳大利亚原住民单独杀害或者集体屠杀。

④ M. Mamdani, 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8.

⑤ B. Raftopoulos and T. Yoshikuni(eds.), Sites of Struggle: Essays in Zimbabwe's Urbam Hisotry (Harare: Weaver Press, 1999).

到处是监视，控制、种族隔离和剥削的殖民政策也无处不在。① 早期城市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城镇和乡村持续的相互作用。人口流动、资金流动、商品交换以及观念和价值观的交流使得城乡的关系更加紧密。尤希库尼在他著名的城市社会史研究中有效地阐述了这一主题。②

种族压力使城区成为“白人的城市”，而同时白人又必须使用廉价的非洲劳动力，这些关键因素使城市定居点成为“斗争场所”。这直接导致无数的冲突，城区的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种族、阶级、民族和性别等方面。③ 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异族通婚和跨种族的性行为，这些都被定为非法行为。

非法的跨种族性行为

绝大多数早期白人殖民者是年轻男人，他们与殖民地性行为政策的形成密切相关。早在 1895 年 3 月，布拉瓦拉有 1 329 名男性白人，但只有 208 名女性白人。1897 年 11 月，索尔兹伯里有 505 名男性白人和 134 名女性白人。④ 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指出，白人男女比例失调势必引起麻烦，比如白人男子会找土著妇女(强迫地或是自愿地)满足性欲。⑤ 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都对白人警官骚扰和强奸当地妇女之事表示不满。⑥

在开普殖民地，大多数早期的荷兰殖民者与柯德撒(Khoisan)和马 63

---

① B. Raftopoulos and T. Yoshikuni (eds.), Sites of Struggle: Essays in Zimbabwe's Urbam Hisotry, (Harare: Weaver Press, 1999), p. 3.

② T. Yoshikuni, Notes on the influence of town-country relations on African urban history, before 1957: Experiences of Salisbury and Bulawayo, in Raftopoulos and Yoshikuni (eds.), Sites of Struggle, pp. 113 – 128. 这一主题在 Yoshikuni 的书中有进一步的讨论：African Urban Experiences in Colonial Zimbabwe: A Soical History of Harare Before 1925 (Harare: Weaver Press, 2007).

③ 同上。

④ B. A. Cosmin, The Pioneer Community of Salisbury in Novermber 1897, Rhodesian History, 2, 1971, pp. 25 – 37.

⑤ Blake, A History of Rhodesia, p. 119.

⑥ Makoni 酋长向圣公会传教士 Frank Edwards 抱怨，有白人入侵者强奸绍纳妇女：NAZ Historical Manuscript WE3/2/5, Weales's Reminiscences。

来(Malay)奴隶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这些奴隶本来被运来充当廉价劳动力。因此，开普敦出现了数量庞大的有色人种。早期的罗得西亚想避免开普殖民地的做法。一些女性白人对男性白人和女性黑人发生性行为的现象即使不嫉妒，也会很蔑视。从广义上来说，异族通婚对种族隔离分别发展的理念是一种威胁。[①] 由于早期的罗得西亚是男权社会，男性白人无法忍受任何女性白人和男性黑人发生性关系。于是他们会很快将这种关系定为非法，认为这种关系不可饶恕，并坚称这种性行为只有是在男性黑人强迫或者女性白人不道德的情况下才会发生。[②]

1903 年，殖民地立法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黑种人和白种人性关系的两项措施。其一是《禁止不道德行为法》(Immorality Suppression Ordinance)，法令规定男性黑人和女性白人的婚外性关系为非法行为。对违法的黑人男性处罚五年苦役，对女性白人处罚两年苦役。然而对同样发生关系的男性白人和女性黑人却没有相对应的惩罚措施。罗得西亚妇女联盟力争修改该法令，但是没有成功。[③] 最终，男性白人保有和女性黑人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因为这从来都没被定为非法。不过女性白人试图阻止这种关系的发生，她们确保家里的佣人是非洲男佣而不是女佣。[④] 禁止男性黑人与女性白人发生性关系的法令颁布之后，马上又颁布了另一法令，对强奸未遂者处以死刑。[⑤] 这种保护女性白人免受男性黑人性侵的强迫心理就是著名的“黑祸论”。[⑥]

早期殖民地的社会发展史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舒特(Shutt)证

---

① S. J. Ndlovu-Gatsheni, African Criminality in Southern Rhodesia, 1900 - 1923(MA thesis, University of Zimbabwe, 1995).

② Blake, A History of Rhodesia, p. 158.

③ Rhodesia Herald, 20 June 1913.

④ Ndlovu-Gatsheni, African Criminality, pp. 10 - 15.

⑤ 这项法案并没有将黑人与白人区别对待，但是它的前提是假设男性黑人有可能强奸女性白人，因为他们在白人的家里当佣人。如果男性白人实施强奸，就被轻描淡写，他们不会被判死刑，也不会入狱，但是很多男性黑人饱受其苦。数不清的男性黑人仅仅凭一丁点儿的证据就被指控强奸或者企图强奸白人妇女。

⑥ Ndlovu-Gatsheni, African Criminality, pp. 16 - 22.

实一些非洲人采取了“傲慢无礼”的策略,来“破坏殖民者及其政府建立的自然合理的统治形象”。[①] 蒂莫西·伯克(Timothy Burke)、米歇尔·韦斯特(Michael West)以及其他的学者都描写过早期白人用于区分非洲人的礼节、礼仪和行为方式等社会手段。[②] 一些法规比如 1910 年的《南罗得西亚本地法规》、1927 年的《本地事务法案》以及 1901 年的《主仆法》都用于殖民地官员监督礼仪,保持种族界线,保护殖民者有可能受到非洲人威胁的威望。[③]

强占地产和被强迫的无产阶级化

在《强制劳动(Chibaro):南罗得西亚的矿工》一书中,查尔斯·范·昂赛雷恩(Charles van Onselen)分析了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是怎样被迫沦为煤矿工人的。强迫他们的手段有:限制农民获得土地,削弱农业生产的地位,同时增加税收迫使非洲人民将劳动力廉价出售给矿主。[④] 范·昂赛雷恩还指出在殖民早期,矿业的两个最基本的目标是产出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要实现成本最小化只能通过发给非洲工人低于基本工资的薪水来实现。除此之外,强制劳动写入了具有剥削性质的《主仆法案》,法案对劳动合同做了定义。伊斯巴洛(Isibalo,恩德贝莱语)或齐巴罗(chibaro,绍纳语)是指强征非洲人劳动的制度,非洲人被迫签订长期工作合同,合同规定他们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在岗。伊斯巴洛或齐巴罗这两个词意味着罗得西亚本土劳工局在实施奴隶制度。[⑤] 范·昂赛雷恩评论道,

---

① Shutt, The natives are getting out of hand, pp. 653 – 654.

② T. Burke, Lifebouy Men, Lux Womne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99 – 104.

③ Shutt, The natives are getting out of hand, p. 655. See also Alison K. Shutt, The settlers cattle complex: The etiquette of culling cattle in colonial Zimbabwe, 1938,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43(2), 2002, pp. 263 – 286.

④ C. van Onselen, Chibaro: African Mine Labour in Southern Rhodesia, 1900 – 1933 (London: Pluto press, 1976), p. 91.

⑤ G. N. Burden, Nyasaland Native Labour in Southern Rhodesia (Salisbury: [n. p.]), 1938).

> 由于1903至1912年间政治经济体系的变化，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变得越来越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化过程中的结构性决定因素，比如土地使用权、税收以及竞争性日益增强的白人商品农业所带来的冲击，由矿主所用的技术进行弥补。[①]

65

《主仆法案》、《通行证法》、《本地管理法》等法律赋予了矿主对矿工的半封建的管理权，这点和19世纪奴隶主的情况非常相似。[②] 罗得西亚白人发展农业和矿业采取了破坏非洲人生活方式的形式。只有剥夺了非洲人的土地和牲畜才能让他们通过出售廉价劳动力给矿主和农场主来养活自己。1920年代和1930年代，殖民地国家的干预越来越多，它代表白人但是损害非洲人的利益。菲米斯特指出，大肆破坏非洲农民的生产为罗得西亚粮食储备的不足埋下了隐患。[③] 征收土地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策略，它让没有私产的土著居民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白人商品农业不稳定的发展是一个非洲土著农业遭破坏的故事，是一个经济货币化的故事，也是一个强占地产和被迫无产阶级化的故事。

土地隔离以及土地问题的本质

早期的白人殖民者先于本地黑人树立了积累财富的明确目标。除了掠夺牲畜这种原始的积累方式以及对非洲土著人征收重税之外，英属南非公司政府以及之后1923年开始掌权的责任政府都将土地瓜分给了白种人殖民者。[④]

---

① Van Onselen, Chibaro, p. 100.

② D. G. Clarke, Contract Workers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Rhodesia (Gwelo: Mambo Press, 1974); D. G. Clare, Settler ideology and the African underdevelopment in post-war Rhodesia, Rhodesia Journal of Economics, 8(1), 1974, pp. 17–38.

③ I. R. Phimister, Phister, Peasant produc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Southern Rhodesia, 1890–1914, African Affairs, 73(291), 1974, pp. 217–228; J. M. Mackenzie, Colonial labour in the chartered company period, Rhodesian History, 1, 1970, pp. 43–58.

④ R. H. Palmer, Aspects of Rhodesian Land Policy, 1890–1936 (Saisbury: Central Africa Historical Association, Local Series No. 22, 1968), pp. 10–21.

66

早在 1894 年，英国政府就宣布委派土地委员会处理恩德贝莱人在 1893 年英-恩战争战败后的安置事宜。同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枢密院令，向英属南非公司施压，要求它为非洲人提供足够的居住土地和适量的农业土地[①]。1894 年英属南非公司给非洲人分配了第一批保留地，即干旱的加瓦伊(Gwai)和尚加尼地区。就连英国副专员马丁·理查德爵士(Richard Martin)都觉得这些保留地“严重缺水，土壤含沙量大，根本不适合定居”。[②] 在被征服前，恩德贝莱人拥有 2 100 万公顷的土地，但到了 1894 年，他们被挤压到只剩两块保留地，面积只有 100 万公顷。白人定居者与恩德贝莱人、绍纳人之间的土地斗争在此时已经埋下了种子，这些斗争贯穿于民族主义运动时期，持续到殖民后时期。

到 1905 年，英属南部非洲公司给非洲人划出了 60 块保留地，但只占到新殖民地的 22%；殖民者自己占据大部分土地。例如，1907 年，英属南部非洲公司在索尔兹伯里附近用大片土地建立了第一座农业研究站。[③] 随后，1904 年成立了保留地委员会，授权完成划分保留地这一任务。1922 年，即责任政府成立的前一年，64% 的非洲人被要求搬进保留地。[④] 此外，由于征收土地的措施并没有让足够的人手去务农，1904 年政府将 1890 年代起征的棚屋税翻了一倍。

1924 年政府指派莫里斯·卡特委员会(Morris Carter Commission)收集关于土地隔离的意见，之后土地隔离政策正式形成。委员会的结论是绝大多数非洲人希望被土地隔离。[⑤] 委员会的建议被写入《土地分配议案》(Land Apportionment Bill)，该议案使土地隔离合法化。该议案在 1930 年成为法令，从 1931 年开始实施。这项法令将土地分为欧洲人区、土著保留地、土著购买区以及森林区；还有 700

---

① V. Moya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d in Zimbabwe (Gweru: Mambo Press, 2nd. edn, 2002), p. 4.

② 同上，p. 2。

③ Phimister,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Zimbabwe, p. 68.

④ 同上，p. 2。

⑤ Ndlovu-Gatsheni, Re-thinking the colonial encounter in Zimbabwe, pp. 188 – 190.

万公顷的"未分配土地"。土著保留区增加到98个,殖民者认为这足以满足快速增长的非洲人口的需求。[①]

除了将种族隔离合法化之外,《土地分配法》还规定了分配土地的使用权限。在欧洲人区,土地被认为是私人财产并且有地契,而在土著保留区,土地是公共财产,没有地契。非洲人可以使用土地来耕作、建造房屋以及放牧,而这些都是公共财产的一部分。非洲酋长有权在本地委员会的监管下分配土地。[②]

67

土著购买区是种族间的"中间"地块,在这里非洲居民只要有钱就可以购买土地。一小部分乡村中产阶级开始购买,这些土地邻近土著保留区,但是有私人产权。不幸的是,土著购买区的土地都很贫瘠。[③]当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冲击发展中的殖民经济时,政府采取极端措施限制土著农业,因为当地的农业已经能成功地与殖民者的商业农业相抗衡。这些措施包括颁布《玉米控制法案》、《征收牲畜税法案》、《储备库法案》、《稳定市场法案》、《农民债务调整法案》以及建立一大批购销管理局,这些措施都是在1930至1937年之间迅速、连续出台的。[④]1931年《玉米控制法案》的结果是建立了国有的购销管理局直接管理罗得西亚玉米的国内销售和国外市场。1934年,通过修订《玉米控制法案》,欧洲农民分配到了80%的国内市场,而非洲人生产的玉米价格普遍较低。这些举措达到了预期效果,非洲人被迫进入薪水制的劳动力市场。[⑤]

---

① Moya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d, p. 43.

② 这是一个明显的"创造传统"的例子,因为殖民政府认为公用土地符合非洲人的传统生活和法律,请参考 T.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revisited: The case of colonial African, in T, Ranger and O. Vaughan(eds), Legitimacy and the State in Twentieth-century Africa(London: Macmillan, 1993)。

③ S. Moyo, The land Question in Zimbabwe(Harare: SAPES Books, 1988); T. O. Ranger, Peasant Consciousness and Guerrilla War in Zimbabwe (Harare: Zimbabwe Pubulishing House, 1988).

④ Phimister,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Zimbabwe, pp. 171-218.

⑤ Robin Palmer, Land and Racial Domination in Rhodesia (London: Heiemann, 1977), p. 213.

当非洲农业产量下降时,殖民地当局指责非洲人落后的耕作方法,却无视殖民地当局对土著农业的蓄意破坏。殖民当局不再增加保留地的数量,反而开始使用现代化手段管理殖民地。这些手段包括设立两所公立学校,一所在马绍纳兰的多姆博沙瓦(Domboshawa),另外一所在马塔贝莱兰的茨罗茨沃(Tsholotsho),在那里非洲人可以学到现代化的农业方法。前美国传教士沃德(E. D. Alvord)是教授非洲人使用新农耕技术的重要农学家之一,这些技术包括如何使用化肥和改良的种子。[①] 农业生产当然需要新技术,但更需要的是足够多肥沃的土地让非洲人提高粮食产量。早期殖民主义造成的这些困难引起了非洲人民的强烈反对。

68

非洲人民对早期殖民的反应

特伦斯·兰格的《南罗得西亚非洲人的声音》是第一部对 1896 至 1897 年恩德贝莱-绍纳起义后非洲发生的抵抗运动进行详尽研究的著作。[②] 他记录和阅读了所有早期殖民期间非洲在宗教、农业、政治、劳动力以及社会骚乱等方面对殖民主义的反抗。他在 1960 年代提出了"统治和反抗"的理论,其中包括主要反抗和次要反抗的概念。[③]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非洲人对早期殖民的回应极为复杂,有同谋、反抗以及其他的反应,不能简单地套用兰格的理论模式。这个模式忽略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接触期间的模仿、融合、杂合、协商、疏远等中心问题。[④] 研究殖民后时期的理论家对帝国和殖民地的冲突成功地进行了重新定

---

① M. Drinkwater, Technical development and peasant impoverishment: Land use policy in Zimbabwe's Midlands province, Journal of Southern Rhodesia, 15 (2), 1989, pp. 287 – 305.

② T. O Ranger, The African Voice in Southern Rhodesia, 1898 – 1930 (London: Heinemann, 1970).

③ Ranger, Connexions between primary resistance movements.

④ F. Cooper, Conflict and connection, pp. 20 – 45; Ndlovu-Gatsheni, Re-thinking the colonial encounter in Zimbabwe, pp. 173 – 191. See also Ndlovu-Gatsheni, Grappling with the ambiguities of the colonial encounter, pp. 14 – 20.

位,并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朝着传统编史从未考虑过的新方向发展。[1] 弗雷德里克·库伯(Frederick Cooper)从殖民后时期理论家的角度解答了殖民统治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非洲人民又是如何参与、质疑、改变以及运用这种统治权来推进自己的各项事务的。[2]

因此,在兰格所称的"非洲声音"下,非洲人的反应和反响很复杂,从坚决的抵抗到以劳工身份全力参与殖民经济建设;运用殖民前时期的正统政治、权利以及继承权等信条反抗殖民掠夺;接受殖民者对文明的要求,争取白人独享的自由权和民主。其他反应加剧了对殖民国家的批判斗争,揭露了它用文明标榜的帝国理念和强调平等的基督教思想掩盖的邪恶和伪善。当殖民政府和主流的欧洲教会仍然没有做出反应时,一些非洲基督徒另立门户,发展了非洲基督教,成了非洲人畅想自由的场所。[3] 罗伯特·布莱克写道:"起义之后非洲的声音变哑了,到了1920年代初又可以听到,但是声音很微弱、很遥远,传达的信息混乱而模糊。"[4]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批判的声音来自马塔贝莱兰的传统社会的精英,包括洛本古拉的王子们。这是因为恩德贝莱的贵族并没有像马绍纳兰那样全部被摧毁。洛本古拉的幸存王子中年纪最大的尼亚曼达(Nyamanda Khumalo)和一些酋长一起组织了马塔贝莱家园运动(Matabele Home Movement)来反对殖民。在思想上,这场运动总的来说是在往后看,是为了证明自己所提的声明和要求是合法的,这些要求以恩德贝莱在殖民前时期对土地和牲畜的权利、合法性和权益为基础。[5] 然而,尼亚曼

---

① 殖民后时期主要的理论家有:H.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nd. edn., 2004); E.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78); G.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l?, in P. Williams and L.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s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66-111.

② Cooper, Conflict and Connection, pp. 24-25.

③ Ndlovu-Gatsheni, Re-thinking the colonial encounter in Zimbabwe, pp. 173-191.

④ Blake, A History of Rhodesia, p. 196.

⑤ Ndlovu-Gatsheni, Re-thinking the colonial encounter in Zimbabwe, pp. 183-184.

达和他的部族运用了现代的反抗手段,包括派代表团谈判和书面请愿。马塔贝莱家园运动的目的是使恩德贝莱人获得由英国王室直接管辖的保护国地位。贝专纳兰(Bechuanaland,今博茨瓦纳)的卡哈马(Khama)、巴罗策兰(Barotseland,今赞比亚)的勒瓦尼卡(Lewanika)以及巴苏陀兰(Basutoland,今莱索托)的莫希韦希韦(Moshweshwe)都成立了保护国,这让恩德贝莱人大受鼓舞。1919 年,他们向英国王室请愿,希望根据恩德贝莱的习俗和传统,归还四分五裂的恩德贝勒土地,委托洛本古拉王族管理该社区。[1] 尼亚曼达在为讨回恩德贝莱的土地、索还洛本古拉的牲畜以及恢复恩德贝莱君主制而斗争时,有人表示模棱两可甚至反对,不过在殖民政府希望非洲人顺从的情况下,这场运动是恩德贝莱人最早表达其想法和愿望的行动之一。[2] 尼亚曼达成功地获得了 1912 年成立的南非非洲原住民大会以及英国的原住民保护协会的支持。

70

到了 1923 年,一个名叫南罗得西亚班图选民协会(SRBVA)的组织在圭罗(Gwelo,今圭鲁[Gweru])成立,非洲的政治变得更加复杂了。该协会成立的时间与责任政府要求全民公投的时间一致。与马塔贝莱家园运动不同,南罗得西亚班图选民协会关注的是现代非洲人选举权的问题。它的当务之急是让非洲人获得选举权,利用选票同责任政府做交易,希望政府对非洲人的要求稍作让步。[3] 该协会的创立者是来自南非的亚伯拉罕·图瓦拉(Abraham Twala),他的职业是教师。协会的会员和领导人都是人们所说的恩德贝莱和绍纳的男女精英。但像所有早期的非洲组织一样,它也发展成为由各种传统组成的奇怪的混合体,这些传统有芬果族(Fingo)现代主义政治学、布拉瓦约

---

① NAZ, N3/18/10 Nyamanda's Land Protests.

② R. S. Roberts, Traditional paramountcy and modern politics in Matabeleland: The end of the Lobengula royal family-and of Ndebele particularism, Heritage of Zimbabwe, 24, 2004, pp. 4–38.

③ Blake, A History of Rhodesia, p. 197.

的乡镇传统、黑人主义以及马塔贝莱家园运动等。[①] 它的现代主义还表现在它有一个土著妇女联盟，这个联盟也由一位叫玛莎·加诺(Martha Ngano)的女性领导。玛莎是一位能令群情激奋的演讲者，是一位坚定果断的政治家，她曾代表非洲人向莫里斯·卡特委员会陈情。[②]

在思想意识上，南罗得西亚班图选民协会仍然是保守的，主要是为那些有能力与欧洲人竞争的非洲人争取全面参与殖民地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权利。例如，在1924年的年度大会上，它介绍了以公正、自由和商业为基础的英国政治体系，表达了由地方官而不是土著专员来管理的想法。[③] 在很多情况下，协会的成员都会表明自己的精英出身和倾向，不加鉴别地拥护殖民地和英帝国的文明意识形态。他们甚至会批评一些非洲人墨守成规，这与他们获取非洲大众支持的动机背道而驰。他们也嘲笑那些在公开竞争范围之外寻求改良的非洲人。[④]

71

南罗得西亚班图选民协会提倡个人财产所有权以及非洲人购买土地不受限制的权力。协会有个很活跃的妇女联盟，表达了对市区非洲妇女选举权的关注，当时欧洲很多城市中的妇女也还没有获得选举权。妇女联盟关心啤酒酿造问题。1934年，当非洲妇女在布拉瓦约因酿造啤酒被起诉时，妇女联盟成功组织了联合抵制啤酒店的行动。[⑤] 协会的领导层由史蒂芬·桑顿(Stephen Thornton)所说的"新兴的小资产阶级"构成。[⑥] 该协会的大多数成员是极少数已经获得选举权的非洲人以及一些渴望获得投票权的人。

---

① Ndlovu-Gatsheni, Re-thinking the colonial encounter in Zimbabwe, p. 189.

② Ranger, The African voice, pp. 45 - 50.

③ Rhodesia Herald, 3 Fed. 1928.

④ S. Thornton, The struggle for profit and participation by an emerging petty-bourgeoisie in Bulawayou, 1893 - 1933, in Raftopoulos and Yoshikuni, Sites of Struggle, p. 36.

⑤ NAZ File S138/22, Sergeant Clark to Assistant Superintendent, CID, Salisbury, 28 Oct. 1929.

⑥ 同上，p. 36。See also NAZ File S138/22, Detective Sergeant Chubbock to Chief Super intendent, CID, Bulawayo, 28 Oct. 1928。

其他重要的城市政治现象有南非工商业工人联盟在 1927 年扩展到罗得西亚。此举由来自尼亚萨兰(Nyasaland,今马拉维)的克雷蒙特·卡达莱(Clements Kadalie)完成。1927 年沙姆瓦(Shamva)矿业工人罢工,这是罗得西亚第一次非洲工人罢工。联盟便利用这个机会宣示它的存在。[①] 工人政治和工会运动在 1920 年代被削弱,很简单的事实是非洲人往返于矿区、农田和在乡下的家;没有一批长期固定的工人,当然也不会产生成熟的工人意识。他们对在乡下和城市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不满与日俱增,进而发展成为共同的抵抗运动。[②]

第三个现象是非洲宗教对早期殖民化的反应。很多非洲人相信姆瓦里和山区的教派威力无穷,于是对其奉若神明。然而,1896 至 1897 年的起义被欧洲人镇压之后,这些非洲人对本土宗教感到失望。基督教传教士利用马塔贝莱兰和马绍纳兰出现的这种情况,宣扬基督教和上帝是非洲人唯一的希望。确实,很多非洲人涌向了教堂,被批判性的想象空间以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深深吸引。[③] 例如卫理公会的约翰·怀特(John White)等一些传教士公开批评殖民者虐待非洲人的行为,并且在批判过程中使"基督教文明使命"成了公认的意识形态。[④] 在起义之后,基督教成了帮助非洲人摆脱苦海的希望之教。

72

然而,基督教传教士没能减轻早期殖民行为的影响,而且一些传教士过于傲慢,这导致了非洲独立宗教的兴起;基督教此时被用来解决非洲人的问题。第一批独立教会包括马克噶索(M. D. Makagatho)的美国卫理圣公教会。马克噶索是索托人, 1890 年来到罗得西亚,1904 年

---

① I. Phimister, The Shamva Mine strike of 1927: An emerging African proletariat. Rhodesian History, 2, 1971, pp. 65 - 88; B. Raftopolous and I. Phimister(eds.), Keep on Knocking, pp. 79 - 98.

② Ndlovu-Gatsheni, Re-thinking the colonial encounter, pp. 189 - 190.

③ T. O. Ranger, Early History of Independency in Southern Rhodesia, in W. Watt (ed), Religion in African (London: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964).

④ T. O. Ranger, Protestant mission in Africa: The dialectcis of conversion in the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in eastern Zimbabwe, in T. D. Blakely, W. E. A. van Beek and D. L. Thompson(eds.), Religion in Africa: Experience and Expression(London: Currey, 1994).

在河滨区购得一块土地。他是一个成功的农民，也是一名成功的牧师。他的独立教会形成于1904年，从美国黑人抗击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形成自己的思想。[①] 随后，恩格文亚(P. S. Ngwneya)在1914年建立了非洲家园教会，之后又有基督教天主教使徒教会在锡安(Zion)建立。这些独立教会强调圣灵的拥有、疗救和先知，基督教的这种做法被殖民政府认为是政治威胁，它相信锡安人拥有宗教的话就会去布道传教。[②]

独立教会代表着我所说的"不同意见的基督教"，为仍然在努力了解自己前世今生的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提供了精神寄托。[③] 殖民当局不允许像马克噶索这样的传教士在非洲人口集聚的地方布道，而且对马克噶索的监视长达20年。正如警察当局所说：

> 一些传教士积极参与宣扬非洲是非洲人的运动。这些运动的领导人是美国和西印度群岛的黑人。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非洲共和国，由马丁·加维担任总统。因此，拒绝这些人进入罗得西亚是很明智的。[④]

73

关于加维理论对非洲人抵抗殖民化的影响和吸引力，迈克尔·怀斯特(Michael West)认为其吸引力在于"它的思想顺应性强，带着对殖民政权的怨恨，它有能力让一切实现都符合非洲人——泛非主义、民族主义、工会主义、黑人主义以及民族动员等"。[⑤] 到了1934年，非洲人已在布拉瓦约建立了南罗得西亚班图国会。它是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温和派政治组织，领导者受过传教士教育，接受进步和文明的殖民现代主义思想。班图大会的精神基础是"难道我们不是人吗?"这个强有

---

① M. Daneel, Quest for Belonging (Gweru: Mambo Press, 1987), pp. 90 – 95.

② A. Mazrui, Seek Ye First the Political Kingdom, in A. Mazrui (ed.), UNESCO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ume VIII (California: Heinemann, 1993), pp. 117 – 119.

③ Ndlovu-Gatsheni, Re-thinking the colonial encounter in Zimbabwe, p. 188.

④ NAZ File TCINB23/3/3R 5892: Superintendent CID to Town Clerk, 26 Sept. 1924.

⑤ M. O. West, The seeds are sown: The impact of Garveyism in Zimbabwe in the interwar yea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35(2 – 3), 2002, p. 341.

力的口号是传教士汤姆森·萨姆坎戈(Thompson Samkange)提出来的,反映了非洲民族政治意识的发展。[1] 做非洲人就意味着要抵抗殖民的暴行,为自身权利而斗争。像所有主要的民族主义组织一样,班图大会是改革主义而不是种族主义的组织。

结论

这一章回顾了 1880 年代至 1930 年代西方殖民统治者在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之间逐渐实现殖民统治的过程。这个时段是两个世界的碰撞——一个是非洲,另一个是西方。碰撞是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其标志是殖民者与被殖民之间的统治与反抗、谈判与斗争。

非洲人对殖民统治的反抗过程是复杂的,因为缺乏明确统一的意识形态,无法使恩德贝莱和绍纳结成非洲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殖民统治;即使在 1896 至 1897 年,非洲人最终以暴力对抗英属南非公司的暴行时,也是如此。即使是非洲传统宗教,如前文多次提到的姆瓦里教派,也未能提供这样一个泛民族的非洲统一战线对抗早期的殖民国家。双方都缺乏统一的、有组织的军事策略,加上武器的落后,导致恩德贝莱在 1896 年、绍纳人在 1897 年先后被击败。

早期殖民国家的创建是模糊且矛盾的。它试图阻止激发非洲人进一步的反抗,但同时又在社会和地域上隔离他们,强占他们的土地。间接统治的殖民统治策略包括重新建立殖民前的主要机构为殖民利益服务。早期模棱两可的殖民化以及矛盾重重的殖民政策使非洲人的回应也同样是模棱两可且矛盾重重。因此,迈克尔·怀斯特总结道,非洲人的政治意识轨迹从来就不是沿着直线或直接的路径发展的。它采取模糊、矛盾、众多的斗争的形式,回应了早期罗得西亚殖民主义提出的具体挑战。[2]

74

[1] Ranger, Are We Not Also Men?

[2] West, The seeds are sown, p. 362.

第三章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单方面宣布独立时期(UDI)(1940 — 1965)

A. S. 姆兰博(A. S. Mlambo)

引言

75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至 1965 年罗得西亚总理伊恩·道格拉斯·史密斯(Ian Douglas Smith)单方面宣布独立,这段时期是津巴布韦历史上很重要的时段。在那几年中,罗得西亚经历了影响深远的经济、人口、社会和政治变革,其政治意识形态和非洲人的自我认识逐渐改变,体现在他们对白人殖民统治的态度从早先的要求公平治理发展到追求自治。

这段时期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的文章涉及许多不同的主题:从劳工运动的历史、非洲民族主义的发展、受过教育的非洲中产阶级的崛起、对社会地位和性别平等的追求,到促成单方面宣布独立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的发展。[1] 本章将重点介绍这些学术研究中已经出

---

[1] 关于该时期的研究主要有:T. Barnes, *'We Women Worked So Hard': Gender,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Colonial Harare, Zimbabwe, 1930 – 1956* (转下页)

现的关键主题和争论，来阐明塑造津巴布韦发展轨迹的历史动力。

概况

76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给罗得西亚经济带来的影响，与殖民政府为应对战争所带来的经济挑战而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战略相结合，促成该国制造业相对快速的发展，使该国经济从严重依赖农业和采矿业转变为多元化的结构。[①] 进口替代、战争需要和内需增加相结合带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产业扩张。

紧随战争浪潮而来的是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的建立，它的建立扩大了国内市场，提高了这三个国家的信贷资格，并刺激了大量的外汇输入。紧接着的战后岁月也见证了大量白人移民的涌入，[②]这大大增加了当地的移民人口，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熟练劳动力和更大

(接上页)(Portsmouth, NH: Heinemann, X999); N. Bhebe, Benjamin Burombo: *African Politics in Colonial Zimbabwe, 1945－1958* (Harare: College Press, 1989); A. S. Mlambo, E. S. Pangeti and I, Phimister, *Zimbabwe: A History of Manufacturing, 1890－1995* (Harar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s, 2000); B. Raftopoulos and T. Yoshikum, *Sites of Struggle* (Harare: Weaver Press, 1999); I. Phimister and B. Raftopoulos, '"Kana sora ratswa ngaritswe": African nationalists and black workers: The 1948 general strike in colonial Zimbabwe',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3(3), 2000, pp, 289－324; B. Raftopoulos, 'Gender, nationalist politics and the fight for the city: Harare 1940－1950s', *Safere: Southern African Feminist Review*, 1(2), 1995, pp. 30－45; T. Scaraecchia, 'Poor women and nationalist politics: Alliances and fissures in 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alist political movement in Salisbury, Rhodesia, 1950－1956',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37(3), 1996, pp. 283－310; M. O. West, *The Rise of an African Middle Class: Colonial Zimbabwe 1898－1965*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A. S. Mlambo, *White Immigration into Rhodesia: From Occupation to Federation* (Harar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s, 2002); Eshmael Mlambo, *Rhodesia: The Struggle for a Birthright* (London: C. Hurst, 1972); T. H, Mothibe, '*Zimbabwe: African working class nationalism, 1957－1963*', *Zambezia*, 23(2), 1996, pp, 157－180; Iden Wetherell, 'Settler expansionism in central Africa: the imperial response of 1931 and sabsequent implications', *African Affairs*, 78, 1979, pp. 210－227. 其他相关文章还有很多。

① 费米斯特和拉夫特波洛斯告诫要防止夸大该时期第二产业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指出这个时期的工业化规模很有限的。该国只拥有 382 家工厂，雇用总计 20 439 名黑人工人。Phimister and Raftopoulos, '"Kana sora ratsva ngaritsve"', p. 294.

② Mlambo, *White Immigration into Rhodesia*.

的国内市场。然而白人移民的到来，也加剧了种族间的紧张局势，加速了激进的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特别是大批白人移民到来后，非洲人被驱离所谓的“欧洲区”。根据尼亚巴拉(Nyambara)的说法，受到该政策影响的是：

> 被转移到戈圭(Gokwe)和萨尼亚蒂(Sanyati)的罗得西戴尔(Rodesdale)原住民。约7 000至1万非洲人生活在罗得西戴尔地区，退伍军人根据政府安置计划接管了那里的农场。新来的白人地主对罗得西戴尔地区不断增加的非洲居民感到非常愤慨，恨不得立刻把他们驱赶出去。[①]

同时，由于其相对雄厚的工业基础，南罗得西亚成为联邦的工业重地。投资，市场的扩大，联邦和南罗得西亚政府出台通过关税、贸易协定以及国家对选定领域直接投资等措施来推动制造业发展的政策，都使南罗得西亚获益匪浅。

77

新兴制造业的兴起需要越来越多的工人，而这只有通过多个政策相结合才能实现：迫使非洲人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政策以及旨在稳定劳动力的政策，比如在市区为工人提供更好的家庭住宿条件。事实上，由于农村人口过多、环境退化以及怀有敌意的殖民土地政策，农村的居住条件恶化，大量的非洲人流入城镇和城市，而这又使得城市的住房问题变得更加重要，饱受争议。

非洲本土工人逐步进入城市中心改变了南罗得西亚城镇的种族和文化面貌。如尤希库尼(Tsuneo Yoshikuni)所记录，迄今为止索尔兹伯里的人口以“外国”或邻国的移民劳工为主，来自尼亚萨兰(马拉维)、

---

① 罗德西戴尔(Rhodesdale)是英国企业巨头罗荷(Lonrho)集团在罗得西亚中部的一个牧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政府购买了这片土地，并对农场和牧场进行调查，居住在该地的非洲人被迁走。参见尼亚巴拉的1945至1990年津巴布韦戈韦地区的土地征用，商业化及社会经济的差异(未出版)。

北罗得西亚(赞比亚)和葡属东非(莫桑比克)。[1] 事实上,到 1950 年代后期,"外来"非洲人仍然在该国城市人口中占相当大的比例。[2] 然而,当地的非洲人口正在逐渐成为该国城市中心的主要人口。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由受过教育的教师、护士、律师、企业家等专业人士组成的非洲中产阶级在崛起。他们的关注点和愿望从一开始就与普通民众并不一致,而且试图与"大众"保持距离。[3] 因这些团体的互动而出现的紧张局势,工会活动家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帮助塑造了此后 20 年非洲政治发展和活动的轨迹。尽管在该时期快结束时终于形成了非洲政治共识,但是最初反殖民斗争采取的形式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冲突的;因为每个社会群体,如城市工人中的外国人和本地人、农村人口、新兴中产阶级,都有自身的利益需求。

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移民社会内部也存在分歧,尤其是所谓的"老罗得西亚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自欧洲的移民。老罗得西亚人久居此地,希望维持现状以保障自身利益;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移民在对非洲人的态度上更加自由。他们认为唯一能够免受非洲激进民族主义威胁的方法便是对受过教育的精英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尽管只是作为初级的合作伙伴,新移民主张吸收非洲中产阶级参与殖民地社会的治理,以缓解广大未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口中潜在的激进民族主义。

78

1950 年代,这些自由主义者在罗得西亚总理加尔菲德·托德(Garfield Todd)的领导下,通过诸如非洲协会和摩羯座非洲学会这样的组织推动了这一议程,而这常须面对其他白人团体的强烈敌意。[4] 越来越多的人反对这些"取消种族隔离"的政策,这导致托德在 1958 年的内阁政变中被罢免;因为他的政府成员认为他太偏袒非洲人,而这对

① Tsuneo Yoshikuni, *African Urban Experiences in Colonial Zimbabwe: A Social History of Harare before 1925* (Harare: Weaver Press. 2007).

② 在当时 40%至 60%的非洲城市的人口被视为"外地人",见 Phimister Raftopoulos 'Kana Sora Ratsva Ngaritsve', p. 295。

③ West, *The Rise of an African Middle Class*.

④ Hardwicke Holderness, *Lost Chance: Southern Rhodesia 1945 - 1958* (Harare: Zimbabew Publishing House, 1985).

罗得西亚的发展有潜在的危险。这实际上表明了自由主义倾向的消失和右翼政治势力的兴起。右翼政策在伊恩·斯密斯(Ian Smith)所领导的罗得西亚阵线党中有全面阐述,它在单方面宣告独立以及随后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中达到高潮。[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当代西方帝国主义在非洲和其他殖民地的历史的分水岭。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殖民列强和殖民地人民的关系,并使殖民统治走向终结。大量非洲人参与了战争,估计有37万非洲士兵在英国军队服役,8万在法国军队服役;此外,殖民地人民也在其他方面对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②] 如在南罗得西亚,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加入战斗,而那些留在家乡的人通过生产食品和开采铬等必需的矿物为战争做贡献,他们还"建立军事基地供英国空军使用"。[③]

非洲人民的参战对他们自己产生了深刻的心理和政治影响,这将会改变他们此后对殖民统治的态度。例如,非洲人一方面在保卫他们的殖民者免遭德国和意大利的暴政,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继续忍受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暴政,他们深受这种矛盾的打击。1941年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宣布人民有自决权,但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决定限制宪章的使用范围,自决权仅适用于欧洲人民,这使得参战带来的矛盾愈发尖锐。

79

这种矛盾也发生在一名罗得西亚非洲士兵一等兵马赛耶(Lance Corporal Masiye)的身上:

> 非洲人是否可以通过《大西洋宪章》进入世界新秩序。《班图镜报》发布了否定的消息。这并没有让我吃惊,反而我认为这是理

① Ian Smith, *The Great Betrayal* (London: Blake, 1997); H. Holdness, *Lost Chance*.

② Kevin Shillington, *History of Africa* (New York: Macmillan, 2nd. edu., 2005), pp. 317-320.

③ West, *The Rise of an African Middle Class*, p. 155.

> 所当然的，因为不管我们如何向欧洲人展现我们的忠诚和奉献，都不要奢望得到相应的人权……这一定是一类非常无耻的统治者，他们随意奴役其百姓，而且从来没有想过要释放他们或给他们一些相应的人权……非洲人民已经为他们的统治者做出了令人钦佩的奉献。而他从中得到什么？不断被剥夺人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统治者就太无耻了，他们一边责备着敌人的暴行，一边却享受着种族优越感。[1]

在前线，非洲士兵与那些来自欧洲的贫困白人有所接触。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这些白人会平等地对待非洲士兵，而不像非洲士兵在家乡习惯面对的那些白人。瓦鲁胡·依托蒂(Waruhui Itote)曾回忆，战时在缅甸前线，面对无时无刻不在的死亡威胁，非洲士兵和白人士兵是如何平等相待的，因为“白热化的战争洗去了种族差异，留下的是同样的韧性和我们相同的非生即死的命运”。[2]

非洲士兵也接触到了印度士兵，印度已经开始从英国的统治下争取独立；这启发非洲士兵一旦战争结束也要努力争取他们自己的自由。

战争结束后，非洲人被彻底激怒了，因为他们的牺牲和努力并没有得到认可和奖励。大多数人得到的仅仅是“几句表扬”，然后又被送回战前的贫困状态中去，而白人士兵复员后却得到了巨大荣誉并获得农场和其他物质奖励。这些因素推动了激进的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他们需要的不是像过去一样对殖民统治的改革，而是要获得自由，要实行多数人的统治或者“一人一票”——这一战斗集结号已经响彻整个大陆。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残杀，对自己文明的优越性充满信心的殖民列强经历战火后大不如前。它们曾非常依赖殖民地人民的帮　80

---

① 《班图镜报》，1944年6月17日。感谢特伦斯·兰杰向我推荐这封信。

② Waruhui Itote, '*Mau Mau*' *General* (Nairobi: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1967), pp. 9－15.

助,但是这种关系不可能再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下去了:在战后不断变化的世界里,需要新的战略来治理殖民地。此外,战争从根本上影响了欧洲的未来,因为它引起了冷战,东西方近半个世纪的关系由此定格。因此,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恰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出现同时发生,于是共产主义国家成了非洲反对西方殖民势力的天然盟友。

在南罗得西亚,战争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白人移民的涌入,他们大多来自英国。其中有一些是英国退伍士兵,他们来此的部分原因是受罗得西亚政府战后安置计划的激励措施所吸引;还有一些是战后回来定居的英国士兵,他们战时在索尔兹伯里的皇家空军训练中心受训。短暂驻留期间,他们喜欢上了这个国家。① 而其他人则是为了逃避英国战后的困境,他们看好来到这个国家的经济前景,因为这里技术工种的就业对非洲人存在制度性的歧视,这给他们自我提升提供了光明的前景。

大量的人口涌入使罗得西亚的欧洲人口在 1946 至 1951 年间从 8.2 万上升到 13.5 万,达到过去三十几年的最高涨幅。② 在这些人口中,其中仅 1948 年就有 1.7 万人进入该国,是移民量最大的一年。③ 不出所料的是,这将从多方面影响到非洲人;其中最明显的是将 10 多万非洲人驱离他们的土地,赶到已经人满为患的非洲居留地,而把空出来的地方重新划分为欧洲人居住区。④

---

① Frank Clements, *Rhodesia: The Course to Collision* (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69), p. 78.

② Julius Isaac, *British Post-War Mig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132 - 134.

③ Harold D. Nelson et al., *Area Handbook for Southern Rhodesia* (Washington, DC: American University, Foreign Area Studies, 1975), p. 73.

④ 殖民晚期强迫迁移的一个例子是戈圭酋长被迫从圭洛契约的特许地搬迁到戈圭疟疾肆虐的干旱地区。见尼亚巴"Madheruka 和 Shangwe: 圭洛民族身份和现代性的文化,1963 年,津巴布韦西北部" 非洲历史,42,2002,第 287 — 306 页;尼亚巴,"移民"传统领导者和罗得西亚政府: 1963 — 1979 年津巴布韦圭洛地区"公用"土地使用权和政治征地,南部非洲研究,27(4),2001 年,第 771 — 791 页;尼亚巴,"津巴布韦公共区域的政治征地和土地斗争: 19 世纪 80 和 90 年代的圭洛地区"非洲,71(2),2001,第 54 — 108 页。同见 Robin. Palmer. and I. Birch 津巴布韦: 分裂的大地(牛津: 牛津乐施会,1992)第 8 页。

表 3.1　欧洲人口增长的来源,1901－1969 年

时　　期	净移民数	自然增长	总增长人数	年均增长率(%)
1931－1941	11 025	8 019	19 044	3.3
1941－1951	50 066	16 576	66 642	7.0
1951－1961	47 097	38 811	85 908	4.0
1961－1969	13 914	20 706	6 792	0.3

资料来源：罗得西亚,《人口普查》,1969 年(索尔兹伯里：中央统计局,1969),第 3 页。

战争给罗得西亚经济带来了显著的变化,最突出的是国家经济从传统的依赖农业和采矿业转向更加多元化,其中制造业在经济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发展制造业受到殖民政府的鼓励,政府认为支持制造业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直到战争爆发,政府都没有积极鼓励第二产业工业化,因为它们认为私人资本完全有能力在“机会出现时”发展“有价值的产业”。① 有人认为发展本地制造业行不通,因为这个国家是内陆国,国内市场很小,缺乏本土化的技术和制造主要设备的能力。②

然而,到了 1940 年,战争带来的国际贸易困难促使当局政府采取一种新政策,即如果国家的经济想要继续发展就必须采用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支持者指出,该国拥有一些实现工业化的优势：丰富的、未开发的矿产资源,如铁、煤和铬等;建厂用地的价格低廉;不断增长的人口使国内市场快速扩大;有大量的“本地廉价劳动力”,他们特别“适合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此外,南罗得西亚孤立于欧美工业强国,这意味着“其工业有天然的保护,可避免与这些国家的工厂进行残酷竞争”。③

---

① *Report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ittee* (Salisbury: Government Printers, 1939), pp. 38－40, cited in Alois Mlambo and Ian Phiinister, 'Partly protected: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colonial Zimbabwe's textile industry', *Historia*, 51(2), 2006, pp. 120－144.

② N[ational] A[i. chives] of Z[imbabwe] F295/51/26/51 Import Controls: Piece Goods —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econdary Industry in Southern Rhodesia', May 1953 [W. A. E. Winterton — Minister of Trad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③ 同上。

82 其结果是，虽然政府只要有可能就宁愿让私营企业来建立工业，但是它不再反对协助建立第二产业，尤其是为“国家的利益”利用本国原材料进行加工的第二产业。[①] 这种思想促成工业发展咨询委员会的成立，之后该会更名为工业发展委员会，以协助在全国建立第二产业。

该时期南罗得西亚制造业的发展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熟练劳动力的日益增加和战后欧洲移民导致的国内市场的扩大；烟草业和矿业的蓬勃发展，赚取了大量外汇；1953 年中部非洲联邦成立后，参与北罗得西亚铜矿开采业赚取了外汇，而且联邦也扩大了国内市场；与南非签订有利的财政政策和海关协议，使罗得西亚的工业进入南非市场。[②] 在这些因素的刺激下，工业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制造业企业的数量从 1939 年的 299 家上升到 1952 年的 724 家。[③]

不可避免的是，制造业的扩张意味着对城市常住劳动力的更大需求，而不再是战前城市经济所需的季节性流动的务工劳动力。以索尔兹伯里的非洲人口为例，据估计该城市的人口 1936 年为 22 126 人，1946 年上升到 45 993 人，1951 年为 75 249 人。[④] 鉴于城市地区非洲人口的增加和对更多可靠劳动力的需求，毋庸置疑当局政府觉得有必要采取措施以“稳定”非洲劳工。这与帝国世界的主流思想一致，就像库珀(Cooper)所说的，1940 年代英国和法国殖民当局重构了非洲工人的形象，把他们看作与自己国内所用工人们相似的、受法律和行政机构管理的工人，而不是现代经济需要的时候才临时叫来的农

---

① N[ational] A[i. chives] of Z[imbabwe] F295/51/26/51 Import Controls: Piece Goods —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econdary Industry in Southern Rhodesia', May 1953 [W. A. E. Winterton — Minister of Trad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② Ian Phimister, 'From preference towards protection: Manufacturing in Southern Rhodesia, 1940 - 1965', in A. S. Mlambo, E. S. Pangeti and I. Phimister, *Zimbabwe: A History of Manufacturing, 1890 to 1995* (Harar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s, 2000), p. 34.

③ Raftopoulos and Yoshikuni, *Sites of Struggle*, p. 131.

④ Cited in ibid.

村打工仔;[①]为了提高生产力并更好地控制劳动力,有必要采取措施“稳定”这些劳工。为了快速增长的城市经济利益,战后的罗得西亚相继出台了类似措施以稳定非洲劳工。

83

表 3.2　罗得西亚产业的总产出和平均增长速度,1946－1953 年

部　门	总产值(百万英镑)		平均增长率(%)
	1946	1953	
食品制造业	5.6	18.8	19.0
饮料	1.2	3.4	16.5
烟草制造业	1.3	4.0	17.5
纺织品和服装	2.4	8.8	20.8
木制品(家具除外)	0.6	1.9	18.3
家具及固定装置	0.3	1.3	22.3
造纸、印刷、出版	0.6	2.4	21.6
橡胶	0.1	0.2	15.3
化学制品	1.0	3.9	21.9
非金属矿	0.8	3.8	24.4
金属制造	1.9	6.8	20.3
交通运输(制造和修理)	1.1	4.8	24.1
其他	0.5	1.7	17.7
总制造	17.3	61.9	20.0

资料来源:C. 斯通曼,“津巴布韦的工业化和自力更生”,见 M. 弗朗斯曼(主编),《非洲的工业和积累》(伦敦:海涅曼,1982),第 279 页。

对城市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再加上战后殖民地土地政策的推动(如 1951 年的《土著畜牧法》),减少库存,严格执行 1930 年的《土地分配法令》及其后续修订法等,导致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因此带来更大的城市化。城市化以及“稳定劳动力”都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住房。例如,1939 年关于“布拉瓦约地区非洲人口住房、工资和生活

① Frederick Cooper, *Decolonization and African Society: The Labour Question in French and British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

条件”的伊伯特森报告(Ibbotson Report)指出,“过度拥挤现象无处不在”,有些地方生活条件之差“令人震惊”。1943年,豪曼委员会(the Howman Commission)报告,“非洲的住房条件骇人听闻,过度拥挤普遍存在”,这种状况加剧了疾病的爆发,如肺结核和肺炎。[①]

84

在评论索尔兹伯里当时的住房问题时,奇彭贝雷(Chipenbere)描述了该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非洲移民迁移到索尔兹伯里寻找就业机会以及欧洲移民的增加是如何“给现有住宿条件以及建筑行业带来压力”的:

> 为非洲人建造的“临时”住所,最后变成了永久住所,但仍旧远远供不应求。这些地方的过度拥挤变得愈发明显,这造成许多不良后果,如青少年犯罪、酗酒和性虐待,以及整体生活条件的不卫生。[②]

城市地区的非洲人对殖民政府还有其他的不满。1947年的《城区法》(Urban Area Act)是为了让当局行使更大的控制权,它规定不准向失业者提供住房,并让雇主负责工人的房租。其他控制措施包括政府通过登记和通行证法来控制非洲人的居住和流动,将单身女性视为法定未成年人,除非结婚否则她们无法获得城市住房。[③]

此外,政府实行严格的酒类饮品法律,监控非洲人何时何地喝什么酒,并密切监视他们在体育俱乐部、妇女俱乐部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休闲娱乐活动。最后,市政警察进行定期夜间突击检查,清查那些没有政府

---

① P. Ibbotson, *Report on a Survey of Urban African Conditions in Southern Rhodesia* (S.R.: 1943), 13; E. G. Howman Commission,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Health Conditions of Africans Employed in urban Areas (1943 - 1944)', cited in E. Chipembere, 'Colonial Policy and Africans in Urban Areas, with Special Focus on Housing, Salisbury, 1939 - 1964' (Unpublished, 2007), pp. 30 - 33.

② E. Chipembere, 'Colonial Policy and Africans in Urban Areas', p. 4.

③ 同上,p. 5。

通行证的人。[1] 这些怨气堆积增加了非洲人对殖民统治和控制的不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不同形式的组织和抗议活动进行宣泄。

从早期民族主义到民族主义时期[2]

在对津巴布韦非洲中产阶级崛起的研究中，迈克尔·韦斯特已经提出了一个有效的方法来追踪1960年代前非洲团体政治和政治激进主义的发展。迈克尔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早期民族主义时期，1945至1948年的民族时刻(the national moment)，以及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的民族主义时期(the nationalist moment)。他认为，在早期民族主义时期，民族主义意识还不是很强烈，因为在追求改善其命运的政策时，非洲的精英变得易于狭隘、"特殊化"。此后，民族主义的动员和互动范围开始扩大。

85

非洲人的抗议和动员并不是针对推翻殖民统治，而是鼓励殖民政府提供一个更公平的殖民治理环境。这个漫长的过程快结束时，迎来了民族主义时期。早期运动失败，非洲人日益看清了殖民体系不愿放权的面目，尤其是不愿将参与政治、社会和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利益给予受教育的中产阶级，于是要求自治或"一人一票"的激进民族主义应运而生。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20年是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内部一段激烈的政治和组织运动时期。该时期的运动围绕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反对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的建立和新兴非洲精英的多元种族主义实验；工会运动集中在关系到城市工人阶级的面包-奶油问题上；反对殖民政府在农村的举措，如减少牛群蓄养量、土壤保持和土地改革；以及到这个阶段结束之时的民族自决问题。

早期民族主义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非洲人对土地问题和殖民政府农业政策的不满。正如费米斯特提及的，自1930年代以来，国家政

---

① E. Chipembere, 'Colonial Policy and Africans in Urban Areas', p. 5.

② Expressions borrowed from West, *The Rise of an African Middle Class*.

策给非洲农民带来的影响助长了他们的怨恨。这些政策包括旨在从非洲农民的支出中为欧洲农业提供补贴的措施，如1931年和1934年的《牛头税法》(the Cattle Levy Act)规定，向用于国内消费的牛征收屠宰税，作为补贴白人农民控制的出口库存的一种手段。1934年每头3个盾，最后变成每头10个先令。此外还有1931年和1934年的《玉米控制法》。[1]

战争期间和战后，居住环境拥挤和过度放牧状况日益严峻，土壤侵蚀加速了环境恶化，而这些则加剧了非洲农业生产者的不满。其结果是殖民政府迫切寻求补救措施，以增加土地承载力，来承载更多的非洲人并提高土地生产力。

例如，为了安置大量流离失所的非洲人，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以改善现有的非洲人居留区的承载能力。这些措施包括集中化的政策，通过调整土地的使用模式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承载能力，到1954年约130万英亩土地受到影响；此外还有无情地大批屠宰非洲牛群以减少库存积压。这些措施都未能完全解决农村地区人满为患的问题。

86

随着对廉价的长期工业劳动力需求的日益增加，国家决心找到一个长效的解决方案，于是便有了1951年的《土著畜牧法》。该法的出台是长期努力的结果，它旨在设计一个战略，不仅能提高保留地的生产力，而且能确保农村地区居无定所的人可以被改造成新兴制造业部门的永久廉价劳动力。事实上，早在1947年，政府首席原住民专员曾建议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就如何解决居留地的人满为患的问题提出适当的建议。政府可采取措施让非洲人选择，要么成为“一个只会使用适当农业技术和土壤保护方法的农民，或者……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工人”。[2]《土著畜牧法》被证明是极不受欢迎的。毫不为奇的是，1950年

① I. Phimister,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Zimbabwe, 1890-1948: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London: Longman, 1988), pp. 171-218.

②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for Native Affairs, Chief Native Commissioner and Director of Native Development, for the Year 1946, p. 2.

代期间及之后，激进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在原住民居留区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事实上，1960 年代及之后的武装斗争主要依靠农村，非洲农民的支持是其成功的关键。

中部非洲联邦(Central African Federation)

长期以来南罗得西亚各移民社区有这样一个想法，将南罗得西亚和另一个欧洲统治的殖民地相结合，建立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实体。

早在 1915 年，英属南非公司曾提出合并南、北罗得西亚，指出合并可以发挥优势扩大非洲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消除贸易壁垒开放商业市场。此外，有人认为，“随着欧洲战争结束，非洲的政治边界将重新划分，这种合并对有效确保罗得西亚的利益很有价值”。[①] 这个想法在当时被南罗得西亚的立法机关彻底推翻，因为担心合并会使移民想在将来获得自治的希望永远破灭。

87

坦噶尼喀被英国委任托管后，英国控制下的领土连成了一片，从赞比西河一直延伸至尼罗河流域。为应对殖民地的未来，1929 年成立了希尔顿·扬委员会(Hilton Young Commission)，不仅东非地区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的未来，连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都在其考虑的范围之内。[②]

英国政府最终认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引导东非各附属国建立正式联盟的时机还未成熟。北罗得西亚白人想与东非各殖民地建立更紧密联系的政治安排，不管他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利益，都被 1930 年发布的帕斯菲尔德备忘录(Passfield Memorandum)抹杀了。备忘录规定任

---

① Report of the Ehodesia-Nyasaland Royal Commission [Chairman: Viscount Bledisloe] (Cmd. 5949, 1939), (London: HMSO, 1939), 108. [Hereafter called the *Bledisloe Commission Report*].

② *Bledisloe Commission Report*, 109－110;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Closer Union of the Dependencies in Eastern* and *Central Africa* (Cmd 3234, 1929), dted in Wetherell, 'Settler expansionism in central Africa'.

何这样的安排都是非洲利益至上。1931年,英国拒绝罗得西亚合并,但表示"以后如条件许可"愿意重新考虑。[①]

1933年,北罗得西亚的立法院又有一次推动合并的尝试,但敦促南北两个罗得西亚合并的动议遭否决。这个想法也遭到恩多拉原住民福利协会(Ndola Native Welfare Association)的反对。该协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

> 虽然本协会欢迎与尼亚萨兰的合并,因为那里的法律和现状与本国相似,但协会恭请政府不要同意南北罗得西亚的合并。在本协会看来,这种合并将极大地损害本国原住民的利益和合法诉求,也包括1万至10万欧洲人的利益。[②]

1937年1月,南罗得西亚合并游说团的领导人、南罗得西亚三个政党的代表和北罗得西亚立法会成员代表在维多利亚瀑布召开会议,讨论合并问题,并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合并的想法。后来该决议得到南罗得西亚立法会和南罗得西亚总理的支持。随后,该决议被提交给南罗得西亚总督,同时请求英国当局开会讨论合并问题,但该请求遭到拒绝。

1937年,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建议反对两个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建立联邦,理由是它们之间存在治理方面的差异,南罗得西亚是自治,而其他两个是由殖民地国务卿统治。此外,调查注意到北部殖民地的非洲人强烈反对合并,因为他们看不顺眼"南罗得西亚本土政策的某些特点",而且这个因素不容忽视。[③] 最后,委员会建议由南罗得西亚总理、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总督组成跨领土理事会,其职责包括协调服务和促进经济发展。

---

① D. O. 35/424/ 11969/24, *SS* to Gov SR, 1 July 1931, cable, cited in Wetherell, 'Settler expansionism in central Africa', 222.

② *Bledisloe Commission Report*, 112.

③ 同上,p. 218。

然后,1939 年成立了布莱迪斯洛委员会(Bledisloe Commission),要求汇报“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之间是否存在更紧密的合作或者联合？如果存在的话,又是什么样的各方所希望的并且可行的形式”。委员会认为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之间可以合并,但并不“认为将政策延伸至南罗得西亚的时机已经成熟,部分原因是因为其不同的本土政策”。[①]

接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南罗得西亚积极主动要求合并,因为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某些地区对更大市场和更多非洲劳动力的兴趣,而这在本国是无法获得的。与北罗得西亚的合并将提供这些优势,同时,南部罗得西亚殖民者能够从北罗得西亚的铜出口中获得相当大的外汇收入。战后几年铜业热兴起。北罗得西亚的铜产值从 1939 年的 799 万英镑上升至 1953 年的 5 147.5 万英镑。[②]

对英国来说,控制中部非洲更大领土的好处包括为英国商品提供更大的市场,还可以对抗南非日益增强的南非白人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 1948 年民族党掌权后更是如此[③];同时也可能掌握不断增强的非洲民族主义的威胁。最终的结果并不是支持者所希望的南、北罗得西亚领土的合并,而是一个联邦,也包括被英国“加进来”而被其他两个地区毫无热情地接受的尼亚萨兰,因为该地经济落后并且定居人口非常少。

89

非洲人反对联邦,尤其是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非洲人从一开始就强烈地反对。早在 1950 年,非洲的各种组织就曾表示反对建立联邦的提议。尼亚萨兰非洲受保护国委员会(the Nyasaland African Protectorate Council)认为,“英国政府不会兑现自己的承诺, 非洲人实现自治的希望破灭了”。尼亚萨兰非洲人大会(the Nyasaland African Congress)表示,他们不会派代表出席维多利亚瀑布会议,“因

---

① *Bledisloe Commission Report*.

② Martin Loney, *Rhodesia: White Racism and Imperial Respons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5), p. 84.

③ R. Hyam, ‘The geo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Central African Federation: Britain, Rhodesia and South Africa, 1948－1953’, Historical Journal, 30(1), 1987, pp. 145－172.

为他们已经宣布反对联邦,并视其为实现他们'全非洲自治'最终目的的障碍"。[①]

同样,北罗得西亚工会大会(Northern Rhodesia Trade Union Congress)谴责合并是"非正义行为"且"违反大西洋宪章","会导致南非移民的增加",从而破坏"原住民土地所有权的安全",威胁"原住民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同时,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Southern Rhodesian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SRANC)决定,"虽然中部非洲联邦自治同盟的成立在经济层面是有利的,但在现阶段的政治发展中并不符合当地人的利益"。[②]

1951年,非洲三个属地的代表在詹姆森堡(Fort Jameson)会面并谴责联邦。代表罗得西亚的是三个主要的组织:1947年本杰明·布朗博(Benjamin Burombo)创建的非洲工人之声协会(African Workers Voice Association),查尔斯·穆辛格里(Charles Mzingeli)领导下的工商业工人改革联盟(Reformed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Workers' Union,RICU),以及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此后,非洲成立了全非大会(All-African Convention)来动员抵制联邦。虽然来自非洲的反对未能阻止联邦的成立,但是联邦在1953至1963年存在的十年中都面临着非洲人的反对。最坚定的反对来自两个北方地区,那里的民族主义者对于没有征求其意见感到愤怒。他们还担心公开的歧视性种族主义立法和南罗得西亚文化将被灌输到他们较为自由的殖民体系中来。[③]

90

尽管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公开反对,还有更多直接的谴责——比如罗伯特·穆加贝指责这个打算要成立的组织不过是"一个用来镇压我们的自治和进步的工具"[④]——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对联邦

---

①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8 (Cambridge: Keesings Worldwide, 1950 - 1952, June 30 - July 7, 1951), p. 11, 770.

② 同上。

③ John Day, *International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67), pp. 61 - 62.

④ *Bantu Mirror*, 27 June, 1953.

的反对态度日益模棱两可,因为一些领导人运用其在白人领导下的联合罗得西亚党(United Rhodesia Party)的党员身份加入到联邦政府组织中。因此,尽管公众对联邦仍是反对的姿态,乔舒亚·恩科莫和贾斯珀·萨万努(Jasper Savanhu)还是参加了1952年的伦敦会谈,为联邦成立铺平了道路。随后,贾斯珀·萨万努和麦克·霍夫(Mike Hove)在选举中支持由戈弗雷·哈金斯(Godfrey Huggins)领导的联邦党主持的联邦议会。在解释为什么南罗得西亚的非洲精英接受联邦时,内森·沙姆亚里拉(Nathan Shamuyarira)写道,联邦的成立



图3.1　查尔斯·穆辛格里
(来源: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

> 在南罗得西亚非洲人看来全是承诺:写入联邦宪法的新伙伴关系政策,迅速终结已经忍受了40年的种族隔离、屈辱和愤怒……北方属地将帮助打破种族障碍,南罗得西亚白人受伙伴关系的启发甚至会主动颁布法律,让黑人分享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享受社会正义。[①]

当然,这种乐观有点过头了。殖民统治下非洲人的命运没有什么改变。如姆兰博·爱莎梅尔(Eshmael Mlambo)所说,尽管建立了联邦,但在三个属地,仍旧有小规模的种族隔离形式存在,“非洲人继续被剥夺使用铁路沿线酒店、餐馆、公共厕所和公共设施的权利。直到1957年都不允许他们饮用那种危险的液体——欧洲产的啤酒”。歧视

91

① Nathan Shamuyarira, *Crisis in Rhodesia* (London: Deutsch, 1965), pp. 15－16.

的做法一直在延续，到了 1950 年代末，“即使是所谓的非洲‘温和派’也在表达他们对联邦的质疑”。[1]

联邦的首府设在南罗得西亚的索尔兹伯里，实施双层政府管理体制，联邦行政职位和机构，如州长和议会也被复制应用到属地层面上来。宪法区分了属地和联邦政府之间的权力和责任。前者保留地方事务的自主权，包括非洲事务，而后者负责泛属地问题（pan-territories issues），如国防和外交政策。

在经济上，联邦取得显著成功。1953 至 1963 年是其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它很快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除南非以外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同时其农业、采矿业和服务业也不断壮大和繁荣。投资显著增加，1954 至 1959 年的总投资达到 8.05 亿英镑，其中有 2.24 亿英镑来自海外。国民收入从 1954 年的 3.03 亿英镑增长到 1959 年的 4.4 亿英镑。联邦成立之后的六年间出口增加了 74%，成立之前的六年间增长幅度为 56%。[2] 该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也令人印象深刻，这方面的代表项目有卡里巴（Kariba）水电站建设及 1957 年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的成立和运行。同时，随着非洲人在新兴产业寻找就业机会，联邦的城市和乡镇发展迅速。

作为工业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多元的属地，南罗得西亚靠牺牲合作伙伴从联邦中获取利益。一直以来，尼亚萨兰基本上就是南罗得西亚农场和矿区廉价劳动力的供应者；而北罗得西亚在贡献它的铜出口收入，这些收入大部分都投资到联邦项目上，主要是南罗得西亚在获益。

此外，南罗得西亚也享受着外国投资增长和本地市场扩大带来的好处。经济利益的不平衡引起其他属地对南罗得西亚的不满，助长了反联邦情绪。

---

① Mlambo, Rhodesia: *The Struggle for a Birthright*, p. 114.

② ‘Federation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 Report of the Monckton Commission’, in *Commonwealth Survey*, 6 (22), 25 October i960, pp. 997 – 1006 [Hereafter called the *Monckton Commission Report*].

然而,到了 1950 年代末,随着世界对铜需求的下降和外国投资流入的减少,联邦经济不再像最初几年一样充满活力。[1] 就像曾指出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联邦都不受非洲人欢迎,尤其是在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他们的反对最终导致了联邦的解体。反对的部分理由源于非洲人在政治上依然被边缘化的事实:虽然联邦的非洲人口为 300 万人,欧洲人口只有 30 万,但在联邦立法大会的 35 名成员中非洲人只有六名代表,每个属地各有两名。

此外,种族主义的政策和做法依然存在,非洲工人继续被支付低于他们欧洲同行的工资,并被禁止光顾欧洲人使用的服务设施。在所有三个属地,这些做法和其他的不满引发了激进的非洲民族主义,尼亚萨兰成立了班达·卡穆祖(Kamuzu Banda)领导的马拉维大会党(Malawi Congress Party),北罗得西亚成立了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领导的民族联合独立党(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在南罗得西亚,民族主义者也接连成立几个政党继续反对白人统治和联邦。1958 年 12 月,来自三个属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召开的全非人民大会上见面,决定为解散联邦和各自国家的独立而开展运动。

根据 1960 年蒙克顿委员会的报告(Monckton Commission Report),对联邦的反对是“广泛的、发至内心的,而且由来已久;这种反对几乎是病态的”。这部分是源于“非洲人的观念”,他们认为“伙伴关系一直是假的”,同样因为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非洲人认为联邦是他们实现政治独立和民族自决的绊脚石。用该委员会的话来说就是:

> 现在对许多非洲人来说,只有欧洲社团从政治上在支持“联邦宪法”;在非洲大陆其他大部分地区,他们的非洲同胞已经获得了自由。在他们看来,只要联邦阻止他们快速的政治进步,他们对联邦的敌意就会继续增长。

---

① Mbthibe, ‘Zimbabwe: African working class nationalism’, p. 160.

蒙克顿委员会的结论是，尽管所有三个属地的欧洲人和一些南罗
93 得西亚的非洲人希望联邦继续下去，但是“在我们看来，北部属地非洲人的反对力量使得联邦不能以目前的形式维持下去”。[1]

反对联邦的压力不断高涨，尤其是在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在这两个国家独立前夕，南罗得西亚的右翼分子也开始要求终结联邦。这些人担心非洲人受1957年加纳独立以来席卷整个非洲大陆的浪潮影响，可能会说服英国让他们独立，由多数人进行统治，就像其他两个属地即将要做的一样。在罗得西亚阵线党(Rhodesian Front Party)的旗帜下，1962年这些右翼分子在南罗得西亚取得政权，推动了一个反联邦党的上台，这与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情况一样，但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这个党致力于终结联邦。在随后的一年中，联邦解体，北罗得西亚变成独立的赞比亚，尼亚萨兰变成独立的马拉维，南罗得西亚不可避免地朝着单方面宣布独立的方向发展。

多元种族主义和非洲精英

正如沙姆亚里拉所说，非洲精英由一种天真的乐观所支撑，认为占主导地位的白人能够自愿进行改革；他们使自己相信参与1950年代国家的“伙伴”关系多种族自由实验是明智的。非常明显的是，他们没有寻求推翻殖民统治，代之以“一人一票”的民主表决，而只是要求获得良好治理以及获得他们作为“文明的”男人和女人应该享受的权利和特权。因此，可以想象，如果白人体制在更大程度上对受过教育的精英敞开大门，激进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就可能被大大推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按照塞西尔·约翰·罗德斯的设想，英属南非公司拒绝推行“赋予每一个文明人平等权利”，因此非洲的知识精英变得更加激进并在联邦末期发展成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如迈克尔·韦斯特所记载，参与1950年代多种族实验的非洲精英，在南罗得西亚的成长过程中由来已久，因为中产阶级在1914至

---

[1] *Monckton Commission Report.*

1933年间就已经开始正式出现。这个群体包括“职员、教师、牧师、社会工作者、记者、护士、律师和医生”。因为自己受过教育，他们认为自己不同于其他非洲人，地位要高一些。[①] 这些中产阶级成员根据自己的教育程度、所属的社会机构和教养水平[②]来给自己定位，他们认为自己要优于乡镇的大多数“穷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决心要达到西方“体面”的标准。[③]

一心想要获得体面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家庭生活，并决心与没有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保持距离，[④]这个阶层要求与“未受过教育的坐在保留区炉火旁边的非洲人”区别对待。[⑤] 斯卡尼迦(T. Scarnecchia)记录了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期，为什么“已婚工人和单身工人之间，本地已婚工人与外来已婚工人之间，以及那些渴望获得中产阶级地位的人与那些依然与农村生活方式保持密切联系的群体之间”会有明显的紧张关系；那些渴望获得社会尊重的群体是如何最积极地谴责通常被称为马坡托(mapoto)的非正式男女同居关系，在索尔兹伯里和其他地方又是如何支持为拥有更好的结婚住房而发起运动的。[⑥]

正是这个中产阶级加入了1950年代的多种族实验。试验中有各种白人自由主义组织，其中最突出的是跨种族协会(IRA)和摩羯座非洲学会，这些组织曾试图增选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来阻止激进的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根据跨种族协会的一个创始成员霍德尼斯·哈德威克(Hardwicke Holderness)所说，该组织拒绝把南非的种族隔离和非洲的民族主义当作种族主义，拥护政治上温和的政权。这种政权会承认非洲人在城市的不动产永久产权，实行不分肤色的公民选举权并促

---

① West, *The Rise of an African Middle Class*, p. 2.

② Raftopoulos and Yoshikuni, *Sites of Struggle*, p. 137.

③ T. Scarnecchia, ‘The mapping of respectabil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frican residential space’, in Raftopoulos and Yoshikuni, *Sites of Struggle*, p. 161.

④ 关于这一时期非洲中产阶级文化主张的详细讨论，参见 West, *The Rise of an African Middle Class*, pp. 68－98, and Scarnecchia, ‘The mapping of respectability’。

⑤ West, cited in Raftopoulos and Yoshikuni, *Sites of Struggle*, p. 137.

⑥ Scarnecchia, ‘The mapping of respectability’, p. 151.

进劳动力的稳定。拥护塞西尔·罗德斯“所有文明人拥有平等权利”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有些特权应该延伸到非洲人中的“文明人”群体，但仅限于让他们拥有政治责任感。

该时期的白人自由主义组织是由家长主义者(paternalists)组成的，他们坚信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优越性，仅把非洲人当作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初级合作伙伴。因此，他们认为，非洲人会通过中产阶级逐步参与政治。这个阶级由“非洲人组成，通过所学的技能和具有的责任感，他们逐渐会感受到与白人一样的身份认同感，因此让他们参加选举不会对白人构成威胁”。当然，作为政治事业的初级合作伙伴，非洲人需要证明自己，通过工作获得提升。①

95

提出应该给予受教育的非洲人体面地位和特权待遇的人，有几个后来成了反对殖民统治的主导力量，如内森·沙姆亚里拉、赫伯特·奇特坡(Herbert Chitepo)、劳伦斯·瓦姆比(lawrence Vambe)、贾斯珀·萨万努以及乍得·奇普扎(Chad Chipunza)。乍得·奇普扎曾一度是摩羯座非洲学会的全职员工。② 同样，乔舒亚·恩科莫当时也是“白人领导下的非洲福利社会联合会(Federation of African Welfare Societies)的成员，布拉瓦约分会的主席”。联合会的其他会员还有桑卡吉(S. T. J. Samkange)教授、杜姆布车纳(E. Dumbutshena)律师、工会领袖穆辛格里(L. S. Mzingeli)等。③

当非洲精英发现政府不愿将他们的利益超越一定范围时，感到非常沮丧，他们意识到自己被带到谚语中的花园小径中散步。多种族的实验也就最终崩溃。就像韦斯特指出的，为了表现出跟白人自由主义者的亲密关系，非洲精英所做的就是废除禁止他们喝欧洲酒的法律。加尔菲德·托德是他们认为同情非洲人诉求的白人政治领袖。当他被内阁成员赶下台之后，非洲精英的这种无用功就变得更加明显。尽管

① Holderness, *Lost Chance*, p. 107.

② 同上，p. 170。

③ Mlambo, *Rhodesia: The Struggle for a Birthright*, pp. 123 – 124.

加尔菲德·托德的内阁成员认为他太同情非洲人的利益,而且改进非洲人待遇的步子走得太快,但是他在1954年处理万基煤矿罢工(Wankie Colliery strike)的铁血手段表明,在关键时刻,他也跟其他白人一样残酷无情。就在那时,非洲精英离弃了白人自由主义者,与他们曾经瞧不上眼的人民群众联手,发起激进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开始要求"一人一票"。

1950年代的大多数时候,多元种族主义已经成功地离间了非洲精英与其潜在的权力基础——工人和农民,白人能够保持"农村人、城里人和非洲精英的区分",因为精英寻求"为自己获得可以获得的最好条件",而且所有文明人权力平等这一白人买办教条也鼓励他们去这样做。精英跟群众的这种隔阂到了1950年代末期才得以愈合。与此同时,非洲精英对欧洲殖民主义的态度依然矛盾,因此

96

> 面对联邦的前景,精英们表现得模棱两可;面对伙伴关系的承诺,他们响应加入联合联邦党(United Federal Party)和后来的中部非洲党(Central African Party)。只有看到托德被赶下台,只有听到联邦体制即将建立,只有看到大众民族主义运动重生,只有看到自治领党身上反映出来的白人抵抗力量不断壮大,他们才最终接受了现实,即如果不解决非洲大众的问题,非洲精英的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①]

工人斗争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非洲人建立了很多组织来改善自身利益,捍卫自身权利。虽然这些组织对非洲政治意识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工人罢工运动也时有发生,但在1940年代之前,非洲人的声音还是很弱并且被边缘化。之后,非洲人加快动员和鼓动政治经济改良,因此到了

---

① Loney, *Rhodesia: White Racism and Imperial Response*, p. 97.

1950年代，当非洲精英还在参加以家长作风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为主角的茶话会和公众演讲的时候，工人已开始要求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增加工资和就业机会、改善住房和社会服务，要求更公平的殖民治理。在整个1940年代，像大陆上其他地方的同伴所做的一样，工人们加入了工人组织并组织罢工。这段时期被约翰·伦恩(John Lunn)形容为“非洲劳工演变的十年分水岭”。[1]

第一个重要的抗议活动是1945年10月20日的铁路工人罢工，这次罢工是由于通货膨胀不断上涨而工资没有增加，工人的生活水平受到危害而引发。[2] 工人的住处既破烂又拥挤。有这样一个例子，2 173名非洲男女挤在设计容纳量为1 450人的楼房中。[3] 一年前，罗得西亚非洲铁路员工协会(Rhodesia Railways African Employees Association, RRAEA)成立，代表铁路工人的利益。当布拉瓦约的工人(包括协会的代表)努力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时，他们被管理方断然拒绝了。[4]

97

作为回应，他们开始罢工。罢工蔓延到北罗得西亚的布罗肯希尔(Broken Hill)，到10月29日罢工结束时大约有1万名工人参加。除了对经济的不满，也有对1934年《工业调节法》的不快，该法案未将非洲人视作工人，以此来阻止他们组织工会、参与集体谈判。直到政府承诺将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工人的不满及相关事宜，罢工才结束。

虽然工人并没有立即实现他们的目标，但调查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些原住民劳工局(Native Labour Boards)。随后，铁路原住民劳工局(Railways Native Labour Board)成立，并在1948年1月提出一个有争议的新工资结构，规定每月最低工资为35先令，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工

① J. Lunn, 'The meaning of the 1948 general strike in colonial Zimbabwe', in Raftopoulos and Yoshikuni, *Sites of Struggle*, ch. 7.

② West, *The Rise of an African Middle Class*, p. 159.

③ Tredgold Commission Report, cited in B. Raftopoulos, The labour movement in Zimbabwe', in B. Raftopoulos and I. Phimister (eds.), *Keep on Knocking: A History of the Labour Movement in Zimbabwe, 1900–1997* (Harare: Baobab Books, 1997), pp. 58–59.

④ Scarnecchia, 'The mapping of respectability', pp. 151–162.

人的要求。

1945 年的罢工表达了工人通过有组织的行动来改变命运的决心，更重要的是，它起到了“示范效应”[1]，显示了有组织的工人所具有的潜在力量。因此，在随后的两年又建立了新的工人组织：贾斯珀·萨万努领导下的布拉瓦约非洲工会联盟(Federation of Bulawayo African Workers Union, FBAWU，或称“联盟”)，本杰明·布洛姆博(Benjamin Burombo)领导下的非洲之声协会，以及索尔兹伯里地区由查尔斯·穆辛格里领导的工商业工人改革联盟(Reformed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Workers' Union, RICU)。[2]

因此，随着这些工会寻求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并建立一个不分阶级的广泛联盟，1945 年罢工到 1948 年下一次大罢工期间成为非洲组织活跃的时期。例如，非洲之声协会代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选民，为选民的每年带薪休假、提拔到技术岗位任职、加班工资和病假等问题开展活动，[3]同时反对殖民当局强加给农村地区的保护性措施。虽然工商业工人改革联盟的成员仅限于索尔兹伯里地区，但它试图建立一个代表工人和新兴非洲商业阶层利益的群众组织。在该协会的斗争中，其中一个就是反对 1946 年的《本地(城区)居住和注册法》。该法案拒绝为失业人口提供住所，要求雇主为他们的工人支付房租。通过这些措施，该法案加强了国家对非洲城市地区的控制。工商业工人改革联盟也要求国家认可非洲工会联盟，同时呼吁国家关注“非洲商人的问题、城市妇女的权利，以及向非洲人出售酒类、住房危机和参与地方政府等问题”。[4]

这期间也见证了南罗得西亚班图大会(Bantu Congress)的复兴，现在它已更名为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Southern Rhodesian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还见证了选民联盟(Voters League)的成

---

① Lunn, 'The meaning of the 1948 general strike'.

② Raftopoulos, 'The labour movement in Zimbabwe'.

③ West, *The Rise of an African Middle Class*, p. 166.

④ 同上，p. 167。

立。这两个组织都捍卫非洲人的投票权，促进工人的权益。其他非洲人的抗议表现有1947年以扫·尼曼帕里(Esau Nemapare)牧师创建的非洲卫理公会教派(African Methodist Church)。尼曼帕里的新教派在早期黑人教会的废墟中发展起来，比如1920年代的非洲卫理圣公教会(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新教派是非洲人对欧洲宗教和种族统治的反抗，源于非洲独立抗议精神，像同年达达亚传教团(Dadaya Mission)学生罢课所表达的那样。[①]

随着建立多利益联盟的努力，新兴精英阶层和工人群体之间的差距在弥合，这些年“见证了一种友善关系的建立，事实上这是一个发展中的政治联盟，它跨越了非洲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社会鸿沟”。[②]韦斯特认为这种利益和关注的结合构成了“民族时刻”：

> 可以肯定的是，1945至1948年之间的罢工运动被追求不同形式的政治霸权欺骗所困扰……然而，这些斗争既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是战略性的……这段时间在宗旨和目标上总体达成了一致，每个派别都声称它最能代表非洲的共识。总之，新的命运——民族时刻已经来临。[③]

然而，这不是民族主义的时刻，因为非洲人仍然想着改良白人统治而不是争取主权和独立。[④]

99

随着下一次大行动即1948年大罢工的爆发，利益多元化群体开始解体，因为非洲精英与工人行动不一致。事情始于1947年10月布拉瓦约市非洲雇员协会(Bulawayo Municipal African Employees

---

① West, *The Rise of an African Middle Class*, pp. 169－170. 关于该时期非洲宗教界反抗的详细讨论参见 Terence Ranger, *Are We Not Also Men? The Samkange Family and African Politics in Zimbabwe, 1920－1964* (Harare: Baobab Books, 1995)。

② West, *The Rise of an African Middle Class*, p. 167.

③ 同上，p. 168。

④ 同上。

Association)抗议削减口粮的罢工。争议最终通过随后与管理方的谈判得以解决。1948 年 2 月,在就工资进行谈判时,问题又尖锐化,市政当局只提供 10%的小幅增长,而工人要求大幅加薪。工人拒绝了当局的提薪建议,要求建立劳工局,而这个要求被理事会拒绝了。于是工人在 4 月 9 日投票举行罢工。

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布拉瓦约非洲工会联盟和工商业工人改革联盟三个组织联合召开会议,提议给政府多一点时间来建立所需的劳工局,罢工因此被推迟。直到 4 月 13 日,工人不愿再继续等待,不顾他们领导的意见进行罢工。

布拉瓦约的罢工运动迅速传遍全国,乌姆塔利(Umtali)、索尔兹伯里、圭洛(Gwelo)加图马(Gatooma)、塞卢奎(Selukwe)和其他小城镇的工人也放下工具开始罢工。然而,尽管全国各地的罢工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布拉瓦约的罢工在 4 月 15 日就虎头蛇尾地结束了,本杰明·布洛姆博说服工人重返工作岗位,误导他们相信政府已同意为单身工人每月增加 5 英镑工资,已婚男职工每月增加 7 英镑 10 先令。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评论都认为,尽管原因尚不清楚,本杰明是故意用误导来化解罢工。



图 3.2 大罢工:人群聚集在布拉瓦约黑人区
(来源: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

1948 年的罢工引发了对罢工特征、重要性以及非洲精英在工人运动中所起作用的讨论。其中一个问题是,如一些学者所声称的,罢工到

100

底是由激进的产业工人主动发起而最终又被非洲精英出卖的运动,[1]还是一个精英成功指导工人朝着预定目标而精心组织的运动。恩瓜比·波赫比(Ngwabi Bhebe)、艾诺克·杜姆布车纳(Enoch Dumbutshena)是支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代表,他们认为一般情况下,精英的领导尤其是本杰明·布洛姆博,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些有能力的领导人能够敏锐地领导该系统,以最好的方式推进工人运动和民族主义事业的前进。[2]

这些学者认为,如果这些领导人有时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罢工运动的矛盾态度,这只是因为他们想误导有关当局,使其不明白到底谁是真正的运动煽动者和罢工领导人,以此来避免被逮捕。因此,根据波赫比的观点,

> 领导人小心谨慎,是为了避免被执法人员当作罢工倡导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要看他们在4月13日及罢工期间的行为。普通人必须看起来像是在自愿行动。这样,就像布洛姆博早些时候表示的,殖民政府不可能将每个人都关进布拉瓦约监狱。[3]

为什么布洛姆博知道当局政府从来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还要故意对工人撒谎,波赫比对此没有充分的解释。他认为,一旦当局同意"在罢工者返工七天内任命劳动局",并以书面形式写下这个承诺,那么罢工领导者就会心满意足,认为工人已经"获得大胜",应该复工。[4] 然

---

① O. Pollak, 'The impac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on African labour organisation in Rhodesia', *Rhodes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7(3), 1973; S. Thornton, The Patterning of Industrial Conflict: African Working Class Assertion and a Collective Employer Response' (Unpublished, 1979); J. Lun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st: The Strikes and Unrest of 1948 in Southern Rhodesia', (BA(Hons.) thesi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1982).

② Bhebe, *Benjamin Burombo*; E. Dumbutshena, Zimbabwe Tragedy (Nairobi: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1975).

③ Bhebe, *Benjamin Burombo*, p. 65.

④ 同上,p. 70。

而,这仍然没法圆这个谎。

有些学者并不同意这种解释。斯蒂芬·桑顿(Stephen Thornton)和约翰·伦恩(John Lunn)等学者[①]仍认为1948年罢工是一次激进且团结的工会运动,但被他们的精英领导者出卖,这些精英自觉或不自觉地跟资本家和政府合作压制工人的战斗精神。尤其在谈到布洛姆博时,韦斯特质疑他作为工人利益的拥护者的诚意,认为他是工人运动的叛徒:

101

> 尽管他是无产阶级以及引发1948年大罢工的众多冤情的代言人,然而布洛姆博最终误导了城市民众,让英国人对黑人,白人对工人,殖民者对被殖民者拥有特权。[②]

在任何情况下,韦斯特都坚称罢工的发生"违背了黑人精英领导的诉求,甚至不知道他们的诉求"。在他看来,"工人阶级…被精英领导出卖了"。[③] 这种背叛摧毁了任何通过精英和民众联手使非洲工人运动成为不可抗拒力量的机会。

一些与布洛姆博同时代的人也否认其领导了罢工。比如,时任非洲国家联盟主席的姆库希·库马洛(Mkushi Khumalo)和布拉瓦约非洲工会联盟的副主席格雷·班戈(Grey Bango),他们都尖锐地批评布洛姆博不是工人,而是一个小气的商人,他没有资格冒充工人领袖。他们把他定义为一个为了实现个人经济利益而跳到工人抗议行列的机会主义者。[④]

另一个问题是,1948年的事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大罢工。伊安·费米斯特和布莱恩·拉夫托帕洛斯就大罢工的特征进行

---

① Thornton, 'The Patterning of Industrial Conflict'; Lun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st'.

② West, *The Rise of an African Middle Class*, pp. 174－176.

③ 同上。

④ Raftopoulos and Phimister (eds.), *Keep on Knocking*, pp. 69－71.

了辩论。他们认为，虽然在战后岁月里第二产业增长相对较快，但在1948年之前工人阶级还不是非常成熟，无法让我们看到国家产业工人阶级所拥有的共同的阶级气质，有能力针对资方采取协商一致的阶级行动。他们指出，1945年全国只有382家工厂，雇工只有30 439人，而且其中很大比例是短期的"外地人"，因此工人参加罢工是小范围的而不是全国性的。让这样互不相干的力量一起上演一场总罢工是不可能的。这些运动的爆发给人的印象是一整个运动的某一部分；事实上，它们只是一系列的单独运动，比如在索尔兹伯里的一些工厂是政府强行关闭的。[①]

102 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一时期工人运动和民族主义的关系。根据华霍斯特·菲利普(Philip Warhurst)的观点，随着1950年代非洲民族主义的崛起，城市工人阶级被边缘化，或者屈从于精英统治的政治，尤其是在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之后更是如此。在他看来，工会运动对政治的屈从和由此引发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②]

1960年代，工人运动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明显，特别是在流亡政治和武装斗争时期，但是值得怀疑的是为什么城市工人和工会在反殖民斗争过程中这么早就被边缘化。可以说，虽然非洲的精英们在茶话会多元种族政治的鼎盛时期公开保持与工人的距离，但是两个群体之间有相当多的合作。事实上，根据拉夫托帕洛斯的观点，在1950年代，"工会活动者通过领导新兴的民族主义政党，为民族主义构建带去组织性经验，在促进民族主义运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③]

同样，莫斯比(T. H. Mothibe)主张，直到1960年代武装斗争开始，"有组织的劳工并不隶属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高

---

① Phimister and Raftopoulos, 'Kana sora rikatsva ngaritsve'.

② Philip R. Warhuret, 'African Trade Unions in Southern Rhodesia, 1948 - 1956: Prelude to Mass Nationalism?', p. 1, cited in Mothibe, TSmbabwe: African working class nationalism', pp. 157 - 180.

③ Raftopoulos, 'The labour movement in Zimbabwe', pp. 55 - 56.

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组织的劳工和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①] 这种紧密的联系有事实证据：1954 年,他们中一些人积极致力于创建南罗得西亚工会大会(Southern Rhodesia Trade Union Congress,SRTUC),比如那卡拉(E. Nkala)、J. Z. 莫约以及 J. 纳科莫等,这些人在日后民族主义政党成立时也是重要人物。[②]

边缘化随后便开始,伴随着武装斗争的兴起,殖民政府和非洲民族主义的对抗舞台从城市转到乡村。[③] 于是就产生了误导性的独立后自我服务的观点,该观点由津巴布韦执政党进行宣传,认为城镇人口没有为国家的解放进行斗争,只有农村人是独立斗争真正的战士。因此,在1960 年代游击战争爆发前,称城市工人被小资产阶级政治或民族主义“边缘化”或“服从于”它们,以及工会运动是“民族主义高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不完全准确。[④]

紧张局势的出现,部分原因是地方工会参与到国际工会运动中。在冷战高潮时期,这些运动在发展中国家争夺势力。那些参与到罗得西亚劳工政治中的国际组织有欧洲的国际自由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 ICFTU)、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以及共产主义世界工会联盟(Communist 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如果非洲工人应该团结,那么哪些是应该团结的,还存在分歧,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 1962 年劳工运动的分裂。

杰米拉(Jemila)认为他与国际自由工会联盟的关系过密,而且他也不愿与民族主义运动合作,这是分歧的中心。鲁本·杰米拉的秘书长——约西亚·马卢莱克(Josiah Maluleke)另立门户建立了南罗得西亚非洲工会大会(Southern Rhodesian African Trade Union Congress, SRATUC)。1963 年,民族主义运动分裂。一派是乔舒亚·恩科莫领

① Mothibe, ‘Zimbabwe: African working class nationalism’, pp. 157－158.

② 同上,p. 159。

③ 同上,p. 158。

④ 同上,p. 157。

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 ZAPU),另一派是纳巴宁吉·西索尔(Ndabaningi Sitihiole)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 ZANU)。南罗得西亚非洲工会大会与后者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而一个叫做津巴布韦非洲工会大会(Zimbabwe African Congress of Unions, ZACU)的新劳工组织则与前者结盟。①

由于1934年《工业调解法令》(Industrial Conciliation Act)并没有承认非洲劳工为工人,他们继续接受1901年《主仆法令》(Masters and Servants Act)的管理,该法案禁止他们组织工会或进行集体谈判。然而,面对日益增长的不安和不断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政府被迫重新审视其劳动法,并最终在1959年修订了《工业调解法令》,允许非洲工人组建和加入工会,但农业和国内工人、公务员及罗得西亚铁路雇员被排出在外。② 在那之前,白人工会一直用自己的影响力在某些技术性工作领域排挤非洲工人,以在职场竞争中保护白人。

1959年的法令被设计成便于政府更好地控制日益不安的非洲工人,其方式是只承认技术性的工会,而这种工会往往以白人会员为主。这延续了传统的做法,让欧洲人比非洲人更为得利。此外,1959年的法令提供了有倾向性的投票制度(a weighted voting system),使技术工人拥有特权并确保白人工会继续主导国家的劳工运动。

104

大规模非洲民族主义的出现

韦斯特所说的"民族主义时刻"始于1955年城市青年团(City Youth League, CYL)的成立。该组织由索尔兹伯里的青年活动家乔治·尼亚斗罗(George Nyandoro)、詹姆斯·契克雷马(James Chikerema)、埃德森·西索尔(Edson Sithole)和奇斯扎·杜杜扎

---

① Raftopoulos, *Keep on Knocking*, pp. 78 – 87.

② Peter Harris, 'Industrial workers in Rhodesia, 1946 – 1972: Woridng class elites or Itimpen-proletaribt?',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2), J975, pp. 139 – 161.

(Duduza Chisiza)共同创立。该青年团掌握了哈拉雷乡民顾问委员会(Harari Township Advisoiy Board)的领导权,削弱了查尔斯·穆辛格里的领导地位,很快便使非洲精英的多元政治黯然失色。[①] 1956年8月,青年联盟在索尔兹伯里发起抵制乘坐公共汽车运动,抗议联合运输公司提高票价,该抗议活动展现了一种新的战斗力。

这些发生在哈拉雷大部分非洲乡镇的组织有序的抵制活动,后来逐渐变成暴力活动,并导致不幸事件的发生。有几个妇女在哈拉里镇(现在的姆巴里)汽车站被强奸,作为违反抵制乘坐巴士运动的惩罚。正如一些评论家指出的,这清楚地表明了当时在非洲城市社区中存在的性别紧张局势。年轻工作女性试图证明自己的独立性,而父权主义的城市男性反过来又试图重申他们的控制权。特里·巴恩斯(Terri Barnes)似乎认为,抵制运动的领导人是强奸案的同谋,但事实更可能是不法分子利用抵制活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让领导人难堪。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青年团的领导人"同意使用暴力,尤其是性暴力"。[②]

就像巴恩斯的文章所表明的,妇女在这整个时期都是非洲城市社会的活跃分子。她们同男同胞一起要求改善住房条件、寻求被尊重、要求政党代表席位。虽然她们没有像南非妇女在反抗种族隔离斗争期间一样建立一个激进的妇女政治组织,但是她们确实加入到反殖民组织中,参与反殖民示威,发出她们为非洲人争取自由和人权的声音。就像巴恩斯指出的,不管怎样,"现行经济体系对妇女的影响"、"家庭的生存和社会再生产问题"对妇女当工人的影响等因素都对1940年代的男性工人有影响。[③] 在反殖民斗争中,妇女发挥的作用不再限于她们在该时期公开参与劳工活动和政治组织。

105

妇女还不得不应对自己所在社会的父权制度,并以巧妙的方式,蔑

① Raftopoulos and Yoshikuni, *Sites of Struggle*, p. 38.

② West, *The Rise of an African Middle Class*, p. 206.

③ T. A. Barnes, '"We Women Worked So Hard": Gender, Labour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Colonial Harare, Zimbabwe, 1930－1956' (D.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Zimbabwe, 1993).

视随意对她们分类和给她们贴标签。[①] 显然，妇女决心要证实自己的独立性，而男子力图控制妇女的活动，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尚未得到解决。这种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在某些斗争中妇女被视为男人的合作伙伴；而在其他情况下，如在公交车站强奸案中，他们视彼此为敌人。[②]

1957 年 9 月，青年联盟跟布拉瓦约的非洲民族委员会(Bulawayo-based African National Council)一起，在乔舒亚·恩科莫的领导下，形成了第一个全国政党，即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后来简称非洲人国民大会)。其他管理成员包括奇科里马(J. Chikerema)、尼亚斗罗(G. Nyadoro)、J. Z. 莫约、姆西卡(J. W. Msika)、弗朗西斯·尼瓦提(Francis Nehwati)、穆坦德瓦(P. Mutandwa)和穆迪科瓦尼(P. Mudikwane)。[③] 事实证明这个政党很受欢迎，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不少于 39 个分部，到 1958 年 6 月号称会员达到 6 000名。[④] 在后来的民族主义政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的非洲精英，在这一时期还不愿跟群众打成一片；他们仍然抱有跟联邦合作的幻想。根据姆兰博的说法，他们仍然相信，该联邦会兑现其“伙伴关系”的承诺，特别是因为他们多数是投票人，并作为“新生”非洲人享受优惠待遇。因此，他们拒绝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愿意跟随联邦党人。[⑤]

青年联盟、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随后的民族主义政党的诞生，必须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待。战后民族主义加速发展，并最终在 1957 年加纳独立时达到高潮；在广播普及和国际航空旅行日益增多的年代，加纳独立事件鼓舞了大陆上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斗争，其中包括南罗

---

① T. Barnes and E. Win, *To Live a Better Life: An Oral History of Women in Harare, 1930 -1970* (Harare: Baobab Books, 1992); T. Barnes, '"So that a labourer could live with his family": Overlooked factor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strife in urban colonial Zimbabwe, 1945 - 1952',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21(1), 1995, pp. 95 - 113; Barnes, 'We Women Worked So Hard'.

② Scarnecchia, 'Poor women and nationalist politics'.

③ Mlambo, *Rhodesia: Struggle for a Birthright*, p. 117.

④ Ngwabi Bhebe, 'The nationalist struggle, 1957 - 1962', in C. Banana (ed.), *Turmoil and Tenacity* (Harare: College Press, 1989), pp. 66 - 67.

⑤ Mlambo, *Rhodesia: Struggle for a Birthright*, p. 123.

得西亚。[1]

非洲人国民大会挑战《土著畜牧法》,抗议减少牛群蓄养量,以及由政府资助但不受欢迎的土壤保持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它获得越来越多的群众支持。[2] 正如上文所讨论的,《土著畜牧法》的前提是非洲保留区可以通过土地私有制来提高生产率,而不是依靠迄今存在的传统的土地公有制。该法案包括削减单位土地面积和个人可蓄养的牛的数量,它的实施削弱了酋长对土地的控制权,损害了酋长的权利,加上各项保护措施的执行,如减少牛群蓄养量和平整畦沟,引起非洲农村人口的反感,为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到最后这种试图通过土地所有权私有化来改变非洲土地使用权的尝试失败了,主要是因为它引起了激烈反对,最明显的是"对官员的攻击随处可见,民族主义政党传播到农村地区"。[3]

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抓住每一个机会来颠覆保留区原住民事务部的权威,并谴责伙伴关系的政策是假的,但是它在非洲民族自决问题上,在为"所有居民要求自治"的问题上相当模棱两可。[4] 同时,《土著畜牧法》的政策导致大量非洲人离开土地、流离失所,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入市区。因此,它为农村和城市地区的非洲人之间提供了一种联系,这成为支撑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这个国家后来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基础。[5]

非洲精英的合作伙伴及多种族茶话会政治的幻想破灭了,因它们不会带来种族平等和对非洲人权更好地尊重。非洲人把白人自由主义者领袖加尔菲德·托德看做是黑人利益的拥护者,1958 年内阁反对他的"亲非洲人"政策把他赶下台,这对非洲人是一个沉重的冲击。托德

---

① Raftopoulos and Yoshikuni, *Sites of Struggle*, p. 139.

② 关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马托波乡村地区的影响,参见 T. Ranger, *Voices from the Rocks* (Harare: Baobab Books, 1999), ch. 6。

③ Jocelyn Alexander, *The Unsettled Land: State-making and the Politics of Land in Zimbabwe, 1893－2003* (Harare: Weaver Press; Oxford: James Currey, 2006), p. 59.

④ Mlambo, *Rhodesia: Struggle for a Birthright*, pp. 118－119.

⑤ West, *The Rise of an African Middle Class*, p. 215.

对非洲人的政策被白人视为软弱可欺，这在伊恩·史密斯的自传中有体现。伊恩指出，在联邦时期，事情“从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带来了新的投资和经济扩张，”但美中不足的是加尔菲德·托德，“这个新的南罗得西亚总理，他倡导的政策不仅超出公众可接受的范围(即，白人的意见)，而且还为极端的黑人政治家谋取方便”。[1]

107

多元种族主义是死路一条的消息，被1958年大选的结果强化了。大选中由托德领导的新党派——罗得西亚联合党与由埃德加·怀特黑德(Edgar Whitehead)领导的联邦联合党(UFP)、由杰克·凯勒(Jack Keller)领导的独立劳工党、由雷·斯德科尔领导的自治领党一起竞选。联邦联合党的胜利显示了对种族分离政策而不是对托德的合作伙伴举措的支持，因此，非洲人民的未来不能再委托给白人自由主义者，靠他们一时兴起发善心，非洲人必须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

毫不为奇的是，很多人退出了联邦联合党和跨种族协会等多种族组织，转而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然而，直到1960年，精英们才放弃多元种族主义的想法，真正接受非洲的民族主义。到那时反殖民斗争已经拥有了一批在未来几十年政治斗争中表现突出的人士，其中包括赫伯特·奇特坡(Herbert Chitepo)、伯纳德·奇泽罗(Bernard Chidzero)、艾诺克·杜姆布车纳(Enock Dumbutshena)、恩达巴尼齐·西索尔(Ndabaningi Sithole)以及罗伯特·穆加贝。当然，并非所有的精英成员都放弃了多元种族主义。有些人还继续参加白人领导的组织，比如联邦联合党和加尔菲德·托德的中部非洲政党。[2]

1959年2月，怀特黑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根据新颁布的《非法组织法》(Unlawful Organisations Act)取缔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收了这个党派的大部分资产，[3]拘留了500多名非洲政治领袖。1960年

---

① Smith, *The Great Betrayal*, pp. 33,34.

② Mlambo, *Rhodesia: Struggle for a Birthright*, p. 129.

③ 根据Lawrence Vambe, *From Rhodesia to Zimbabwe* (London: Heinemann, 1976), p. 281，政府没收了价值1.5万英镑的财产。

1月1日,非洲民族主义者[1]建立了民族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NDP),其宗旨跟被取缔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相似,唯一的例外是它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通过普选实行多数人的统治。其他目标包括取消《土地分配法》、改善社会条件和城市的住房条件。据莫斯比(Mothibe)所说,这个新党派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建立不到数月就吸引了不少于7 000人参加它的集会。[2]

108



图3.3 民族民主党官员,摄于1960年。从左到右依次为J. Z. 莫约、马利安加·莫顿、乔舒亚·恩科莫、罗伯特·穆加贝

(来源: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

109

和它的前身一样,民族民主党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均获得了支持。《土著畜牧法》和减少牛群蓄养量运动给农村生活带来严重破坏,导致农业收入下降、农民失去土地到城里漂泊。在城市地区,经济衰退导致失业增加、工资降低和生活成本的上升。[3] 民族民主党的斗争,特别是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全国性抗议运动,造成了大量财产损失和一些示

---

① 创始人包括迈克尔·马维马,E. J. 兹伯格,T. G. 斯伦迪卡 以及 E. 恩卡拉。

② Mothibe, 'Zimbabwe: African working class nationalism', p. 168.

③ 同上。

威者死亡，[①]最终导致1961年12月该党派被取缔。作为回应，非洲人在乔舒亚·恩科莫的领导下又建立另外一个政党：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几年后，随着一个新的党派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的成立，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就分裂了。

108



图3.4 监管城区暴力行为，摄于1960年

（来源：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

109

该时期任何激进民族主义的出现都受到非洲大陆上其他地区独立斗争的影响，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的。1950年代肯尼亚的茅茅起义，人们拿起武器企图将白人殖民者赶出他们的土地，激发了其他非洲国家民族主义者的理想，并证明了挑战白人殖民统治的潜在可能。1957年加纳的独立同样启发了其他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的国家，随后许多非洲国家在1960年代初独立，特别是邻国赞比亚、马拉维和刚果，这进一步鞭策着津巴布韦民族主义者继续努力。

① Mothibe, 'Zimbabwe: African working class nationalism', p. 172.

迈向单方面宣布独立时期

恩科莫作为领导人其软弱是公认的,这导致 1963 年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分裂。这种软弱在 1961 年制宪会议会谈中可以看出。会谈是在南罗得西亚的坚持下举行的;怀特黑德政府希望新宪法能为南罗得西亚从英国获得独立铺平道路,跟英国其他殖民地如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一样。所制定的 1961 年新宪法扩大了公民选举权。为了使更多的非洲人拥有投票权,该宪法创设了一个更低资格要求的“B 票名单”,而这表面上宣称是因为非洲人不能满足更高标准的“A 票名单”。宪法还规定罗得西亚议会成员从 30 名扩大到 65 名,其中 15 人由“B 票名单”选民选举产生。

1961 年 7 月 26 日,白人选民举行全民公决通过了新宪法。然而,白人团体内部有一群人认为新宪法对非洲民族主义做出了太多的让步,而且在种族问题上过于宽松。帕特里克·邦德(Patrick Bond)指出,相对黑人而言,白人政治上的团结都是由他们相对黑人而言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决定的。对于工业和金融资本家来说,重要的是要培育黑人中产阶级的发展,以提供一个国内市场,同时也会帮助减少社会动乱;而矿业和农业资本家,以及“白人工薪阶层和小资产阶级”则担心对非洲人的政治让步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上涨,使就业竞争加剧。正是“这种白人反应的联合意见”破坏了由联邦联合党首先提出又先后得到自治领党和罗得西亚阵线党(RF)加盟支持的政治改革。[①] 正是这个在罗得西亚阵线党领导下的联盟赢得了 1962 年 12 月的大选,温斯顿·菲尔德(Winston Field)担任总理,伊恩·史密斯担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110

然而,温斯顿·菲尔德的统治是短暂的。他无法在强硬的英国面前继续推进罗得西亚的独立事业,英国坚持认为非洲人在考虑独立前应该更多地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1964 年 4 月,他不愿意单方面宣布

---

① Patrick Bond, *Uneven Zimbabwe: A Study of Finance,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1998), p. 111.

独立，被迫辞职。根据 W. 盖尔所言：

> 因为很明显英国不会同意罗得西亚独立，除非是以它要求的形式，这对罗得西亚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于是关于罗得西亚不得不自己采取行动的谣言飞传。菲尔德先生面对单方面宣布独立可能带来的后果退缩了，他发现自己与急不可耐的同事们产生了对立。他的同事认为他采取的手段不够强硬。因此，他辞去了总理职务。[①]

伊恩·道格拉斯·史密斯(Ian Douglas Smith)接任了总理职位，他是首位在罗得西亚本地出生的总理。[②] 当与英国的独立谈判进展甚微时，史密斯选择了在 1965 年 11 月 11 日单方面宣布独立，这样将罗得西亚白人置于与多数非洲人对立的位置上。

这个脱离英国的决定需要结合当时席卷整个非洲大陆的去殖民化浪潮的大背景来理解。刚果独立几天之后发生军事叛变，导致白人大规模逃亡罗得西亚和南非，这证实了当地白人对非洲多数统治的恐惧，除非他们提前从英国人手里取得独立并获得统治权。因此，虽然非洲其他地区实现独立使非洲民族主义者欢欣鼓舞，但是它对白人的意义却截然相反。

111

同时，非洲民族主义者在 1963 年分裂成两个主要派系：乔舒亚·恩科莫领导下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西索尔(Ndabaningi Sithole)领导下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此前一些民族主义领导者表达了不满，他们宣称乔书亚·恩科莫接受 1961 年宪法上的 15 个非洲人席位，出卖了他们。然而，姆兰博表明，整个民族民主党团队——包括在 1963 年领导独立的罗伯特·穆加贝——已经同意了这个修宪决定。他们只有在后来受到党派支持者的激烈批评后才拒绝承认"宪法"。[③]

---

① W. Gale, *The Years Between, 1923 - 1973: Haifa Century of Responsible Government in Rhodesia* (Salisbury: H. C. P. Andersen, 1973), p. 49.

② 菲尔德被罢黜故事的详情参见斯密斯的《大背叛》(The Great Betrayal)。

③ Mlambo, *Rhodesia: Struggle for a Birthright*, pp, 151 - 164.



图 3.5　伊恩·史密斯签署单方面独立宣言
（来源：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

马斯普拉·西索尔(Masipula Sithole)认为，分裂主要是由领导人之间的个性和气质上的差异造成的，而不是任何前进道路上的根本性战略分歧。他写道：

> 恩科莫、西索尔以及其他领导人，都开始认识到去殖民化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去殖民者问题）需要激进的手段……然而，这种差别变成了关于性情倾向的问题……性情倾向的问题涉及一个人是否是“胆小”或“勇敢”……这跟个体是否看到“需要做什么”无关，但是跟个体是否“做需要做的事情”密切相关。[①]

112

内森·沙姆亚里拉是民盟的创始成员，他声称分歧主要是针对恩科莫的决定：建立流亡政府，从罗得西亚外部进行反殖民斗争。

① M. Sithole, *Zimbabwe: Struggles within the Struggle* (Harare: Rujeko Publishers, 2nd. edn., 1999), pp. 52－53.

内森认为，分裂是因为“恩科莫想回避国内的情况，希望获取国际组织的支持进行有效施压”；而西索尔和穆加贝认为，党的领导应该更多关注“国内组织，掌握国内具体情况”，这至关重要。[①]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观点，关于民族主义者为什么会分裂、谁应该受到谴责的争论仍然没有结果。

民族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揭开了罗得西亚非洲民族主义历史上悲惨的一页，双方党派的支持者在街上激烈交战，转移了反殖民斗争本身的注意力。这给罗得西亚当局在 1964 年 8 月取缔这两个党派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恩科莫、西索尔、穆加贝和其他领导人被拘留或监禁。那些没有被逮捕的人则流亡到邻国，他们在那里组织武装斗争。[②] 随着 1965 年《单边独立宣言》(UDI)的到来，这个国家进入它动荡历史的另一个阶段。

113

结论

回顾该时期，从工人罢工到精英的种族多元化尝试，再到激进民族主义的崛起，非洲组织和政治活动采取了多种形式。同样，民族主义的概念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1950 年代中期之前，非洲人普遍接受了“大英帝国公民”的身份，只要求得到英国人公平合理的统治。有些人，比如精英们，渴望跟欧洲人平起平坐，被纳入到英帝国体制中。只有当多种族平等关系的幻想破灭时，他们才会离弃白人的家长式统治并开始要求自治和独立。因此，到 1950 年代末，非洲政治运动的基调和目标在新兴的民族主义者领导下才变得更加

---

① Shamuyarira, *Crisis in Rhodesia*, p. 177. See also Sithole, *Zimbabwe: Struggles within the Struggle*. 关于恩科莫在民族主义政治中失势背景的另一说法，参见 M. Nyagumbo, *With the People* (Salisbuiy: Graham Publishing, 1980)。

② 早期关于组织武装斗争的努力，参见 see D. Dabengwa, 'ZIPRA in the Zimbabwe war of liberation', in N. Bhebe and T. Ranger (eds.), *Soldiers in Zimbabwe's Liberation War* (Harar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s; London: Currey, 1995), pp. 24 - 35; J. Tungamirai, 'Recruitment to 2ANLA: Building up a war machine', in Bhebe and Ranger (eds.), *Soldiers in Zimbabwe's Liberation War*, pp. 36 - 45.

激进起来。

在反殖民族运动过程中，阶级、性别、种族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多元种族主义时代下的精英和工人的分裂，使得民族主义领导人和工人阶层之间的紧张局势浮出水面，并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与此同时，公交车站强奸案件、女性在男性主导的民族主义政党中被边缘化以及工会谴责性别紧张关系，这些问题可以说从来没有得到解决。1963年当非洲人民联盟和非洲民族联盟组成广泛的部族战线时，种族划分问题开始出现，尽管每个政党中都有其他种族的领导者和成员。因此，虽然1950年代后期的反殖民斗争都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但它们根本没有关于国家未来的共同设想。

至于白人，他们对自己作为帝国成员角色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他们的根在英国或其领地，把罗得西亚当作英属殖民地，多数白人定居者自豪地认为自己是不折不扣的大英帝国成员，认为自己体现着1890年占领这个国家的殖民者的精神。事实上，有英国血统的罗得西亚人一直以来都歧视非英裔的白人群体，如南非白人、犹太人和波兰人，让他们在国家事务中边缘化并采取严格的移民标准以控制其较小的人口数量。[①]

罗得西亚人帮助建立了中部非洲联邦，部分原因是为了抵消南非白人的民族主义，但是当英国在1960年代早期拒绝其独立，坚持"在获得多数统治之前不能独立"的原则时，他们的信心动摇了。此后，罗得西亚白人身份似乎已经变得非常矛盾。他们把自己看做真正的英国价值观的拥护者和捍卫者，来对抗非洲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双重威胁；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也反对英国自身的衰落。他们经常反复声称捍卫"文明"和"标准"，这种做法反映了他们的信念。这种主张经常从他们罗得西亚祖先的"开拓精神"中寻找支撑。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反对1965年《单边独立宣言》的人呼吁发扬祖先的自由精神和豪迈情操，以便利用国内力量支持他们对抗世界，但事实上，

114

① Mlambo, *White Immigration into Rhodesia*, pp. 49－67.

这些人根本不是这些先驱的后裔"。[1] 舒尔茨(B. Schulz)的抽样调查表明,罗得西亚阵线领导人中只有27%出生在罗得西亚,另有33%生于南非,26%来自英国。[2]

---

① Mlambo, *White Immigration into Rhodesia*, p. 2.

② Barry M. Schulz, 'Homeward bound? A survey study of the limits of white Rhodesian nationalism and permanence', *Ufahamu*, 5(3),1975, p. 605.

第四章　单方面宣布独立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

约瑟夫·姆提斯，穆亚茹帝兹·恩雅库迪亚和
特丽莎·巴纳斯（Joseph Mtisi，Munyaradzi
Nyakudya and Teresa Barnes）

引言

1965至1980年，津巴布韦的历史发展在很多方面上都不同于大多数非洲国家。尽管很多非洲国家已经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获得独立，但是南罗得西亚的发展却经历了一次不同的转变。当英国宣称努力实现黑人的多数统治时，罗得西亚的白人决定保卫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特权，巩固南罗得西亚"白人国家"的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世界上最集中控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产生了。[1] 赫布斯特(Herbst)恰如其分地称为"白人的社会主义"。

115

就非洲人而言，他们要寻求独立，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由于各种

---

① E. S. Pangeti. 'The State and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 Study of the State as Regulator and Entrepreneur in Zimbabwe, 1930 – 1990' (D.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Zimbabwe, 1995), p. 117.

势力都急于对各自理想的国度做出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定义和重新定义，它们对未来的憧憬充满了矛盾，导致了复杂且通常是暴力的权力斗争。本章将阐述这些复杂的斗争，并探讨1965年单方面宣布独立后它们在罗得西亚各个领域中的表现。

背景

如上一章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整个非洲大陆掀起了民族主义的高潮。[①] 这体现为与国家政权的对抗加剧(主要通过罢工)；有组织的政党不断增多，并向殖民统治发起挑战。南罗得西亚也掀起了这种民族主义浪潮。1945年铁路工人罢工及1948年大罢工的规模和组织在殖民地前所未有，正体现了这种对抗。[②] 迈克尔·韦斯特(Michael West)发现，"虽然非洲建国意识在1945至1948年的南罗得西亚非洲人中有所显现，但是这种国家并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个拥有主权并且独立的实体"。[③] 战后随即出现政治骚动，焦点是反抗欧洲人的暴政却不是要将他们完全推翻。但是，"到了1960年代初，黑人精英作为社会的一部分站到了非洲民族主义一边，他们领导人民要求将政治权力从少数白人手中转移到多数非洲人手里"。[④]

116

1953年，为了推进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的建立，种族合作的观点被突出，但是事实上，非洲人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地位，几乎都没有改变。尽管为实现非洲一定程度的发展做出了努力，但是1953年之后的发展证实了哈金斯(Huggins)所描述的联邦是一种"马和骑

---

① 关于全非洲去殖民化进程的详细研究，参见 R. W. M. Louis, *Decolonization and African Independence: The Transfers of Power*, 1960－1980(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② 参见 L. W. Ndlovu, 'The 1945 African Railway Strike' (BA (Hons)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Zimbabwe, 1983); B. M. Zulu, 'The History of Railway African Workers Union' (BA (Hons) dissertation, 1985); Shi Xiuchun, '1948 Strike in Salisbury and Bulawayo' (BA(Hons)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Zimbabwe, 1986)。

③ M. West, *The Rise of an African Middle Class: Colonial Zimbabwe*, *1898－196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of Zimbabwe, 1986).

④ 同上，p. 203。

手"的关系。[1] 从 1950 年代晚期开始，非洲人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利益无法通过联邦安排得以保障。民族民主党主席迈克尔·马维马(Michael Mawema)的声明简要阐述了非洲人民的反应："殖民政府在'小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我们认为应该由我们来控制政府"。[2]

在动荡的 1960 年代，越来越多的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开始与殖民当局进行对抗。1961 年 7 月，在哈拉雷(Harare)和布拉瓦约(Bulawayo)等城市爆发了令人震惊的兹伊暴乱(Zhii Riots)，有 18 个人被警察杀害。[3] 受民族主义情绪和反对《土著畜牧法》的影响，乡下的农民同样表达了对罗得西亚统治的不满。[4] 例如，1961 年在北萨比(Sabi North)的居留地：

117

> 一名负责实施《土著畜牧法》的土地开发官员(Land Development Officer)要去丈量可耕地的界限，却被 30 多个农民阻拦。当他想回到自己车上时，发现车子无法开动，因为车轮被原木阻挡。150 余名村民强迫他参加一个会议，在此期间村民审问他关于《土著畜牧法》和减少牛群蓄养量的问题。在被审问之后，他被迫写下了"不

---

① T. R. M. Creighton, *The Anatomy of Partnership: Southern Rhodesia and the Central African Federation* (London: Faber, 1960).

② Quoted in A. Megahey, *Humphrey Gibbs: Beleagured Governor* (London: Macmillan, 1998), p. 72.

③ 参见 T. O. Ranger, 'The Meaning of Urban Violence: *Zhii* in Bulawayo, July 1960', paper presented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Department Seminar Series, University of Zimbabwe, 2000。

④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土著畜牧法》(NLHA)的影响是不均衡的，在东部高地的一些地区，由于地形原因它很难得以实施。但是，在任何地区实施，它都必然遭到当地人的反抗。关于《土著畜牧法》的进一步的讨论，参见 I. Phimister, 'Rethinking the reserves: Southern Rhodesia's Land Husbandry Act reviewed',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9(2), 1993, pp. 225－239; J. Alexander, *The Unsettled Land: State-making and the Politics of Land in Zimbabwe, 1893－2003* (Harare: Weaver Press; Oxford: James Currey, 2006); N. Bhebe, *Benjamin Burombo: African Politics in Zimbabwe, 1947－1958* (Harare: College Press, 1989); V. E. M. Machingaidze, 'Àgrarian change from above: The Southern Rhodesia Native Land Husbandry Act and African respon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24(3), 1991, pp. 557－588。

再划界、不再杀牛"的承诺。最后村长警告他如果再来保留地,就打死他。[①]

洪代谷地(Honde Valley)也发生了反抗《土著畜牧法》的类似事件。海克·施密特(Heike Schmidt)说,曼地亚酋长(Chief Mandeya)辖区的村民经常拒绝交出他们的牛,并威胁普法政府官员的生命安全,并举行示威公开反对该项法案。同样,针对土地桩界和土壤保护的反抗也普遍存在。[②]

但是,南罗得西亚政府决定镇压任何形式的非洲民族主义。1961年民族民主党被取缔,但是它很快被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取代;然而该联盟在1962年9月也被禁止活动,但促使人民临时议会(People's Caretaker Council)的形成。值得关注的是,早先民族主义活动还合法时在城乡建立的组织为1970年代的游击战争留下了宝贵的传统。

在愈加激进地反抗殖民统治的背景下,先后由加尔菲德·托德以及埃德加·怀特黑德领导的联邦联合党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立法改革,旨在给非洲人带来有限的进步。[③] 拉里·鲍曼(Larry Bowman)认为,这些让步是希望殖民地能获得自治领地位。[④] 面对压力,怀特黑德政府在1961年推出了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对令人深恶痛绝的土地使用制度做了修改,在权力问题上做了更多的让步,从而促进了多数统治

118

---

① N. Bhebe, 'The nationalist struggle', in C. Banana(ed.), *Turmoil and Tenacity: Zimbabwe, 1890 -1980*(Harare: College Press, 1989), p. 97.

② H. Schmid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Political Violence in Zimbabwe, 1890 - 1990: A Case Study of the Honde Valley'(D. Phil. thesis, Oxford University, 1996), pp. 178 - 180.

③ 对罗得西亚政治自由界定的更详细讨论,参见 K. M. Thornton, 'The Liberalism of Garfield Todd' (BA(Hons)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Zimbabwe, 1984)。

④ L. W. Bowman, Politic in Rhodesia: White Power in an African State(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442 - 446. 自治领是英帝国享有自治权的殖民地,例如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

的进展。[1] 但是，这些妥协遭到政府右翼势力的反对，因为他们希望更加缓慢地变革。伊恩·道格拉斯·史密斯也是持反对意见者，他反对1961年宪法中有关"自由"的条款。这些对宪法不满的议员组成了一个新的政党，罗得西亚阵线(Rhodesian Front，RF)，由温斯顿·菲尔德(Winston Filed)领导。该党参加了1962年的选举，[2]大获全胜。菲尔德成为政府总理后，为1950年代初开始的温和自由的时期敲响了丧钟。同时，非洲人意识到他们争取多数统治的努力受阻，因此，爆发了越来越多的动乱，其中一些充斥着暴力。[3]

在1960年代初发生了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第一个事件是1963年发生的中部非洲联邦的解体。在解体前期，核心问题是殖民统治的未来，也就是南罗得西亚如何发展。英国人不愿意在没有对黑人多数统治做出承诺的情况下准其获得独立。第二个事件与第一个事件密切相关，涉及南罗得西亚自身的政治变动。1964年，温斯顿·菲尔德被免去总理职位，因其政党内部分人士认为他无法"按照他们可接受的条款做出独立的保证"。[4] 他被伊恩·史密斯取代，伊恩一直执政到1979年。

1964年发生的政治变动，引起索尔兹伯里和伦敦之间一系列的外交访问，双方曾试图解决涉及殖民地政治前途的困难局面。[5] 英国方

119

---

① R. Welensky, *Welensky's 4000 Days: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Federation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 (London: Collins, 1964), pp. 275 - 282. 但是非洲人反对这部宪法，因为他们支持多数统治，现在的北罗得西亚就是这种情况。

② 罗得西亚阵线主要的支持力量来自"国内白人阶层"，包括农民、白人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但是联盟并不是牢固的，并逐步变得脆弱。参见 P. Godwin and I. Hancock, *'Rhodesians Never Die': The Impact of War and Political Change on White Rhodesia, c. 1970 - 19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③ N. Shamuyarira, *Crisis in Rhodesia* (London: Deutsch, 1965); N. Sithole, *African Nationali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④ 同上。

⑤ 在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后的会议包括1966年臭名昭著的 HMS Tiger 会议和1968年的 HMS Fearless 会议。参见 J. R. T. Wood, *So Far and No Further!: Rhodesia's Bid for Independence during the Retreat from Empire, 1959 - 1965* (Victoria, BC: Trafford, c. 2005)。

面围绕罗得西亚独立制定了"五点原则"：确保 1961 年宪法中的多数统治不受阻碍，确保反对倒退的修宪行为，改善非洲人的政治地位，结束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接受任何关于罗得西亚人民是一个整体的观点。其次，还有额外的第六条原则，即没有获得多数统治就不能独立(No Independence Before Majority Rule)，这项原则非常关键，并导致津巴布韦于 1965 年 11 月单方面宣布独立。

白人的不妥协却无意中促进了民族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针对民族民主党以及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被取缔，民族主义者有两种回应。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部分成员认为，政党对伦敦宪法会谈失败的反应太迟缓，他们对此感到不耐烦，所以离开联盟另立门户，在 1963 年 3 月成立了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纳巴宁吉·西索尔(Ndabaningi Sithole)担任首任主席。其次，这两个政党开始招募年轻人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去接受军事训练，包括杜米索·达本古瓦(Dumiso Dabengwa)。达本古瓦回忆道：

> 我是在 1963 年第一批离开国家到赞比亚的。1963 年底，我们离开赞比亚前往坦桑尼亚，然后辗转多个国家，最后抵达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例如，我们那一批是在苏联接受训练的。在训练结束后，大部分批次的人员于 1964 年底和 1965 年初在赞比亚会合。[①]

这些人的早期目标是进行破坏活动，而不是开展游击战。[②] 但是，在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后他们的目标有了重大转变，他们开始寻求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进攻。1963 年，他们派遣了第一批小分队受训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武装派别——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ZANLA)于 1966 年 4

① D. Dabengwa, 'ZIPRA in the Zimbabwe war of national liberation', in N. Bhebe and T. O. Ranger (eds.), *Soldiers in Zimbabwe war* (Harar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 London: James Currey, 1995), p. 26.

② 同上，p. 27; Bhebe, 'The nationalist struggle', pp. 13 – 16。

月发动了首次袭击。在去特许区的途中,他们在西诺伊(Chinhoyi,当时叫 Sinoia)遭遇了罗得西亚军队,七名游击队员丧命。① 这些早期的武装斗争包括1967至1968年的万基战役(Wankie Campaign)。在该战役中,以赞比亚为基地的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Zimbabwe People's Revolutionary Army,ZIPRA)游击队,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武装力量——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MK)携手作战。万基战役的目标是"在战斗途中,无论在哪里遇到敌人,都应与共同的殖民者敌人战斗到底"。②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和民族之矛武装力量最初的对手是其他非洲人,即罗得西亚非洲步枪队(Rhodesian African Rifles,RAR)③的士兵,后来该部队得到地面部队和空军的增援。④

120

构想国家,界定公民

单方面宣布独立时期的最明显政治斗争是黑人和白人之间政治、社会和经济利益的斗争,也即他们对建立的国家的不同愿景。总的来说,白人寻求维护他们的利益和强权,而黑人则要打破现状。这似乎可以支持这样一种解释:单方面宣布独立时期的特点是存在两个严重敌对的种族阵营;但是,也存在着更加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种族并不总是能反映不同利益群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背景下罗得西亚形成了一个有色人种小群体,对上述政治发展提出了许多改革诉求。⑤ 种

① D. Martin and P. Johnson, *The Struggle for Zimbabwe* (Harare: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 1981), p. 10.

② Olive Tambo, 1968, quoted in N. Bhebe, *The ZAPU and ZANU Guerrilla Warfare and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Zimbabwe* (Gweru: Mambo Press, 1999), p. 19.

③ 罗得西亚非洲步枪队由黑人组成,受白人军官指挥。它最初组建是为了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④ E. Sibanda, *The 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 1961 – 1987: A Political History Insurgency in Southern Rhodesia* (Trenton, NJ: Africa Word Press, 2005), p. 106. 解放斗争的更多内容,请参阅本书的下一章。

⑤ J. Muzondidya, Walking a Tightrope: Toward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oloured People of Zimbabwe (Asmara: Africa World Press, 2004), pp. 217 – 222.

族界限有时候是交叉的，要么是因为政治和经济的迫切需要，要么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早在 1923 年，当殖民地获得责任政府地位时，罗得西亚的白人表示在与外国资本的关系中他们能够确保其自身利益，同时能够让国家充当实现其利益的工具。到 1965 年，他们已经探索了很长一段路，终于把对国家的愿景变成了现实。韦斯特发现，1923 年以来罗得西亚白人的长远目标就是实现“完全独立”。[①] 之后的罗得西亚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的首要目的是确保殖民者群体仍然感到舒适；但是，他们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措施有所不同。罗得西亚阵线的创立原则决定着单方面独立时期的白人政治，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愿景：

121

> 罗得西亚阵线承诺维持每个群体有保持其自身身份的权利，确保按绩效进行晋升以维持适当的水准，维护《土地分配法》的原则，反对强制兼并，支持政府为不同种族分别提供便利措施的权利，反对廉价劳动力、保护熟练工人权益。总之，罗得西亚阵线承诺“南罗得西亚政府仍然掌握在负责任的人手中”，同时，它将确保“欧洲人永久当权”。[②]

类似思想促使白人与非洲民族主义者进行对抗。某本小册子中这样描述一些罗得西亚白人的立场：

> 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所捍卫的是什么。这无外乎是基督教文明的遗产及其价值观、准则以及关于善恶的信仰，而这些都是共产主义所要破坏的。[③]

---

① West, *The Rise of an African Middle Class*, p. 233.

② Godwin and Hancock, ‘*Rhodesians Never Die*’, p. 57.

③ ‘Rhodesian Christian Group pamphlet, March 1977’, quoted in Bruce Moore-King, *White Man, Black War* (Harare: Baobab Books, 1988), p. 51.

罗得西亚人的言辞有时充满历史性幻想，例如他们宣称：

> 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像我们这样勇敢的小国，拥有那么多的美德和这么少的过失，像我们一样痛苦地被敌人围攻……而我们就像是在温泉关的斯巴达人，是他们前进路上的绊脚石。[①]

从本质上讲，罗得西亚阵线主张国家应当由白人来掌控，公民身份主要按照种族来划分。

但是白人社会的愿望明显比这更复杂。诚然，种族在寻求特定活动的支持、划定群体界限等方面是有用的政治资源。但是，无论如何界定，它在激发对“国家”忠诚度方面力度不够，在解决当时不同群体的竞

122



图 4.1　白人在索尔兹伯里示威反对伊恩·史密斯
（来源：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

---

① 外交部长 P. K. van der Byl 1977 年在全国战争受难者安置中心的讲演。引自 J. Freerikse, *None but Ourselves: Masses vs Media in the Making of Zimbabwe* (Harare: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 1982) p. 157.

争方面也不够有力。殖民群体本身也被划分为不同的派别，如戈德温(Godwin)和汉考克(Hancock)所言，这种国民身份意识是“被营造”出来的。[①] 本质上，除了种族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白人的观点。麦克肯齐(J. A. McKenzie)发现了罗得西亚白人内部显著的多样性，因此他提醒道“虽然 1960 年代白人社会的主要社会压力是为了政治顺从和种族稳定……但太过强调统一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不是所有罗得西亚白人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并不是所有罗得西亚农民的观点都是一致的。”[②]首先，在殖民地的大约 20 万白人定居者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信心十足地称其拥有共同的历史，因为“这些数量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多数人要么是移民，要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当地出生的。”[③]另外，相当数量的人已经拥有或者能够轻松获得外国公民的身份，这种因素使得白人在“国家”忠诚度上出现了分化。

123

其他导致白人社会分化的因素包括种族、地域、职业和阶级。这些因素被作为身份和划分群体的标志。相对于很大程度上是营造出来的国民身份理念而言，它们“出现得更加自然”。[④] 从表面上看，1962 至 1980 年间罗得西亚阵线选举的接连胜利似乎意味着殖民群体中高度的一致性。[⑤] 但是，仔细分析白人的政治可以发现，罗得西亚阵线在酝酿国民身份意识中获得成功之路并不平坦。戈德温(Godwin)和汉考克(Hancock)指出，罗得西亚白人的政治立场可以划分为三类：三分之一的人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种族隔离主义者”，他们认为不能由黑人统治自己；四分之一的人持有自由的观点，他们支持非洲人独立；剩下的人“并不反对非洲人进步，但是希望黑人为主导的统治进程拖延得

---

① Godwin and Hancock, '*Rhodesians Never Die*', p. 17.

② J. A. McKenzie, 'Commercial Farmers in the Governmental System of Colonial Zimbabwe'(D.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Zimbabwe, 1989), p. 21. Godwin and Hancock 在'*Rhodesians Never Die*'也有此类论点。

③ 同上，p. 7。另见 A. S. Mlambo, White Immigration into Rhodesia: From Occupation to Federation (Harar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s, 2000)。

④ Godwin and Hancock, '*Rhodesians Never Die*', p. 21.

⑤ 同上，p. 56。

越长越好。”[①]事实上，罗得西亚阵线是白人社会中右翼派和温和派的松散联盟。

1969年宪法通过扩大特定群体的选举权和放慢黑人为主导的统治进程暴露了这些差异。少数群体诸如亚洲人和有色人种同样包含在A类“选民名单”中，[②]但就像莫桑迪亚(Muzondidya)指出的那样，考虑到在1969年的《土地用法》(Land Tenure Act)中，亚洲人和有色人种被排除在欧洲人的土地之外，以及不断提出的在学校和医院进行种族隔离的要求，这种做法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噱头而已。[③] 这些明显退让的背后是史密斯及罗得西亚阵线率先提出的“包容性排斥”策略：将其他种族群体(非洲人、有色人种和亚洲人)纳入到政府体系中，以此阻止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因此，这些变革只是用来装点门面的，他们希望拉拢非洲中产阶级，阻止非洲民族主义的浪潮；另外，将非洲人纳入政府体系，也被认为有助于与英国人和解。但是，极端右翼选择了强硬的立场排斥非洲人，认为史密斯与英国人为敌的努力是不恰当的。

1969年宪法意味着将人分成公民和臣民的界限变得更加漏洞百出；[④]它使殖民社会变成了由白人公民和黑人臣民组成的二元结构。[⑤] 通过这种公民/臣民的二元结构来理解单方面宣布独立时期的社会和政治状况，要考虑到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随着时间推移所采取的妥协退让。随着民族主义的反抗不断增强，史密斯最初所设想的国家显然是不能实现的。罗得西亚阵线政府最初持否认“一千年”内实现黑人为主导统治的立场，后来被迫做出明显的退让：不仅承认黑人为主导统治的可能性，而且在一系列的会议中试图与民族主义

124

① Godwin and Hancock, '*Rhodesians Never Die*', p. 46.

② A类“选民名单”最初仅限于白人选民。

③ Muzondidya, *Walking a Tightrope*, p. 201.

④ 关于殖民社会公民—臣民划分的详细讨论请参见M. Mandani, 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Colonialism(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⑤ 对Mamdani文章的评论参见J. Alexander, *The Unsettled Land*, pp. 1 - 14。

者做交易。[1] 罗得西亚阵线的政治抱负随着外在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从理想转到了现实的可能性。

单方面宣布独立时期非洲人的政治与白人社会的政治情况一样复杂。非洲人的主流声音来自民族主义者。在 1940 年代晚期和 1950 年代早期，就像许多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南罗得西亚的非洲中产阶级曾领导着民族主义运动。韦斯特和曼达扎(Mandaza)均认为这些领导人渴望"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适当分享殖民者的特权"，希望继承少数白人的特权地位。[2] 民族主义者对新国家的期望是强调机会均等和种族平等，并没有批判剥削制度和阶级差别。在本质上，它并不是中产阶级所设想的新国家，即改变政治模式，赋予其公民权以获得相关福利。在国家建构设想方面，民族主义者非常注重种族和起源。[3] 从惯用语穆瓦纳维胡(土地的孩子)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起源和原住民的理念。一方面，这个惯用语表达出了基于起源的公民身份；另一方面，将其他群体归为"殖民者"以体现他们的非法性。而在白人社会中，种族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排外的手段而非"国家"忠诚的来源。

125

但是，正如亚历山大等人指出的那样，并不只有中产阶级对民族主义的理念进行定义。一些农村地区群众有自己的方式，"也在民族主义事业框架下对本地事务进行重新定义"。[4] 例如，在沙迦尼地区，本土民族主义最基本的目标是，以他们梦想中好的国家去取代坏的国家。

---

① 包括在日内瓦和维多利亚瀑布以及兰开斯特大厦召开的会议；这些政治变动是单方面宣布独立时期政治斗争的显著特征。

② West, The Rise of an African Middle Class; I. Mandaza, Race, Colour and Class in Southern Africa: A Study of the Coloured Question in the Context of an Analysis of the Colonial and White Settler Racial Ideology and African Nationalism in Twentieth Century Zimbabwe, Zambia and Malawi(Harare: SAPES, 1997), p. 528.

③ 参见 J. Muzondidya, ' "Zimbabwe for Zimbabwean": Invisible subject minorities and the quest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post-colonial Zimbabwe', in B. Raftopoulos and T. Savage, Zimbabwe: Injustic and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Cape Town: 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2004), p. 214。

④ J. Alexander, J. McGregor and T. O. Ranger, *Violence and Memory: One Hundred Years in the Dark Forests of Matabeleland*(Harare: Weaver Press; Oxford: James Currey, 2000), p. 85.

在他们看来，坏的国家将他们逐出生存之地赶到深山老林里去，是一个发号施令、要这要那的国家；而好的国家是再没有歧视，能够为他们提供服务，恢复市场，以及对他们这些公民负责的国家。[①] 这些基本的目标，在其他社区也是如此，并不是静态的民族主义。亚历山大等人进一步指出：

> 在沙迦尼地区，民族主义的先驱们是基督教现代化的推广者。但是，随着国家对抗的加剧，很多教师、传教士和店主充其量被视为“温和派”，在最坏的情况下被称为“背叛者”。而且，对发展（更广泛的）民族主义的需要……意味着对多元历史和多元宗教合法化的呼吁，久而久之，当地民族主义的基督教色彩淡化而“传统主义”的色彩趋浓。[②]

虽然亚历山大等人持这样的看法，但显然“国家”理念还需要同阶级、性别、宗教和种族等利益去竞争，争取人们对其的忠诚。

无数非洲人在为“罗得西亚白人”服务，从事诸如警察、士兵和线人等不同的职业，这证明种族对立并不是决定政治忠诚度的最重要因素。例如，白人被征召进入罗得西亚军队的同时，黑人士兵一直在充当志愿兵，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 1979 年初“国民兵役”首次征招黑人。[③] 罗得西亚非洲步枪队有白人军官和黑人士兵；这支部队组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70 年代人员数量翻了一倍；用于平叛的塞卢斯侦察队（Selous Scouts）有黑人士兵，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队也是如此。黑人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为白人服兵役（甚至殉职），有大量的事例可以验证这

---

① J. Alexander, J. McGregor and T. O. Ranger, *Violence and Memory: One Hundred Years in the Dark Forests of Matabeleland* (Harare: Weaver Press; Oxford: James Currey, 2000), p. 86.

② 同上，p. 87。

③ Frederikse, *None but Ourselves*, p. 235. 她指出“最初……3 000 名黑人中只有可怜的 1 500 人起来反抗。”

种现象。一名罗得西亚警察部队非洲警员的回忆录揭示了加入维护“法律和秩序”队伍的吸引力。察扎(G. A. Chaza)追忆道：

126

> 在那个大城市的街道，我会遇见杜姆博沙瓦公立学校(Domboshava Government School)的昔日同窗——所罗门·兹威提(Solomon Dzviti)。我有一次偶然碰到他，他穿着当地城镇巡逻警察的制服——这是英国南非警察的一个分支……那时这支当地警察部队只招收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那就是所罗门——已经改头换面了，穿着耀眼的警服，做着男人的体面工作！我能不能也找一个机会加入到警察武装呢？很明显我是可以的，所罗门也确信可以。[①]

罗恩·雷德达利(Ron Reid-Daly)是声名狼藉的“伪”塞卢斯侦察队的一名指挥官。他在为侦察队招募非洲士兵时，突出社会地位和经济因素对入选人员的影响：

> 我……着重提醒他们，我们寻找的是做体面男人工作的男人……非常坚强的硬汉……然后向他们宣传可以在塞卢斯侦察队获得职位晋升。等到他们答应之后，我不经意地向他们投掷另一个重磅炸弹。从通过遴选课程完全成为塞卢斯侦察队成员的那一天开始，他每天可以额外获取一美元二十美分的特殊部门津贴，这等同于步枪营的军士长的工资……突然之间他们就都争着要当志愿者了。[②]

---

① G. A. Chaza, *Bhurakuwacha: Black Policeman in Rhodesia* (Harare: College Press, 1998), pp. 10 - 11. 查咋 1936 年加入了警察武装力量，但是因为罗得西亚人的种族主义而大失所望，于 1957 年离开。

② 罗恩·雷德达利口述，史蒂夫·彼得笔录，Selous Scouts: Top Secret War (Alberton: Galago, 1982), p. 107。黑人侦察队被称为“冒牌的”，因为他们是乡村地区的内奸，渗入到游击队里。白人侦察队员常常将他们的脸涂成黑色，实施暴行，然后让罗得西亚的宣传机构来谴责游击队。

将参与暴力活动看作不仅是保留和争取政治权利的途径，而且是对性别规范的定义或重新定义，这在民族主义者和罗得西亚国家交战的15年中是常见的做法。

国家权力扩张和经济重组

对于单方面宣布独立，英国的回应是断绝与索尔兹伯里的外交关系，并对罗得西亚实行官方经济制裁。这些制裁包括停止与罗得西亚的贸易，将其逐出英镑区和英联邦特惠制度，禁止罗得西亚进入伦敦资本市场。[①] 在贸易方面，英国禁止从罗得西亚购买糖和烟草，罗得西亚向英国出口额的71%被终止。[②] 1965年12月，英国将禁令扩大到所有矿产品和食品，这部分占罗得西亚向英国出口额的95%。1966年1月，英国对罗得西亚实行贸易禁运，任何与其相关的产品买卖行为均违反英国法律。联合国在1966年4月强制实行了石油制裁，随后在1968年5月29日展开了全面制裁。

127

当时，外界普遍认为通过制裁可以实现预期目标，迫使史密斯政府迅速撤销独立宣言。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认为制裁会在"几个星期而非几个月内"[③]结束津巴布韦的反叛。他之所以做出这种乐观的评估，是因为罗得西亚经济依赖外部经济关系，尤其是英国。1965年，罗得西亚基本上是一个初级产品出口国，最重要的是烟草的出口，烟草收入占总出口额的三分之一。矿产品则占22%的份额。[④] 英国是罗得西亚最大的烟草市场。罗得西亚的出口占了国民收入的45%，相反，进口只占34%。在罗得西亚，几乎所有的机械、交通工具、化学品、零配件及其所有的石油都依赖进口。此外，资本、技术技

128

---

① H. R. Strack, *Sanctions: The Case of Rhodesia*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6–20.

② 同上。

③ Pangeti, 'The State and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 110.

④ W. Minter and E. Schmidt, 'When sanctions worked: The case of Rhodesia re-examined', *African Affairs*, 87(347), 1988, p. 20.

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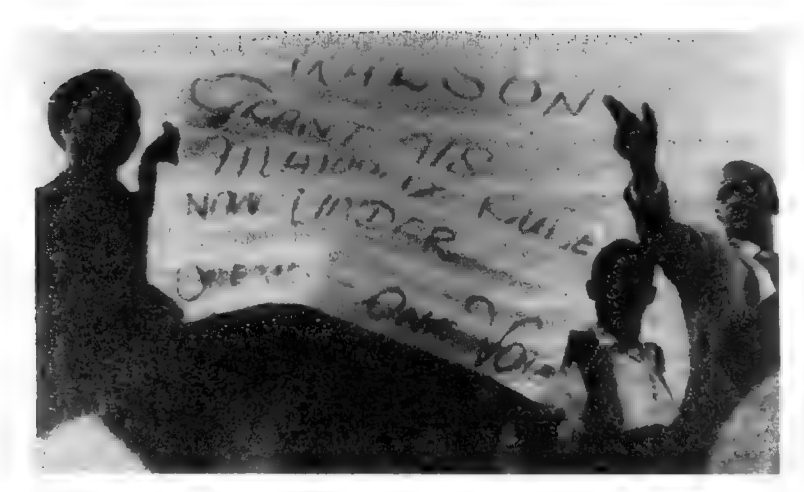


图 4.2 示威者呼吁获得哈罗德·威尔逊的支持
（来源：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

128

能以及管理方式方法也依靠引进。[①] 罗得西亚是一个内陆国家，这一事实使它似乎更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制裁的影响。

单方面宣布独立的政策取决于白人的忍耐力。罗得西亚阵线政府决定通过经济重组以及扩大国家政权来减轻制裁对白人的影响。在农业领域，经济重组的方式是减少烟草种植，从而确保农作物生产的多元化。麦肯齐(McKenzie)指出，“1965 至 1966 年间，烤烟叶的种植面积比 1964 至 1965 年间减少了 2.4 万英亩”。[②] 政府宣布计划，限制下一年度的农作物产量为 2 亿磅，每磅价格保证在 28 盾。[③] 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对烟草的依赖，同时确保那些继续种植农作物的白人农民仍然具备清还债务的能力。

同时，政府鼓励大规模生产玉米、棉花、小麦、黄豆以及牛肉。除了可以减轻农民受制裁的影响，也旨在实现粮食自给，从而减少粮食进口的开销。此举在提高玉米、棉花和小麦产量方面获得了显著成果。1972

① W. Minter and E. Schmidt, ‘When sanctions worked: The case of Rhodesia re-examined’, *African Affairs*, 87(347), 1988, p. 20.

② McKenzie, ‘Commercial Farmers in the Governmental System’, p. 97.

③ 同上。

年，玉米的总产量达到1 800万袋，产值2 625万兰特，每公顷平均产量达到62袋。1965年的产量只有520万袋，产值不足1 000万兰特，每公顷平均产量仅为30袋；相比之下取得了极大进步。[①] 但是，最成功的还是棉花生产，1965至1972年间，棉花产量提高了800%，超过了2亿磅。[②] 但是，这种成功的代价也是高昂的；欧式农业能够生存下来，得益于国家补助和贷款的增加。虽然罗得西亚实现了农业多元化并提高了产量，但这背后却存在着许多问题。就烟草而言，虽然显著减产的目的达到了，但是它的市场销售仍然存在问题。[③] 相比之下，小麦受到青睐，但是政府只重视本地产量的增加，而忽视出口市场的状况，导致国内市场供过于求，致使其价格下跌，最终意味着农民获得的利润更低。[④]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蔗糖生产上，国际市场价格下跌了，出口市场也更低迷了，但蔗糖生产却在扩张。[⑤]

农民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涉及他们的投入(特别是氮肥)与贷款，[⑥]这导致农民为了有限的资源而相互竞争；在这种形势下，“白人联盟”有可能瓦解。化肥的短缺引发了烟农的抱怨，因为烟草的施肥率更高，与种植玉米的农民相比，他们需要更多的硝酸铵。[⑦] 同样，种植玉米的农民游说政府，要求提高粮食价格，却遭到牧场主的反对，因为他们将面对生产成本的增加。另一个事实是农民社区是最易遭受游击队袭击的对象之一，[⑧]这样就能理解为什么许多农民认为罗得西亚阵线政府并

---

① Strack, *Sanctions*, p. 94.

② 同上。

③ J. Kurebwa, 'The Politcs of Multilateral Economic Sactions on Rhodesia during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period, 1965－1979'(D.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Zimbabwe, 2000), p. 384.

④ 例如，在1977至1978年之间，A级小麦每公斤从12.3分下降到11分。同上，p. 387。

⑤ 同上，p. 385。

⑥ 同上，p. 403。

⑦ 同上，p. 406。

⑧ 塞尔比指出“在1972至1980年间，大约有300名农民或者他们的直系亲属被杀害，这个数目占了平民死亡人数的半数以上。”产生这个不成比例数字是因为农民通常生活在边远地区，这种危险处境需要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生存策略。参见 A. Selby, 'Commercial Farmers and the State: Interest Group Politics, and Land Reform in Zimbabwe' (D. Phil. thesis, Oxford University, 2006), p. 78。

未有效地保护他们的利益。① 因此，白人农民重新审视其政治地位，并采取策略保护自己、家人及其投资。

130

策略之一是农民与游击队进行"协商"，保护自己免受袭击。虽然很难量化这种做法的程度，但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况在罗得西亚的许多地区都普遍存在；②对游击队的帮助主要包括提供食物、药品和衣物。③ 由于农民住在乡下，极易遭受袭击，而他们投资的固有本质又使他们很难迁移，所以对他们的这些行为应该予以理解。对许多农民来说，他们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制定了"保险政策"。但是，豪库努牧场(Hokonui Ranch)的加菲·托德(Garfield Todd)及库德·康福特农场(Cold Comfort Farm)的盖伊克·拉顿·布洛克(Guy Clutton Brock)，由于支持民族主义武装而被定罪。1975 年，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罗得西亚全国农民联盟代表 P. 斯特朗(P. Strong)和 S. 弗里克斯(S. Fircks)告诉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农村社区已做好准备迎接多数统治，并愿意与黑人政府合作。④ 他们指出，至少 70%的农村社区领导人支持这一观点。农民致力于和解，但构建排除种族问题的国家这一想法会受到其他更具体利益的挑战，这点很重要。

就非洲农业而言，其发展将面临矛盾的政策。重要的是，将维护欧洲人的利益作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对黑人地区的改善。以经费为例，非洲农业方面的开支在总开支中的比例，从 1966 至 1969 年的 2.8%下

① 参见 A. Selby, 'Commercial Farmers and the State: Interest Group Politics、and Land Reform in Zimbabwe'(D. Phil. thesis, Oxford University, 2006), pp. 75－124。

② K. Manungo, 'Collection, Manage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Oral Evidence from Zones of Conflict: A Post-mortem of the Liberation War in Concession and Chiweshe, North-eastern Zimbabwe', paper presented at T. O. Ranger's Valedictory Lectur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1999. 南部非洲一个关于解放运动的区域研究项目的调查结果显示，偏远地区的白人向游击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例如，在奇马尼马尼地区，特别提到一个名叫汉斯的白人农民向游击队员提供了帮助。

③ 这个发现同样在以下作者的作品中提及：D. Caute, *Under the Skin: The Death of White Rhodesia*(London: Allen Lane, 1983), pp. 229－384。

④ Sebly, 'Commercial Farmers and the State', p. 90.

降到 1975 至 1976 年的 1.2%。[①] 即使是非洲购买区(African Purchase Areas)的农民,他们从 1930 年代以来一直获得前任政府的支持,也开始从自己的土地外迁。[②] 在信贷措施分配方面,存在普遍歧视现象。例如,1977 年,6 000 名白人农民获得的信贷是 60 万名非洲购买区农民所获信贷的 100 倍;[③]而他们在部落信托土地(Tribal Trust Lands)方面的差异则更大。随着解放战争越演越烈,罗得西亚政府刻意阻碍小农经济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理由是不让农民生产过多的粮食,因为余粮可以提供给游击队。一些官员甚至建议并鼓励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农民种植经济作物,以此消除游击队跨境抢粮的可能性。

131

罗得西亚政府对某些非洲地区的发展充满兴趣,这反映出他们意识到,对非洲人进行有限度的剥削不会损害欧洲人的利益,实际上也不会破坏整个单方面宣布独立的计划。政府认识到完全忽视部落信托土地可能导致内暴(implosion),加剧社会的动荡,最终加剧就业市场中黑人与白人的竞争。同时,农村地区的生产将帮助整个国家实现经济自给自足。例如,1967 年,在非洲地区实行了 50 项灌溉计划,修建了 4.2 万公里公路和 10 座高等级大桥,5 000 名农民在高克韦(Gokwe)重新安置,奇桑班杰(Chisumbanje)成为部落信托土地开发的试点项目。[④] 此外,1968 年成立了部落信托土地发展公司(Tribal Trust L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TILCOR),这是一个法定的机构,旨在"促进边远地区融入国民经济,并创造就业机会。"[⑤]从 1972 年开始,部落信托土地发展公司引领着萨尼亚蒂(Sanyati)和赛琪(Seki)等地区的发

---

① A. Astrow, *Zimbabwe: A Revolution that Lost Its Way?* (London: Zed, 1983), p. 65.

② A. Shutt, ' "We are the Best Poor Farmers": Purchase Area Farmers and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in Southern Rhodesia, c, 1925 – 1980' (D.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5), pp. 190 – 237.

③ 同上,另见 S. S. Mushunj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redit Systems in Zimbabw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gricultural Finance Corporation, 1971 to 1986' (M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Zimbabwe, 1988)。

④ Kurebwa, 'The Politics of Multilateral Economic Sanctions ', p. 412.

⑤ 同上,p. 413。

展。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欧式农业获得发展,而其对手非洲农业则遭到系统性的破坏。

这些旨在改善非洲农村地区的措施,仅是抑制日益高涨的非洲民族主义措施的一部分。在单方面宣布独立时期,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利用传统统治者的策略。早在1950年代,殖民地的高层公务员曾建议通过"扩大"酋长的权力来应对非洲民族主义者的影响。[①] 根据建议,罗得西亚阵线政府开始象征性地提高酋长的权力。政府希望把"传统"领导人作为非洲人的合法代表推出,来反对民族主义者。[②] 但是,这项政策却产生了复杂的结果。

132

面对制裁的威胁,为了有效利用稀缺资源,罗得西亚经济开始实行集约化。大量的委员会纷纷成立,以协调不同经济部门间的事务,这包括工业关税委员会(Industrial Tariff Committee)主要负责关税变化的相关请求;国家促进出口委员会(NEPCO)处理相关出口事宜;而罗得西亚石油进口代理处(GENTA)则主要负责石油进出口事务。[③] 外币的管理主要由工商部的一个常设机构负责。国家也会直接参与到经济投资中。例如,政府将罗得西亚钢铁公司国有化,并投资了约6 000万兰特。[④] 同样,国家通过牛肉冷藏冷冻委员会(Cold Storage Commission)向屠宰场和肉类冷冻部门投资了3 000万兰特。

1965年以后,罗得西亚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国家的工业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起步,战后继续发展,

---

① A. K. H. Weinrich, *Chiefs and Councils in Rhodesia: The Transition from Patriarchal to Bureaucratic Power*(London: Heinemann, 1971), p. 20.

② 参见 P. S. Nyambara, 'Immigrants, "Traditional" Leaders and the Rhodesian State, 1963 - 1979', paper presen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History Seminar Series, University fo Zimbabwe, October 2000; Alexander, *The Unsettled Land*. Other efforts to 其他巩固酋长地位的努力包括通过诸如1967年部落信托土地法案等法律以稳步扩大酋长的权力。

③ C. Stoneman, 'The economy: An overview', in C. Stoneman (ed.), Zimbabwe's Inheritance(London: Macmillan, 1981).

④ 廉价钢铁是进口替代工业最重要的原材料,同时它可以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参见 Pangeti, 'The State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p. 175 - 177。

到 1953 年中部非洲联邦成立前夕，相较于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南罗得西亚拥有更好的工业基础。被制裁时期，政府更加致力于进口替代工业和现有工业的多元化。罗得西亚财政部长 J. J. 拉塞尔(J. J. Wrathall)阐述了政府委员会的相关政策。在 1967 年的经济政策蓝图中，他强调，“政府应加大工作力度支持制造业，重点扶持快速发展的行业，支持那些能促进进口替代的企业、为当地制造商提供原材料的企业及拥有良好出口前景的企业。”[①]这仅仅是更广的经济政策重新定位后的一部分，旨在减少罗得西亚对相关领域的依赖，首先是对农业部门尤其是对烟草的依赖，其次是对制成品外部资源的依赖。

在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初，这些目标大多得以实现。例如，制造业取得了显著增长，平均每年增长 12%，而这一时期制造业的固定资本完成了总额 524%的增长。1966 至 1974 年在多元化政策主导下，第二产业增加了 212%，其产量增长了 160%。此外，1969 年有超过 400 个新生产业。[②]

133

纵观整个单方面宣布独立时期，罗得西亚投入了大量精力来规避制裁。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罗得西亚建立了一些准国家机构来监督具体商品的出口。联合市场组织(Joint Marketing Organisation, JMO)就是其中之一，它主要通过烟草公司和津巴布韦环球出口公司(UNIVEX)两个分支机构来监管烟草以及铬、锂、铝等矿产品的出口。[③] 联合市场组织独立于政府运作，在经营活动中享有必要的自主权并可保有秘密。尽管成本很大，罗得西亚还是借助国际中间商。一些在罗得西亚开展经营的跨国公司也帮助其获得进口产品。最后，国家暂停了那些对抗衡制裁有所阻碍的地方法律，尤其是涉及跨境石油产品运输的法律。[④]

---

① 引自 A. Mseba, ‘Money and Finance in a Closed Economy: Rhodesia's Monetary Experience, 1965 – 1980’ (M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Zimbabwe, 2007), p. 52。

② Pangeti, ‘The State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 110.

③ Kurebwa, ‘The Politics of Multilateral Economic Sanctions ’, p. 365.

④ 同上，p. 399。

单方面宣布独立的政府顶住了制裁，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社会并未有效地实施其制裁承诺，尤其是在制裁初期。意识形态、政治及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使一些国家继续同罗得西亚阵线政府保持贸易关系。实施制裁三个月后，《纽约时报》评论道：

> 在联合国，大家似乎是一致支持英国……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对英国的支持远没有想象得那么强烈。一些工业化国家根本没有减少其与罗得西亚的贸易。英国人走后留下的贸易真空，很快由对罗得西亚进行过最严苛批评的国家来填补上了，其中包括一些非洲国家。①

很多"中立"国家如联邦德国、瑞士、中国、孟加拉国以及朝鲜并没有对罗得西亚实施制裁，而其他如丹麦和荷兰等国家则采取了不干涉政策。② 另外，政治对抗导致一些国家拒绝"帮助英国解决其所谓的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和西班牙，它们对英国干预突尼斯和直布罗陀表示不满，而这两个地方正是它们各自的利益区域。③ 因此，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主持通过了1968年第65－759号法令，列出93种法国产品免于制裁。法国继续以各种借口从罗得西亚进口烟草和铬铁。④ 罗得西亚拥有铬等战略性矿产这一事实对其非常有利。库拉布瓦指出，罗得西亚是高品质铬的主要产地。除共产主义阵营之外，其铬产量占全世界的14%。⑤ 罗得

134

---

① 引自 L. Kapungu, *The United Nations and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Rhodesia* (Lexington, Lexington Press, 1973), pp. 9－10。

② 同上，pp. 86－88。

③ 同上，例如，法国对英国继续向突尼斯武装提供支援表示愤怒，尽管有抱怨称这些支援会重新运输到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手中。

④ 同上，p. 88。

⑤ Kurebwa, 'The Politics of Multilateral Economic Sanctions', p. 314. 另外，南部非洲拥有除共产主义集团国家以外世界的97%铬储量，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冷战时期对这块区域一直保持着兴趣。

西亚在全球战略性矿产品销售链中的重要地位不减，这得益于美国通过的伯德修正案(Byrd Amendment)。无论制裁与否，修正案确保其仍然可以从南罗得西亚进口铬。[①] 既然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此类矿产品不受禁止，修正案解禁了任何从非社会主义国家进口至美国的战略性和紧缺性矿产品。[②]

南非和葡属莫桑比克也拒绝履行联合国支持的强制性制裁法案，为罗得西亚创造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生命线"。1970 年代前，这些国家以自己的名义颁发原产地证书，来掩饰罗得西亚的出口货物。莫桑比克走私罗得西亚烟草特别有名。[③] 潘格提(Pangeti)指出南非是"陷入困境的罗得西亚经济的生命线，是其财政投资的主要来源，是其初级产品和二次加工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是其大部分贸易运输的中转路线。"[④]明特(Minter)和施密特(Schmidt)进一步指出"没有南部非洲邻邦的全力支持，罗得西亚无法承受耗时如此之长的制裁。"[⑤]这种制裁下培育出来的情谊满足了三个南部非洲白人国家所需，因为他们要共同对抗席卷该地区的共产主义思潮。但是，乔治·贾迪姆(Jorge Jardim)表示经济方面的考虑也十分重要。例如，一旦罗得西亚通过莫桑比克铁路和港口的货物贩运被中断，莫桑比克的贸易经济将受严重影响：在那段时期，莫桑比克平均每年运送 400 万吨罗得西亚货物，获得 1 800 多万英镑的外汇收入。[⑥]

135

经济需求同样限制了马拉维、赞比亚和博茨瓦纳对罗得西亚实施全面的制裁。这三个国家长期依赖罗得西亚的制造商、能源、资本和铁

---

① Kurebwa, 'The Politics of Multilateral Economic Sanctions', p. 315.

② N. Chimhete, 'The Impact of UDI Sanctions on the Mining Industry in Rhodesia, 1965 – 1980' (BA (Hons)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Zimbabwe, 2001), p. 27.

③ 同上，p. 301。

④ Pangeti, 'The State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 109.

⑤ Minter and E. Schmidt, 'When sanctions worked', p. 228.

⑥ J. Jardim, *Sanctions Double Cross: Oil to Rhodesia* (Bulawayo: Books of Rhodesia, 1979), p. 14. A. de Roche, in his book, *Black, White and Chrome: The United States and Zimbabwe, 1953 – 1998* (Trenton, NJ, and Asmara: Africa World Press, 2001)，书中阐述了1970 年代经济利益是如何在决定美国对罗得西亚的政策中扮演影响深远的角色的。



图 4.3　示威者感谢南非的石油供应
（来源：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

路。1965 年，赞比亚采矿业 42%的能源需求和 95%的铁路运输都依靠罗得西亚。另外，其他部门 40%的能源需求靠罗得西亚支持，主要有万基煤矿（Wankie Colliery）的煤、乌姆塔利（Umtali）中部非洲炼油厂（Central African Petroleum Refinery）的石油、卡里巴大坝（Kariba Dam）提供的水电。[①] 同样，马拉维几乎完全依赖罗得西亚的制造商和投资，以及罗得西亚出产的肉类、肉制品、糖和煤；另外，有 30 多万马拉维移民劳工在罗得西亚工作。博茨瓦纳牛肉业同样依靠罗得西亚提供的铁路出口路线。马拉维和赞比亚告知联合国秘书长“只有在没有危及本国经济，也没有给国家经济增加负担的情况下，才会实施对罗得西亚的制裁。”[②]

但是，罗得西亚同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而与其开展贸易的国家的关系并不总是愉快的。一些国家和中间商同罗得西亚开展地下交易，由于罗得西亚急需外汇，这些国家和中间商就趁机低价收购罗得西亚的货物。在 1969 至 1980 年间，埃迪·克洛斯（Eddie Cross）是当时政府农业局的经济学家，他简洁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 罗得西亚受到制裁，南非人完全是唯利是图……他们从一开始就利用形势做交易。他们利用垄断控制我们的运输路线，并利

① Kapungu, *The United Nations and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Rhodesia*, pp. 94 – 95.

② 同上，p. 95。

> 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向我们出售富余的急需商品，这些产品因为制裁无法从国际市场买到。为期 14 年的制裁困境，我们并不亏欠南非人什么……他们在这期间大赚了一笔。①

因此应当牢记的是，制裁的破坏导致罗得西亚在商业上付出了代价，也影响到经济发展。

同大多数政策一起，罗得西亚阵线政府使用劳工法，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确保白人就业的稳定性。例如，禁止解雇欧洲工人，即使有些白人工人是多余的，工厂也只得被迫继续付工资。② 其他一些措施也陆续出台，用于限制非洲工人的职业培训，同时为白人预留工作也非常普遍。此外，非洲人想获得职位晋升也是困难重重，例如 1968 年的学徒训练和熟练技工发展法案（Apprenticeship Training and Skilled Manpower Development Act）强调，要求熟练技术的职位只能向那些已完成正式学徒培训或者已通过被认可的行业技能测试的人开放；虽然这些法案没有规定黑人不具备申请资格，但是这些先决条件已经让大部分黑人靠边站了。③

国家努力确保白人生活安逸，但这并不意味着白人工人总是与政府一条心。在单方面宣布独立时期，白人工会常常与政府和资方发生冲突，关键原因有两个：通货膨胀使工资更加不值钱，原先白人的工作有被分化和非洲化的趋势。④ 国家在维持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同时，还要确保维持半熟练和不熟练的白人的生活水平。事实证明，这种平衡是很

---

① 引自 Minter and E. Schmidt, ‘When sanctions worked’, p. 228。

② P. Sutcliff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hodesian sanctions’,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Political Studies*, 7 (July), 1979, p. 119; Stoneman, ‘The economy’, p. 155.

③ 关于这一时期更多劳工动态的情况，参见 B. Raftopoulos and I. Phimister (eds.), *Keep on Knocking: A History of the Labour Movement in Zimbabwe 1900 – 1997* (Harare: Baobab Books, 1997), p. 99, See also M. Majonga, ‘The Struggle Continues: African Trade Unions and Workers’ Responses in Rhodesia, 1965 – 1980’ (M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Zimbabwe, 1998)。

④ Godwin and I. Hancock, ‘*Rhodesians Never Die*’, p. 25.

137 难达到的，1968 年，罗得西亚铁路工人工会(Rhodesia Railway Workers Union, RRWU)和联合机械工程工会(Amalgamated Engineering Union, AEU)要求调整生活成本的罢工证实了这一点。这些工会成员被迫回去工作，而交通部长布拉加迪尔·邓禄普(Brigadier T. Dunlop)并没有完全答应他们的请求。[①] 在某些情况下，一些认为政府没有保护他们权益的白人工人成立了反对党。例如，1970 年，部分心怀不满的罗得西亚铁路工人工会和联合机械工程工会的成员成立了右翼共和党联盟(Republican Alliance)。[②]

通常情况下，劳资关系中的权力平衡更有利于雇主。[③] 政府对非洲工会的镇压激增，1973 年有 68 个工会的领导人被拘留。[④] 工人罢工被报道的次数不断下降，从 1965 年的 138 次下降到 1966 年的 57 次，而 1971 年只有 19 次。[⑤] 通常黑人工人面对政府镇压，而移民工人的处境则更加危险。例如，1965 年 4 月，史密斯发出警告，"如果英国政府的制裁行动使罗得西亚经济受创，哪怕是短时间受创，罗得西亚不可避免要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遣返来自赞比亚和马拉维的外国移民及其家人。"[⑥]这次警告在 1965 年付诸实施，那时候数千名来自赞比亚的移民工人被遣返回国。那些剩余的移民工人则被限制在罗得西亚东部地区工作。史密斯不仅向其邻邦施加压力，还在经济制裁的背景下，确保本地非洲人就业。1976 年，除了矿场和农场之外，外国移民工人被禁止在罗得西亚的其他任何地方工作。他们希望当地非洲人就业，并

---

① 邓禄普为自己辩护时，声称他绝不允许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使国家处于剑拔弩张状态，参见同上，pp. 23－25。

② 同上，p. 25。

③ 一些法律的执行例如 1960 年的法律和维护秩序法案(Law and Order Maintenance Act)及紧急权力法案(Emergency Powers Acts)加剧了局势的紧张，警方不断监视工会的活动。1967 年的工业调解修订法案(Industrial Conciliation Amendment Act)进一步限制了劳工的经营环境。

④ P. Bond, *Uneven Zimbabwe: A Study of Finance,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1998), p. 123.

⑤ 同上，p. 123.，See also Majonga, 'The Struggle Continues'。

⑥ Astrow, *Zimbabwe: A Revolution that Lost Its Way?*, p. 109.

希望在此过程中剥夺民族主义者招募工人的机会，因为政府中有人认为民族主义者可能会从未就业的非洲人群中招募新人。但是，政府绝不可能真正对外国非洲工人关闭边界，因为国内劳动力短缺，而且他们也受农业和矿业游说团体的影响。[①]

但是，在1970年代后期，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这种经济衰退的原因有好几个。随着冲突的升级，用于战争的花费上涨惊人，1979年的战争花费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40%。战争期间白人工人和移民被征召入伍，也导致了熟练工人的流失。为了资助石油和其他能使单方面宣告独立行动成功的关键物资，从1970年代中期起，政府大幅削减对非石油进口品的拨款，这也导致了罗得西亚日用品供应的短缺。[②] 此外，农业连年歉收，尤其是1972至1973年。1973年，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引发国际经济衰退，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因而减少；鉴于罗得西亚已经廉价销售了大部分商品来应对制裁的破坏，它的情况变得更加岌岌可危。[③] 斯通曼(Stoneman)认为对乡下人的歧视和黑人低水平的工资限制了国内市场的规模，导致了消费力不足的问题。[④] 史密斯的平叛策略并没有令形势有任何好转。例如，1973年他决定封锁同赞比亚的边界，由于赞比亚的铜矿改道坦桑尼亚出口，造成国家收入遭受相当大的损失。这也引起了罗得西亚最亲密的战友——南非和莫桑比克的愤怒，它们并不喜欢这种“不必要的”冲突升级。[⑤]

138

所有这些因素交织起来，影响巨大。从1974至1978年，制造业产量下降了27%，产能利用率下降了38%，同时丧失了大约5万个城市私营机构的就业机会，这些岗位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领域。即使是那些1965年以来自我感觉良好的政府官员在1976年也不得不承

① Strack, *Sanctons*, p. 204.

② 参见 Minter and E. Schmidt, ‘When sanctions worked’, p. 226。

③ 同上。

④ Stoneman, ‘The economy’, pp. 95 – 96.

⑤ M. Meredith, *The Past Is Another Country: Rhodesia UDI to Zimbabwe* (London: Pan Books, 1980), p. 113.

认，当时国内经济的基本形势是“经济受国际经济衰退、制裁以及反恐行动压力的影响”。[①] 此外，经济在昂贵的石油进口重压下挣扎。[②] 燃油不得不实行定量供应，通过发行配券来控制燃油购买。在矿业部门，由于国际价格偏低，出口收入不断减少，矿山开始出现流动资金困难[③]和运输瓶颈问题，因为这些因素对价值低、运量大的矿石品的影响特别大[④]；此外，还造成了熟练劳工的短缺。

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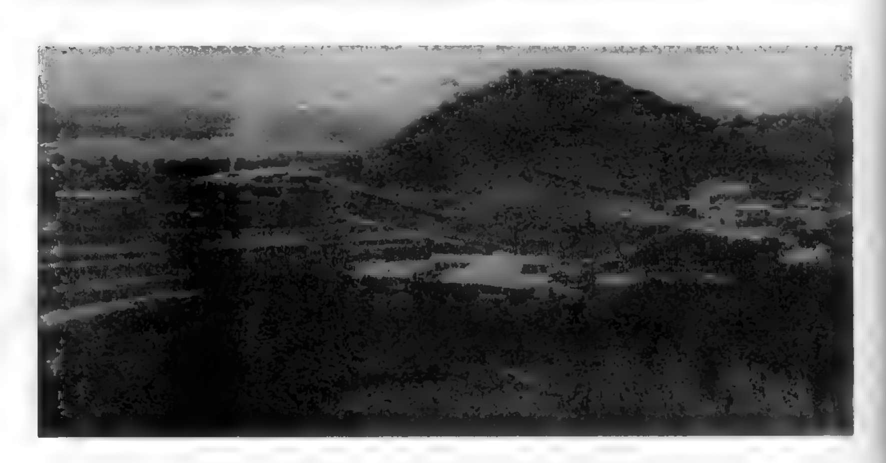


图 4.4　曼古拉矿山(Mangula Mine)，摄于 1974 年
（来源：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

在乡村地区，战争的升级也破坏了农民的生产方式，这不仅是由农民劳动力的短缺而引起的，也由于农民普遍缺少农作物的优良品种。[⑤] 种子短缺的问题有两种解释：首先，据报道，公路网因战争严重损坏，

① Rhodesia. Ministry of Finance, Economic Survey of Rhodesia, 1976 (Salisbury: Government Printers, 1977).

② Rhodesia. Ministry of Finance, Economic Survey of Rhodesia, 1979 (Salisbury: Government Printers, 1980).

③ 参见 B. Ngwenya, 'The Rise and Fall of Copper Mining at Mhangura, c. 1957 – 2000'(M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Zimbabwe, 2007)。

④ Rhodesia. Ministry of Finance, Economic Survey of Rhodesia, 1977 (Salisbury: Government Printers, 1978).

⑤ P. Makaye,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Matsai Communal Area before and after the Second Chimurenga'(M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Zimbabwe, 2000), p. 38.

"大量地雷导致道路无法通行"。[1] 因此,当地的贸易商发现从他们传统的贸易源头找到新的供应商越来越难。第二,游击队对食品和服装的索取增加,加重了当地商人的负担,导致资本的积累越来越难。

在北部和东部地区,当地政府制定了相应措施,将平民安置在"受保护村庄"里以进一步减少游击队的侵扰,但这反而使形势恶化。这项政策首先是要切断游击队的食物供应和其他重要生活必需品的来源。因此,正如迈克尔・布拉顿(Michael Bratton)指出,由于"国家在前线采取'焦土'政策,在重新安置时期,现有的村庄和庄稼要么被付诸一炬,要么被投毒,牛也被仓促卖掉。"[2]在评论洪代谷地"受保护村庄"里农民的生活状况时,施密特(Schmidt)认为这种强迫迁徙的非人性化做法,与政府想要赢得非洲农民民心的官方政策相违背。[3] 受保护村庄对村民实行宵禁,如果有人违反,他们常常会被杀死,而且隔离营的住所状况通常都很糟糕。农民放在外面的家当常常会被毁掉。为了限制游击队的粮食供应,政府每次供给每个家庭的粮食不到 7 公斤,同时出台了禁令,禁止携带粮食到田间地头。[4]

140

亚历山大等人提出,在 1970 年代后期,沙迦尼地区的罗得西亚武装力量很可能使用了化学和生物武器,而当时炭疽病菌曾被认为是用来"打击平民和游击队"的手段。[5] 炭疽病和其他动物疾病的爆发都可归结到生化战争以及战争导致的兽医服务短缺。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农民的损失都是巨大的。

结论

鉴于罗得西亚的历史背景及其种族群体的差异性,构建该国的国

---

① P. Makaye,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Matsai Communal Area before and after the Second Chimurenga'(M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Zimbabwe, 2000), p. 38.

② M. Bratton, 'Settler state, guerrilla war and rural underdevelopment in Rhodesia', Issue: A Journal of Opinion, 9(1/2), 1979, p. 61.

③ Schmid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Political Violence ', p. 254.

④ 同上,pp. 254－256。

⑤ Alexander, *et al.*, *Violence and Memory*, p. 145.

民意识必须明确：罗得西亚属于谁？谁属于罗得西亚？在形成国民身份的过程中，种族往往是最关键的因素。但是，它的重要性主要限于调动某些选民和划定排他界线，即定义谁不属于这个国家。在培养"国家"忠诚度和决定政治前景方面，种族问题并不像经济利益一样总是有影响力。例如，在单方面宣布独立时期，政治与经济的冲突开始凸显，白人社会中的部分群体，诸如白人农民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政治前景。

单方面宣布独立时期，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主要活动以确保白人的稳定为原则。国家力图促进农业多元化，制定措施规避制裁和重建财政体系。为此，在地区和国际政治局势的背景下，罗得西亚作为一个国家，其外交和经济政策服务于维持整个单方面宣布独立时期各项活动的正常进行。罗得西亚经济一直维持在平稳状态，直到 1970 年代中期多种危机一起将经济推向崩溃。总之，单方面宣布独立时期，非洲人在经济重组的进程中损失最惨重。虽然国家在特定的非洲人居住区采取了象征性措施促进生产，但是这对非洲人的需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整个社会的不平衡发展仍然根深蒂固。

第五章　罗得西亚战争
(1965－1980)

约瑟夫·梅提斯　穆亚茹帝兹·
恩雅库迪亚　泰瑞斯·巴恩斯

引言

141

在罗得西亚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罗得西亚阵线政府减缓白人对抗"变革之风"的尝试难上加难。但是，民族主义者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诸多压力下他们团结一致，却举步维艰。本章主要讨论国内战争/解放战争，分析罗得西亚内部和外部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同时考察罗得西亚各种力量是如何理解和诠释这种演变的。

日益升级的危机

1971年被认为是"罗得西亚白人命运顶峰"时期。[①] 这段时期，最主要的民族主义者领导人和工会成员不是被拘押或驱逐，就是被迫取消活动。1969年英国-罗得西亚协议签署，罗得西亚同英国多年的谈

---

① M. Meredith, *The Past Is Another Country: Rhodesia UDI to Zimbabwe* (London: PanBooks, 1980), p. 82.

判至此达到高潮，这项协议只是对多数统治作了极小让步，它仍然确保了白人的继续统治。[①] 在前线，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和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这两支军队深受后勤和组织问题牵绊，诸如糟糕、不协调的策略以及弹药短缺等困扰重重。尽管面临制裁，罗得西亚阵线坚持认为他们仍运筹帷幄，对局势操控自如。但是，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已经开始斗转星移。

形势的倒退影响了单方面宣布独立时期白人开展各项活动的信心。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标志是，日趋强大的反抗浪潮开始在白人统治的城市地区翻涌，农村地区不断升级的战争则与之遥相呼应。罗得西亚种族关系的一项重要的参照标准来自 1972 年成立的皮尔斯委员会，其成立目的是检验英国-罗得西亚协议的可接受性。在很大程度上，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反映了国家现有不同阶层和种族的分歧。一方面，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非洲人反对这项提案，其中包括采购区域的农民，他们饱受罗得西亚战线政府和民族主义者的排斥；即使是一些酋长也不支持这项提案，虽然政府在极力拉拢他们做其代理人。[②] 在城市地区，“对非洲人命运情绪上积累的愤懑、无奈和辛酸被压抑、酝酿了七年之久”，[③]皮尔斯委员会成立后，在索尔兹伯里、乌姆塔利和圭洛等城市发生了暴力示威活动，人们用这种方式来宣泄为时甚久的强烈情绪。皮尔斯委员会的成立见证了阿贝尔·穆佐雷瓦的崛起，他本是一名联合卫理公会主教，后来成为民族主义政治的领袖人物。在大多数民族主义者偃旗息鼓时，穆佐雷瓦率先发起运动，号召对皮尔斯委员会选举说“不”。[④]

142

---

① M. Meredith, *The Past Is Another Country: Rhodesia UDI to Zimbabwe* (London: PanBooks, 1980), p. 82.

② J. Alexander, *The Unsettled land: State Making and the Politics of Land in Zimbabwe* (Harare: Weaver Press; Oxford: James Currey, 2006), pp. 83 – 99, for more on state efforts to co-opt traditional leaders.

③ Meredith, *The Past Is Another Country*, p. 93.

④ 关于皮尔斯委员会的详细资料，参见 J. Todd, *The Right to Say No*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1972), and A. T. Muzorewa, *Rise Up and Walk: An Autobiography* (London: Evans Brothers, 1979)。

20世纪70年代早期,随着游击战愈演愈烈,对白人统治的反抗也渐趋军事化。大卫·科特宣称,在1967至1972年间,“游击活动造成许多白人死亡”。① 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发生改变。在1971年,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游击队开始渗入东北部的边境地区招募农民充当搬运工以协助他们藏匿武器。1972年12月,这些持久的努力和付出终于在阿尔特纳农场袭击战中得到了丰硕的回报。②

表5.1 罗得西亚政府估计的战争死亡人数(1973－1974)

	欧洲平民死亡人数	罗得西亚安全部队死亡人数	游击队死亡人数	非洲平民死亡人数
1973	12	44	179	52
1974	16	96	345	118

资料来源:Martin and Johnson, *The Struggle for Zimbabwe*, p. 145.

1972至1974年,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的武装部队同罗得西亚北部地区的农民建立联系,共同开展游击活动。同时,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在赞比亚也相当活跃。1971年该力量由于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领导人存在政治分歧,便在重组后形成了一个短期组织——津巴布韦解放阵线。

144

除了世界经济衰退和战争导致的经济困境外,罗得西亚阵线还遭到来自国内白人的反对和抵制,他们强烈批评政府种族和解政策中的种种失误。③ 影响白人忠诚度的更重要的因素源于稳步增长的欧洲移

① D. Caute, *Under the Skin: The Death of White Rhodesi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Allen Lane, 1983), p. 40.

② P. Godwin and I. Hancock, '*Rhodesians Never Die*': *The Impact of War and Political Change on White Rhodesia*, *c. 1970 - 1980* (Harare: Baobab Books, 1995), pp. 85－86, and D. Martin and P. Johnson, *The Struggle for Zimbabwe* (*Harare: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 *1981*), pp. 1－3, 73－74.

③ 许多个人对此表达了批评,包括主教拉蒙特(Bishop Lamont)、朱迪(Judith)和加尔菲德·托德(Garfield Todd)、艾伦·萨沃里(Allan Savory)和山姆·帕特里尔(Sam Putterill),生活在农村社区的一些群众也逐渐开始反对罗得西亚阵线的政治策略。

143



图 5.1　对皮尔斯委员会说“不”(资料来源：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

图 5.2　布拉瓦约的工人要求政治协商(资料来源：标准报)

民以及战争给这些移民带来的负面影响。[1] 这些移民大多是专业人士及无家庭、无财务负担的罗得西亚年轻一代。 144

军事力量的发展从来不是罗得西亚的内部事务。直到1975年，葡属莫桑比克，尤其是南非，对罗得西亚政治和经济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德西亚依旧能获得来自美国等国的货物供应，包括原材料，这些供应秘密地绕过联合国的制裁。罗得西亚军队也欣喜地接收白人雇佣兵加入其队伍。为了声援非洲民族主义者，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国也都为民族主义武装部队提供支持，并强化其与非洲人、第三世界和当时以欧洲为基地的反殖民民族运动力量之间的联系。最后，罗得西亚的冲突成为全球冷战的一部分。当时苏联等国支持上述两支游击武装部队，而美国及其盟友则是罗得西亚白人和南非的后盾，他们将其作为反共产主义的战略性堡垒和资源基地。

1975年莫桑比克的独立给罗得西亚各方面都带来了极大影响。首先，莫桑比克实施联合国的制裁，除了关闭边境，还没收了所有罗得西亚人的财物和资产；因此，罗得西亚大量的铁路运输车辆都被扣押在莫桑比克。而这也意味着罗得西亚80%的对外贸易需要改道南非。这种额外的路程不仅增加进口成本，而且减少出口收益，使本已严峻的外汇短缺局势雪上加霜。这种困难也加剧了南非本已严重的铁路和港口拥堵状况。从政治层面来讲，莫桑比克的独立发挥了两大重要的影响：首先，这意味着长达764英里的边境线对游击队的袭击开放；[2]其次，这也意味着史密斯失去了一个关键盟友，他意识到现在不得不更加依赖南非，按约翰·沃斯特(John Worster)总统的意志行事，而沃斯特“很快抓住了莫桑比克独立带来的各种好处”。[3] 145

和史密斯差不多，民族主义者阵营同样面临难题，尤其是政党内部

---

① 有数据显示，1973年9月移民的数量减少了118个，“这是1966年以来第一次移民数量减少”。参见 Godwin and Hancock, '*Rhodesians Never Die*', pp. 137－138。

② Meredith, *The Past Is Another Country*, p. 150.

③ A. De Roche, Black, *White and Chrome: The United States and Zimbabwe, 1953－1998*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2001), p. 204.

以及各党派之间的权力争夺战越演越烈。例如，在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中，一部分被拘留者一直对恩达巴宁齐·希托莱(Ndabaningi Sithole)的总统位置虎视眈眈，他们任命罗伯特·穆加贝为该党的新领导人。[①] 同时，军方和政治领导人之间也意见不合，各政治领导人按自身的年龄、教育程度、意识形态甚至个人出身等排资论辈。[②]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内部分歧由上而下蔓延到普通士兵中间。1974 年 12 月的恩哈瑞暴乱(Nhari Rebellion)即是明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游击队指控约西亚·通戈加拉(Josia Tongogara)领导的最高指挥部在提供弹药、食品和衣物方面重视不够、能力不行，但该指挥部成员仍在卢萨卡过着奢华的日子。[③]

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独立标志着罗得西亚与其邻邦的关系迈入了一个新时代。至于南非，沃斯特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早日解决罗得西亚危机是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的当务之急。之后，沃斯特的主要策略转为与南部非洲的黑人统治国家改善关系。肯尼思·卡翁达同样希望危机能够尽快解决，以便将赞比亚的注意力转回到自己国内亟待解决的问题。[④]

这种利益并存促使局势在 1974 年末进入了"缓和"时期。卡翁达和沃斯特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他们一手促成史密斯和非洲民族主义者协商化解矛盾。但在该地区的左派力量被认为对西方利益造成了威胁。左派力量联系着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与莫桑比克、安哥拉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有联系。因此，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承诺解决罗得西亚危机，并希望以此赢得非洲国

---

① Martin and Johnson, The Struggle for Zimbabwe, p. 202, and F. Chung, *Re-living the Second Chimurenga: Memories from Zimbabwe's Struggle* (Harare: Weaver Press, 2007), pp. 114 – 115.

② E. Sibanda, *The 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 1961 – 1987: A Political History of Insurgency in Southern Rhodesia*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2005), p. 167.

③ 下文"解开斗争之结"这部分通过考察种族、意识形态和阶级等其他因素，试图揭开民族主义运动内部的冲突。

④ Sibanda, *The 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 p. 207.

家的支持,[①]但德罗氏(De Roche)认为基辛格的政策是企图“消除潜在的战场”,避免发生类似安哥拉军事介入失败的尴尬。[②] 南非被迫撤出大部分援助罗得西亚武装力量的人员。其他微妙的压力表现在迫使已经规划好的南非铁路延期完工,而这对罗得西亚的进口和出口影响颇大。

如果迫使史密斯参加谈判是和解这枚硬币的一个面,那么把民族主义各党派拉到同一张谈判桌上则是另一面。1975 年后,前线国家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将各种民族主义政党团结在一起。[③] 但由于紧张的种族关系和权利纷争,团结大业并非易事,所以,将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津巴布韦解放阵线和阿贝尔·穆佐雷瓦(Abel Muzorewa)领导的[④]非洲人全国委员会联合在一起的计划迅速夭折。到 1975 年,因为穆佐雷瓦和恩科莫为了争夺领导席位相互倾轧,这个综合性的联盟陷入瘫痪状态。[⑤] 无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还是津巴布韦人民联盟都不承认穆佐雷瓦,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⑥] 非洲人全国委员会随后做了另一项努力,1975 年 9 月,它倡议联合各政党成立津巴布韦解放委员会(ZLC),成员组成包括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津巴布韦解放阵线和非洲人全国委员会。[⑦]

---

① De Roche, *Black, White and Chrome*, p. 210.

② 同上。有关在安哥拉军事介入的详细内容,请参见 J. Hanlon, *Beggar Your Neighbours: Apartheid Power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Cathol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6)。

③ 前线国家包括赞比亚、博茨瓦纳、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

④ 阿贝尔·穆佐雷瓦是联合卫理公会的主教,在民族主义者反抗皮尔斯委员会时期其地位被凸显。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都承认他为“黑人利益的代言人”。参见 Chung, *re-living The Second Chimurenga*. p. 97。

⑤ N. Bhebe, *Simon Vengayi Muzenda and the Struggle for and Liberation of Zimbabwe* (Gweru, Mambo Press, 2004), p. 170. 穆佐雷瓦(Muzorewa)在马普托(Maputo)驱逐了约书亚·恩科莫(Joshua Nkomo)并掌控了该党的外部势力,而恩科莫在 1975 年 9 月的哈拉雷会议中掌控了该党的内部势力。

⑥ J. Nkomo, *The Story of My Life* (Harare: SAPES Books, 2001), p. 155.

⑦ E. Mnangagwa, ‘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s army: ZIPA’, in C. Banana (ed.), *Turmoil and Tenacity* (Harare: College Press, 1989), pp. 146 - 149.

前线国家的领导人认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与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矛盾是实现民族和解的巨大障碍，因为每个政党都不断想方设法控制对方。争取"说服"民族主义者团结一致的胁迫手段包括将其驱离赞比亚领土、切断弹药补给等。[①] 其结果是1975年11月成立了受马克思主义思想鼓舞的津巴布韦人民军。这项尝试将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和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两支军队联合起来。[②] 津巴布韦人民军时期亦同样是年轻游击队员们表达"纯粹主义"愿望的时期，他们渴望在思想上更加贴近实际的斗争方式。[③] 这些愿望被写进了"穆嘎高宣言"(Mgagao Declaration)，呈交给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宣言建议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和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合二为一。但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内部的"保守势力"都对新的组织形式持怀疑态度。最后，津巴布韦人民军内部的年轻领导人被资深民族主义者清除。但是，正如大卫·摩尔(David Moor)所言，津巴布韦人民军"确保津巴布韦解放斗争的精神财富饱含强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涵"。[④]

非洲民族国家独立的长久压力促使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与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在1976年10月形成联合阵线(而不是合并)，称为"爱国阵线"。但两者依然存在分歧。例如，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公开表达了对"和解"的不满，它认为和解是剥夺即将来临的军事胜利果实的安排。[⑤] 大多数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对卡翁达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卡翁达想要构建在恩科莫领导下的联合非洲

---

① Bhebe, *Simon Vengayi Muzenda*, p. 196.

② 对津巴布韦人民军成立背景的深入分析，参见 D. B. Moore, 'The Contradictory Construction of Hegemony in Zimbabwe: Politics, Ideology and Class in the Formation of a New African State'(D. Phil. thesis, York University, 1990), ch. 5。

③ W. Z. Sadomba, 'War Veterans in Zimbabwe's Land Occupations: Complexities of a Liberation Movement in an African Post-Colonial Settler Society'(D. Phil. thesis, Wageningen University, 2008), pp. 41 – 49.

④ Moore, 'The Contradictory Construction of Hegemony in Zimbabwe', p. 310.

⑤ 1973年以来，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自身的军事优势非常明显。参见 Bhebe, *Simon Vengayi Muzenda*, p. 168, and Chung, *re-living The Second Chimurenga*. p. 87。

阵线。

然而,"和解"时期的各种努力均未获成功。除了非洲民族主义者内部意见不一之外,史密斯对非洲人提出的多数统治持反对意见。在筹备宪法大会的会谈中,他继续向其选民承诺不会偏离或者降低罗得西亚的文明标准。[①] 他坚持既不会接受政府中的种族平等,也不会在五年内实现多数的统治。作为替代,他委婉地抛出"负责任的多数统治"的选择,意思是多种族的国家构建要缓慢开展,白人依然保持主导地位。随后的会谈中充斥着指控和辩驳,协商毫无诚意,1975 年 8 月的维多利亚瀑布会议最终以失败收场。[②]

和解期间非洲民族主义者阵营中暴露出来的团结危机并未消退。1975 年 10 月,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游击队宣布西索尔、穆佐雷瓦和契克雷马领导解放运动全都"没有希望,完全不称职"。[③] 史密斯提防着迫近罗得西亚的各种压力,他寻求与非洲民族主义者谈判。这一人选得是他眼里的"温和派",并且为大多数非洲人所接受。他最终锁定乔舒亚·恩科莫。在卡翁达的协助下,他同恩科莫在卢萨卡举行秘密会谈。[④] 史密斯的政治目标是权力分享安排,让白人占领导地位。恩科莫接受这一安排加深了民族主义者之间本已存在的不信任。大多数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人认为卡翁达选择恩科莫作为津巴布韦独立后的首位领袖已成事实,他们认为之前的秘密会谈目的就是推恩科莫上台掌权。但是,就像维多利亚瀑布会谈那样,史密斯同恩科莫的谈判因为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中断: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多数的统治。

尽管基辛格的战略性目标告吹,但是他第一次成功地促使史密斯

---

① Meredith, *The Past Is Another Country*, p. 163.

② Martin and Johnson, *The Struggle for Zimbabwe*, pp. 158 - 165, and Meredith, *The Past Is Another Country*, p. 194.

③ Meredith, *The Past Is Another Country*; p. 202.

④ 同上,pp. 196 - 215,这里有关于 1974 年 11 月至 1976 年 3 月期间史密斯和恩科莫之间的关系,以及卡翁达扮演的角色的详细资料。

接受了多数统治的想法。1976 年，日内瓦会议上他再次就此事积极斡旋，这表明在解决南罗得西亚问题时要让英国更多地参与，但也导致民族主义者和前线国家领导人对基辛格安排的不满。同以前的和解谈判一样，日内瓦会议强调了各种民族主义者阵营不同的利益诉求。由恩科莫、穆加贝、穆佐雷瓦和西索尔率领的四个民族主义代表团带着共同的目的与会：将权力移交给黑人政府。除此之外，他们对采用的策略存在巨大分歧。① 民族主义者内部的不和谐也造成谈判意见分歧。例如，穆佐雷瓦特别在意如何破坏爱国阵线的政治主导权，他要求英国高级专员在过渡期起更大作用，要求立即将游击队编入国家正规军。② 面对这些压力，日内瓦会谈最终破裂，并以失败告终。

149

同时，战争升级加速。在战争最后阶段，血腥暴力尤为突出。罗得西亚分别在 1976 年和 1977 年袭击了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在莫桑比克恩亚迪祖尼亚(Nyadzonia)和希莫尤(Chimoio)的营地，1978 年袭击了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在赞比亚姆库希(Nkusi)的训练营和佛利敦(Freedom)营地。这些或许是罗得西亚政府发动的最恶劣、最肆虐的战争范例。塞卢斯侦察队渗入莫桑比克，负责屠杀在恩亚迪祖尼亚的 600 名难民。1977 年 11 月 23 日，同样在莫桑比克：

> 飞机开始在希莫尤附近的学校上空投掷凝固汽油弹和破裂弹。一些老师和学生顷刻间倒在血泊中。轰炸之后，伞兵马上降落。他们尾随逃跑的孩子和老师朝着医院奔去。在医院，他们碰到了护士、患者和伤员，这些没来得及逃跑的人都被残忍杀害。经过一整天的大屠杀后伞兵们才扬长而去。在他们身后躺着 85 具尸体，其中 55 名是孩子。大多数被杀死的成年人是妇女，因为教师和护士大多是妇女……在汽油弹和炮火中受伤的超过 500 人，

① Meredith, *The Past Is Another Country*, pp. 277–278.
② 同上。

其中 200 人受重伤。[1]

钟恩(Chung)认为这些袭击主要针对难民营,是阻止前线国家进一步支持解放运动的一种手段。[2]

同样,在战争最后阶段,罗得西亚农村也同样遭到不断升级的暴力冲击。民族主义者军队"通过袭击孤立农庄中的白人农民,在敌军经过的道路上埋设地雷,攻击社区站和警察局等殖民权力中心,炸毁铁路和桥梁以及伏击敌人的车队等手段侵扰敌人。"[3]

罗得西亚军队在战争期间的活动,除了与游击队交火,还包括强迫农村居民迁离自己的村庄,[4]焚烧他们的家园,殴打、肆意逮捕和对其使用酷刑等。塞卢斯侦察队发起了臭名昭著的活动,他们以平叛为名,秘密向游击队的食物、饮用水源和平民的衣服中投放毒药,向牲畜投放炭疽菌等。[5] 农民们还饱受罗得西亚平民志愿军施加的暴行,这些人往往很少受军队纪律规范,有时候甚至更加狂野,随便发动暴力活动。例如,当被问及到马塔贝莱兰辖区安全助理问题时,一个被访问者回忆道:

150

> 他们不只焚烧房屋,"如果你企图把财产拿出屋外,他们会把这些东西拿走烧掉";他们不只杀害有嫌疑的人,"他们屠杀一切,杀死所有的驴、山羊,甚至是鸡。"殴打是家常便饭,甚至常常走向极端——他们想要获取有关游击队员下落的信息,或者只是怀疑

---

① Chung, *Re-living the Second Chimurenga*, p. 144.

② 同上,p. 277。

③ N. Bhe, *ZAPU and ZANU Guerrilla Warfare and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Zimbabwe*(Gweru: Mambo Press, 1999) p. 65.

④ H. I. Schmid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Political Violence in Zimbabwe', 1890－1990: A Case Study of the Honde Valley'(D. Phil. thesis, Oxford University, 1966),洪代谷地的农民被暴力迁徙到所谓的保护村庄。

⑤ J. Alexander, J. McGregor and T. Ranger, Violence and Memory: One Hundred Years in the 'Dark Forests' of Matabeleland (Harare: Weaver Press; Oxford: James Currey, 2000), pp. 144－145; L. White, 'Poisoned uniforms, poisoned food and anthrax: OR, How guerrillas die in war', Osiris, 19, 2004.

> 某间房子曾经住过游击队员。"辖区安全助理最为邪恶,他们在公共场所殴打民众甚至把人打死。不管他们在哪里发现了嫌疑犯——商店、学校或钻井中——他们会把所有人都叫来观看。"[①]

罗得西亚武装力量在最后阶段施加种种暴行,以此来吓阻农村民众支援游击队,就像让"鱼儿离开其赖以生存的水"。

解开斗争之结

库珀曾告诫在殖民时代后期要防止出现政治单一化的风险:

> 阅读1945至1960年的历史总会使人兴趣盎然(罗得西亚则是1965至1980年),因为民族主义必将取得最后胜利;殖民地内正在发生的一次次社会运动都很引人入胜,无论它们由农民、妇女、工人或者宗教团体来发动,这些分散的运动共同缔造了一个新生的国家。这种阅读所缺失的是殖民地不同群体实现具体目标所采用的方法,利用和反对惯常所使用的方法,以及新旧结构冲突带来的利益。不管这些努力是否符合民族主义政党构建反殖民联盟的要求,它都需要进行调查而非仅靠假设。[②]

151

因此,除了武装斗争,还有很多涉及性别、阶级、民族和种族等问题的复杂斗争在逐渐展开;[③]在殖民后期许多斗争继续影响着罗得西亚的

---

① Alexander *et al.*, pp. 152 - 153.

② F. Cooper, 'The dialectics of decolonization: Nationalism and labor movements in post-war French Africa', in F. Cooper and A. Stoler (eds.), *Tensions of economic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 406.

③ 很多学者研究这一主题,例如: M. Sithole, *Struggles with the Struggle* (Harare: Rujeko Publisher, 1999); W. Z. Sadomba, 'Movements with the Movement: Complexities of Zimbabwe's Land Occupation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Economic History Department, Seminar Series, November 2007; N. Kriger, 'The Zimbabwean war of liberation: Struggles with the struggle',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4(2), 1988.

发展。

在非洲人追求公民权的过程中,有些诉求只顾自己、忽略他人利益。根据马赛普拉·西索尔的观点,"民族、阶级等社会因素是那些政治竞争者在权力斗争中所使用的资源"。① 这种权力斗争是产生解放"运动"诸多矛盾的根源。在权力斗争中,敌对双方通常过分寻求和夸大彼此间的种族差异,以此来争取民众对自己的支持。

1963 年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关系开始破裂,这是它们彼此冲突的最好例证。学者一直对分裂存在争论。一些学者解释分裂时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他们认为恩科莫在对民族主义斗争中表现得优柔寡断。② 另一些学者认为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内部的种族斗争导致了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形成。③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领导人解散了津巴布韦解放阵线,这一行为被形容为"一个有亲戚裙带关系的团体……注定要破坏解放战争"。④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本身也难免受种族政治影响。1975 年发生在赞比亚的赫伯特·契特波(Herbert Chitepo)暗杀行动之后,这种紧张状态达到高潮。玛尼卡人指控卡兰加人为了掌控该党的外部势力而策划了此次暗杀。⑤ 同样的种族紧张态势也困扰着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其在1971 年的危机被归咎于两个泽祖鲁领导人,即意图控制该党的乔治·尼

152

① M. Sithole, 'Class and factionalism in the Zimbabwean nationalist movement', *African Studies Review*, 27(1), 1984, p. 122. 把一切归结为权力斗争太简单化了,Sithole认为要解释这段时期的冲突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② Martin and Johnson, *The Struggle for Zimbabwe*, pp. 139 - 142; Bhebe, *Simon Vengayi Muzenda*, pp. 131 - 136; Sitthole, *Struggle within the Struggle*, pp. 35 - 43; N. Shamuyarira, *Crisis in Rhodesia* (New York: Transatlantic Arts, 1966), pp. 173 - 192.

③ Sibanda, The 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 p. 90, and J. Nkomo, *The Story of My Life*, pp. 117 - 120. 他们都表达了对恩科莫领导的不满,认为本来绍纳族人多势众可以控制解放运动,而恩科莫搞乱了权利格局。

④ Cited in Sithole, *Struggle within the Struggle*, p. 120.

⑤ Sithole, *Struggle within the Struggle*, see also L. White, *The Assassination of Hebert Chitepo: Texts and Politics in Zimbabw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6.

亚多罗(George Nyandoro)和詹姆斯·奇科罗马(James Chikerema)。[①] 种族问题还导致了津巴布韦解放委员会的解散。这些差异经常使不同武装部队爆发冲突,甚至在赞比亚的军事基地也是如此。例如,在赞比亚的姆博罗马,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津巴布韦解放阵线武装人员各自反目成仇。[②]

个性、意识形态和种族冲突充斥着整个解放部队。民族主义者之间也出现了阶级矛盾,加剧了现有的分歧。阶级冲突是恩哈瑞暴乱背后的因素之一,这次暴乱是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在赞比亚的高级指挥部成员与一群年轻的自由主义战士之间的对抗。后者坚持认为那些领导人过着舒适的生活,而"战士们在前线却面临食物、弹药和衣服短缺等问题"。[③] 萨杜巴(Sadoba)认为奇特波时期和津巴布韦人民军[④]时期招募的新兵之间差异明显。[⑤] 总体而言,前者"受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是文盲";而后者是城市市民或者学生,他们中很多人是受斗争思想的鼓舞而参加战争。[⑥] 在津巴布韦人民军时期招募的新兵大多是"乘火车来参军的人"或者"听了收音机广播后选择当兵的人"。[⑦]

153 研究者们注意到一个特别现象: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津巴布

---

① Sithole, *Struggle within the Struggle*, pp. 43 – 57.

② Bhebe, *Simon Vengayi Muzenda*, p. 163. Sadomba 也提到了齐苏如(Tsuro)的活动,他是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安全与情报机关的成员,他在种族立场上以迫害其他游击队员而臭名昭著。参见 Sadomba, 'War Veterans in Zimbabwe's Land Occupations', p. 49。

③ Sadomba, 'War Veterans in Zimbabwe's Land Occupations', pp. 37 – 38. 萨杜巴(Sadomba)观察到在津巴布韦殖民后时期,战争退伍军人的分化与他们被招募进来的那个时代有关系。以津巴布韦解放者论坛这一分裂群体的形成为例,他提出该群体的很多领导人来自前津巴布韦人民军。他指出解放战士之间的不同之处"某种程度上,仍然对当前的政治起作用,也可以解释错综复杂的土地运动以及政府快速土地改革"。

④ 萨杜巴将 1963 至 1975 年称为奇特波(Chitepo)时期是因为"奇特波在津巴布韦解放战争中最初阶段的核心领导地位";1975 年 4 月至 1977 年 1 月津巴布韦解放军开始发挥作用,因此称之为津巴布韦解放军时期;参见 Sadomba, 'War Veterans in Zimbabwe's Land Occupations', pp. 34、41。

⑤ 同上,p. 38。

⑥ 同上,p. 49。

⑦ 同上。有意思的是,这里提到的分裂在 1997 年后战争退伍军人占领土地运动中显示出来。

韦非洲人民联盟都对党内精英予以镇压。镇压的方式通常是逮捕，关在“地下牢房”里鞭打，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处死。在1971年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危机中，年轻的支持者遭到“极端残忍”的纪律处罚。[①] 平息1974年恩哈瑞暴乱被视为在战争期间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人对反对者无情报复最显著的例子之一。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处死了托马斯·恩哈瑞和达卡瑞·巴得扎以及那些支持叛乱的人，并缺席判处很多其他支持者死刑。[②] 同样，在1970年代中期，一群自称瓦沙第(意为“工人”)的群体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责领导人的资产阶级倾向。结果他们被关押在地牢里，直到国家独立后才获释。[③]

民族主义者内部的不和谐可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来诠释，即非洲群体不但在自然属性上具有异质性，而且个体加入武装斗争的动机也不尽相同。一些人加入进来是为了把他们自己从被剥削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是受到土地分配问题的驱动。[④] 1980年代一位以前的战斗队员在采访中谈道：

> 我亲身经历了自己的家庭从最肥沃的黑德兰兹地区(Headlands)被迫迁移到贫瘠的岩石地区。曾经我有过这种感觉(虽然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我们为什么要到这样的地方呢？所以，在开始从津巴布韦撤离时，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迁往莫桑比克，我想：“好吧，如果这意味着什么，那么当我们加入战争，当我们回来同当权者们展开战斗时，一切会重新开始，我想我们会有机会回到那片肥沃的土地，我们会越来越好。”于是，我直接离开了办公室，带上钥匙，踏上行程。[⑤]

---

① Moore, ‘The Contradictory Construction of Hegemony in Zimbabwe’, p. 203.

② White, The Assassination of Chitepo, p. 40. 据信有超过250多人被处死。

③ Bhebe, *Simon Vengayi Muzenda*, pp. 212－214; see also Chung, *Re-living the Second Chimurenga*. 关于被镇压的叛军的镇压和独裁方式，参见 Sithole, *Struggles within the Struggle*.

④ J. Nhongo-Simbanegavi, *For Better or Worse? Women and ZANLA in Zimbabwe's Liberation Struggle* (Harare: Weaver Press, 2000) pp. 17－18，土地分配问题的斗争成为民族主义运动反抗白人统治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

⑤ Interview between ‘F. N’ and Teresa Barnes, quoted in Teresa Barnes, ‘The heros’ struggle: Life after the liberation war for four ex-combatants’, in N. O. Ranger (eds.), *Soldies in Zimbabwe's Liberation War* (Harar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s, 1995), pp. 120－121.

154 其他一些原因包括医疗设施的不足、失业以及城市住房短缺等。[1]

尽管有以上原因,他们的参战动机并不像民族主义史学家宣称的那样,是整齐划一式的"英雄"行为。许多人加入战争是各种"推力和拉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恩胡戈-辛巴耐加维(Nhongo-Simbanegavi)认为,对许多妇女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在一些不幸发生之后(如离婚),加入战争可以让她们重新开始生活;而很多男女青年是为了在意外怀孕的情况下摆脱做父母的责任。[2] 还有一些人为了躲避债务而跨越边界加入到战争中。一些人因为个人问题自愿选择逃离,而另一些人则是被迫的。图噶米瑞(Tungamirai)是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的一名指挥官,他承认,在战争初期招募的士兵并不都是自愿的。强征入伍是很常见的行为,尤其在学校里。[3] 对探险和猎奇的追求也促使一些人决意加入战争。"加入"战争的动机并非一成不变。那些"逃离"国内问题的人同样可以为民族主义斗争贡献力量。同时,那些对殖民压迫义愤填膺而参战的人也容易感到理想破灭。

战争期间游击队与农民之间关系的话题现在仍然存在争论。民族主义历史倾向于以"快乐的"方式来描述战争。这些历史强调年轻男孩与女孩之间的合作,他们为游击队充当眼线、刺探情报、搬运物资;强调社区民众是如何乐于冒着生命危险,向游击队提供食物、避难所和其他支持。[4] 但是,另一些研究显示,游击队对农民的暴力胁迫是为了获取

---

① J. Tungamirai, 'Recruitment to ZANLA: Building up a war machine', in Bhebe and Ranger(eds.), *Soldiers in Zimbabwe's Liberation War*, pp. 37–40.

② Nhongo-Simbanegavi, *For Better or Worse?* pp. 32–33.

③ Tungamirai, '*recruitment to ZANLA*', pp. 40–41.

④ 关于这一部分的研究包括 T. O. Ranger, *Peasant Consciousness and Guerrilla War in Zimbabwe: A Comparative Study*(London: James Currey, 1985),这些都显示游击队的指导思想在调动农民方面是有效的。K. D. Manungo, 'The Role the Peasants Played in the Zimbabwe War of Liberation,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Chiweshe District' (D. Phil. thesis, Ohio University, 1991),强调农民自愿加入援助游击队的行列,在游击队动员农民支持的过程中有更多强制性因素。有关回顾民族主义者斗争的文学作品,参见 B. Raftopoulos, 'Problematising nationalism in Zimbabwe: A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 *Zambezia*, 26(2), 1999, pp. 115–134。

155

物资支持和性服务，这绝非鲜见。例如，克瑞格(Krige)认为，游击队建立“解放区”的任务失败意味着运用武力强迫招募士兵和动员群众是不可避免的。[①] 玛辛盖泽(Mashingaidze)关于布赫拉地区(Buhera District)的研究也发现游击队对农民使用暴力。[②] 亚历山大等人指出，在尚噶尼地区存在一些游击队员虐待、强奸妇女的现象，尽管他们认为游击队会对违纪者采取严厉的惩罚，这种行为不太会发生。[③] 坦亚·里昂(Tanya Lyons)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游击队对平民的侵害“在论及战争时被刻意回避”，但是这种行为在小说作品中常有揭露。[④] 事实上，一些研究表明，在冲突的最后阶段，战争变得更加残酷，游击队变得更加冲动。[⑤] 例如，施密德特(Schmidt)曾记录“1976 年 12 月 19 日洪代谷地的游击队杀害了 27 名平民”。[⑥]

很明显，不管是否使用了强制手段，游击队与农民之间的“合作”是确保武装斗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这可以避免斗争的定义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打仗”层面，局限于某些特殊群体，而将大多数人排除在外，因为许多普通百姓并没有“跨越边界”或者“拿起武器”，但是他们对国家的解放斗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更广阔的定义包含了民族主义斗争的哲学，即在斗争中认识到“群众”的重要性，恰

---

① Kriger, 'The Zimbabwe war of liberation', p. 306.

② T. M. Mashingaidze, 'The Dynamics of Zimbabwe's Struggle for Liberation: The case of Buhera District from 1950 to 1990'(M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Zimbabwe, 2001).

③ Alexander *et al.*, *Violence and Memory*, pp. 162－164.

④ T. Lyons, *Guns and Guerilla Girls: Women in the Zimbabwe Liberation Struggle*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2004), p. 146.

⑤ See, for example, T. Ranger, 'Bandits and guerrillas: The case of Zimbabwe', in D. Crummey (ed.), *Banditry, Rebellion and Social Protest in Africa* (London: James Currey, 1986), pp. 386－390, and J. Frederikse, *None but Ourselves: Masses vs Media in the Making of Zimbabwe* (Harare: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 1982), pp. 299－318.

⑥ Schmid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Political Violence in Zimbabwe', pp. 243－244. 另见 Caute, *Under the Skin*. 在阿伯福伊尔(Aberfoyle)有 27 个人被杀害，因为他们无视游击队的警告，继续为白人种植园工作。在解放战争中，游击队通常认为白人种植园产生的资本被罗得西亚政府用于战争，因此必须破坏它们。但是，在这起事件和其他许多类似事件中，游击队和罗得西亚武装力量互相指控对方应对屠杀平民承担责任。

当地领会到了毛泽东关于“军民鱼水情”的比喻。

很明显，将人民群众与自由战士联合反抗罗得西亚武装部队的统一战线描绘成美好的画面很容易误导人。事实上，“水”的颜色和密度并不总是一样，流向也并不总是一致。除了个人利益、贪婪、嫉妒、世仇、纷争，甚至是为了生存糊口，农民常常将交战双方“彼此出卖”。亚历山大等人引用了卢潘(Lupane)一个叫杰里·穆洛特施瓦(Jeli Mhlotshwa)的话，他指出：

156

> 如果你不说一些可以让人接受的话，那么双方都会攻击你。在我们中间，我们会互相出卖——当地人会向辖区安全助理报告[①]，连小孩子都是这样。这真是罪过啊！[②]



图 5.3　一位所谓的背叛者展示他被游击队殴打的伤势

洪代谷地，1976 年

（来源：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

① 这是非洲的准军事军队，从农村地区公务员的孩子中招募，有时候是强制招募征招，他们的任务是在地区行政长官和正规军周边的农村地区协助管理和维持治安，他们被认为比正规军更加残暴。

② Alexander *et al.*, *Violence and Memory*, p. 152.

乡下的大户富裕家庭通常更容易遭到攻击。[①] 一个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领导说道,"如果你恨你的叔叔,这会成为指控你的理由,说你是'背叛者'或'巫婆',然后把你除掉。"[②]战争期间这些在任何地方,如马塔贝莱兰地区都是事实。当然,也有真正的背叛者和那些被视为巫婆的人;这些人会受到惩罚,通常会被判处死刑。处理背叛者被视为游击队在战争期间的必要行动,而惩罚巫婆是游击队"与邪恶作斗争"的合法化活动。[③]

农村地区围绕酋长政治地位的争夺也日益激烈。民族主义武装力量和罗得西亚阵线政府都试图拉拢传统酋长领导人站在他们的一边。但是增加薪酬的"胡萝卜"并不起效,于是便动用"大棒"。在被拘留期间,相当数量的酋长发现自己被指控向游击队提供支持。并不只有罗得西亚阵线政府使用武力。那些被认为向政府提供支持的酋长也被游击队杀害。[④] 某种程度上,农村地区权力的天平从传统酋长倒向游击队;前者与罗得西亚阵线政府有联系,后者则受到巫师的佐助。[⑤]

战争也是宗教方面的竞逐。图噶米瑞认为,传统宗教在促使农村地区群众与游击队建立亲密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⑥] 钟恩(Chung)也持同样观点,他指出巫师是如何"在自由战士的心灵中占据特殊位置

① 同上,p. 153。N. Kriger, *Zimbabwe's Guerrilla War: Peasant Voices* (Harare: Baobab Books, 1995), pp. 208－209.

② Quoted in Alexander *et al.*, *Violence and Memory*, p. 173.

③ D. Lan, *Guns and Rain: Guerrillas and Spirit Mediums in Zimbabwe* (Harare: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 1985), p. 36. Alexander *et al.*,但是,有观点认为,在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控制的区域,经常会出现女巫,革命军不鼓励对被认为是女巫的人采取行动,因为这并不符合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的策略,有失去组织支持的风险。

④ T. Ranger, 'Tradition and travesty: Chief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in Makoni district, Zimbabwe, 1960－1980', *Africa*, 52(3), 1982, pp. 20－41.

⑤ Lan, *Guns and Rain*,该书描写了丹德(Dande)地区巫师的作用,他们利用魔力把游击队和土地联结起来,但是他们在推广降低酋长的合法性时犯了错误;参见 T. Ranger and G. Ncube, 'Religion in the guerrilla war', in N. Bhebe and T. Ranger (eds.), *Society in Zimbabwe's Liberation War* (Harar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 London: James Currey, 1996), p. 45。

⑥ Tungamirai, 'Recruitment to ZANLA', p. 41.

的”。[1] 但是这也随时间和空间的更替而改变。在 1970 年代中期，当时津巴布韦人民军在前线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通常对宗教唯恐避之不及。[2] 然而，津巴布韦人民军的短暂存在也意味着传统宗教仍然在招募士兵和动员群众这两个战争的主要方面发挥显著作用。

在罗得西亚，游击队和基督教会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马克拉夫林(McLaughlin)指出游击队和阿维拉传教团(Avila Mission)之间有合作，这与鲍迪伦(Bourdillion)和冈达尼(Gundani)对罗得西亚西南地区的研究发现形成对照。[3] 他们两人认为游击队信奉“反宗教世俗主义”，这导致在他们的活动区域几乎所有的传教站都被关闭，他们推断到 1979 年几乎所有传教活动都销声匿迹了。[4] 但是游击队对基督教会的态度则大有改观。麦克斯韦(Maxwell)指出，夜间政治聚会的歌曲[5]通常由教会音乐改编而成，而有些聚会有祈祷内容。[6] 然而，尽管一些传教士试图与游击队建立密切联系，但在战争期间仍有许多传教士被游击队杀害。[7] 孤立的乡村学校和传教站里的传教士常常发现自己处于左右受敌的危险境地，可能受到政府士兵和游击队的双重

① Chung, *Re-living the Second Chimurenga*, p. 197.

② J. McLaughlin, ‘Avila Mission: A turning point in church relations with the state and with the liberation forces’, in Bhebe and Ranger (eds.), *Society in Zimbabwe's Liberation War*, p. 92.

③ J. McLaughlin, *On the Frontline: Catholic Missions in Zimbabwe's Liberation War* (Harare: Baobab Books, 1996), pp. 108 - 144. M. Bourdillon and P. Gundani, ‘Rural Christians and the Zimbabwe liberation war’, in C. Hallencreutz and A. Moyo (eds.), *Church and State in Zimbabwe* (Gweru: Mambo Press, 1988).

④ Bourdillon and Gundani, ‘Rural Christians’, p. 52.

⑤ Pungwes 是指“晚上的政治集会”，参见 Tungamirai, ‘Recruitment to ZANLA’, p. 42.

⑥ D. J. Maxwell, ‘Christianity and the war of liberation in eastern Zimbabwe: The case of Elim Misson’, in Bhebe and Ranger(eds.), *Society in Zimbabwe's Liberation War*, pp. 74 - 75.

⑦ 关于凶手的身份，直到现在仍然有争论，一些人指责是塞卢斯侦察队，另一些人则认为是游击队；参见 Ian Linden,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struggle for Zimbabwe’, in Bhebe and Ranger(eds.), *Society in Zimbabwe's War*; Martin and Johnson, *The Struggle for Zimbabwe*.

攻击。也许最恐怖的例子当属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1978年对伊利姆布道团(Elim Mission)的袭击。该布道团是乌姆巴地区东部的新教基地。

> 一支约20至30人的游击队来到学校……他们闯入学校的商店，将许多食物和新衣服分发给了学校的孩子……然后他们开始围捕传教士。第二天早晨，人们在操场发现了这些传教士的尸体……①

1980年2月末，贝雷杰纳布道会(Berejena Mission)的一名天主教牧师，基利安·厄塞(Kilian Heusser)，也被一群据称是伪装成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的游击队士兵杀害，教堂建筑同样惨遭破坏。② 但是，教会对游击队的态度从早期的公开敌对转变为1970年代的全力支持。许多传教士，包括主教多纳尔·拉蒙特(Donal Lamont)，由于支持民族主义事业而被驱逐出境。③

159

民族主义军队一个重要特征是他们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黑人妇女。妇女加入战争这个话题在史学界和主流文化圈都有激烈争论。④ 普遍认同的说法是，非洲妇女想要为独立斗争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而赢得了男同胞一种新的尊重。一个女游击队员写道：

> (我)想解放国家，因为我们受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一些工作只有白人才能得到。我加入战争时只有18岁。我没听说过单方面独立的情况……因为那时候自己太年轻了。我们想解放津巴布

---

① Maxwell, 'Christianity and the war in eastern Zimbabwe', p. 69.

② Frederikse, *None but Ourselves*, pp. 299－318.

③ 关于主教多纳尔·拉蒙特如何被罗得西亚政府迫害的细节，参见McLaughlin, 'Avila Mission', p. 98。

④ T. Barnes, '*Flame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armed struggle in Zimbabwe*', in Richard Mendelsohn and Vivian Bickford-Smith(eds.), *Black and White in Colour: African History on Screen*(London: James Currey, 2007).

> 韦。如果你是男孩子，你可以来解放津巴布韦。如果你是女孩子，你也可以来解放津巴布韦。[1]

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的2万名游击队员中有10%是妇女，她们编成一个旅，“有自己的工程师、通讯官、其他支援机构和女性指挥官”。[2]据估计，接受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武装部队训练并参加战斗的妇女达1 000至2 000人。难民营接纳了许多其他的妇女，在国内有数千名支持游击队的妇女。[3]

民族主义者正式提倡男女平等；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喉舌“津巴布韦人民之音”的一篇报道指出：

> 妇女的解放是必然的，并不是慈善行为。妇女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们的斗争是整个社会进步斗争的一部分。妇女应当与男同胞分享相同的权利。如果没有妇女的有效参与，就没有社会的进步。现在妇女应当全身心地将自己投身到革命中去。只有这样团结一致地参与，津巴布韦妇女才能从男同胞那里赢得自信。[4]

但是，反抗殖民和种族压迫往往也伴随着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克瑞格指出，一些妇女利用游击队员的身份介入家庭冲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游击队不再对此类埋怨感兴趣，[5]显然他们认识到在社会中疏远男人是多么愚蠢的想法。恩胡戈-辛巴耐加维（Nhongo-Simbanegavi）揭穿了民族主义政党传播的“神话”，一些女权主义学者

160

① Lyons, *Guns and Guerilla Girls*, p. 108.

② J. Brickhill, 'Daring to storm the heavens: The military strategy of ZAPU, 1976–1979', in Bhebe and Ranger(eds.), *Soldiers in Zimbabwe's Liberation War*, pp. 65–66.

③ Lyons, *Guns and Guerilla Girls*, pp. 159–160.

④ Cited in ibid., pp. 45–46.

⑤ Kriger, *Zimbabwe's Guerrilla War*, pp. 179–195.

认为战争有“解放”妇女的作用。[①] 恩胡戈指出，妇女参军通常是待在后方，在那里她们承担了厨师、护士、护工和搬运工的职责。路易丝·怀特(Luise White)也记下了一些女同志在训练营里的抱怨，“男同志不太愿意教我们用枪”。[②] 对这种抱怨的回复通常是，“枪并不是你用来炫耀的道具，更不用说以它来证明你与男同志能平起平坐了”。[③]

性别斗争也在军营上演。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女游击队员和普通妇女在战争期间遭受了性侵。[④] 例如，钟恩指出，恩哈瑞暴乱吸引了大批妇女加入，她们想借机结束被军事指挥官们虐待的命运。[⑤]

对性别角色不断增加的关注并不仅局限于非洲人。白人妇女同样参与到战争中，但是里昂斯(Lyons)认为，白人妇女并没有获得新的地位，她们的作用就是支援军队。她认为，这会强化现有的性别身份和不平等性。一份杂志对白人妇女的经历做了如下描述：

> 她们是世界上典型的前线群体，罗得西亚妇女在面对恐怖行动和制裁期间的经济困境中显示了强大的勇气和忍耐力。她们经受住了干旱、恐惧、家园遭武装袭击，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恐怖分子地雷炸飞的风险，但她们像以前一样能干而又迷人。[⑥]

但是里昂斯意识到战争并没有给白人妇女带来多大程度的解放，她们仍局限于家庭主妇的角色。随着男人被号召奋起战斗，妇女接受培训学习自卫方法，比如如何用枪。她指出，这对妇女的看法是一种挑战，因为通常认为她们是“家庭主妇”，擅长“抚养”孩子，而不是像男人一样去战斗。[⑦]

---

① Nhongo-Simbanegavi, *For Better or Worse?*, pp. 1－11.

② White, *The Assassination of Hebert Chitepo*, p. 21.

③ 同上。

④ 同上，p. 63; see also Chung, *Re-living the Second Chimurenga*, p. 126。

⑤ Chung, *Re-living the Second Chimurenga*, p. 127.

⑥ Focus on Rhodesia, 1977, quoted in Lyons, *Guns and Guerilla Girls*, p. 131.

⑦ Lyons, *Guns and Guerilla Girls*, p. 35.



图 5.4 被遗弃在受保护村庄的人们
洪代谷地，1977 年
（来源：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

战争同样加剧了农村地区代际关系的紧张。例如，年轻男女信使(mujibhas and chimbwidos)指挥与游击队的交往，因此他们的权力大大超过了其长辈。于是他们就面临危险，长辈会告诉游击队说他们是“叛徒”，如果他们敢对抗长辈的权威，甚至会向罗得西亚安全部队报告说他们“通敌”。① 例如，在受保护的农村，人们每次离开或进入村庄都要接受年轻武装卫兵的搜身。② 但是，当他们对妇女搜身时，卫兵“确信他们摸到了每一个部位……包括胸部”，而那些妇女的丈夫只能在一旁无助地观看。③ 这种行为并不限于那些在受保护村庄执行日常保卫的士兵。在恩卡伊和卢帕，年长的男人们发现游击队员是“极大的隐患”，一位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领导人后来回忆道，“年轻的游击

① M. Kesby, ‘Arenas for control, terrains of gender contestation: Guerrilla struggle and 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 in Zimbabwe, 1972 - 1980’,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22(4), 1996, p. 570.

② M. Nyakudya, ‘War, Protected Village, Enviriomental Degradation and Social History in Chiweshe, 1972 - 2005’,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ew Dimensions in History, Seminar Series, History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Zimbabwe, March 2007.

③ Kesby, ‘Arenas for control’, p. 527.

队员很难控制。他们要向女孩子求婚，但是我们劝告他们，'这不是你在这里的目的。'"①

这是谈判的氛围?

到了1970年代末，战争成本大增，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人力资源耗费都飞涨。财政开支每天高达50万英镑。② 白人需要缴纳更高的税，用于支付45%的防务预算增长。出差和移民迁离补贴均被削减。这种不断恶化的困境导致了外迁移民率迅速攀升。在1976年，

> 数月来外迁人数大约在40人左右，但到了4月猛增到817人，这是1964年以来单月最多外迁人数……5月和9月期间平均每月外迁771人，这也反映了糟糕的治安状况……③

这也影响到政府的兵源。史密斯政府开始时的征兵对象为所有38岁以下的健康白人男子。之后扩大范围，将18至35岁的非洲男性包括在内，尤其以大学生为主要征兵群体。④ 尽管罗得西亚阵线政府做了种种努力，仍控制不了局势；国内行政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农村地区数百所学校、诊所和医院被迫关门。

民族主义军队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损失惨重。游击队首先面临后勤供应短缺的问题；随着数千名高中生和大学生涌入在赞比亚、博茨瓦纳、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的征兵营地，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和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的医药、衣服、甚至食物均告急。1970年代末期游击队的伤亡人数在不断增加，这有部分原因是后勤物资短缺，也有士兵缺少训练的原因。

爱国阵线在赢取战争胜利的过程中有重大进展，这一事实让他们

---

① Alexander *et al.*, *Violence and Memory*, p. 164.

② Meredith, *The Past Is Another Country*, p. 305.

③ Godwin and Hancock, 'Rhodesians Never Die', p. 163.

④ Meredith, *The Past Is Another Country*, p. 239.

认为有必要进行政治改组。随着国际压力不断增加,史密斯尝试建立一个国际社会认可的政府。1978年的《内部和解》实现了这一愿望,史密斯、穆佐雷瓦、希托莱和齐劳(Chirau)酋长组成了联合政府。穆佐雷瓦和希托莱至少在一件事情上与史密斯达成了共识,即他们都对爱国阵线不满,尤其是爱国阵线有非洲统一组织的公开支持。[①] 这两个被放逐的领导人符合史密斯推选非洲领导人的标准:都不想讨论军队问题,因此他们没有安全威胁,他们也都想不顾一切地把踩在爱国阵线脚下的政治地毯拉出来。齐劳是效忠于史密斯的非洲酋长,他被史密斯拉进来,制造白人政权得到传统权威支持的假象。新的国名是津巴布韦-罗得西亚,给人的印象是和解宣告了种族合作新时代的到来。

163

这种和解是交战双方不断重新定位的实证,这也是该时期的特点。该时期政治和解的细节清晰地传达了这一事实:史密斯既不会投降也不会放弃白人更优越的信念。白人的财产权利仍然是神圣的,同时司法、公共服务、军队和警察仍然掌控在白人手中。白人也被赋予拥有双重国籍的权利。宪法规定继续确保白人在国会中的特权,允许白人单独选举20个席位,另有8个席位由普选产生;剩余的72个席位由黑人拥有,他们主要来自3名非洲领导人的政党。[②]

为了促使以上协议生效,3名非洲领导人展开竞选角逐。穆佐雷瓦赢得64个席位,大举领先获胜;希托莱和齐劳分别赢得了14个和6个席位。钟恩和梅雷迪思都认为,尽管爱国阵线发动了抵制运动,大部分人仍参加投票,只有约180万选民没有参加选举,这意味着普通民众厌倦了战争,想要回到正常的生活中。[③] 另一方面,德罗氏认为,安全部队以及穆佐雷瓦和希托莱民兵的恐吓,加上史密斯鼓励选举,这些都影响了参选人数。[④] 但是,一系列因素导致的这种和解变得软弱无力。第一,战争仍然在持续,因为爱国阵线并未参与和解安排。第二,它并

① Nkomo, *The Story of My Life*, p. 193.

② Chung, *Re-living the Second Chimurenga*, p. 231.

③ 同上,p. 233; Meredith, *The Past Is Another Country*, p. 364.

④ De Roche, *Black, White and Chrome*, p. 274.

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①] 第三,因为史密斯仍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使和解在民众中的支持率大幅削弱。[②] 然而,政府内部高级官员的辞职很快让史密斯对权力的操控变得岌岌可危。辞职的官员包括内务部联合部长罗洛·海曼、约翰·希克曼将军等人,这些都清晰地表明罗得西亚政权的终结之时即将来临。[③]

1978年之后无疑是解放战争最残酷的时期。政府迫切要求停火,而游击队则继续进行他们认为合法的战争,对抗"出卖"他们的和解安排,农民在此期间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尽管穆佐雷瓦和希托莱的民兵互相攻击的情况也不少见,但他们站在政府立场抗击爱国阵线。新政府深受持续战争和经济崩溃困扰,穆佐雷瓦在竞选活动中的大部分承诺都化为泡影。长达30年的制裁累积的影响变得更加显著:基本商品和燃料急缺;由于零部件短缺,制造业和矿业开工率极低;1978至1979年度农作物普遍歉收。[④] 164

由于游击队使用的武器越来越先进,战争依然肆虐。1978年9月,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游击队利用苏式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准备开往卡里巴(Kariba)的罗得西亚民用飞机。机上54名乘客只有18人幸免于难,但是其中14人随后被游击队枪杀。[⑤] 1979年另一架飞机也被击落,54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⑥] 1978年12月,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专门从事破坏的部队炸毁了索尔兹伯里南部工业区的罗得西亚战略石油储备罐。大火延续一周,远在120公里外的地区都能看见。

---

① Meredith, *The Past Is Another Country*, pp. 365-367.

② 同上,pp. 336-338。司法联合部长拜伦·霍弗(Byron Hove)被控对新的穆佐雷瓦-史密斯政权下的白人种族占主导地位发表颠覆性言论而遭罢免。穆佐雷瓦对此反应不冷不热,他无力追求非洲人利益的一面暴露无遗。

③ 参见 Godwin and Hancock, '*Rhodesians Never Die*', p. 238. and Chung, *Re-living the Second Chimurenga*, p. 240。

④ Godwin and Hancock, '*Rhodesians Never Die*', p. 224.

⑤ Caute, *Under the Skin*, p. 274.

⑥ 同上,p. 310。

这些事件无不表明，一直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白人公民空间实际上完全在游击队武装力量的打击范围内，这也标志着"白色罗得西亚"的末日开始了。正如埃勒特(Ellert)所描述的 1979 年战争那样：

> 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组织了各自的作战部队，在长期没有有效控制的农村地区公开阅兵，展示其军事力量。1979 年兰开斯特大厦制宪会议召开前夕，安全部队待在防雷车上，白天由重兵护送。晚上农村的营地通常很容易受到迫击炮和小型武器的袭击。[1]

165 此时恰逢 1979 年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在卢萨卡召开，非洲国家重申现在是英国承担解决罗得西亚危机责任的时刻。英国受到来自尼日利亚的外交压力。尼日利亚是英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它威胁将阻止英国在尼日利亚投资直到罗得西亚危机得到解决。[2]

1979 年的兰开斯特大厦会议由新上任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主持，会上这些压力达到高峰。穆加贝和恩科莫率领的爱国阵线代表团、包括希托莱和史密斯在内的穆佐雷瓦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会议的召开是几股势力逐渐厌倦战争的结果。例如，赞比亚和莫桑比克急切盼望结束战争，因为战争导致这两个国家生灵涂炭、经济紊乱。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也厌倦了战争。游击队的后勤供应变得非常紧张。在罗得西亚内部，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政治，都面临严重困难。

在兰开斯特大厦会议和解中最显著的共识是，少数白人被允许在国会 100 个席位中保持 20 席，为期至少 7 年。[3] 新政府承担 20 亿美元的债务，同意对所有罗得西亚公务人员发放养老金，甚至那些外迁的移

---

① H. Ellert, *The Rhodesian Front War: Counter-insurgency and Guerrilla Warfare, 1962–1980*(Gweru: Mambo Press, 1989), p. 7.

② Bhebe, *Simon Vengayi Muzenda*, p. 228.

③ Chung, *Re-living the Second Chimurenga*, p. 246.

民也包括在内。解放部队在整合后加入正规军队。交战各方同意停火,在3个月内重新举行选举,从而产生津巴布韦独立后的新领导人。[1] 各方未达成一致的主要分歧是土地问题。爱国阵线希望政府能够允许征用那些未使用的白人商业土地,重新安置很多渴求土地的黑人。但是,兰开斯特大厦会议强调,土地不能被没收,只可以在自愿买卖的基础上进行交易。[2] 但是,这种安排超越了新国家的财政承受能力。[3] 随着英国和美国答应购买和开发白人所拥有的土地,未解决的土地问题暂时搁置下来,但是两国并没有透露会拿出来多少资金进行补偿。

在卡翁达总统和梅切尔总统的压力下,[4]爱国阵线被迫同意这种不完整的和解,这被乔舒亚·恩科莫描述为“糊里糊涂妥协的结果,为了停止流血冲突而仓促达成的和解”。[5] 一个评论员形容协议给了非洲人“驾驶员的座位,而白人继续指引着行车路线,控制着所需的燃料”。[6] 这种匆匆“解决”问题的方式为殖民后时代的斗争埋下了伏笔。 166

随着新宪法准备就绪,停火安排落实,独立后的津巴布韦开始了新国家领导人的首次选举。爱国阵线组建以来的各派联盟解体了;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分别成为单独的政党: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以及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在选举中,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赢得了57个多数席位,恩科莫领导的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赢得了30个席位,而穆佐雷瓦领导的非洲人全国委员会仅获得3个席

---

① Sibanda, *The 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 p. 218.

② S. Moyo, 'The Land Question', in I. Mandaza (ed.), Zimbabw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1980－1986 (Dakar: Codesria, 1987), p. 172.

③ Nkomo, *The Story of My Life*, p. 202. 更多关于兰开斯特大厦会议土地问题的讨论,参见 S. Moyo, *The Land Question in Zimbabwe* (Harare: SAPES Books, 1995).

④ Sibanda, The 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 p. 218.

⑤ Nkomo, *The Story of My Life*, p. 204.

⑥ Quoted in C. Sylvester, Zimbabwe: A Terrain of Contradictory Developmen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p. 55.

位，远远落后排在第三。除了一个席位外，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其他所有席位都来自马塔贝莱兰省，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所有席位都在马绍纳兰省赢得，这也预示着在独立后会出现的凶兆。[1] 这些事件在 1980 年 4 月 18 日的独立庆典中达到高潮，罗伯特·穆加贝出任津巴布韦独立后的首位总理。

① Sibanda, *The 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 p. 222.

第六章　从繁荣到危机 (1980 — 1997)

詹姆斯·穆祖恩迪亚(James Muzondidya)

引言

167

围绕津巴布韦后殖民历史这个话题历来众说纷纭。本章就将考察津巴布韦1980年代早期出现的经济繁荣和政治和解,古库拉洪迪时期的统一矛盾,以及1990年代末席卷全国的大型危机等问题,并以1980年之后津巴布韦的国家重构与重组、统治与国家政权建设进程、土地等资源公平分配、后殖民时期国家意识和公民身份等论争为主题展开叙述。本章将首先关注津巴布韦独立后第一个十年内的政治经济,然后回顾1990年代经济困难背景下国家、政治和社会性质的变迁。

国家与民族的政治经济重组

独立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一个民族、阶级、种族、性别和地域分裂的社会进行国家建设。其他挑战包括战后的一系列重建:殖民地政治经济的重整,尤其是种族失衡问题的解决,以及专制殖民政权及其机构的民主化等。

政府开始实施战后重建规划,旨在进行资产重组,将津巴布韦国家

经济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为了匡正旧殖民秩序遗留下来的一些不平等问题，政府尝试扩大经济规模，通过黑人经济振兴政策、公共服务非洲化和促进黑人中产阶级发展等举措来整合黑人力量，促使他们更广泛地参与经济活动。[①] 为了满足黑人普遍的愿望和需求，以及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津巴布韦政府针对农民大量拥挤在公共区域的状况，实施逐步重新分配土地项目，试图以此解决偏远地区的贫困问题，以及黑人和白人因土地所有权纷争引发的种族不平等问题。政府同时尝试通过主动定价、提高市场服务质量、信贷投入等方式保护偏远地区农民的权利。仅在独立后的几年时间里，偏远地区农产品产量就得到提高，公共区域的农民成为玉米和棉花的最大供应商。[②]

168

在当地社区和外国捐赠者的帮助下，尤其是来自北欧国家的帮助，政府在那些以前被殖民地国家忽视的地区扩大了健康和教育设施建设。在与城市相比相对落后的农村公有土地上修建了公路、学校、诊所、钻井以及卫生设施等。在国家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末，正如阿洛伊斯·姆兰博所指出的，政府在扩大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③] 例如，在教育部门，小学的入学人数从 1979 年的 8.2 万人上升到 1985 年的 2 216 878 人，同期中学入学人数从 6.6 万上升到 48.2 万。在 1980 至 1990 年之间，小学和中学的入学率增幅高达 80%，从 3 358人上升到了 6 024 人。[④]

---

① I. Kaplan, 'Zimbabwe: Ethnicity and race', *Chapter2B: Countries of the World*, 1991. http: //www. fb10. uni-bremen. de/anglistik/kerkhoff/AfricanLit/MiniLectures/ZimbaGeneral. htm; B. Raftopoulos, *Zimbabwe: Race and Nationalism in a Post-colonial State*(Harare: SAPES Books, 1996.)

② 参见 C. Mumbengegwi,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nd agricultural performance', in C. Mumbengegwi (ed.), Macroeconomic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ies in Zimbabwe (London: Macmillan, 2002), p. 240; A. S. Mlambo,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 The Case of Zimbabwe, 1990 – 1995* (Harar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s, 1997), p. 4; S. Moyo, *Land Reform under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Zimbabwe: Land Use Change in Mashonaland East Province* (Uppsala: Nordic Africa Institute, 2000). p. 24。

③ Mlambo,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 pp. viii, 55 – 82.

④ 同上，p. 59。

政府还努力加大对农村家庭饮水与卫生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取得了不菲成绩。截至 1988 年,政府向 84％的国民提供安全饮用水,这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救助基金会的一致赞赏。① 同时,政府在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方面也有所作为:政府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引入集体谈判机制,帮助提高工人的谈判能力,要求公司改善员工及其家庭的生活和工作条件。②

总体而言,政府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方面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取得了显著成就。独立后的两年时间里津巴布韦经济快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达 12％,外部融资从 1.57 亿津元(合当时的 1.57 亿美元)飙升至 1982 年的 5.33 亿津元,这对政府建设基础设施、创造就业机会、发展教育和医疗多元化等发挥了巨大的助推作用。③

但是,独立后第一个十年取得的成就也是有限的,其本质仍是一种难以为继的社会福利权宜之计。在 1980 年代,津巴布韦持续面临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利益重新分配后的诸多挑战,尤其是来自土地和经济。学界一系列著作都曾就此做过研讨。④ 独立后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并没有持续太久。在整个 1980 年代,津巴布韦经济命运坎坷,遭遇了干旱、贸易疲软、高利率和高油价等带来的负面冲击。这给国家财

---

① M. Musemwa, 'The Politics of Water in Zimbabwe, 1980－2007', Semina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frican Studies Centre, Leiden University, 19 June 2008, p. 6.

② 'Liberation and opposition in Zimbabwe', in H. Melber(ed.), *Limits to Liber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The Unfinished Busines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Cape Town: HSRC Press, 2003), p. 30; G. Kanyenz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Zimbabwean economy, 1980－2000', in S. Darnolf and L. Laakso (eds.), *Twenty Years of Independence in Zimbabwe: From Liberation to Authoritarianism*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③ 参见 M. Burdette and R. J. Davies, 'The Zimbabwe economy: Prognostications and realities after six years', *Zambezia*, 14(1), 1987, p. 79; Mlambo,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 pp. 40－41。

④ S. Moy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d acquisition and redistribution in Zimbabwe, 1990－1999',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26 (1), 2000; I. Mandaza (ed.) *Zimbabw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1980－1986* (Dakar: Codesria, 1986); C. Stoneman (ed.), *Zimbabwe's Prospects: Issues of Race, Class, State and Capital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Macmillan, 1988).

政支持各种项目实施的能力带来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1983至1984年之间,政府受到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施加的种种压力,一些社会政策因而未能实施。

在1980年代,就业振兴工作日渐式微,失业率大幅上涨。一些评论家将此类问题归结为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1982至1990年,年均GDP增长率为1.2%,但人口平均增长率却达3.3%。[①]独立后第一个十年里,年均新增就业岗位仅为1万个,既赶不上人口增长的幅度,也满足不了数目庞大的毕业生的就业需求(在1980年代中期大约有10万名毕业生)。[②]

同时,第一个十年取得的成果也面临分配不均的难题。乡村和城市地区的精英团体,包括富农、商人和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他们从那些旨在为黑人开放国家、资本积累的政策中牟取到诸多好处。[③] 因此,政府并没有实现明显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的目标:据统计,1980年代,只占人口总数3%的大多数白人农民和小部分黑人中产阶级仍旧拥有大量资源,掌控着三分之二的国民收入。[④]

政府发展偏远地区的政策,尤其是对农民的扶持措施,并未有效改变偏远地区的经济面貌,数以百万的农村居民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在公共领域,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家庭长期无地可耕。由于1982至1983年,以及1984至1985年发生了干旱灾害,农业用地愈发紧缺,政府也相应减少了奖励计划,这些都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又回到了自给农业中。[⑤]

---

① 参见 C. Stoneman, 'The economy: Recognising the reality', in Stoneman (ed.) *Zimbabwe's Prospects*, pp. 47–48; Dansereau, 'Liberation and opposition in Zimbabwe', p. 27。

② F. Chung, 'Education: Revolution or reform', in Stoneman (ed.), *Zimbabwe's Prospects*, pp. 129–130.

③ Mandaza(ed.) *Zimbabw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Stoneman(ed.), *Zimbabwe's Prospects*.

④ See Stoneman, 'The economy', pp. 51–52.

⑤ L. Cliffe, 'The prospects of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Zimbabwe', in Stoneman (ed.), *Zimbabwe's Prospects*, pp. 309–325.

在城市领域,政府发展计划中城市发展往往处于边缘化的地位,[①]1980年代中期,城市工人开始面临日益恶化的交通、住房短缺问题。在殖民时期,乡镇中为非洲工人修建的、不合标准的房子和旅馆开始人满为患、不堪重负,这些从未解决的难题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末期,那时候许多来自偏远地区的非洲人由于战事扩大而移居到乡镇。[②]

除了面临不断加剧的住房和交通问题,城市工人工资缩水,度日艰难。工人工资在国家独立后的两年有所改善,但是此后实际工资以每年18%的速度下降。[③] 黑人中产阶级同样面临诸多问题。那些在商业部门工作的人依然遭受约束、限制,只能参与经济领域的生产部门工作。因为白人资本历史形成的垄断地位受到威胁,所以白人、外商独资金融家以及充满警惕的银行不愿意为黑人发放贷款。[④] 在生产领域,尤其是制造业,国家继续禁止对潜在的黑人企业家打开市场。[⑤] 1989年一项私有部门黑人事业发展的报告显示了管理层的种族人员分布状况：高级管理人员,62.5%是白人,37.5%是黑人;中层管理人员,35.5%是白人,64.5%是黑人;初级管理人员,22%是白人,78%是黑人。[⑥] 到1993年,在所有经济部门中,黑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比例只有2%。[⑦]

171

---

①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政府偏重乡村地区的发展是有历史和政治考虑的——他们认识到,在殖民地历史发展进程中,1970年代和80年代选举胜利时期,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发展是不平等的,乡村地区更需要安抚。参见 Musemwa, 'The politics of water', p. 5。

② J. C. Mafico, *Urban Law-income Housing in Zimbabwe* (Aldershot: Avebury, 1991); L. M. Zinyama, D. Tevera and S. Cumming (eds.), *Harare: The Growth and Problems of the City* (Harar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s, 1993).

③ J. Cobbing, 'Review article: Imperialising of Zibabwe', *Transformation*, 9, 1999, p. 85.

④ F. Maphosa, 'Towards the sociology of Zimbabwean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 *Zambezia*, 25(2), 1998, pp. 176－178.

⑤ P. Bond, *Uneven Zimbabwe: A Study of Finance,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1998).

⑥ Raftopoulos, *Race and Nationalism*, p. 6.

⑦ *Financial Gazette*, 28 Jan. 1998.

在殖民时代,囿于殖民国家的结构和性质,黑人小资产阶级无法展开拳脚,实现抱负,而在后殖民时代他们的追求也被遗留下来的殖民结构摧残殆尽。国家独立后的几年,某些经济部门非洲化快速发展,而现在这种现象只发生在公共部门并且由政府直接掌控。它不会再次出现在私有部门,因为其掌控权仍然在白人和国际资本手中。政府试图通过劝勉和非优惠性立法等手段重新解决私有部门的种族不平等问题,例如颁布《劳动关系法案》(1985 年第 16 号法案),规定劳动市场歧视是非法行为。但是,劳工部仅有调查权,但没有足够的资金对企业行为进行充分监督。[①]

在整个 1980 年代,津巴布韦经济几乎没有经历任何彻底的改革或者结构性变化。它仍然被外国势力掌控,尤其是英国和以南非为基础的跨国公司拥有津巴布韦工业绝大部分所有权。[②] 据统计,1985 年津巴布韦 48%的制造业被外国企业或个人掌控。外国资本在矿业主导地位更加显著,据统计,90%的矿业被外国跨国公司控制。[③] 在经济生产领域中,外国公司的优势地位意味着当地企业的边缘劣势。而合资企业和被部分收购的企业继续掩饰了外国资本的垄断实质,这使他们以及与其相关的人有机会进行个人敛财。例如,许多前政府的公务人员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政客充当中间商,也效力于白人开办的公司。[④]

172

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关键地区,土地改革的速度蜗行牛步,极其缓慢。截至 1990 年,政府只收购了 3.5 万公顷土地,安置了 5.2 万户家

① P. Bennell and B. Strachan, 'The Zimbabwean experience: Black occupational advancement', in P. Hugo(ed.), *Redistribution and Affirmative Action: Working on South Africa's Political Economy*(Johannesburg: Southern Books, 1992), p. 30.

② Stoneman, 'The economy', pp. 54 – 55.

③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Zimbabwe's First Five Years: Economic Prospects Following Independence*(London: The Unit, Special Report 11, 1981), p. 87; Burdette and Davies, 'The Zimbabwe economy', p. 78.

④ B. Raftopoulos and D. Compagnon, 'Indigenization, the state bourgeoisie and neo-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Darnolf and Laakso (eds.) *Twenty Years of Independence in Zimbabwe*.

庭，而其预期目标是安置16.2万户家庭和收购9万公顷土地。更糟糕的是，在收购的土地中只有19%是优质土地，其余的要么位于多雨区的边缘地带，要么不适合用于农业生产。[①]

这些失败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政府缺少资金购买土地；英国政府与当局政府意见不一，英政府不愿意继续为项目提供资金，还指控政府官员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政客们收购土地谋取私利。[②] 不过，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最大障碍乃是兰开斯特大厦宪法。

兰开斯特大厦宪法和种族遗产

兰开斯特大厦宪法是1979年为了结束解放战争，各方谈判妥协的产物。该宪法体现了针对少数人权利的一系列妥协，尤其是对国家未来土地所属权划分的让步；它保证了白人在议会中的代表权。即便重新分配的规模受到限制，它也保护了现有的专制官僚机构和私有财产。事实上，它"在长达十年的期间内巩固了移民者的资本，在这期间遗留下来的经济不平等问题需要彻底的重构"。[③]

宪法中体现的买卖自愿原则是土地改革的最大障碍并致其失败；它保护了白人、大商业户农民的利益，而阻碍了政府购买足够的土地满足不断增加的人口需求。[④] 白人农民意识到宪法中承诺的种族保护，一般不愿意放弃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特权。在这方面，1979年宪法"弥漫着新国家的构建进程……寻求巩固民族独立和提供真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⑤]

173

---

① Moy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d acquisition'.

② 同上，p. 13。

③ B. Raftopoulos, 'Unreconciled differences: The limits of reconciliation politics in Zimbabwe', in B. Raftopoulos and T. Savage (eds.), *Zimbabwe: Injustice and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Cape Town: 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2004), p. 2.

④ L. Tshuma, *A Matter of (In) justice: Law, State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Zimbabwe* (Harare: SAPES Books, 1997).

⑤ I. Mandaza, 'The state in the post-white settler colonial situation', in Mandaza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p. 2.

宪法通过确保“津巴布韦继承白人移民的主要殖民结构”，来保证少数白人的经济利益，此外，宪法通过确立白人在议会中的特殊地位来阻碍公正与政治和解的进步。[①] 直到 1987 年白人的 20 个保留席位被废除，那些政坛白人活跃分子仍认为他们高高在上凌驾于新的民族国家，以压倒性的多数优势坚守着保守党罗得西亚阵线。[②] 但自从罗得西亚阵线解散后，宪法草案颁布，宣称废除分开选举，许多白人因此远离了国家选举政治。他们仅在 2000 年再次露面，那时候政府没收了许多白人商业农场，致使其经济生活面临威胁。[③]

如兰杰和曼达扎所言，许多白人行为依旧深受“殖民文化”遗产的影响。[④] 殖民文化是“殖民者拥有和行使巨大权力，垄断政治和法律制度，用尽各种手段获得和扩大经济利益”。[⑤] 但因不能适应非洲人的环境，他们也异乎寻常的保守。[⑥] 这种“文化”遗留下来的是一种“行为和思想标准化模式”的意识形态，是“关于白人社区脆弱主导地位的绝佳表述”。[⑦]

土地和经济中的种族不平等问题也没有在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内

---

① 同上，p. 42；T. O. Ranger, ‘Race and ethnicity in Zimbabwe: A historical overview’, in Mass Public Opinion Institute, *The Salience of Race and Ethnicity in Zimbabwe*, forthcoming。

② C. Sylvester, ‘Zimbabwe's 1985 elections: A search for national mythology’,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24(2), 1986. p. 252. A more detailed, journalistic account of political conservatism among whites I post-independence can be found in P. Godwin, ‘Whose kith and kin now?’ *Sunday Times Magazine* [London], 25 Mar, 1984. http://www.maryellenmark.com/text/magazines/london-sunday-times/904G - 000 - 005.html, retrieved 28 May 2009.

③ L. Huyse, ‘Zimbabwe: Why reconciliation failed’, in D. Bloomfield, T. Barnes and L. Huyse (eds.), Reconciliation after Violent Conflict: A Handbook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2003), pp. 34 - 39. http://www. idea. int/publications/reconciliation/upload/reconciliation-chapo2cs-zimbabwe. pdf retrieved 28 May 2009.

④ Mandaza, ‘The state in the post-white settler colonial situation’; Ranger, ‘Race and ethnicity in Zimbabwe’.

⑤ D. Kennedy, Islands of White: Settler Society and Culture in Kenya and Southern Rhodesia, 1890 - 1939(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⑥ Ranger, ‘Race and ethnicity in Zimbabwe’.

⑦ 同上。

得到有效解决。因为那时候经济运行状况良好，社会义务得到履行，政府并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正是由于这种压力的缺失，政府并未对其本土化政策进行有序规划，实施起来也不够尽力。面对黑人中产阶级提出的更大程度地控制和占有经济的要求，政府也置若罔闻，不做承诺。

政府和贫困大众对公正和经济改革一致缺少紧迫感，而握有特权的白人在政治和经济安全问题上错误地以为，与黑人相比，因为白人有巨额的资本投资，他们在经济上享有特权是正常的。[①] 国家在黑人与白人或者是民族构建的过程中并没有付出努力去解决遗留下来的种族不平等问题。1982 年卡普兰在其著作中写道"白人意识到政治优先权的丧失，他们集中在继续维持其经济地位的优势领域，但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秩序下，他们很少去做适应这种变化的尝试"。[②] "他们维持独立之前的特权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正常的"，胡耶斯补充道，"他们带来的偏见和遭受破坏的社会关系依然存在。"[③]这些尚待解决的问题成为 1990 年代的主要焦点，当时经济开始严重萎缩，贫困等社会问题渐渐露出水面。

1980 年代乡村和城市的政治改革、和解和民主化

在独立之初，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政府声称致力于建立民主、公正和平等的社会秩序。不久，政府制定了许多法律，如《法定成人年龄法》(the Legal Age of Majority)(1982 年第 15 号法令)，给予任何年满 18 岁的人监护权；颁行《取消性别歧视法》(the Sex Disqualification Act)，允许妇女拥有参与任何公共服务等许多权利以保障其进行个人决策。[④] 政府废除了种族主义宪法，以及那些会导致

① C. Banana, *The Politics of Repression and Resistance* (Gweru: Mambo Press, 1996), p. 22.

② Kaplan, 'Zimbabwe: Ethnicity and race'.

③ Huyse, 'Zimbabwe: Why reconciliation failed'.

④ J. Kazembe, 'The women issue', in Mandaza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pp. 386－394.

压迫、族群分化和种族不和谐问题的法律;瓦解了产生种族差异的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持。[1]

175 政府也尝试对城乡的统治结构进行调整,推行民主化改革,分散地方当局和其他地方行政实体的权力、资源和责任。[2] 在尝试构建更和谐的民族国家的进程中,政府采取了和解政策,优先在白人与黑人之间推行。[3]

针对以前民族主义政党之间相互敌对的状况,政府1980年采取的民族和解政策也尝试融合黑人,努力促进他们之间的政治合作。为了实现以上目标,首届政府人员的组成不仅囊括之前败北的罗得西亚阵线成员,也吸纳了来自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爱国阵线)的成员(他们在选举中名列第二)。新的军队也是混合产物,包括来自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和前罗得西亚联盟的成员。[4]

为了促进工人之间的民族融合,政府就业政策强调国家公务员的招募要考虑户籍问题。其语言政策也强调要开设绍纳语和恩德贝莱语(它们是津巴布韦两个主要种族群体的语言),培养年轻人的民族气质和精神。恩德贝莱语、绍纳语和英语一并被采纳为国家官方语言。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如卡拉迦语、沙迦尼语、切瓦语(尼昂加语)、文达语、通加语和纳姆比亚语,都被官方认可和允许在教育和广播中使用。[5]

但是,1980年代采取的这些措施并没有产生预想的效果。1980年代后殖民时期的种种努力,并没有实现构建一个公正、公平和无种

---

① Kaplan, 'Zimbabwe: Ethnicity and race'.

② R. Weitzer, *Transforming Settler State: Communal Conflict and Internal Society in Northern Ireland and Zimbabw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134.

③ J. Muzondidya, ' "Zimbabwe for Zimbabweans": Invisible subject minorities and the quest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Zimbabwe', in Raftopoulos and Savage (eds.), *Zimbabwe: Injustice and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pp. 213–235.

④ M. Rupiya, 'Demobilisation and integration: "Operation Merger" and the Zimbabwe national defence force, 1980–1987', *African Security Review*, 4(3), 1995, pp. 52–64.

⑤ S. Makoni, S. Dube and P. Mashiri, ' Zimbabwe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practices', Multilingual Matters, 7(4), 2006, pp. 377–414.

族分别社会的目的，也未能为建设和实现真正民主秩序打下牢固根基。

历史的延续与断裂

许多学者在谈论津巴布韦后独立时代政治时都涉及从罗得西亚阵线到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当局政府的延续性问题。他们探究独立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独裁的性质，探究其是否处理了反对派官员、罢工工人、学生和民间团体。[1] 就像韦尔什曼·恩库贝(Welshman Ncube)所评论的，在民主宪法的背后是一个剥夺民主空间的专制政治制度，它严重侵犯基本人权和妨碍法治。罗得西亚政权与这种制度紧密联系并且通过施行专制法律来确保其永存下去。如《紧急权力法案》和1960年《法律与秩序(维护)法案》等的颁布都是为拘押政治对手和打压批评者的目的服务。[2]

176

政府也过度地依赖从解放斗争中演变而来的强迫性诱导公民顺从的手段。[3] 如马西普拉·西索尔指出的：

---

① 参见 B. Raftopoulos, 'The state in crisis: Authoritarianism, selective citizenship and distortions of democracy in Zimbabwe', in A. Hammar, B. Raftopoulos and S. Jensen (eds.), *Zimbabwe's Unfinished Business: Rethinking Land, State and N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of Crisis* (Harare: Weaver Press, 2003); Horace Campbell, *Reclaiming Zimbabwe: The Exhaustion of the Patriarchal Model of Liberation* (Cape Town: David Philip, 2003); J. N. Moyo, *Voting for Democracy: Electoral Politics in Zimbabwe* (Harar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s, 1992); W. Ncube, 'Constitutionalism,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practice in Zimbabwe', in I. Mandaza and L. Sachikonye(eds.), *The One-Party State and Democracy*; Darnolf and Laakso(eds.), *Twenty Years of Independence in Zimbabwe*。

② 见 Ncube, 'Constitutionalism,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practice in Zimbabwe', pp. 156－177。

③ 关于解放战争期间在民族主义政治中出现的暴力和压迫的详细讨论，见 Norma Kriger, *Zimbabwe's Guerrilla War: Peasant Voi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F. Chung, Re-living the Second Chimurenga: *Memories from Zimbabwe's Liberation Struggle* (Harare: Weaver Press, 2005), pp. 175－178; D. Moore, 'Democracy, violence and identity in the Zimbabwean war of national liberation: Reflections from the realms of dissent',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3, 1991. pp. 472－495; S. J. Ndlovu-Gatsheni, 'Nationalist-military alliance and the fate of democracy in Zimbabwe', *Africa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 2006. pp. 49－80。

解放战争也给津巴布韦政治和文化烙下了一个明显的印记。命令者的本性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动员工作和表露政治倾向，常常恐吓政治对手令其害怕。其对手被视为好战分子和敌人，由此其对手的行为也属于非法行为。[①]

这种“偏执的文化”对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所倡导民主理想的实施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虽然在 1980 至 1990 年，多党选举经常举行，但是它们的活动表明了政府缺乏对政治多元化的宽容和对民主政治的承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还将选举视为“战斗”，将他们的政治反对者视为需要消灭的敌人而非政治竞争者。通过古库拉洪迪策略和实行“针对反对者的公开、偏执、命令式和故意的暴力政策”，他们在选举中成功攫取了部分主导权。[②]

177

不过，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并不像它的批评者和政治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完全依靠恐吓、威胁赢得选举。例如，在 1980 年，该党选举的胜利是基于其有能力在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控制区域建立一个更大的、大约占据全国三分之二面积的政治领域。[③] 虽然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中央集权倾向和暴力政治及部落主义可能会使其在部分选民中碰壁、受挫——尤其是在城市精英和知识分子中，但在如马塔贝莱兰以及马尼卡兰的部分地区，暴力冲突即将结束——在 19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

---

① M. Sithole, ‘Zimbabwe: In search of stable democracy’, in L. Diamond. J. Linz and S. Lipset(eds.),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 2, Africa*(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88), p. 245. See also S. J. Ndlovu-Gatsheni, ‘Putting people first: From regime security to human security: A quest for social peace in Zimbabwe’, in A. G. Nhema(ed.), *The Quest for Peace in Africa*(Addis Ababa: OSSREA, 2004).

② M. Sithole and J. Makumbe, ‘Elections in Zimbabwe: The ZAUN(PF) hegemony and its incipient decline’, Afir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1)1997, p. 133.

③ 关于 1980 年选举深入细致的分析，见 M. Sithole, ‘The general elections, 1979 - 1985’, in Mandaza(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pp. 81 - 85; T. Rich, ‘Legacies of the past? The results of the 1980 election in Midlands province, Zimbabwe’, *Afric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52(3), 1982, pp. 42 - 55。

颇有经验地迎合民意，颁布涉及土地、经济本土化、就业和工人权利的政策，履行了它最初的一些社会和经济承诺，因而颇受青睐，仍然是许多津巴布韦黑人的投票对象。

然而，在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津巴布韦政治选举仍然混杂着暴力和压迫事件。1980 年，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被广泛指控实施政治威胁，尤其在战争期间其游击队员活动地区情况特别严重，[1]在 1985 和 1990 年的选举中，其拥护者对竞争者普遍实施暴力活动。虽然政府从不禁止多党选举，但是它从来没有创造一个自由、公平的选举环境，反对派政党几乎没有活动空间。除了在选举期间部署其青年和妇女力量支持选举，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还动用国家资源和组织，如军队、警察、智囊团和公共广播及电视以确保其掌控选举领导权。[2]

178

津巴布韦执政党在国家机关和决策部门的主导地位在行政领域也可见一斑。自 1980 年开始津巴布韦不允许分散权力到地方政府，这是因为执政党势力骄横地存在于所有的部门。乡村发展委员会和监护发展委员会的建立原本旨在促进乡村地区的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但它们并未被允许参与到更广泛的治理结构中去。正如阿曼达·哈默尔所言，它们仍然属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地方组织在解放战争中延续的委员会和单位，执政党的偏袒和独裁行为波及它们积极参与和发展民主主义。[3] 更有甚者，农村地区议会被当做自治机构，只为地方委员会利益服务。虽然它们仍然是中央政府的附属机构，但被严重边缘化，缺少资源，只能依赖中央政府的资金和人力。地区行政官取代了地区专员，其只对中央政府而非地

---

① See Sithole, 'The general elections', pp. 84－85.

② See Sithole and Makumbe, 'Elections in Zimbabwe', pp. 122－139; Moyo, *Voting for Democracy*; A. Reynolds, *Electoral System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40－181.

③ A. Hammar, 'Disrupting Democracy? Altering Landscapes of Local Government in post－2000 Zimbabwe'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Crisis State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Discussion Paper No. 9, June 2005), p. 19.

方社区负责。[①]

在城市领域,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政府掌控着军队以应对主要来自工人、年轻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挑战。但在殖民后时代,大部分工人组织不仅力量微薄、分散,而且屈从于津巴布韦工会大会,自治权非常有限,制定和实施独立方案的能力被大幅削弱,而且这一情形持续至1980年代仍未有好转。[②]

1980年以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不断试图展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尤其在1984年建立了该党的政治局议会和五个新的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负责监督各个部委,确保政府中执政党的权威。[③] 在津巴布韦政体中,新上任的政党勾勒出树立权威的蓝图:

179

> 在独立后的早些时期变得非常清晰,其缓和政策是将其他政党和大众社会置于其控制和从属部门之后形成的。1980年代中期马塔贝莱兰危机和暴力显示了一些状况,这标志着在2000年之后会形成专制的中央集权。[④]

独立后,津巴布韦的主要特征是缺少对政治多元化与异议的包容,严重依赖军事化,对公民权、民族主义和民族团结的诠释狭隘单一。[⑤] 例如,在马塔贝莱兰危机时期,政府镇压部分武装力量的政治反对活

---

① E. Masunungure and N. Musekiwa, 'Local Government Policy Review' (Policy Document Prepared for the Zimbabwe Institute, 2005); J. McGregor, 'The politics of disruption: War veterans and the local state in Zimbabwe', *African Affairs*, 101, 2002, pp. 17 – 23; W. Munro,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State: Conservati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State-Making in Zimbabwe*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8); E. M. Chiwome, *Masango Mavi* (Gweru: Mambo Press, 1998).

② 参见 B. Raftopoulos and L. Sachikonye, (eds.), *Striking Black: The Labour Movement and the Past-Colonial State in Zimbabwe*, 1980 – 2000 (Harare: Weaver Press, 2001)。

③ Weitzer, *Transforming Settler States*, p. 140.

④ Raftopoulos, 'Unreconciled differences', p. 4.

⑤ 同上。

动,与这些反抗者所带来的安全威胁相比,使用武力镇压不仅毫无必要而且过于大张旗鼓。一个名为《打破沉默》的报告列出了详细数据:1982至1987年间,政府在马塔贝莱兰和中部省份等地区武力杀害了2万多名公民。"第五部队"开展了各种匪夷所思的军事行动,他们肆意杀害、诱拐、折磨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爱国阵线)的拥护者和说恩德贝莱语的公民,试图强迫说恩德贝莱语的公民改说绍纳语,进行思想灌输,试图强迫民众支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①]

马塔贝莱兰危机给政府击垮其唯一劲敌——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创造了契机。他们部署军队并动用名为"第五部队"的小股军事武装力量,以古库拉洪迪行动(意思是"大雨扫尽糟糠")的组织形式来解决这场原本应靠政治途径处理的政治争端。这一时期充斥着暴力和仇杀行动,直到1987年才以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和爱国战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签署联合协议而告一段落。联合协议宣布将两党合并,统称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当马塔贝莱兰的暴力活动结束后,这次政治联合也有效地削弱了反对党势力。[②]

暴力威胁和联合话语霸权不仅对其附属的爱国战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其他反对党有效力,对持不同意见或组织抗议活动的妇女、劳工、学生和其他社会团体也具有震慑和控制作用。[③] 但是,国家

180

---

① Catholic Commission for Justice and Preace in Zimbabwe and Legal Resource Foundation, *Breaking the Silence, Building True Peace: Report on the Disturbances in Matabeleland and the Midlands, 1980 -1989* (Harare: CCJPZ and LRF, 1997). 另见 S. J. Ndlovu-Gatsheni, 'The post-colonial state and Matabeleland: Regional perception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1980 - 2002, in R. Williams *et al.* (eds.), *Ourselves to Know: Civil-Military Relation and Defence Transform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Pretoria: ISS, 2003); J. Alexander, 'Dissident perspectives of Zimbabwe's post-independence war', Africa, 68(2), 1998, pp. 151 - 182; J. Alexander, J. McGregor and T. Ranger, *Violence and Memory: One Hundred Years in the 'Dark Forests' of Matabeleland* (Oxford: James Currey, 2000)。

② Raftopoulos, 'Unreconciled differences'; p. 4.

③ 同上, pp. 4 - 5; L. Sachikonye, 'Sate, Capital, and Trade Unions', in Mandaza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pp. 243 - 273。



图 6.1　签署联合协议(来源：私人收藏)

各阶层、社区和政治团体对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权威的质疑和挑战之声仍不绝于耳。

霸权与反抗

近期,绝大多数关于津巴布韦独立后的国家政治,尤其是国家专制主义的研究成果都表明：在 1980 年代,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曾有实力在本国建立政治霸权。这些研究主要尝试着从政治党派和民间组织的历史演变来认识津巴布韦的政治格局。[①] 但这一过程不仅忽视了 1980 年代在夹缝中挣扎求生的民主倾向,也低估了广泛的个体努力及其附属力量的重要意义。

181

① 这些分析主要来自津巴布韦独立后的新闻报道,例如 Martin Meredith, *Our Votes, Our Guns: Robert Mugabe and the Tragedy of Zimbabwe* (Oxford: Public Affairs, 2003); S. Chan, *Robert Mugabe: A Life of Power and Violence*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J. R. Arnold and R. Wienar, *Robert Mugabe's Zimbabwe* (Brookfield, CT: Twenty-First Century Books, 2007)。

尽管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建立政治霸权的企图和尝试为时已久,但其心有余而力不足,霸权体系并未真正建立起来。1980至1990年间,涌现出一系列强烈的反对意见,例如,法官拒不执行行政命令,政府在多个关键性审判中铩羽而归,执行官屡次表达对法官的不满情绪,在公共场合发生针对法官和法院的袭击等事件。[①] 在1988年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大会上,穆加贝总统承认执政党在政府中"并未达到"最高地位。[②] 即使在执政党内部,其多次会议活动都依旧存在大量意见分歧和争论,执政党领导人和国会议员,如埃德加·特克雷、拜伦·霍夫、瑟得尼·马伦加、威尔士曼·马比纳和拉佐鲁斯·恩扎耶巴尼等人都争论不休。[③] 在许多民族问题上他们各执一词,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和一党制这两个有争议的问题,穆加贝总统甚至公开承认一党制的观念面临国内反对。[④] 1988年10月,秘书长特克雷因其直言不讳的批评意见被开除党籍,导致党内斗争达到高潮。特克雷及其拥趸者联盟,对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持异议的党内人士,以及国内其他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反对者,成立了津巴布韦统一运动党,并通过其广泛的全国竞选活动参与1990年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以此阻止一党专政获得法律通过。[⑤]

在农村地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领导者试图表明他们心系百姓,但这一念头常常遭到讽刺,尤其在民众投票选择候选人

---

① See Weitzer, *Transforming Settler States*, pp. 153－154; O. Saki and T. Chiware, *The Law in Zimbabwe* (Harare: Zimbabwe Lawyers for Human Rights, 2007).

② C. Stoneman and L. Cliffe, *Zimbabwe: Politics, Economic and Society* (London: Printer, 1988), p. 80, cited in Weitzer, *Transforming Settler State*, p. 140.

③ T. C. Nkiwane, 'Opposition politics in Zimbabwe: The struggle within the struggle', in A. O. Olukoshi (ed.), *The Politics of Opposition in Contemporary Africa* (Uppsala: Nordic Africa Institute, 1997), pp. 97－98.

④ 'Zanu PF divided over one-party state', Financial Gazette, cited in J. Moyo, 'The dialectics of national unity and diversity in Zimbabwe', in Mandaza and Sachikonye (eds.), *The One-Party State and Democracy*, p. 99.

⑤ 虽然津巴布韦统一运动只在120个席位中赢得了两个席位,但它赢得了18%的大众支持票。参见 Makumbe and Sithole, 'Elections in Zimbabwe', p. 128; Moyo, *Voting for Democracy*。

时。虽然党内高层常常通过政治宣传来实施决策,但这并不总能得到其追随者的支持和服从。因此,在 1980 年代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在纪律听证会上,党内退休人员和领导人拒绝服从他们认为不公平的决策、政策和指令。[①]

即使在政府实行强势控制的偏远地区,部分人群,包括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追随者,也并不完全遵循政府政策的条条框框行事。正如萨姆·莫约指出的,1980 年代早期的土地侵占行为是由农民发起和实施的,他们对政府土地改革进程缓慢表示极度不满。[②] 政府在许多场合都使用过武力大规模驱逐农民,这些农民曾占据商业用地或者政府土地进行放牧和耕作。莫约还进一步指出,在 1980 年代,农民比政府更激进,政府不得不在兰开斯特大厦宪法的保守派势力牵制下开展各项工作。[③] 政府制定的自上而下发展的议题常常遭到农民的抗拒,有时候政府在没有征得当地农民同意前就派遣公务员到地方,因此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只能以失败收场。[④]

在整个 1980 年代,政府不受欢迎的政策遭到了来自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内外许多人的厌恶。这些反对声音主要集中在贪污腐败、领导人监督缺失、工人和妇女的权利以及民主等问题上。在津巴布韦独立后的 1989 年 10 月,学生发动了反政府示威游行活动,此举导致许多大学被迫停学关闭。[⑤]

---

① Moyo, 'The dialectics of national unity', pp. 99ff.

② S. Moyo, 'The Land and Agrarian Question in Zimbabwe' (Conference on the Agrarian Constrai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Addis Ababa, 17 – 18 December 2004). See also J. Alexander, ' "Squatters", veterans and the state in Zimbabwe', in Hammar *et al.*, (eds.), *Zimbabwe's Unfinished Business*, pp. 83 – 117; N. Marongwe, 'Farm occupations and occupiers in the new politics of land in Zimbabwe', in Hammar et al. (eds.), *Zimbabwe's Unfinished Business*, pp. 155 – 190; A. Chiundura-Moyo, Kuridza Ngoma Nedemo (Harare: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 1985).

③ Moyo, 'The Land and Agrarian Question in Zimbabwe'.

④ Chiwome's brilliant political novel, *Masango Mavi*.

⑤ A. Mutambara, 'The one-party state, socialism and democratic struggles in Zimbabwe: A student perspective', in Mandaza and Sachikonye (eds.), *The One-Party State and Democracy*, pp. 139 – 142.



图 6.2　抵制贪污腐败(来源：标准报)

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处理程序也颇有微词。事实是政府试图限制这些言论,但是遭到了许多人抗议,包括达姆布德祖·马瑞奇采尔、高恩祖·穆塞内戈兹、查尔斯·塞穆皮第、斯塔内雷·恩亚穆福库扎和史末·奇诺迪亚,[①]法律专家凯姆波顿·玛卡穆瑞、舍坡德·恩祖姆比、威尔士曼·恩库比以及政治学专家马斯普拉·瑟索勒和卓纳兰·莫约等人;他们继续通过公开研讨会,书籍和文章(小说、诗歌),戏剧,以及在媒体上发表一些观点等形式表达自己对政府的批评意见。这些批评包括政府对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承诺、政府治理社会

183

---

① 以下这些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批评了殖民后期的国家：D. Marechera, *Mindblast* (Harare: College Press, 1984); D. Marechera, *Cemetery of the Mind: Collected Poems of Dambudzo Marechera* (Harare: Baobab Books, 1992); S. Nyamfukudza, *The Non-Believer's Journey* (London: Heinemann; Salisbury: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 1980); G. H. Msengezi. *The Honourable MP* (Gweru; Mambo Press, 1984); S. Chinodya, *Harvest of Thorns* (Harare: Baobab Books. 1989); Charles Samupindi, *Pawns* (Harare: Baobab Books, 1992); F. Nyamubaya, *On the Road Again: Poems during and after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of Zimbabwe* (Harare: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 1986); Chenjerai Hove, *Bones* (Harare: Baobab Books, 1988); Chirikure Chirikure, *Rukuvhute: Muunganidzwa weNhetembo* (Harare: College Press, 1989).

腐败问题的失败、不公正文化的盛行、侵犯民主权利、土地和经济所属权中长期存在的不平等问题等。尽管政府企图让这些独立辩论者销声匿迹，但在 19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津巴布韦的大学为这些批判性思考和尖锐批评意见保留了自主空间。[①]

1980 年代中期，以结束长期以来对妇女的歧视为目标，一种新型的女性激进主义也应运而生。[②] 它指责政府在结束妇女从属地位和被剥削状况上的承诺和努力极其有限。事实上，旨在为实现性别平等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政府在 1980 年代批准和出台了一些进步法规和国际性协议，但显著的不平等问题存在。妇女依旧在社会中地位偏低，在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分配、决策制定过程等方面受到忽视、排挤。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改革仅使极少数妇女获益，由于任免权通常与政治休戚相关，[③]即便是她们也仍然游离于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领域之外，而这与殖民斗争时期妇女被歧视、被边缘化的情况几乎毫无二致。[④]

184

整个 1980 年代政府都在不断将自身的政治理想强加于整个国家。在 1980 年代早期，政府逆民意实施了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的诸多项目，但是对国家中民族、种族、性别和阶级结构等存在的残留问题关注极少，因此其发展一个更具凝聚力的民族国家之举也以失败收场。津

① M. Sithole, 'Should Zimbabwe go where others are coming from?', in Mandaza and Sachikonye(eds.), *The One-Party State and Democracy*, pp. 71 – 72, 80. 另见 Mandaza and Sachikonye, 'The Zimbabwe debate on the one-party state and democracy', in Mandaza and Sachikonye(eds.), *The One-Party State and Democracy*, p. 11。

② B. Raftopoulos and K. Alexander (eds.), Reflections on Democratic Politics in Zimbabwe (Cape Town: IJR, 2006), p. 40.

③ C. Sylvester 'Vacillations around women: The overlapping meanings of "women" in the Zimbabwean context', in Darnolf and Laakso (eds.), From Liberation to Authoritarianism; C. Sylvester, Producing Women and Progress in Zimbabwe: Narratives of Identity and Work from the 1980s(London: Heinemann, 2000).

④ 关于全国解放运动中妇女被边缘化的详细论述：J. Nhongo-Simbanegavi, For Better or Worse? Women and ZANLA in Zimbabwe's Liberation Struggle (Harare: Weaver Press, 2000), See also T. Barnes, 'The heroes' struggle: Life after the liberation war for four ex-combatants in Zimbabwe', in Bhebe and Ranger(eds.), Soldiers in Zimbabwe's Liberation War, pp. 118 – 139; T. Lyons, Guns and Guerilla Girls: Women in the Zimbabwean National Liberation Struggle(Trenton, NJ: African World Press, 2004)。

巴布韦仍深陷严重的分裂泥潭中。

民族国家的种族和区域划分

政府运用胁迫手段产生的明显失误以及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之间冲突的极致引发了马塔贝莱兰危机。虽然最初这只是持不同意见的两个政党之间的政治冲突，但不久之后，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种族和区域的分化。[①] 首先，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对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使用政党的标语、歌曲和政治演讲表示不满，这些内容将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标榜成真正的解放者，而将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及其支持者贬损为恶棍。[②] 其次，政府在对解放历史的宣传中低估和诋毁了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其他政党的作用，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领导人和支持者为此深感失望和痛心。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这种凯旋主义体现在对前殖民时期绍纳人英雄和历史纪念碑的极度推崇，而那些恩德贝莱人则被漠视、忽略。[③]

在津巴布韦国民军队中，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的成员对前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参战者都相当歧视。1982 年这一局势愈发紧张，政府在布拉瓦约和圭洛地区发现了属于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武器藏匿点，随后其大批领导人和人民革命军指挥官遭到逮捕，在联合政府中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领导人被罢免，其中包括乔舒亚·恩科莫。[④]

185

---

① 从 1980 年独立开始，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将津巴布韦想象成为一党制的国家，而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则将他们视为在多党民主下正式的反对党。

② Alexander, 'Dissident perspectives', pp. 151 – 182. D. Dabengwa, 'ZPRA in the Zimbabwe war of national liberation', in N. Bhebe and T. O. Ranger(eds.), *Soldiers in Zimbabwe's Liberation War*(Harar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s, 1995).

③ N. Kriger, *Guerrilla Veterans in Post-War Zimbabwe: Symbolic and Violent Politics, 1980 – 198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74 – 75.

④ Alexander *et al.*, *Violence and Memory*, pp. 180 – 196; Alexander, 'Dissident perspectives on Zimbabwe's post-independence war'.

在1982至1987年间,政府在马塔贝莱兰和米德兰地区残酷镇压少数反抗者的暴行不仅给受害者留下了深刻伤痕,还加剧了马塔贝莱兰地方主义的分离活动。比约恩·林格伦认为,这是古库拉洪迪暴行中最严重的后果之一。[①] 他指出"马塔贝莱兰地区的人们指控穆加贝政权伙同绍纳人杀害恩德贝莱人"。[②] 在恩德贝莱公众眼里,打压持不同政见者的任务被描绘成反恩德贝莱运动,他们故意将乔舒亚·恩科莫、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参战者和每一个说恩德贝莱语的人作为政治反对者。第五部队联盟几乎都由绍纳人组成,他们在政治和种族活动中发动暴力行动。对他们大多数人而言,这代表着绍纳人对恩德贝莱人在政治上的讨伐。[③]

被边缘化的恩德贝莱人在津巴布韦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齐平加、希雷济和齐克姆贝德兹等地展开反对和抵抗运动。1980年代上述地区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落后,尤其在莫桑比克独立战争时期,当时里纳莫叛军袭击了津巴布韦边境地区,以报复津巴布韦军队攻击另一边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政府军。这些袭击不仅残暴而且对道路、财产、学校、诊所、家畜等造成毁灭性破坏,阻碍了经济发展。[④] 正是由于发展滞后以及对津巴布韦政府处理战争事务感到不满,一些村民向里纳莫提供支持,另一些人通过煽动地方主义和政治部落主义对抗中央政府来发泄不满。[⑤] 例如,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恩东加)领导人成功动

---

① B. Lindgren,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the remembrance of violence: Ethnicity and gender at the installation of a female chief in Zimbabwe', in V. Broch-Due(ed.), *Violence and Belonging: The Quest for Identity in Post-Colonial Africa*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156-158.

② 同上,p. 158。

③ Ndlovu-Gatsheni, 'The post-colonial state and Matabeleland'; Alexander *et al.*, *Violence and Memory*, pp. 204-231.

④ B. Tauyanago, 'The Renamo War and its Impact in South East Zimbabwe, 1982-1992'(MA thesis, University of Zimbabwe, 2002), pp. 70-95.

⑤ A. Alao, Brothers at War: Dissidence and a Rebellion in Southern African(London: Zed Books, 1994), pp. 122-123.

员了恩达乌少数民族和在齐平加当地被边缘化的人群建立了一个区域性的权力基地以对抗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因此在整个 186 1980 年代,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恩东加)获得了齐平加地区大部分说恩达乌语人的大力支持。[①]

殖民后时期的地方主义和政治部落主义问题在马斯温戈地区也表现突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高级领导人和政府部长爱迪生·祖温博格(Edison Zvobgo)试图利用卡伦加人的身份,来淡化他及其支持者(如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前主席迪兹卡麦·马夫海雷和前空军指挥官乔萨亚·图恩噶米瑞)认为泽祖鲁人垄断了权力和资源的印象。从独立后,卡兰加的政治精英及其信徒们建立了另一个在种族制衡政治中难以被忽视的权力中心。[②] 它的根基可以追溯到解放斗争时期,那时候权力斗争主要集中在卡兰加和马尼卡之间。[③] 独立后,他们的种族划分源自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和国家政治对其实行的边缘化策略。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如有色人种以及来自马拉维、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的移民及其后裔,仍长期被后殖民时期的津巴布韦人疏远、歧视,这也表明黑人与白人混血的后代急需得到身份认同。据劳埃德·沙奇孔耶(Hoyd Sachikonye)、布莱尔·卢瑟福(Blair Rutherford)和德德·阿曼内威尔克(Dede Amanorwilks)的研究显示,在津巴布韦获得国家独立后,来自马拉维、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的移民及其后裔长期属于被歧视对象,尤其就重新分配规划和国家政治归属与公民身

---

① 津巴布韦独立后出现恩达乌部落主义。1975 年出生在齐平加、说恩达乌语的恩大邦宁·西索尔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领导地位下台颇具争议。See M. Sithole, 'Is Zimbabwe poised on a liberal path? The state and prospects of the parties', *Issue: A Journal of Opinion*, 21(1/2), 1993, pp. 37–38。

② Muzondidya and Ndlovu-Gatsheni, 'Ethnicity in post-colonial Zimbabwe', pp. 291–292; Tekere, *A Lifetime of Struggle*.

③ M. Sithle, 'Ethnicity and factionalism in Zimbabwe nationalist politics, 1957–1979',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1), 1980; M. Sithole, Zimbabwe struggles Within the Struggle (Harare: Rujeko Publishers, 2nd edn., 1999).

份而言。[①] 独立后的长时间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农场和矿场中工作和生活,他们没有权利在公有土地上居住,更没有权利参与当地政府的选举活动。[②]

187

一般而言,所有的少数民族依旧被排除在对其他津巴布韦民众开放的权力和治理结构之外。后殖民国家对待这些少数群体,既有持续的矛盾心理,又有彻底的敌视。独立后的津巴布韦在非洲人/津巴布韦人的身份识别时,仍然局限在"祖先在津巴布韦生活的人"(即那些在被迫接受殖民统治之前就生活在津巴布韦土地上的群体)。许多主要少数民族群体因此离开了他们原来生活的地方,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们不被视为土著居民,更不用说拥有土著居民所拥有的权利了。[③]

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如尚噶尼、卡兰加、通加和文达,也被纳入边缘群体,他们通常沿边境线居住,那里经济发展缓慢,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极度匮乏。他们抱怨绍纳人和恩德贝莱人在政治和文化上占尽优势;抱怨国家以牺牲其他民族语言为代价,强迫推行使用绍纳语和恩德贝莱语。南部边境小镇拜特布里奇(Beibridge)因为语言问题被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国家强迫在边境线居住的"外来者"群体进行身份认同,只

---

① L. M. Sachikonye, *The Situation of Farm Workers after Land Reform in Zimbabwe: 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Farm Community Trust of Zimbabwe*, May 2003, available at < http://www.oxfam.org.uk/what_we_do/issues/livelihoods/landrights/downloads/zimfwsit.rtf >, retrieved 31 May 2009; D. Amanor-Wilks, *Zimbabwe's Farm Workers and the New Constitution*,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africaaction.org/rtable/ed0002.htm>, retrieved 15 Feb. 2004; B. Rutherford, 'Belonging to the farm(er): Farm workers, farmers and the shifting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in Hammar et al. (eds.), *Zimbabwe's Unfinished Business*, pp. 191 – 216.

② Amanor-Wilks, Zimbabwe's Farm Workers; S. Moyo, B. Rutherford and D. Amanor-Wilks, 'Land reform and changing social relations for farm workers in Zimbabwe',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84, 2000, p. 189; Sachikonye, *The Situation of Farm Workers*, p. 18.

③ J. Muzondidya, '*Jambanja*: Ideological ambiguities in the politics of land and resource ownership in Zimbabwe',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History*, 33(2), 2007, pp. 330 – 333.

能在当地操文达语人群和绍纳人之间进行身份选择。[①] 在东北部地区操尚噶尼语人群悲痛地抱怨自己儿女因为语言不同而就业困难。同时，操尚噶尼语和操卡兰加语的人群之间竞争激烈，时常会因为争夺有限的资源爆发种族暴力冲突。[②]

可是，虽然津巴布韦国内经历了种种混乱，它却像打破悖论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声誉：在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和前线国家组织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主持了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会议；由于持续领导人民为结束饥饿所做的努力，津巴布韦总统在 1988 年荣获非洲奖，在 1989 年荣获尼赫鲁和平奖；1982 年 11 月，津巴布韦被非洲统一组织授予了一个为期两年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1986 年，在哈拉雷主持举办了不结盟首脑会议；作为联合国一员，津巴布韦还被要求在 1991 年安哥拉维和使命中派遣军队。[③]

188

作为前线国家组织的领导国，津巴布韦强烈反对种族隔离和南非占领纳米比亚。1982 至 1992 年间，津巴布韦部署了 1.5 万名战士防护途经莫桑比克的石油管线；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军并肩作战，反抗南非支持的里纳莫反叛军。虽然对津巴布韦来说，参与战争的代价惊人，花费了大量人力和原材料。但它被非洲大陆以及第三世界的诸多国家视为无私奉献的典范。[④]

---

① R. Mathe, *Making Ends Meet at the Margins: Grappling with Economic Crisis and Belonging in Beitbridge*, *Zimbabwe*(Dakar: Codesria, 2005), pp. 8 - 20.

② Muzondidya and Ndlovu-Gatsheni, 'Ethnicity in post-colonial Zimbabwe', p. 290.

③ J. Muzondidya and N. Samasuwo, ISS Country Profile: Zimbabwe (Pretoria: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7). Available at <http: //www. issafrica. org>.

④ 在 2000 年后的危机中，津巴布韦有能力接受来自周边区域国家的支持，在这一时期它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中与莫桑比克、安哥拉、纳米比亚和坦桑尼亚形成了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但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的暴政都遭到来自国内和国际的批评。相似的历史确保津巴布韦能够在外部获取道德和外交的支持，包括来自非洲统一组织、其他国际组织如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的支持。关于穆加贝是如何在他现在的政治斗争中利用非洲和第三世界的团结的详细资料，参见 B. Raftopoulos, 'The Zimbabwean crisis and the challenges for the left',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32(2), 2006, pp. 203 - 219. See also D. Chimanikir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Zimbabwe', in Darnoff and Lassko (eds.), *From Liberation to Authoritarianism*。

不过，从 1980 年代晚期开始，津巴布韦在国际上获得的积极评价并没有掩盖其国内不断爆发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津巴布韦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但这些问题在 1990 年之后仍不断恶化。

1990 至 1997 年政治与经济自由化

1990 年代，随着经济下滑，津巴布韦在社会服务领域取得的成果不断被鲸吞蚕食。连续干旱导致农业产量下降，出口明显减少，1991 年津巴布韦实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出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但却导致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从 4%下滑至 0.9%，到 1998 至 1999 年间只恢复到 2.9%。[①] 随着工厂关闭，大批工人失业，在结构调整政策影响下，公共开支被逐步压缩。截至 1994 年，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经济自由化计划开始后，有 20 710 名工人失业；但据津巴布韦工会代表大会估计，这个数字可能超过 3 万。失业率也从 1990 年的 32.2%上升到 1993 年的 44%。[②]

189

同时，由于物价不稳以及在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下取消了基本消费品补贴，给工人、失业者和贫困者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困难，随着物价飞涨和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工人为了基本的食品供应被迫相互竞争。在结构调整计划下，妇女和儿童苦难加重，因为贫穷的家庭只能逐渐依靠育龄妇女来维持生活。政府削减了公共医疗卫生和教育补贴，大多数贫困者和失业者不能再接受这些服务，在经济结构调整规划影响下，学校开始收取学费，这使入学率进一步降低。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也在下降。1993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项研究显示，津巴布韦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下降了 30%，妇女在分娩中死亡的人数是 1990 年的两倍，因为支付不起费用，很少有人再去诊所或者医院。[③]

---

① Kanyenz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Zimbabwean economy'.

② Mlambo,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 p. 91.

③ 关于结构调整计划影响的详细讨论，参见上书 83－100 页。

这一时期农村居民的境况也同样糟糕。[①] 在农业-工业部门有去工业化的现象,随着经济结构调整规划减少了分配给穷人的农产品数量,这种反作用导致农村地区贫困局势不断恶化。这也加剧了城市和乡村地区收入不平等。这些合力导致了一系列的困难:政府和农业投入服务减少、信贷时间短而又昂贵、乡村公路破坏严重导致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大幅降低。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增加了乡村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压力,节约开支的城市工人既不能把他们的家人送到乡村家庭,他们自己也不能和家人一块回到乡村。[②] 由于诸如种族不平等和土地归属权等问题在津巴布韦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内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政府逐渐增加的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高压政策导致以上潜在社会矛盾急剧爆发。

1990 年代的土地、经济和种族政治

190

1990 年代初期,津巴布韦面临严重的土地使用分配危机。到 1987 年,公用土地上的人口达到 510 万,全国人口密度为 36 人/平方公里,与 1982 年的 390 万人口和 27 人/平方公里相较涨幅巨大。[③] 由于政府在分配土地工作中的失误,随之而来的持续土地占有狂潮对国内稳定带来挑战,许多农民在表达土地诉求时变得更加激进。1990 年代,土地占用形式多样,农民有时候在酋长和当地战争退伍军人的带领下,不仅对私有土地而且对国有土地进行断断续续地侵占。同时,城市贫民为了保障食物来源,开始在国有土地和公共土地上进行农耕。[④]

1980 年代,津巴布韦政府和土地所有者通过暴力形式成功控制了

---

① 研究显示到了 1995 年,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津巴布韦农村人口年收入不足 4 000 津元;更不用说有足够的粮食或者是饲养足够的牲口来维持家庭生活。见 CSO,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 1995。

② S. Moyo, 'The Land and Agrarian Question in Zimbabwe', p. 9; Moyo, *Land Reform under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Zimbabwe*, p. 90; Chiwome, *Masango Mavi*.

③ Zimbabwe, *Population Census*, 1987.

④ Moyo, 'The Land and Agrarian Question in Zimbabwe', p. 8; Moyo, *Land Reform under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Zimbabwe*.

这些土地占领活动，但1990年代，土地占领的形势更加严重，政府被迫寻求和采取不同应对之策。[1] 为了加速土地收购，政府在兰开斯特大厦宪法终止两年后，推出了《土地收购法案》(1992年第3号法案)。这项法案尝试废除买卖自愿原则，加强政府权力，强制收购土地进行重新安置。但是，因为在500万公顷土地上重新安置11万户家庭的目标永远无法实现，政府基于行动进展的现实情况修订了目标。[2] 一系列原因导致计划失败，包括政府未能投入充足的资源来实施该计划，以及拥有商业土地农民的强烈反对。[3]

由于种种原因，津巴布韦社会继续处于严重种族分裂状态。黑人反对在种族划分形式下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地位。例如，愤怒的黑人商人成立了施压团体，希望政府和白人资本为其黑人成员创造更多的机会；同时，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希望政府增加支持补助金，游行常常伴随着针对北部郊区富裕白人或轿车等财产进行的袭击。[4] 虽然开着昂贵轿车的黑人驾驶员未能幸免，这直指白人的攻击表明其根源为种族矛盾。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对继续保留白人特权的一种普遍愤怒情绪。甚至津巴布韦亲资本性质的《金融公报》也警告道：

191

> 作为国民的一小部分，少数富人认为其余人等能够安于贫穷，并且自己能够安享财富，这显然是虚妄而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当这些穷人很明显地来自同一个种族时。[5]

---

① J. Herbst, State Politics in Zimbabwe (Harar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s, 1990); Moyo, 'The Land and Agrarian Question in Zimbabwe', p. 8.

② Moy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d Acquisition'.

③ 津巴布韦政府在1997年12月强制征用1 471个农场，总共有1 393人持反对意见，其中有510人支持。参见 Zimbabw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ial Land Review Committee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Dr Charles M. B. Utete (Harare: Government Printers, 2vols., August 2003), p. 20.

④ 这是1988至1995年之间，作者在津巴布韦大学学习、任教的亲身经历。

⑤ *Financial Gazette*, 25 Feb. 1992.

1990年,新建立的土著商业发展中心(IBDC)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黑人参与和控制经济局势。各种黑人游说团聚集起来,包括津巴布韦全国农场主联盟、女商人协会、津巴布韦运输协会和津巴布韦全国商会,土著商业发展中心的工作重心随着经济所有制结构变化而转移,除了领导其他黑人反歧视行动游说团,商业农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去种族主义原则也得到进一步重视。[①]

由于对土著商业发展中心有限的成果感到失望,一些年轻的黑人商人在菲利普·齐扬圭(Philip Chiyangwa)的领导下成立了平权行动组织(AAG),他们将外国人所有的公司实施本土化,在这些咄咄逼人的运动中争做急先锋。不久,这些平权团体的势头就压过了土著商业发展中心,他们对政府和现有的企业施加压力,为黑人商业的发展争取资金、政治支持和其他政策优惠。[②]

最初,有抱负的黑人资产阶级表示愤怒和不满,他们将矛头直指让其濒临破产的政府。例如,在1996年7月,土著商业发展中心附属的土著商业妇女组织即对政府提起了诉讼:

> 极力袒护跨国公司和前殖民者商业团体的利益来对抗外部竞争,因此这些人狼狈为奸、攫取经济掌控权……但是,政府并没有干预国内垄断集团和大亨们对积极进取的黑人商人实施恶性竞争。[③]

黑人精英的批评主要针对白人资本,指责白人商人和农民通过有组织的种族主义活动阻碍其成功。但是不久,由于平权行动团体内部人员以种族名义假公济私,该团体领导的一场消费者抵制未同黑人企 192

① Maphosa, 'Towards the sociology of Zimbabwean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 p. 185; Moyo, 'The Land and Agrarian Question in Zimbabwe', p. 13.

② Maphosa, 'Towards the sociology of Zimbabwean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 R. Sanders, 'Zimbabwe: ESAP'S fables', *Southern African Report*, 11(2), 1996, pp. 8－11.

③ Sanders, 'Zimbabwe: ESAP's fables'.

业家合资工厂的行动以失败收场。[1] 1994 年 7 月,一个黑人施压群体联盟,包括土著商业发展中心、平权行动团体、土著商业妇女组织和以津巴布韦大学为基地的桑佳诺·穆罕姆塔帕青年组织,在哈拉雷组织抗议游行,声讨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存在的预谋性种族主义活动。[2]

政府颇受欢迎的民族主义力量加大渲染力度,通过宣扬独一无二的黑人民族主义概念,成功地将这种愤怒强加并重新指向了白人。政府开始给予一些假公济私的种族团体外围支持。在公共论坛上,国家和政党的高层都开始倾向于指责白人并认为其应该对国内存在的问题负责。[3] 政府逐渐放弃了早期的怀柔政策和包容民族主义,开始采取具有种族性和排外性的民族主义立场。政府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重新开展了种族运动,试图在国内恢复关于权利、公平和公民权的讨论。这种深刻的转变在官方和民众的讨论中都有所提及,正如乔斯林·亚历山大所言,"在股份、条款和联盟中的关键性转变标志津巴布韦开始展开土地政治",这也包括资源的重新分配及其归属权的再次确认。[4]

由于独立以来缺少有效的社会一体化,以及在一些白人中普遍存在种族主义思想,种族问题既能产生分歧,也是可资利用的强大工具。独立后的 20 年,在学校教育、体育运动、居民区和其他社会活动几乎都没有什么一体化。而一些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在社会上自成一体,很多人保持社会隔离,"在很大程度上放弃积极参与国家建构进程"。[5] 正如塞尔比(Seiby)在谈及白人商业农民时写道:

---

① Maphosa, 'Towards the sociology of Zimbabwean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 p. 186.

② Maphosa, 'Towards the sociology of Zimbabwean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

③ A. Selby, 'Commercial Farmers and the State: Interest Group Politics and Land Reform in Zimbabawe' (D. Phil, thesis, Oxford University, 2006).

④ Alexander, ' "Squatters", veterans and the state in Zimababwe'; J. Alexander, *The Unsettled Land: State-making and the Politics of Land in Zimbabwe, 1893 – 2003* (Harare: Weaver Press; Oxford: James Currey, 2006).

⑤ K. Alexander, 'Orphans of the empire: An analysis of elements of white identity and ideology construction in Zimbabwe', in Raftopoulos and Savage(eds.). p. 194.

在结构调整时期，白人社区明显的富裕以及继续扩大社会隔离为反白人情绪提供了对象和催化剂。一位独立顾问认为商业农民联盟的种族排他性是其最大弱点和最致命威胁。白人中间的种族主义仍然普遍存在，农民对政府产生了怀疑，这可以通过居高临下的文化角度来解释。一些农民对种族色彩继续持保守态度。[①]

尽管独立后津巴布韦一些白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其他白人不得不躲入"种族飞地"中。[②] 例如，在城市区域，白人制造了一些可替代的空间继续隔离黑人，以示对黑人在郊区的侵扰做出回应，"从公共生活中离开，进入封闭的运动俱乐部、家庭娱乐和观影场所"。[③] 在哈拉雷，后独立时期的黑人开始进入以前只有白人才能进入的运动场所，如马贝瑞甘和埃文代尔，但富裕的白人却继续撤退到更加排外的郊区，如欢喜山和博罗戴尔等地；布拉瓦约的白人也做出了类似的举动。[④] 在一些新建的封闭式社区，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偏见仍未消除。[⑤]

一些俱乐部、餐厅和饭店实行会员准入制，进行变相隔离。[⑥] 在教育部门，政府实行去种族主义教育，允许黑人学生进入以前只允许白人就读的学校；一些白人家长祭出反制措施，他们新建了独立学校并设定

---

① Selby, 'Commercial Farmers and the State'. p. 242.

② 在1980年，有相当数量的津巴布韦白人对实行黑人多数统治做出反应，他们移民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国家。到了1984年，白人数量大约有10万人，与1960年代末的27万人相比，下降了63%。参见 Godwin, 'Whose kith and kin now?'

③ 同上。

④ C. Pickard-Cambridge, *Sharing the Cities: Residential Desegregation in Harare, Wind-hoek and Mafikeng* (Johannesburg: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1980), pp. 1－13; *Financial Gazette*, 30 Dec, 1999.

⑤ 关于南非种族隔离后种族主义空间进程的讨论，参见 J. Dixon and S. Reicher, 'Intergroup contact and desegregation in the New South Africa', *British of Community and Health Science*, 4(1), 1997, pp. 1－10。

⑥ 1996年，津巴布韦大学的压力团体桑佳诺·穆罕姆塔帕在哈拉雷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反对"种族俱乐部"的运动，俱乐部和餐馆的隔离问题凸显。运动中，学生对被指控有针对黑人进行有组织的种族主义行为的俱乐部开展纠察活动。

194 高额学费，将大部分黑人中等和低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拒之门外。[①] 由于缺少社会一体化，类似的情况也在运动领域中发生，尤其是以前白人专享的橄榄球和板球等球类项目。

尽管不得人心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政府有能力巩固其权力，例如将愤怒的黑人中产阶级和农村地区的酋长群体联合起来，但是在城市地区，焦虑的社会群体如失业的学生和工人不断反抗，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权力被逐渐削弱。

城市地区的不稳定和政治合作与对抗

在实施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中产生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将城市市民进一步推向了深渊，他们用激进的煽动行为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在1990 年代早期，工人和失业者发起群众运动，通过罢工来回应经济结构调整规划带来的贫困。[②] 津巴布韦工会大会逐渐脱离国家并变得更加具有对抗性，因为只有这样它才有能力维护其权威。1992 年6 月，工会大会组织了一场反对政府经济改革计划的游行，但由于民众参与程度低，最终遭到了警察的残酷镇压。工会大会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一个动员和鼓励受威胁工人奋起反对政府及其雇主的组织实体。[③]

但是，由于工资持续降低，工人群体不安情绪激增。1996 年 6 月的公共部门罢工是津巴布韦后独立时期由公务员组织的规模最大的罢工；教师、医生、护士和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了为期八周的自发罢工抗议，他们还得到学生团体、人权组织和教会的共同声援。虽然政府最初对此作出的反应仅是宣布其是非法活动，扣留工会领导人并拒绝进行谈

① . R. J. Zovbgo, 'Educat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independence', in Mandaza (ed.), *Zimababw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p. 337.

② R. Sauders, 'Striking ahead: Industrial action and labour movement development in Zimbabawe', in Raftopoulos and Sachikonye(eds.), *Striking Back*, pp. 133 - 173.

③ B. Raftopoulos, 'The labour move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opposition politics', in Raftopoulos and Sachikonye(eds.), *Striking Back*, p. 11.

判,但是这次罢工几乎席卷全国,对政府至高无上的权威产生了强大冲击。[①]

这次之后,工会继续组织了一系列罢工反对私营企业的雇主和政府。1997 年 12 月的总罢工将浪潮推至顶点,成功迫使政府放弃了对工人征收新税的计划。衰退的经济形势对于公众对政府的愤怒情绪来说是火上浇油。1997 年 11 月政府未将战争中老兵的补贴金编入预算,诸如此类的原因促使津巴布韦工会大会在这一时期动员工人活动的能力增强。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大罢工和示威行动,不只是工人参与,也吸引了其他城市社会团体,包括失业者、学生以及一些争取人权和民主的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其中。这样,劳工同其他争取工人权利和社会公正的人们联合起来成立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工会便开始运转。[②]

195

在这一时期,民间社会团体逐渐变得强势,它们从 1980 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只局限在国家发展工程的建设中。而现在它们开始质询



图 6.3　1997 年大罢工时期的警察(来源:私人收藏)

① Raftopoulos, 'The labour movement', pp. 10－11.

② Raftopoulos, 'The labour movement'; Dansereau, 'Liberation and opposition in Zimbabwe'.

国家根除贫困的承诺,批评政府针对异议者不断扩大的偏执政策。[1]即使是教会也不断深入地参与到尘世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它们在历史上总是有效地回避"信仰问题"以外的活动。教会在涉及社会公正问题时总是发挥模糊不清的作用,不管是在国家选举还是责任退让等问题上都依然宣称中立。许多传教士旨在传播福音,他们将自己奉献到学校、医院、人道主义项目、孤儿、寡妇和弱势群体的照顾等国家发展建设中。[2]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在独立后试图建立民间的自治机构实现垄断,教会与其政治偏执产生冲突,但教会依然避免公开批评政府,正如大卫・麦克斯韦(David Maxwell)和萨拉・理查・多尔曼(Sarah Rich Dorman)的观点,"他们试图让自己适应政府"。[3]

然而,在逐渐增加的社会和经济压力背景下,不仅更多的人来到教会寻求物质和精神支持,而且教会本身也对政府有越来越多的批评。1994 年,一些以教会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联合起来,在 1990 年代早期成立的普世教会的支持下重新评估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对其成员带来的影响。津巴布韦天主教正义与和平委员会(CCJPZ)——在历史上它谴责罗得西亚阵线的暴行以及在古库拉洪迪的屠杀——天主教教会的西尔维拉审议机构(Silveira House)和卫理公会主教全都在努力扩大关于经济结构调整规划的辩论。[4] 虽然没有必要同政府采取对抗性的立

---

① S. Dorman, 'NGO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debate in Zimbabwe: From inclusion to exclusion',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29 (4), 2003; Raftopoulos and Alexander, *Reflections on Democratic Politics in Zimbabwe*, p. 35.

② D. Maxwell, Christians and Chiefs in Zimbabw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M. Lapsley, Neutrality or Co-option? Anglican Church and State from 1964 until the Independence of Zimbabwe (Gweru: Mambo Press, 1986); F. J. Verstraelen, Zimbabwean Realities and Christian Responses (Gweru: Mambo Press, 1998).

③ D. Maxwell, 'The church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The case of Zimbabwe', in P. Gifford (ed.). The Christian Churches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Africa (Leiden: Brill, 1995); S. R. Dorman, ' "Rocking the boat?" Church NGO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Zimbabwe', *African Affairs*, 101, 2002, p. 79.

④ Dorman, ' Rocking the boat?', pp. 82 – 83.

场，但是一些健全的教会，如津巴布韦天主教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和津巴布韦教会理事会，开展了一些活动，如政策宣传、公民教育、选民教育和选举监督等。[1]

如津巴布韦妇女资源中心和网络以及穆萨萨项目(the Musasa Project)等妇女团体也变得更加活跃。由于男性人口大量减少，妇女逐渐承担了养育家庭的重担，独立后大部分妇女在经济方面仍然处于边缘地位。[2] 这些团体另一个主要关注点在不断增长的家庭暴力。[3]

随着抗议的增加，政府加大了镇压力度。政府在 1992 年修改了劳工关系法案，大大减少了工人罢工的权利，有争议的总统权力法案(1986 年第 1 号法案)偶尔会宣布停止或者暂停针对国家的罢工。[4] 但是，政府没能阻止罢工和游行，他们逐渐部署警察和军队开展剧烈的武力行动。

为了巩固统治、掌控人民，政府对法律、媒体和安全部门加强了控制。穆加贝总统越来越多地关注安全部门，尤其是军队，防止各种不满的出现。通过他的培养系统，他设法与军队领导人保持了密切联系。[5]

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穆加贝领导的政府也转向战争退伍军人问题，处理来自党内外不断增加的反对意见。从 1970 年代独立战争开始，在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内部，政党-军队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军队常常对政党

---

① Dorman, 'Rocking the boat?', p. 81.

② N. Kanji and N. Jazdowska,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low-income urban women in Zimbabwe',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56, 1993, pp. 11－26; Moyo, Moyo, *Land Reform under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Zimbabwe*.

③ Raftopoulos and Alexander, *Reflections on Democratic Politics in Zimbabwe*, p. 40.

④ L. Madhuku, 'Trade unions and the law', in Raftopoulos and Sachikonye(eds.), *Striking Back*, pp. 105－132.

⑤ UN, 'Final Report of the Panel of Experts on the Illegal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Other Forms of Wealth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16 October 2002. Available at <http: //www. afrol. com/Countries/DRC/documents/un_resources_2002_govt_zim. htm>.

政治拥有显著的话语权。[1] 诺玛·克里格认为战争退伍军人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不仅严重依靠暴力、要求得到解放战争时期的话语权来建立它们的权力与合法性,而且他们之间彼此串通、相互利用,从而在军队、警察、官僚和其他工人之间获取权力和特权。[2]

但是,克里格自己也承认,这种关系摇摆不定,归因于从解放战争中延续而来的紧张局面,如 1974 年的巴德扎/恩哈瑞叛乱和 1977 年的瓦沙第危机。[3] 1980 年之后,退伍军人的利益常常与那些政客们的产生冲突,范·钟认为,政府中的许多职员害怕退伍军人团体联合、组织起来的权力。[4] 政府因此只是勉强允许他们建立代表组织,1989 年 4 月建立了津巴布韦民族解放战争退伍军人协会(ZNLWVA)。这是"当政府不愿意援助前战斗队员的倾向变得更加清晰的时候,他们采取的一个应对举措"。[5] 即便如此,政府试图约束这些退伍军人,强迫他们在政治上忠诚地接受政府领导,直到 1997 年车杰拉·洪兹维出现。

198

在整个 1980 年代和 90 年代早期,激进的战争退伍军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前者希望向穷人重新分配土地和其他资源,后者希望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在自我扩张和个人积累方面审视本土化进程。虽然许多退伍军人仍然对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土地问题、失业、被

---

① Ndlovu-Gatsheni, 'Nationalist-military alliance'; Sithole, *Struggles within a Struggle*.

② N. Kriger, Guerrilla Veterans in Post-War Zimbabwe, p. 103; N. Kriger, 'War veterans: Continuities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7(2&3), [online], <http://web.africa.ufl.edu/asq/v7/v7i2a7.htm>.

③ D. Moore, 'The Zimbabwean "organic intellectuals" in transition',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5, 1988, pp. 96 – 105; Sithole *Struggles within a Struggle*; Chung, *Re-living the Second Chimurenga*.

④ Chung, *Re-living the Second Chimurenga*. p. 302.

⑤ M. Musemwa, 'The ambiguities of democracy: The demobilization of the Zimbabwean excombatants and the ordeal of rehabilitation, 1980 – 1993', Transformation, 26, 1995, p. 40.

忽视和政府腐败心怀不满，[①]但是政府并没有太关注他们，因为其权威没有受到其他群体的挑战。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政府为了巩固权力，决定维护战争退伍军人的利益。

最初政府忽视了津巴布韦民族解放战争退伍军人协会，随后政府同其谈判，颁布了《战争退伍军人管理条例草案》(1991年)、《战争退伍军人法案》(1992年第4号法令)和《战争受害者补偿法案》(1993年)，最后一个法案针对战争中所有受伤的战斗队员，根据他们的伤残程度给予经济补偿金。[②] 这种“新伙伴”于1997年确立，遭到战争退伍军人的抗议后，尤其是在战争退伍军人首领琴杰拉伊·胡恩佐威的领导下，他们在政党办公室将穆加贝总统团团包围，最终政府同意向他们提供预算外的5万津元(约合4 500美元)资金和每月2 000津元的补偿金。

在乡村地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在1990年代通过逐渐集中权力和权威来巩固政党权力。随着国家和执政党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政府在乡村地区重新与酋长和有影响力的权威人士缔结成同盟。[③] 1998年颁布了《传统领导人法案》(1998年第25号)，授予传统领导人处理土地和自然资源问题，如审判盗窃牲畜等犯罪行为以及调解家庭纠纷。这有效地排挤了民选的村镇发展委员会和守护发展

199

---

① 1980年，在65 000名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和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游击队成员中，只有20 000人加入了津巴布韦国民军。其他人复员，每月获得185津元的补贴，一直持续到1983年，但是许多人没有接受技术培训，此后他们逐渐变得穷困。See Kriger, Guerrilla Veterans in Post-War Zimbabwe; Barnes, ‘The heros'struggle’; Zimbabwe Women Writers (ed.). *Women of Resilience: The Voice of Women Ex-combatants* (Harare: ZWW, 2000); Musemwa, ‘The ambiguities of democracy’, pp. 31－46.

② 1993年到1996年，补偿金计划的实施变得混乱，政党领导人通过在计划中伪造歪曲请求权，将战争退伍军人排除在外，从而撤回部分基金，将这些钱据为己有。See T. K. Chitiyo, ‘Land violence and compensation: Reconceptualising Zimbabwe's land and war veterans' debate’, *Track Two*, 9(1), May 2000, Available at <http://ccr.uct.ac.za/archive/two/9_1/zimbabwe.html>.

③ See Hammar, ‘Disrupting Dempcracy?’, pp. 13－21; A. Hammar, ‘The making and unma(s)king of local government in Zimbabwe’, in Hammar *et al.* (eds.), Zimbabwe's Unfinished Business, pp. 119－154; J. Alexander, ‘State, peasantry and resettlement’,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61, 1994, 325－345; McGregor, ‘The politics of disruption’, pp. 9－37.

委员会，也反映了1980年代早期乡村治理民族化的成就是非常有限的。[1] 传统领导人不再对政府负责，他们现在被认为在巩固马哈茂德·马姆达尼描述的“分散化的专制主义”中发挥重要作用。[2]

结论

在独立后第一个十年早期，津巴布韦毫无疑问取得了一些有限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的发展、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投入，以及农业产量等方面。这些进步使国家在国际上更具竞争力，这是一份持久的遗产，但是就本质而言，这些进步大部分只是福利主义的权宜之计。许多计划无法长久实施，而政府也没有充分解决这一系列严重问题，包括土地和经济资源归属、公正和平等、民族国家的重构、政治包容与开放以及国家意识与公民权等问题。因此，殖民后政府的诸多努力只是徒劳，其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和无种族的社会目标在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也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秩序的基础还有待夯实。

总之，政府很少有针对殖民经济或者是经济不平等遗留问题的彻底改革。许多遗留下来的紧张关系和分歧意见都源于没有得到解决的种族、民族、区域主义、阶级和性别问题。这些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和分歧贯穿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当经济开始严重衰退，由贫富差距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对实现其目标政府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在政治方面，实施国家建构计划时主要依靠高压而不是顺从，缺少对政治多元化和持不同意见者的宽容。国家垄断了公民的话语权，国家意识也仍然狭隘而单一。

200

尽管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做出了种种努力，其排斥民主空间，建立凌驾于人民之上的霸权和统治的谋划是无法得逞的。

---

① E. Masunungure and N. Musekiwa, ‘Local Government Policy Review’ (Policy Document Prepared for the Zimbabwe Institute, 2005), pp. 10-11, 13-14, 26-27.

② 关于“分散化的专制主义”概念的详细讨论，参见 M. Mamdani, 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在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政府努力把它自己的政治理想强加在人民头上。它的权力受到许多团体和个人的持续挑战,这些团体和个人感受到自己被排除在国家项目发展和政治经济结构之外。这些挑战确保了不受欢迎的政策总是会被质疑,民主化的趋势在人民大众中是能够共存的,只是实现它并非易事。

第七章　津巴布韦危机 (1998－2008)

布莱恩·拉夫托普洛斯(Brain Raftopoulos)

引言

201　从1990年代末起,津巴布韦进入了一个通常被称为"津巴布韦危机"[①]的时期。这场剧变包含了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双重衰退,其根源在

① 关于"津巴布韦危机"的文献资料众多,以下所列仅为部分精选的资料: A. Hammar, B. Raftopouios and S. Jensen (eds), Zimbabwe's Unfinished Business: Rethinking Land, State and N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risis (Harare, Weaver Press, 2003); Patrick Bond and Masimba Manyanya, Zimbabwe's Plunge: Exhausted Nationalism, Neoliberalism, and the Search for Social Jusice (Harare: Weaver Press; London: Merlin, 2nd edn., 2003); Jocelyn Alexander. The Unsetteled Land: State-making and the Politics of Land in Zimbabwe, 1893－2003(Harare, Weaver Press; Oxford: James Currey, 2006); S. Moyo and P. Yeros, 'Land occupations and land reform in Zimbabwe: Towards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S. Moyo and P. Yeros(eds), Reclaiming the Land: The Resurgence of Rural Movements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Cape Town: David Philip; London: Zed Press, 2005), pp. 165－205; S. Moyo and P. Yeros, 'The radicalized state: Zimbabwe's interrupted revolution',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111, 2007, pp. 103－121; D. Moore, 'Is the land the economy and the economy the l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in Zimbabw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19 (2), 2001, pp. 253－266; D. Moore, 'Zimbabwe, s triple crisis: Primitive accumulation, nation-state form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ge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转下页)

于殖民统治由来已久的结构性的经济和政治遗留问题以及非洲民族主义政治的影响。危机爆发使当时的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简称“民盟”)的政治前途受到严重威胁。这场危机表现为多种形式：由土地和财产权引发的冲突，关于民族主义和公民权之历史与意义的争论，主要围绕工会、人权和宪法问题开展运动的民间团体涌现，国家以更专制的形式进行重构，津巴布韦斗争中泛非和反帝的含义更趋广泛，津巴布韦文学作品中关于这场危机的文化再现，以及核心人物罗伯特·穆加贝。

202

随着危机不断发展，各种社会力量考虑过去和现在的基本情况，均提出各自对危机的处理方案。执政党倡导复兴民族主义，突出其在国家解放中的特殊作用，提倡优先为土地而战，除支持选编的“爱国历史”外，将一切妖魔化。执政党还扩大立场，成为历史更长的非洲大陆、全球泛非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新兴的工会、民间政治反对力量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号召为劳工、人权、地方政府、性别歧视开展反殖民斗争，号召响应 1989 年后由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而引起的全

(接上页) 7(2&3), 2003, [online], http://www.africa.ufi.edu/asq/v7/v7i2a2.htm>; and I. Phimister, ‘Zimbabwe now: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isi and coerc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2(4), 2004, pp. 355－382. B. Raftopoulos and I. Sachikonye(eds.), Striking Back: The Labour Movement and the Post-colonial State in Zimbabwe, 1980－2000(Harare, Weaver Press, 2001); T. Ranger,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patriotic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The struggle over the past in Zimbabwe’,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30(2), 2004, pp. 215－234; T. Ranger(ed),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Zimbabwe: Volume Two: Nationlis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Harar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s, 2003); B. Raftopoulos and T. Savage(eds.), Zimbabwe: Injustice and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Harare: Weaver Press; Cape Town: 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2005); B. Raftopoulos and I. Phimister, ‘Mugable, Mbeki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imperialism’,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101, 2004, pp. 127－143; R. Primorace and S. Chan(eds.), Zimbabwe in Crisis: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and the Space of Silence(London: Routledge, 2007); R. Muponde and R. Primorac(eds.), Versions of Zimbabwe: New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and Culture(Harare, Weaver Press, 2005); Martin Meredith, Our Votes, Our Guns: Robert Mugabe and the Tragedy of Zimbabwe(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2); Heidi Holland, Dinner with Mugabe: The Untold Story of a Freedom Fighter Who Became a Tyrant(South Africa: Penguin, 2008).

球民主化进程。

津巴布韦危机一个重要表现是经济迅速衰退，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工农业生产力大幅下跌，恶性通货膨胀创历史新高，劳动的信息化(informalisation)，经济交易美元化，人民流离失所，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这场经济危机对津巴布韦各种社会力量的整体平衡造成了严重影响，也对国家重构提出了巨大挑战。本章要述说的正是这场危机的方方面面。

1990 年代晚期执政党面临的挑战

从 1998 年起，工人和民间组织对国家施加的压力加剧。截至 1997 年末，数个重要经济指标都显示出了这个国家面临着挑战：工资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由 1987 年的 54%跌至 1997 年的 39%，同期的利润率由 47%升至 61%；实际工资指数由 1985 至 1990 年间的 100.6 减少为 1996 至 1999 年间的 86.1；就业增长指数由 2.4 萎缩至 1.5，而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却由 11.6%飙升至 32.6%；贫困水平由 1990 至 1991 年度的 40.4%上升到 1996 年的 63%。[①] 此外，津巴布韦政府还于 1998 年出兵刚果民主共和国。最初它作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的一员，前往维持安全局势，但它发现这次出兵带来了众多经济拓展机遇。津巴布韦国防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建立的“成本低、有利于商业活动的”网络系统富有吸引力，津巴布韦为此特别鼓励企业进入该国市场。[②] 但到了 1990 年代末，津巴布韦出兵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成本使政府结构性调整方案的失败雪上加霜。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国内发展和扩大出口等日益失衡，国家、资本和劳动力三者之间建立社会契约的可能性不断缩小，这些情况使未来发展策略的制定陷入了僵局。正如丹塞罗(Dansereau)所言，结果是民盟“倒退到压制、孤立

203

① G. Kanyenze and B. Chiripanhura, ‘The State of Union Organisation in Zimbabwe’ (Harare: unpublished paper, 2001).

② M. Nest, ‘Ambitions, profits and loss: Zimbabwean economic involvement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frican Affairs, 100, 2001, pp. 469 – 490.

的状态,它采取的战略是扶持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经济精英,利用国家来消除其扩张的障碍”。[①]

到了1980年代末期,随着经济危机的恶化,工人和工会表现出对国家政策日益强烈的对抗情绪。截至1997年,津巴布韦已发生了百余起变相罢工事件。[②] 1998年1月,因为玉米面价格飞涨,从首都哈拉雷到拜特布里奇(Beitbridge)、彻故图(Chegutu)、切赫伊(Chinhoyi)等较小的城镇均爆发了粮食暴乱(food riot)。政府对此予以残酷无情地回应:十人被打死,数百人被安全部队逮捕和殴打。但更大的集体行动随之而来,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人权组织和妇女团体等建立了广泛的同盟,产生了津巴布韦历史上最卓有成效的社会运动之一——全国制宪大会(NCA)。

在1990年代中期,津巴布韦的非政府组织已经致力于解决创收、人权、环境、艾滋病、性别歧视和贫困等诸多问题;随后几年,津巴布韦在劳工、立宪和民主化等领域都发生了激烈的社会运动。[③] 此外,这一进程也推动了争取民主变革运动(MDC,简称“民革运”)在1999年诞生。它是津巴布韦殖民后时期最成功的反对党派。尽管以上这些社会运动对政府都持强烈批判和对抗的立场,同期的退伍老兵运动对国家却采取了以“合作、对抗、和解”为特征的态度。退伍老兵运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在90年代末期才达到高潮。[④]

204

---

① Suzanne Dansereau,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Zimbabwe's development impasse’, in H. Melber (ed.), *Zimbabw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cline* (Uppsala: Nordic Africa Institute, 2005), p. 25.

② Suzanne Dansereau, ‘Labour and Democratisation: Potential of Labour's Political Challenge in Zimbabwe’ (Cape Town: unpublished paper, 2002); R. Saunders, ‘Striking ahead: Industrial action and labour movement development in Zimbabwe’, in Raftopoulos and Sachikonye (eds.), Striking Back, pp. 133－174.

③ S. Moyo, J. Makumbe and B. Raftopoulos, *NGOs, the State and Politics in Zimbobwe* (Harare: SAPES Bools, 2000); B. Raftopoulos, ‘Civic Organisations, Governance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Zimbabwe’ (Harare, unpublished paper, 2000).

④ N. Kriger, ‘Zimbabwe's war veterans and the ruling party: Continuities in political dynamics’, Politique Africaing, 81, 2001, p.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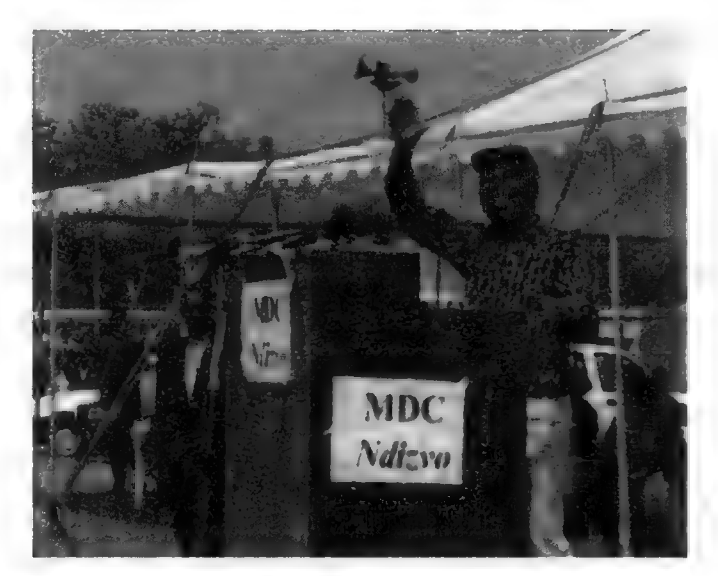


图 7.1 摩根·茨万吉拉伊在民革运集会上发表演讲(埃德温娜·斯派塞 摄)

劳工斗争、宪政改革和国家权力之争

1998 年 1 月爆发了粮食暴乱,此后,津巴布韦工会大会继续对政府施压,要求废止从 1997 年末开征的营业税、发展税和提升物价措施。工会大会还要求设立一个制度健全的经济政策咨询机构,工会大会在其 1996 年的文件"超越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中首次提出了这一建议。[①]在津巴布韦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工人运动发挥的主导作用愈发明显。其大会章程提出:

> 各行各业的人深切期盼从工人运动中得到拯救。因此,工人运动应该慎重考虑和理解普通人(man in the street)的要求。我们需要考虑工人以外的人群,团结普通大众。对津巴布韦工

① Zimbabwe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ZCTU]. Beyond ESAP: Framework for a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Zimbabwe beyond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Harare: ZCTU, 1996).

> 会大会来说,关键是走出去,参与各层面的改变,同时,大力强化组织。工人问题已经成为社区问题,尽量与其他民间团体建立联系、形成网络非常重要。我们要有能力控制和引导社会活动,把握方向。我们要在活动发生偏差时予以纠正,维护活动的合法性。[1]

205

整个1998年,津巴布韦工会大会一方面不断与其他民间组织建立更广泛的同盟战线,另一方面也在苦心经营自身建设。1998年4月,秘书长摩根·茨万吉拉伊发起了一场讨论,探讨"应该将重点放在集体谈判还是国家大事上……如何两者兼顾以便问题能得到更好地解决?"[2]因此,即使工会大会试图通过全国经济协商论坛来参与政事,但论坛的重点仍是大规模群众活动;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在1998年组织了三次卓有成效的游行活动,一次在3月,两次在11月。与政府谈判毫无进展,工会大会在受挫后宣布:

> 如果工人通过在车间的工业生产劳动无法得到保障生存的工资和体面的工作环境,他们可以越过车间管理层把问题摆到国家台面上,让问题政治化。此外,当工会被边缘化,政府抛弃达成全国共识的意愿,而工会也无法成功通过政府的国家改革解决这些问题时,唯一的求助途径是在国家层面采取行动。[3]

面对工人阶级如此强烈的反抗情绪,津巴布韦政府在1998年11月强制颁布了《1998年总统权力(临时措施)劳动法规》(1998年368A号法定文书),对煽动和帮助罢工、游行或其他形式非法集体行动的工

---

① ZCTU, 'Minutes of the Special General Council Meeting held at Adelaide Acres on 30 January 1998'.

② ZCTU, 'Minutes of the Special General Council Meeting held on 22 April, 1998 at Adelaide Acres'.

③ ZCTU, 'Special General Council Meeting, 30th January 2008'.

会和雇主予以严惩。

当工人运动正权衡工厂以及更广泛的政治考虑，意图掌控事态发展方向时，它还不得不应对自身严重的组织挑战。这些问题在 1990 年代中期就已经十分明显。推动工厂车间参与工会组织的进程十分缓慢，技能培训工作毫无起色，中央组织与地方组织之间的联系也相当薄弱。工会大会注意到在一些地方建设地区委员会的必要性，因为在一些地方，例如马斯温戈(Masvingo)，"绝大多数行政区的工会组织不过是空架子，而在有些地方，不隶属于本工会组织的人却在该工会大会中身居要职。"[①]另外，由于劳工中心的下属机构不需支付会费，中心面临财务运转问题，"被迫向企业借钱以维持运作"[②]。

206

在这种背景下，津巴布韦工会大会利用其在 1997 年建立全国制宪大会时发挥的关键作用来一展自己更宏伟的政治抱负。鉴于工会和民族主义政治家们自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就关系紧张，工人运动提出建立民间政治反对派，这不仅基于一直以来的对民族主义和公民权争议的传统[③]，也考虑到 1980 年后工人运动与其他民间社会组织有一起解决经济结构调整计划、贫困、人权、城市居住权等问题的经历，事实证明这种合作对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至关重要[④]。因此，工人运动举全国之力，建立更大公民联盟的能力对 1990 年代末期出现另一种民主声音具有决定性影响。

全国制宪大会在津巴布韦教会理事会的倡议下建立起来，由"宗教组织、工会、行业协会、基层组织、媒体机构、学术机构、企业以及妇女、学生和人权等相关组织"的成员组成。全国制宪大会的成立为 1997 年

---

① ZCTU, 'Minutes of the Special General Council Meeting held at Adelaide Acres on 29th August 1998'; R. Saunders, 'Trade Union Struggles for Autonomy and Democracy in Zimbabwe' (Harare: unpublished paper, 1996).

② ZCTU, 'Minutes of the Special General Council Meeting held on the 28th July 2000'.

③ 见本书第三章。

④ A. LeBas, 'Polarization and Party Development: Capturing Constituencies in Democratizing Africa' (Ph. 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2006).

之后反对派政治的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①]。虽然全国制宪会议在1998年才正式宣布成立,但它在获得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斯蒂夫汤(Friedrich Ebert Stiftung)[②]提供的种子基金(seed funding)后,就已经于1997年8月的一次会议中确立了自己的主要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发起并参与目前津巴布韦民众的宪法启蒙运动;指出现行宪法的不足之处并且组织讨论宪法改革的可行性;组织宪法讨论,让更多的民众参与;保证宪法制定过程接受民众监督,确保宪法民治、民享的原则;大力培养民众参与决策的文化。[③] 在全国制宪大会成立之初,许多成员要求成员资格政治多元化,但当时政治两极分化,导致了2000年的宪法公投,使这一提议实现起来难上加难。津巴布韦天主教正义与和平委员会的迈克·欧瑞特(Mike Auret)是提出这一诉求的人士之一。1997年7月,欧瑞特提出:

207

> 既然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运动,我要求所有特别工作组成员都可以宣布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然后,特别工作组必须力争吸纳那些没有成员代表的思想派别。我相信,最基本的是自由民主派和民主社会派应该有代表参加。我也相信,在实现该目标的过程中,那些绝对相信非种族主义理想的,与绝对相信平权行动与黑人意识的人士之间会存在意见分歧。还有人把本土化自身作为一个目标,对非种族主义的目标没有特别兴趣。特别工作组必须对这些不同的思想意识和其他意见予以保护。[④]

---

① E. McCandless, 'Zimbabwe Forms of Resistance: Social Movements, Strategic Dilemmas and Transformative Change' (Ph. D. thesis, American University, 2005), p. 209. For another good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NCA, see Sara Rich Dorman,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NGOs and Politics in Zimbabwe' (D.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② National Constitutional Assembly [NCA], 'General Meeting of the 30th January 1998: Task Force Report: 1st Interim Report for 1998'.

③ NCA, 'Second Interim Report of the Taskforce to the Assembly 1997'.

④ 摘自迈克·欧瑞特在1997年7月21日写给全国制宪大会特别工作小组的信件。欧瑞特还在这封信里提到,津巴布韦历史上许多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之一即是全国制宪大会应该被命名为"民主宪法运动"。

1998 年 1 月 31 日，全国制宪大会在津巴布韦大学正式宣布成立，但事实证明其后的宣传普及工作更充满挑战，特别是 1999 年 3 月政府另设了自己的宪法委员会之后。民盟的法律秘书埃迪森·祖沃布戈(Edison Zvobgo)对全国制宪大会根本不屑一顾，他说道："几个人坐在大树下就宣称自己是全国制宪大会，这怎么可能？他们既不是宪法，也不是大会。"[1]全国制宪大会基本上被剥夺了在公共媒体上进行宣传的机会，又必须与财大气粗的政府宪法委员会的大举宣传活动相抗衡。在这种情形下，全国制宪大会开始发展自己的社区延伸项目。尽管双方支持者的立场更加对立，但在 1998 至 2000 年初这段时间，开展生机勃勃的宪法改革政治讨论仍有足够的政治空间。

208

到 1997 年底，全国制宪大会的公开露面仅限于独立会议和研讨会。在对这一策略的早期评估中，全国制宪大会注意到：

> 总的说来，迄今为止我们召开会议的经历只说明了一个悲观的事实，我们的后续策略捉襟见肘。这就很像特别工作组在注视火星上的一块区域，却武断地对宪法发表意见，甚至说看到了欢欣鼓舞的民众——然后再回看地球上的哈拉雷，人们的生活依旧如昔……我们务必找到强化项目地方归属感的方法，这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我们的特别工作组和大会才能保持初衷。[2]

全国制宪大会的组织成员广泛参与了工人运动中的各个项目，而后事实也证明这对"强化项目地方归属感"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除了教会的工作外，津巴布韦工会大会很好地发挥其组织机构的关键作用，这对全国制宪大会的工作也极其重要。在 1998 年 1 月的总理事会会议上，津巴布韦工会大会重申了其在全国制宪大会事业中的作用，并指

---

① 引自 McCandless, 'Zimbabwe Forms of Resistance', p. 210.

② NCA, 'Second Interim Report 1997'.

出“当前津巴布韦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是如何制定民主治理的规章制度”[①]。尽管不时会有总理事会成员质疑“津巴布韦工会大会在全国制宪大会中的地位”[②]，工人运动依然致力于制宪事业。在城市地区，城镇居民协会网络于 1990 年代末期不断壮大，为工人运动添砖加瓦。除此之外，妇女组织在将宪法讨论推向农村地区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商业农民团体也功不可没。正如希琳·艾索夫(Shireen Essof)在其文章中所言，在 1995 至 1998 年间，津巴布韦的妇女组织重新定义了其战略，积极参与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活动。这种战略见证了组织基地、农村网络和关键性人物“因各种问题导向的配置和战略组合需要走到一起，根据需要进行组合、解散和再组合”[③]。在这种背景下，妇女宪法联盟组织于 1999 年 6 月成立，并在此后的动员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 1999 至 2000 年 3 月全民公投期间，津巴布韦围绕宪法展开争论。政府在 1999 年成立制宪委员会，试图掌控宪法改革的进程和结果。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广泛深入的咨询过程，在全国范围推动政治讨论的开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盟内部也压力重重。1995 年后，国会议员提出议会改革、宪法改革，有时还要求更换领导人。由于在党内更换领导人的空间有限，一些团体希望宪法改革进程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更可行的办法。[④]

209

由于许多民间组织者都是全国制宪大会的成员，国民讨论围绕公民权、政府问责和扩大民主空间等议题展开。尽管实施改革已经在全国制宪大会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但它仍然是公民运动的一个主要诉求。辩论一开始围绕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后来转向政府委员会的人选组成

① ZCTU, ‘Second General Council Meeting, 30th January, 1998’.

② ZCTU, ‘Minute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Meeting on the 26th June 1999’.

③ S. Essof, ‘Women in Movement’, in K. Alexander (ed.), *The Futur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Zimbabwe* (Cape Town: Institute fou Justice and Recondiliation, 2006), p. 47.

④ B. Rafttopoulos, ‘The State, NGOs and Democratisation’, in S. Moyo, J. Makumbe and B. Raftopoulos, NGOs the State and Politics in Zimbabwe, pp. 21－46.

和宪法草案,特别是总统府坚持的中央集权条款,全国制宪大会拒绝这一条款。全国制宪大会反对政府拒绝"以议定的法律框架来指导制宪过程"的行为,也担心政府会利用《1941 年调查委员会法案》(第十章第七节),将其作为行政工具"操控立宪的过程和结果"。全国制宪大会赞成"召开一个所有利益相关者参加的大会,会议要建立共识,以人民为中心"。[①]

1999 年 9 月民革运成立,加大了推进宪法改革进程的筹码。成立民革运源于一系列的民间斗争,特别是劳工运动和立宪运动。1999 年 2 月的全国劳动人民大会采纳了民间团体关于成立该党的正式决议。在立宪问题上,大会指出:

> 国家无力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解决基本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源于国家内部的政府危机。这种危机使政府无法兑现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之间的分权,无法遵守基本的问责和透明原则,无法尊重人权,无法分散权利让人民有效参与政府公共机构事务。[②]

210

因此,基于执政党和民间宪法改革运动关键人物的共同考虑,全国制宪大会围绕宪法改革的动员工作也与政府的变革联系在了一起。民革运以摩根·茨万吉拉伊担任主席,它的许多领导人来自津巴布韦工会大会、全国制宪大会和其他民间组织。当抵制政府宪法草案的运动越来越激烈时,民革运、劳工运动、全国制宪大会、妇女组织、学生群体以及其他许多相互交叉渗透的民间组织都表示支持抗议[③]。除此之外,全国制宪大会和民革运都得到了白人农场主们的支持。失去土地的威胁日益加剧,而之前与民盟签署的协商安排也已破裂,白人农场主在 1999 年决定倒戈加入新的反对派政治运动中。因此,当全国制宪大

---

① NCA, 'Task Force Report Presented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28th October 2000'.

② 'Declaration of the National Working People's Convention', Harare, February 1999.

③ LeBas, 'Polarizaion and Party Decelopment', p. 157.

会在城镇地区非常有效地开展工作时，商业农民也“开始在当地动员农民拒绝宪法，并印制T恤和宣传单来呼吁投反对票”[①]。在2000年大选时，白人农场主也是民革运的一支重要支持力量。

由于广泛的利益联盟团结在全国制宪大会和民革运周围，政府在2月12至13日的全民公投中铩羽而归，参与投票的130万选民中有54%投了反对票。[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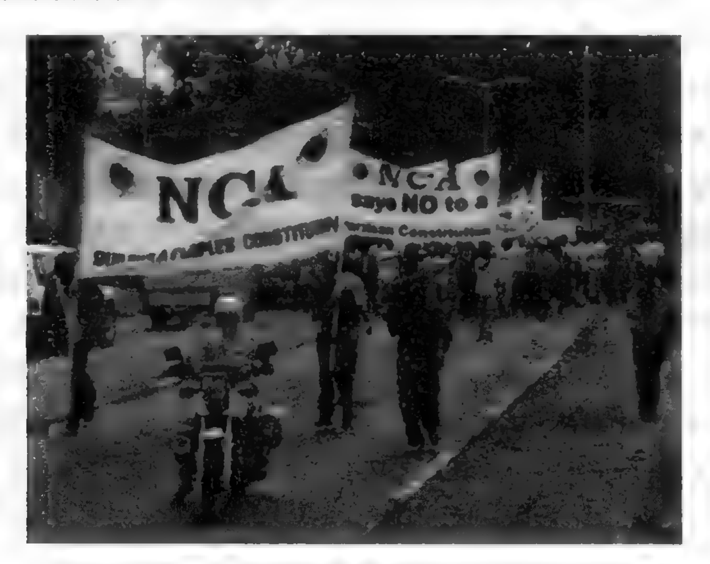


图7.2　民革运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政府的宪法草案（埃德温娜·斯派塞 摄）

土地与政治

211

政府宪法被否决标志着执政党的首次重大政治失败，而政治上和民间的反对派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作为一个多阶级、跨种族的联盟，民革运及其同盟用民主的话语与国家抗争，它们的言论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从而将宪法公投演变成对1980年以来民盟

---

① A. Selby, ‘Commercial Farmers and the State: Interest Group Politics and Land Reform in Zimbabwe’(D. Phil. thesis, Oxford University, 2006), p. 277.

② McCandless, ‘Zimbabwean Forms of Resistance’, p. 483.

统治的公投。民革运的政治变革理念浓缩在该政党主要的口号——“改变你的道路”(chinjia maitiro/guqula izenzo)中。民盟的标志是握紧的拳头,与之相反,张开的手掌成为这一新政党的象征。[①] 这次失败也提醒执政党,接下来在 2000 年和 2002 年分别举行的大选和总统选举中,它将面临选举失利和丧失执政权的直接威胁。

作为对公投失败的回应,几周之后一系列的占领土地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格局。被否决的宪法草案中有一项条款规定:被津巴布韦政府充公的土地由英国政府负责赔偿。由于对民众投票的结果感到愤愤不平,加之殖民后国家与退伍军人之间长期以来既合作又冲突的关系,后者开始了暴力占领土地的行为[②]。退伍军人的这一举动标志着民盟内部权力关系的重要转变。当时穆加贝正面临着反对派日益加剧的外部压力和党内退伍军人爆炸性的内部压力。他果断地选择与退伍军人发展更紧密的联盟关系。

2000 年及其后发生的占领土地事件并非独立后首次发生的类似抗议活动。在 1980 年代出现过许多占领土地情况,当时土地被其所有者抛弃,政府接手并转交给了占领者。在 1990 年代,由于国家土改计划实施放缓,加上公有土地压力激增和经济自由化,占用土地情况进一步发生。[③] 其中比较突出的事件是东马绍纳兰省马龙德拉(Marondera)附近斯沃斯维地区(Svosve)的农民占领了当地的商业农场。这一事件促使政府于 1998 年组织召开国际捐助者会议。穆加贝希望筹资 15 亿津巴布韦元来实施一个五年计划,将 15 万个家庭重新

① 口号和手掌标志都来源于津巴布韦工会大会动员活动,见 B. Raftopoulos, “The labour move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opposition politics in Zimbabwe”, in Raftopoulos and Sachikonye (eds.), *Striking Back*, p. 19。

② N. Kriger, ‘War veterans: Continuities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7(2&3)*, [online], <http: //web. africa. ufl. edu/asq/v7/v7i2a7. htm>.

③ S. Moyo, ‘The land occupation move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in Zimbabwe: Contradictions of neoliberalism’,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0(2), 2001, p. 321; S. Moy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d acquisition and redistribution in Zimbabwe, 1990 – 1999’,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26(1), 2000, pp. 5 – 28.

安置在500万公顷土地上。但是英国和美国政府拒绝资助该项目,理由是它不能缓解贫困,又不尊重财产权。[①]

新一波的占地事件就是大家熟知的快速土改和重置计划,通过萨姆·莫约(Sam Moyo)所说的"集权再分配模式"进行[②]。尽管莫约宣称2000年前后的占地事件形式上是连续的[③],其他人却认为"这些事件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对国家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利用占地对反对派进行打击等都有显著不同"[④]。虽然在对土地问题的长期不满方面是有延续性的,退伍军人发挥的领导作用也都是显著的,但在2000年后的占地事件中,国家提供了组织、后勤和强制政策的支持,这是关键的区别特征。绝大多数参与占地运动的都是民盟的年轻人,来自公社和城区,[⑤]受基层组织倡议,加上集中的强制安排和暴力而参加运动。

正如一些分析家所指出的,这些占地事件发生的背景是"由来已久的土地问题,最近又变得更加复杂",比如农耕区的内部斗争、城乡移民的影响、城市家庭的生存危机、结构调整时期农产品出口的替代和回收影响以及生态旅游等问题。[⑥] 不过,容纳、压制和遣散组织的各种需求以及反对派的支持在2000年之后的土地政治中起到中心作用,这一进程的关键特征是对国家本身的重建,重建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

213

第一,执政党的民族主义思想被改写,围绕土地这一中心问题和民盟对解放斗争做出的贡献,体现为更加专制、更具选择性和种族歧视的

---

① E. McCandless, 'The Case of Land in Zimbabwe: Cause of Conflict, Foundation for Sustained Peace' (Harare: unpublished paper, 2001).

② Moyo, 'The land pccupation movement', p. 313.

③ 同上。

④ Alesander, *The Unsettled Land*, p. 185.

⑤ 同上。另一份有意思的、关于退伍军人和土地占领运动的内部文件见 Wilber Sadomba, 'War Veterans in Zimbabwe's Land Occupations: Complexities of a Liberation Movement in an African Post-Colonial Settler Society' (Ph. D. thesis, Wageningen University, 2008)。

⑥ H. Bernstein, '"Changing before our very eyes": Agrarian ques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land in capitalism today',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4(1&2), 2004, p. 218.

公民权与社会归属。穆加贝把土地问题概括为以下内容：

> 过去我们知道、现在也明白，土地是1893年洛本古拉国王(King Lobengula)反击英国侵略战争的主要目标；过去我们知道、现在也明白，土地是领导第一次解放战争的英雄尼安达(Nehanda)和夸库维(Kaguvi)的心头之恨。过去我们知道、现在也明白，土地是第二次解放战争的基本前提，也是后来新的津巴布韦民族和国家的立国之本。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土地是第三次解放战争的核心任务和迫切要求，你我正在为之奋斗，并将继续为此做出巨大牺牲。[①]

专制的民族主义还构想出了一系列"局外人"和"民族敌人"，即白人、民革运、民间团体、城市居民和农场工人。穆加贝说土地斗争是历史更久、涉及面更广的反帝和泛非主义斗争的一部分，还将反对党和民间组织描绘为西方代理人。[②]

第二，执政党开始着手大规模的国家机构重组工作。司法机构进行重组，确保裁决与民盟的指令一致。在重组过程中，法律系统的完整、公正性因各种压力受到危害：迫使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独立法官辞职、国家屡次拒绝遵循法院对土地和其他问题的判决、对代表执政党实施暴力行为的人颁布特赦令。[③] 在行政部门，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当地退伍军人委员会将认定是支持反对派的老师、医务人员和地方政府官员等一律开除。这些做法表面上看起来是民众长期以来不满地方

---

① R. Mugabe, *Insede the Third Chimurenga* (Harare: Goevernment of Zimbabwe, 2001), pp. 92 – 93.

② B. Raftopoulos, 'Nation, race and history in Zimbabwean politics', in Raftopoulos and Savage (eds.), *Zimbabwe: Injustice and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pp. 160 – 175.

③ G. Feltoe,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Helping Overcome the Crisis in Zimbabwe: The Constitution, the Legal Syste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Harar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risis in Zimbabwe Coalition, 2003); K. Saller, *The Judicial Institution in Zimbabwe* (Cape Town: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2004).



图 7.3 在一次民盟集会中人们要求获得土地
（安妮・姆普拉鲁姆 摄）

政府官员缺乏财政能力、管理不善和腐败行径等进行控诉的结果。就这样，退伍军人的领导接管了快速土改重置计划的实施，让地方发展规划机构靠边站。[①] 214

第三，强制立法。比如在 2002 年通过的《公共秩序与安全法案》(POSA)第 11 章第 17 条和《信息使用和隐私保护法》(AIPPA)第 10 章第 27 条等，用于限制反对党和民间团体在公共领域开展活动，并对独立的新闻媒体进行监控。在对 2000 年后国家动用《公共秩序与安全法案》的研究中，有一些重要发现：在逮捕试图举行公共集会者时，该法案的援引率最高；该法案被用于党派之争，能有效禁止正常的民主活动；警察和其他执法人员在逮捕和拘押平民时会有计划地对其进行刑

① J. McGregor, 'The politics of disruption: War veterans and the local state in Zimbabwe', African Affairs, 101, 2002, pp. 9－37; A. Hammar, 'The making and unma(s)king of local government in Zimbabwe', in Hammar et al, 9eds. 0, Zimbabwe's Unfinished Business, pp. 119－154.

215 讯、拷打和心理骚扰；如果被指控和拘留主要是因为恐吓和阻止抵抗行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家无意继续追究这些人。①

第四，这一时期的二十几份人权报告证实，在国家机构不断军事化的背景下，每逢选举，国家都会加深对暴力的依赖。在 2000 年大选和 2002 年总统选举期间，民革运及其拥护者遭遇了大范围的暴力活动——谋杀、谋杀未遂、刑讯、强奸、失踪以及死亡威胁，而这些暴力活动大多由执政党的青年民兵组织负责执行。

尽管面对这些暴力活动的猛烈冲击，民革运在 2000 年大选中仍然赢得了 47%的选票，民盟获得 49%的选票；在总统选举中，穆加贝获得 56%的选票，摩根·茨万吉拉伊获得 42%的选票。两场选举都在分歧极大的乌云笼罩下举行。反对党曾质疑这两场选举中存在问题，这在 2005 年民盟获胜的大选中又被提及。② 此外，在这个选举中发生暴力活动和违规行为的国家，其关键职位，从选举指挥部、检察总长办公室的负责人到粮食营销局、津巴布韦电力局、津巴布韦国家铁路局的局长，穆加贝都安排由军方人员担任。③ 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广泛的暴力原因不仅在于执政党要恐吓、控制反对党，也因为民盟内部竞争激烈，其内部组织机构正在弱化，国家领导人要利用暴力活动加强党内

---

① Solidarity Peace Trust, *Disturbing the Peace: An Overview of Civilian Arrests in Zimbabwe: February 2003 - January 2004* ' (2004) Available at < http://www.solidaritypeacetrust.org/reports/disturbing_the_peace.pdf >. For a discussion on the repression of the media, see W. Chuma, 'Liberating or limiting the public sphere? Media policy and the Zimbabwe transition, 1980 - 2004', in Raftopoulos and Savage (eds.), *Zimbabwe: Injustice and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pp. 119 - 139.

② K. Alexander and B. Raftopoulos (eds.), *The Struggle for Legitimacy: A Long-term Analysis of the 2005 Parliamentary Elec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tic Processed in Zimbabwe* (Cape Town: Institu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2005). D. Moore, 'Marxism and Marxist intellectuals in schizophrenic Zimbabwe: How many rights for Zimbabwe's legt?', *Historical Materalism*, 12(4), 2004, pp. 405 - 426; T. Scarnecchia, 'The "Fascist Cycle"in Zimbabwe, 2000 - 2005',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32 (2), 2006, pp. 221 - 237.

③ M. Rupiya, 'Evaluating the Security Sector as the Repressive Instrument for the state in Zimbabwe' (Cape Tow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2006).

控制。[1]

216

有关占地事件后果的评价纷杂;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来说,需要对该领域进行更多的研究。不过,可以做点历史性的评论。占地事件断然摧毁了津巴布韦的白人土地所有制,从而改变了殖民土地分配的遗留问题。在2000年时,4 500个白人商业农场占据了1 100万公顷土地,其农业产出占全国农产量的70%强,但到2008年时,白人商业农场的数量锐减到了只有约500个。[2] 到2005年,"剩余的白人农场支离破碎,势单力薄",并且白人农场主的"农业产出、经济贡献、财政实力和机制效力"都已经被削减殆尽[3]。白人农场主及其家庭命运的巨大逆转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也催生了一种崭新的殖民后"白人碑文",刻写着白人身份的新型受害者。正如阿什利·哈里斯(Ashleigh Harris)所言,穆加贝通过占用土地这一政治手段来废除政治和解,"重塑了白人的过去……通过去除白人身份的历史,为津巴布韦白人卷入种族冲突开脱罪名"。[4]

这场土地重新分配运动的大输家还有反对党拥护者和农场工人。2000年对农场工人的研究注意到,好几个指标涉及土地改革对这一群体的影响:就业水平大幅下降,估计中部省份降幅为70%,南北两个马塔贝莱兰省为65%;到2000年年中,约90万人受到土地被收回的影响;不到5%的农场工人分到土地;没有收入、失去住房、没有安全的饮用水使许多家庭无法照看病人,特别是那些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

---

① A. LeBas, 'Polarization as craft: Party formation and state violence in Zimbabwe', *Comparative Politics*, 38(4), 2006, pp. 419－438.

② P. Matondi, 'Shaping and Stewarding Replacement amidst Uncertainty of Fast Track Land Reform in Zimbabwe' (Harare: umpublished paper, 2008).

③ A. Selby, 'Commercial Farmers and the State', p. 331.

④ A. Harrris, 'Writing home: Inscriptions of whiteness/descriptions of belonging in white Zimbabwean memoir-autobiography', in Muponde and Primorac (eds.), *Versions of Zimbabwe*, p. 107. Examples of such writing include: A. Fuller, *Don't Let's Go to the Dogs Tohight* (Johannesburg: Picador, 2004); P. Godwin, *Mukiwa: A White Boy in Africa* (London: Picador, 1996); P. Godwin, *When a Crocodile Eats the Sun* (Johannesburg: Picador, 2006); I. Holding, *Unfeeling* (London: Scribner, 2005).

患者。[1] 农场工人被排除在占有土地运动的受益者之外，这是因为民盟认为他们要么"属于农民"，"受商业农场主'国内政府'管辖"，要么是"这个国家"政治的外来者。与白人农场主、民革运成员一样，这些农场工人被归类为"国家敌人"，在 2000 至 2002 年间最糟糕的选举暴力活动中历经磨难。除此之外，和白人农场主一样，2000 年以后颁布的新的居民身份法进一步削弱了农场工人的选举权。他们被认为是外国人，如果要行使选举权就必须宣布放弃其拥有的双重居民身份。由于宣布放弃双重身份的官方程序繁琐，许多人的公民选举权被轻易地剥夺了。[2]

217

快速土改计划对农业部门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显著：对农业产量和受益人务农能力的担忧；大量土地闲置或未得到充分利用；基础设施肆意遭毁、情况糟糕；生产系统专业化程度下降；受干旱影响，玉米产量急剧下降，导致 2008 年底约 500 万人需要粮食援助；农业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生产联系停止；熟练工流失严重；对土地进行金融投资缺乏安全期限。[3] 正如马托蒂(Matondi)所言：

> 作为一种机制，土地所有制总体的法律框架本身仍然模糊不清，非常不确定，它见证了各种运动和威胁，也没有农场资本进行

---

① L. M. Sachikonye, *The Situation of Farm Workers after Land Reform in Zimbabwe: 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Farm Community Trust of Zimbabwe*, May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oxfam.org.uk/what_we_do/issues/livelihoods/landrights/downloads/zimfwsit.rtf>, retrieved 31 May 2009.

② B. Tutherford, 'Belonging to the farm(er): Farm workers, farmers and the shifting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in Hammar et al. (eds.), *Zimbabwe's Unfinished Business*, pp. 191-216; B. Rutherford, 'Commercial farm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 placement in Zimbabwe: Colonialism, liberation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4), 2001, pp. 626-651.

③ N. Marongwe, 'A Think Piece on Land Reform and the Current Food Crisi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paper prepared for Joint Review of Food Aid in Zimbabwe (EC/ECHO, USAID, DFID, 2006); Matondi, 'Shaping and Stewarding Replacement'.

有效投资。各种运动接踵而来,无论有什么理由,原本宣布在计划启动后两年就完成的项目到了八年后才完成,这足以表明该所有制法律框架的不确定性。①

从这种评价的积极方面来说,莫约(Moyo)和叶罗斯(Yeros)等学者特别强调了快速土改计划中土地所有权的重大转变,指出"新成立的小商品生产企业"在新农业企业中所占比例为93.7%,其中绝大部分企业发迹于人口密集的公共区域。② 其他学者记录了津巴布韦南部畜牧业的发展依然充满活力。这种情况通过改变种族生产系统和商品链,及重新定义"国家与这些非正式市场系统的关系"来实现。③ 不过,卡曾斯(Cousins)指出,由莫约和叶罗斯提出的"农民民粹运动"(agrarian populism)形式"忽视了依靠地产和其他专业化、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来获取收入的短期迫切需求,也忽视了养活城市人民的重要性"。④ 此外,土地受益人的阶级分化也影响了该计划的效能发挥,因为相当一部分最好的农场落到执政党政治、军事、行政和商业等部门的精英手中。

218

对穆加贝政权中某些人在占地事件中侵犯人权的行为,西方政府采取的对应措施是一系列"针对性制裁"(targeted sanction)。2001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津巴布韦民主和经济复苏法案》;在2002至2008年间,欧盟和澳大利亚也对穆加贝政府中越来越多侵犯人权行为或牟取暴利的关键人物实行旅行限制和资产制裁等措施;美国、欧盟以及加拿大对津巴布韦政府实行武器禁运;2002年英联邦暂停津巴布韦成员国

---

① Matondi, 'Shaping and Stewarding Replacement', p. 13.

② Moyo and Yeros, 'Land occupations and land reform in Zimbabwe: Towards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p. 195.

③ B. Z. Mavedzenge, J. Mahenehene, F. Murimbarimba, I. Schoones and W. Wolmer, 'The dynamics of real market: Cattle in southern Zimbabwe following land reform',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9(4), 2008, p. 619.

④ B. Cousins, 'Reply to Mamdani article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4 December 2008'(Cape Town: unpublished paper, 2008).

资格,2003 年津巴布韦正式退出英联邦。[①]

与此同时,西方政府和捐助机构对致力于民主化和人权工作的民革运、劳工运动和其他民间组织给予政治和经济援助。实际上,穆加贝多次将这种援助指控为“外国势力控制”津巴布韦民革运和民间组织的“证据”,这种说法回避了反对党在国内拥有的强大根基。[②] 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津巴布韦政府实施经济制裁是因为它未能偿还 1999 年布莱顿森林体系的贷款。[③] 快速土改计划导致的政治、经济混乱,以及国际势力的卷入,都严重影响了津巴布韦其他经济部门,也削弱了国内社会力量应对日益加深的危机的能力。

219

经济衰退和政治僵局的恶化

1990 年代末期起津巴布韦的经济大衰退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原因,更多的是当代的原因。殖民资源分布不均,资本积累形式有限难以形成更大的生产基地,劳动力再生产系统依赖于低工资的农民工,1980 年代的“福利主义”和 199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策略备受争议,这些长期以来的遗留问题为 1998 至 2008 年从衰退到危机提供了大致的历史背景。[④] 导致危机爆发更直接的原因有土地改革中不断涌现的“威胁”、支付给退伍军人的大笔复员费以及出兵刚果民主共和国等。这些问题的综合后果在 1997 年 11 月 14 日彰显,当天津巴布韦元在短

---

① Reuters. 'Factbox-Sanctions on Zimbabwe', 26 Jan. 2009, cited on Zimbabwe Situation <http://www.zimbabwesituation.com/jan27_2009.html>.

② McCandless, 'Zimbabwe Form of Resistance'; Dorman,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LeBas, 'Polarization and Party Development'; P. Yero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ivilisation: Peasant Workers in Zimbabwe and the Neo-colonial World' (Ph. D. thesi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2).

③ P. Bond 'Reply to Mamdani' (Durban: unpublished paper, 2008).

④ 关于这场讨论的文献资料见 P. Bond 'Competing explanations of Zimbabwe's long economic crisis', Safundi: The Journal of South American Studies, 8(2), 2007, pp. 149–181; R. Davies, 'Memories of underdevelopment: A person interpretation of Zimbabwe's economic decline', in Raftopoulos and Savage (eds.), Zimbabwe: Injustice and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pp. 19–42; Moore, 'Is the land the economy the economy the land?'

短4小时内贬值74%。[①]

2000年之后,津巴布韦的经济飞速下滑,创世界纪录。截止200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1980年相比下降了47%,与1991年最高值相比下降了53%。[②] 正式部门(formal-sector)的收入水平也一落千丈。2006年12月底,农业工人和家政工人的最低平均工资为2 800津巴布韦元,仅为粮食基准线(Food Datum Line)的3%,而同期的最低平均工资为5.7万津巴布韦元,为贫困基准线的16.6%。津巴布韦工会大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将其称为"饥饿工资"(Starvation wages)。随着工资下降,其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平均份额由1985至1990年间的49%下降为1991至1996年间的41%,在1997至2003年间更是跌至29%。正式部门的工作岗位数量也由1998年的140万萎缩至2004年的99.8万。[③]

2008年底,官方公布的恶性通货膨胀攀升到了230 000 000%,这使津巴布韦人的收入和储蓄都遭到极大贬值。彼特·罗宾森(Peter Robinson)这样解释这一过程作用于各类经济的效果: 220

> 恶性通货膨胀臭名昭著,它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使已经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分化矛盾更严重。以津巴布韦为例,因为有高层的庇护,这个不受欢迎的过程就被放大。在一个极度扭曲的环境里(比如廉价信贷和外币按官方汇率定价),关键资源都被分配给某些个人和特殊团体,使他们在很短时间内聚敛大量财富。那些有政治影响力的从银行借出大笔款项,然后拒绝偿还。等到通货膨胀时,他们就可以摆脱债务负担,并援引"双重规则"(in duplum

---

① Bond, 'Competing exlanations', p. 170.

② P. Robinson, 'Macro-Economic Paper produced for the Zimbabwe Institute' (Cape Town, 2007), p. 4.

③ G. Kanyenze, 'The Labour Market, Sustainable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in Zimbabwe' (Harare: unpublished paper, 2007), pp. 31－35.

rule)避免支付利息。小储户承担了损失,他们实际上是在贴补富人。[1]

这一过程将利润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平均份额由1985至1990年的50%提升至1997至2003年的73%,但是2006年,估计有85%的津巴布韦人生活在贫困基准线以下。[2] 在农业危机、正式部门就业缩减和经济不断信息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工人面临巨大挑战。由于进城劳工寄回农村家里的汇款减少,城乡联系的规模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农村和城市家庭的粮食安全均受到影响。

在这一时期,恶性通货膨胀取代了之前有间接食品消费补贴和低工资的殖民地政治经济,使实际工资越来越低。[3] 政府于2005年5月开始"净化行动"(clear out the filth),在城区进行军事化"清理",大规模冲击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原本弱势的劳工境遇更加悲惨。据联合国一份报告估计,65至70万人受到此次行动的直接影响,另有170万人间接受其经济影响。[4] 据推测,推行"净化行动"有如下原因:惩罚城区在2000年后对民革运的持续支持行为;奉行技术官僚的现代化城市规划;减少城市贫困人口,因为城市无力为其提供充足的食物和燃料。[5] "净化行动"的前提是被清除出城市的人会"回到"农村的家

221

① Robinson, 'Macro-Economic Paper', p. 15.

② Kanyenze, 'The Labour Market', p. 32.

③ L. Cliffe and B. Raftopoulos, An Assessment and Review of the Joint Donor Review of Food Aid in Zimbabwe(Leeds and Cape Town: EC/ECHO, USAID, DFID, 2007).

④ 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Fact-Finding Mission to Zimbabwe to Assess the Scope and Impact of Operation Murambatsvina by the UN Special Envoy on Human Settlements Issues in Zimbabwe Mrs. Anna Kajumulo Tibaijuka' (UN, 2005); L. M. Sachikonye, 'The Impact of Operation Murambatsvina/Clean Up ON the Working People in Zimbabwe' (Harare: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Labou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Zimbabwe, 2006).

⑤ D. Potts, ' "Restoring order" ? Operation Murambatsvina and the urban crisis in Zimbabwe',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32(2), 2006, pp. 273 - 291; A. Kamete, 'Cold-hearted, negligent and spineless? Planning, planners and the (r)ejection of "filth" in urban Zimbabwe', 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ies, 12(2), 2007, pp. 153 - 171.



图 7.4　在净化行动中，一名妇女被迫破坏自己的房屋(埃德温娜·斯派塞 摄)

里，但是截止 2001 年，他们中的半数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无家可回。[①]

穷人变得更穷的原因还在于采纳了劳勃·戴维斯(Rob Davies)所说的“纯食利经济”(pure rentier economy)。执政党刺激短缺商品交易，“这不仅是致富之道，也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与贱买贵卖快速牟取的暴利相比，长期投资生产的获利微不足道。[②] 此外，这一时期加强了产业结构的信息化，这也为与执政党和政府密切相关的企业在黄金和钻石开采业攫取财富提供了新的机会。在这些产业中，依靠国家的高压垄断和执法上的照顾是暴富竞赛的关键因素。[③] 一份关于马尼卡兰(Manicaland province)马兰吉(Marange)地区“钻石潮” 222

① D. Potts, ' "You must go home": Manipulating narratives of rural linkages for Operation Murambtsv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Political Economies of Displacement in Post-2000 Zimbabw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9-11 June 2008.

② R. Davies, 'Economic Recovery in Zimbabwe' (Harare: unpublished paper, 2008).

③ S. Mawowa, 'Crisis, State and Accumulation in Zimbabwe'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Kwazulu Natal, 2007).

的报告指出：

> 穆塔雷(Mutare)的一名监狱官员说民盟和安全部门的上层人物在这里经营非法钻石交易：
>
> 警察局、监狱管理局、军队和中央情报组织里有一些为高官助手效力的人，他们组成了联合财团(syndicates)，这位官员说道，“通常军队里的高级官员都听命于部长、省长和民盟里的其他权贵人物。”①

尽管这些权贵们打着“本土化”的幌子干着疯抢矿产的勾当，但是大规模的采矿业依然由外国资本控制和支配。②

国内经济崩溃，尤其是飞速发展的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另一个主要影响是津巴布韦货币快速贬值和经济交易“美元化”。当津巴布韦货币变得不值一文时，那些始作俑者又将其大部分资产转换成外国货币；当只有用外币才能购买商品和服务时，更多的人选择离开这个国家。津巴布韦移民的历史悠久：在殖民时期，人们移民去南非的矿区和城市；从 1980 年代中期起，在马塔贝莱兰和中部省份许多人因为躲避古库拉洪迪大屠杀(the Gukurahundi killings)而移民；人们还因为马斯温戈省(Masvingo)、中部省份和南马塔贝莱兰省等地的旱灾而移民。尽管如此，只有在 2000 年之后，由于政治暴力、强制驱逐和大规模经济衰退才出现大批移民迁居国外。据估计，移民人数在 100 万至 300 万之间，主要目的地有南非、博茨瓦纳、英国和美国等。

223

当这些移民工人(majoni-joni/amadouble-up)在异国他乡打拼谋

---

① Robyn Dixon, ‘Zimbabwe's deadly diamond fever’, Los Angeles Times, 4 Dec. 2008.

② R. Saunders, ‘Painful paradoxes: Mining, crisis and regional capital in Zimbabwe’, At Issue EZINE, 8(4), 2008, pp. 17 - 49, available at＜http: //www. africanfiles. org/atissueezine. asp? issue = issue8 # art3＞; Solidarity Peace Trust, A Difficult Dialogue: Zimbabwe-South Africa Economic Relations since 2000(Johannesburg, 2007).

生时，他们利用了殖民时期开始形成的历史网络。[①] 殖民统治期间，殡葬行业、教会组织、社会足球俱乐部以及地下酒吧等都是社会扶持的重点对象。[②] 2000年之后，津巴布韦移民在南非约翰尼斯堡和比勒陀利亚等地建立了诸如麻萨萨纳(Masasane)、麻伦达(Maranda)和姆贝伦戈瓦(Mberengwa)等丧葬协会，同时锡安会(Zionist churches)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支持，特别是对妇女。还有许多"酒鬼足球"俱乐部和地下酒吧等非正式场所，移民们在这里进行社交，交换关于家乡的信息。[③] 极为重要的是这些外出劳务工人将挣来的钱汇给国内的家人，这也是这些家庭谋生的重要门路。据估计2005至2006年，津巴布韦两大主要城市的半数家庭都在接收境外汇款，[④]而英国利兹大学对津巴布韦人的一项研究表示，超过80%的受访者谈到他们在向国内的家人寄送"生活必需品"。[⑤]

移居南非的津巴布韦人对公民权和认同问题有不同的反应：有的

---

① 这部分资料主要来自 James Muzondidya, 'Majoni-Joni: Survival Strategies among Zimbabwean Migrants in South Afric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ies of Displacement in Zimbabw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9－11 June 2008. Muzondidya 解释说，majoni-joni 这个词源于人们"通常认为所有去南非的移民在约翰内斯堡工作"。该词有殖民时代移民的历史背景，在移民中和津巴布韦当地人中间广为使用。在津巴布韦一些说恩德贝莱语的地方，在南非的津巴布韦非熟练工叫做"amadouble-up"。这个词也表明他们借用不正规的途径和渠道来到南非。也见 Solidarity Peace Trust, No War in Zimbabwe: An Account of the Exodus of a Nation's People (Johannesburg, November 2004)。关于英国的津巴布韦移民见 J. McGregor, '"Joining the BBC(British Bottom Cleaners)": Zimbabwean migrants and the UK care industry',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3(5), 2007, pp. 801－824。

② T. Yoshikuni, *African Urban Experiences in Colonial Zimbabwe: A Social History of Harare before 1925*, (Harare: Weaver Press, 2006); T. Yoshikuni, *African Urban Experiences in Colonial Zimbabwe: A social History of Harare before the Mid－20th century* (Tokyo: Impact Shuppankai, 2005).

③ J. Muzondidya, 'Majoni-Joni'.

④ S. Bracking and L. Sachikonye, *Remittances, Poverty Reduction and Informalisation in Zimbabwe 2005－2006: A Political Economy of Dispossession?* Brooks World Poverty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28, 9 Sept. 2008.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1265516>.

⑤ F. Magunha, A. Bailey and L. Cliffe, 'Remittance Stretegies of Zimbabweans in Northern England' (University of Leeds, 2009).

呼吁地区公民权和泛非主义；有的希望融入南非，因为他们与南非在文化和语言上联系紧密；其他人则提出更加特定的民族主张或者复兴“爱国民族主义”，大力推崇国家符号以作为对继续存在的仇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回应。2008年上半年南非爆发的大规模排外暴乱活动坚定了这种爱国主义情操。[①] 在南非边境地区工作的津巴布韦人尝试着在劣势中捍卫自己的权利，然而南非农民和南非政府仍根据其地位予以区别对待。[②] 尽管国内经济形势一片衰败，津巴布韦政府仍未能提出有实效的建设性举措。

224

在这种经济快速恶化的情形下，民革运和民间组织在与穆加贝政权抗争时面临着严峻挑战。民革运的官员和议员不断遭遇与选举相关的暴力、骚扰、刑讯和谋杀，其领导人被捕，在媒体上不断被诬蔑为“外国代理人”、“不爱国”和“‘合法国家政治’的局外人”。对他们而言，通过选举获得国家权力越发遥不可及。在城区，有些地方民革运占优势，连续赢得了2000至2008年间议会选举和地方政府选举的胜利，执政党对这些城区开展预先筹划的行动以破坏民主投票。

通过滥用《城市议会法案》第29条第15款、《公共秩序与安全法案》、《津巴布韦宪法》、《选举法》第2条第1款以及《省级议会和行政管理法案》第29条第11款等法律，执政党要么罢免民革运的市长，要么威胁民革运的地方议会，并且运用其权利“干预地方事务，以达到调整、削弱或摧毁地方议会的目的”。[③] 民间组织，比如哈拉雷居民联合会

---

① J. Muzondidya, ‘Makwerekwere: 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Identity among Zimbabweans in South African’, in J. McGregor and R. Primorac (eds.), *Displacement and Survival: Zimbabwe's Diasporic Identities and Connections* (Oxford; Berghahn, forthcoming).

② B. Rutherford, ‘Zimbabweans living in the South African border-zone: Negotiating, suffering and surviving’, *Associating of Concerned African Scholars*, 80, 2008, pp. 36–42. Available at <http://concernedafricascholars.org/docs/acasbulletin80-6.pdf>.

③ A. Kamete, ‘The return of the jettisoned: ZANU-PF's crack at “re-urbanising” in Harare’,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32(2), 2006, p. 270; A. Kamete, ‘In defence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Urban governance and democracy in Zimbabw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21(2), 2003, pp. 193–213.

(CHRA),长期以来一直都在与中央政府作合法的斗争,争取市民的民主权利,但是他们被执政党称为是“没有图腾的异族人”,并被视为民盟统治的持久威胁。[①] 在殖民时期,中央政府面对的是只致力于顽强捍卫白人居民权利的地方议会,而哈拉雷居民联合协会和民革运需要面对的却是一个独裁国家,未经民主授权一味实行自己的统治。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争夺控制权和代表权的争斗也是津巴布韦悠久斗争史的一部分。[②]

用和平方式对抗暴力专政政权的战略困境造成反对党内部关系紧张:问责、能力、战略、党内暴力和种族划分等问题成为争论焦点,最终导致该党在 2005 年产生分裂。分裂的直接原因是对是否参加由民盟召开的 2006 年参议院选举持不同意见。但是,上述众多问题是主要影响因素,而且在党内分裂后,这些因素继续挑战着该党的生存能力。2006 年,民革运分为两个派系:较大的一派由摩根·茨万吉拉伊领导,另一派由前学生领袖亚瑟·穆坦巴拉领导。绝大多数民族运动力量和民众支持在茨万吉拉伊派这边。[③]

当民革运在应对麻烦时,它的民间社会联盟也因政府的压迫和经济恶化的侵害受损严重。由于国家骚扰、就业岗位缩减和工会成员减少(从 1990 年占工人总数的 16%降至 2000 年的 12%),津巴布韦工会大会丧失了很多发展助力。[④] 津巴布韦工会联盟由执政党在 2000 年建立。它在家具木材、工程、餐饮、皮革、服装、贸易、农业、糖料种植和建筑这九个经济领域建立工会分会,进一步弱化了工会大会的力量。[⑤]

---

① Mike Davies [Chair of CHRA], ‘Citizens or Subjects? Housing Rights in Zimbabw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Social Forum, Nairobi, January 2007.

② T. Ranger, ‘City versus state in Zimbabwe: Colonial antecedents of current crisis’, journal of East African Studies, 1(2), 2007, pp. 161－192.

③ B. Raftopoulos, ‘Reflections on opposition politics in Zimbabwe: The politics of the Movement for Democratic Change (MDC)’, in B. Raftopoulos and K. Alexander (eds.), Reflections on Democratic Politics in Zimbabwe(Cape Town: IJR, 2006), pp. 6－29.

④ Kanyenze and Chiripanhura, ‘The State of Union Organisation’.

⑤ ZUTU, ‘Annual Report fo the Organising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ended 2004’.

经济的全面信息化使工人运动极难组织,因为非正式部门的工人转向"多元经济"(kukiya-kiya economy),采取多种谋生方式。琼斯(Jones)把这种情况描写成"悬停空间,正常的规则和程序不一定适用"。[1] 在工人越来越依靠各自生存策略的背景下,1990 年代行之有效的公共罢工和游行在 2000 年之后变得非常难以组织。组织和动员工人以及其他公民的能力退步也影响到其他民间组织。全国制宪大会、津巴布韦妇女崛起组织和津巴布韦危机联盟等民间组织坚持与国家抗争,它们的特点不在于大规模动员群众的能力,更多的是依靠其领导人和成员们的勇敢。2008 年第四季度,霍乱在津巴布韦肆虐蔓延,其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对反对党日渐衰落的社会基础建设更是雪上加霜。政府无力供应清洁用水,加上公共卫生系统瘫痪,引发人道主义危机,这充分说明政府缺乏为民众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捍卫人权医生协会(the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的一份报告这样描述这场危机:

> 津巴布韦卫生和医疗危机是穆加贝政权严重渎职、全面触犯人权的行径导致的直接后果,这包括公民参政和参加自由选举得不到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利得不到尊重、保护和履行。[2]

瓦莱丽·泰格维拉(Valerie Tagwira)的小说《模糊的希望》生动描绘了持续恶化的情况和希望破碎后人们明显失落的情绪。凯蒂(Katy)在备受"净化运动"余波折磨时疲惫、无望地说道:"现在我们还有其他可以谈论的吗?我们究竟要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才能让事情稍有改变?"[3]在国内改革势力明显落败的背景下,故事中绝望、不幸的女

---

① J. Jones, '"Nothing is Straight in Zimbabwe": The Rise of Kukiya-kiya Economy 2000–2008'.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ies of Displacement in pose – 3000 Zimbabwe, 2008), p. 15.

②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 Health in Ruins: A Man-Made Disaster in Zimbabwe (Cambrige MA: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 2008/2009), p. viii.

③ V. Tagwira, The Uncertainty of Hope(Harare: Weaver Press, 2006).

主人公最终在一个好心商人的帮助下获救。泰格维拉构想的小说情节正好例证了伊格尔顿(Eagleton)所说的"对日常生活中拙劣、不公的一种幸运救赎"。[①]

在这一时期,津巴布韦政治上的"救赎"来自不断的政治斗争。1998至2008年间,津巴布韦的教会也因为在国家政治上的分歧产生分裂。一些主要教堂里的关键领导人选择追随穆加贝的民族主义;而另一些则倾向于民间组织。越来越多像五旬节派(Pentecostal)会众这样的教徒依靠自己的教义"充分利用急速的社会变革"。[②] 2007年3月,在哈拉雷市人口密集的海菲尔德区(Highfield),警察粗暴地搅乱了一场由基督教徒联盟组织的祷告会,民革运和其他民间组织的领导人以及另外50名与会者被捕并遭到痛打。这一事件很快在世界范围引起了关注,也再一次证实了津巴布韦政府的有罪不究的行为。自2004年以来,民盟因内部争夺接班人的争斗而出现混乱。当年由姆南加格瓦(Mnangwa)支持的"措罗措阴谋"(Tsholotsho plot)企图推翻穆加贝便是明证,执政党为此团结起来镇压反对党势力。尽管内部权力斗争勾心斗角,执政党对反对派的打压仍然有增无减。[③]

争端调停、选举危机与政治协议

全球关注津巴布韦局势发展,国际社会也因此对穆加贝政权继续施压,这促使南共体为解决津巴布韦危机进行新的努力。从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就任南共体主席起,他就开始推行所谓的"静默外交"(quiet diplomacy)。在政治上,这好比走钢丝,"保持南非的大陆野心,

---

① T. Eagleton, *The English Novel: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5), p. 60.

② D. Maxwell, '"Delivered from the spirit of poverty?" Pentecostalism, prosperity and modernity in Zimbabwe,' Journal of Religious Affairs, 28(3), 1998, p. 351. For the divided role of the church, see W. Anderson, 'The Role of the Church in Zimbabwe: A Willing Servant' (Unpublished paper, 2008).

③ E. Masunungure, 'The Dynamics of ZANU(PF) in the Post-Tsholosho Phase' (Zimbabwe Institute, Cape Town, 2006).

同时做到既不与穆加贝政权为敌，也不牺牲西方的支持”。[1] 2002 年，姆贝基联手尼日利亚政府发起了民盟与民革运之间的对话，但此举并未取得较大成效。2007 年 3 月的哈拉雷事件之后，姆贝基得到 3 月 29 日在坦桑尼亚举行的南共体特别首脑会议的授权，帮助津巴布韦主要政党之间开展对话。这种帮助的主要目的是为在津巴布韦进行能被广泛接受的选举创造条件，用姆贝基的话来讲是：

228

> 将津巴布韦局势引向正轨，恢复发展，开展重建，在可持续基础上为所有津巴布韦人民谋求更好的生活。[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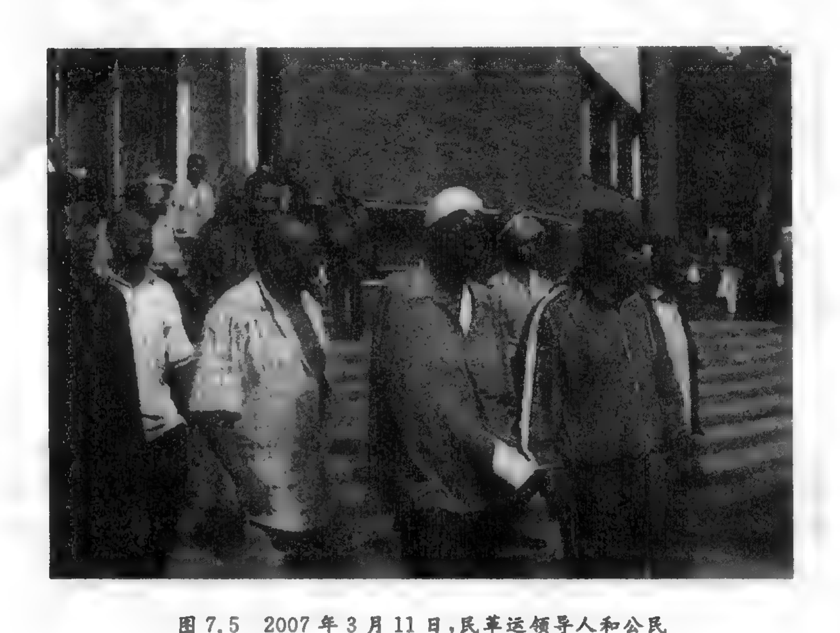


图 7.5　2007 年 3 月 11 日，民革运领导人和公民领袖被安全部门严刑拷打后获释

（从左至右依次为：亚瑟·穆塔姆巴拉、摩根·茨万吉拉伊、拉夫穆尔·马督库和腾达伊·比提）（埃德温娜·斯派塞 摄）

---

① L. Freeman, ‘South Africa's Zimbabwe policy: Unravelling the contradic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23(2), 2005, p. 156.

② 2007 年 4 月 4 日，塔博·姆贝基总统写信给摩根·茨万吉拉伊和亚瑟·穆塔姆巴拉，同时抄送给了罗伯特·穆加贝。

经历了政党间相互责难、姆贝基与茨万吉拉伊关系紧张、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意见不合、西方对南共体不断施加外交压力等一系列旷日持久的麻烦后，津巴布韦局势终于在 2007 年有所好转，为 2008 年举行公正合理的选举创造了条件。尽管对自由、公正选举的条件依然争议重重，经调解达成了一项重要的改革意见，即在投票站外公示投票结果以确保选举透明。事实证明，此举对后来民革运参与 2008 年 3 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地方政府选举和总统选举都意义重大。[1]

这些选举都发生在南共体斡旋调停和暴力活动相对较少的氛围下。选举结果延迟了一个月才公布，很明显执政长达 28 年的民盟第一次失去了议会的多数席位。民革运联合党派赢得了 109 个席位，民盟获 97 个席位。但是在总统竞选中，没有一位候选人获得 51%的多数票而一次性胜出，因此还需进行决胜选举。茨万吉拉伊和穆加贝分别都只获得 47.9%和 43.2%的选票。民盟连连败北不仅是因为其党内分歧较大，更是由于不断失去选民对其正统性地位的认可。前执政党坚定分子辛巴·马科尼(Simba Makoni)作为独立总统候选人参与竞选，他的脱党表明了执政党内部的分歧。虽然马科尼本人并未获得政治上的成功，但这也拓展了选举的政治空间。尽管民革运联合党派已经赢得了议会选举，但分派参选可能会阻碍其获得更大的成功。

然而，在 6 月底总统决选前夕，暴力活动进一步使津巴布韦陷入巨大的政治不稳定状态。执政党发动暴乱迫害选民，以此作为其在 3 月选举中败北的报复，也是警告选民不要让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这是 1980 年代中期古库拉洪迪大屠杀之后津巴布韦爆发的最严重的骚乱。在武装力量联合作战指挥部指挥下，大多数暴力活动发生在三个马绍

---

① 有关南共体调停活动促进 2008 年 3 月选举平稳进行的讨论，见 Solidarity Peace Trust, *Punishing Dissent, Silencing Citizens: The Zimbabwe Elections 2008*, (Johannesburg, May 2008).

纳兰省，这里曾是民盟的根据地。[①] 面对四处蔓延的暴力行为，民革运的候选人茨万吉拉伊宣布退出总统决选；在缺乏普遍认可的背景下，穆加贝由此获得没有竞争对手的"胜利"。

从7至12月，南共体更加努力地致力于调停工作，以期早日解决争端。由于未能终止穆加贝政权实施的暴力专政，南共体被视为其共犯而饱受诟病，受到了来自西方国家、津巴布韦教会和民间组织的强烈指责。除调停程序之外，民盟和民革运各派面临的选择非常有限。前者不放弃垄断国家的强制权，但对国内经济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的解决无计可施。后者虽然有来自西方和国内民间团体的大力支持，但由于南共体各国政府拒绝超越姆贝基的"静默外交"政策，因此它仍然得不到南共体的信任。在南共体的斡旋下，民革运两派和民盟于2008年9月11日共同签署了政治和解条约。协议是津巴布韦国内各派势力平衡的结果，它也取代了另外一种可能——将津巴布韦拖入越陷越深的政治泥潭。[②]

协议条款规定，穆加贝政府对国家安全机器具有掌控权，但在构想的联合政府中也给予民革运一定的政治权利。四个月之后，在多次南共体首脑会议的敦促及西方国家和联合国的施压下，各党派就权利的最终分配达成了统一意见。2009年1月，各政党最终同意建立起一个联合政府。这一决定带来了挑战与机遇这一对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也为突破政治僵局打开了一个小口子。不过，无论在民盟还是民革运内部，该方案招致了一些成员的批判和抵制，而且大多数民间团体对此并不买账。所以，当摩根·茨万吉拉伊向公众宣布加入联合政府的决

---

① Solidarity Peace Trust, Desperately Seeking Sanity: What Prospects for a New Beginning in Zimbabwe? (Johannesburg, July 2008); J. Alexander and B-M. Tendi, 'A tale of two elections: Zimbabwe at the polls in 2008', Association for Concerned African Scholars Bulletin, 80, 2008, pp. 5 - 17. Available at <http: //concernedafricascholars. org/doc/acasbulletin80 - 2. pdf>.

② B. Raftopoulos, 'Elections, mediation and deadlock in Zimbabwe?', Real Instituto Elcano, 119, 2008, pp. 1 - 7. Available at <http: //www. realinstitutoelcano. org/wps/portal/rielcano_eng/Content? WCM_GLOGAL_CONTEXT=/Elcano_in/ARI119 -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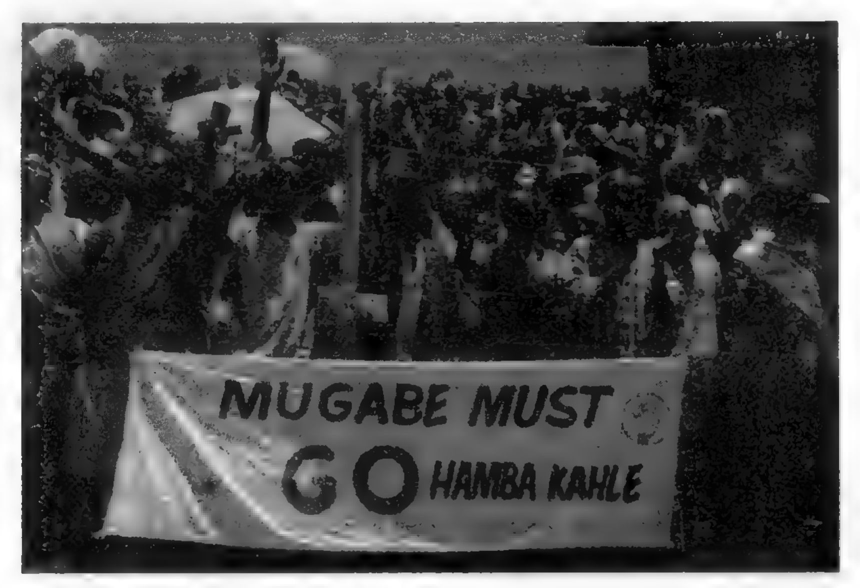


图 7.6　“穆加贝必须滚蛋!”(安妮·姆普拉鲁姆 摄)

231

定时,其声明中所表现出的乐观中夹杂着不安情绪,历史性的期望和疑虑兼具,这并不让人吃惊:

> 我们不要误会,我们并不是说加入联合政府是津巴布韦危机的解决方案,相反,我们的加入表明我们选择在一个新的舞台上继续为津巴布韦民主作斗争。该方案是我们追求民主之路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但是它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无论斗争持续多久,我们都会致力于民主津巴布韦的建设。[①]

结语

本书在最后一章梳理了津巴布韦在 1998 至 2008 年间蓬勃发展的

---

① D. Muleya and H. Radebe, 'MDC to join government', *The Weekender*, 31 Jan. 2009.

思想,比如国家主权、民族主义、公民权和归属感等,以及占地政治事件、"爱国民族主义"、民权和立宪等问题,并在津巴布韦危机的大背景下对以上概念的意义进行了讨论和重塑。在津巴布韦成为独立国家之后的 15 年里,现代化、发展、官僚制度的话语和政治引领着整个国家建设的进程。危机期间的政治暴露出津巴布韦历史长河中的真正事实,如哈默(Hammar)等学者所说,各种形式的取代、更替,国家主权的暴力主张与国家形成之间有着"持续的亲密关系"。[①]

1990 年代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的失败导致国家陷入政治独裁。随着非正规经济成为支柱产业,执政党治理国家更依赖于高压政治和主仆政治(the politics of patronage),而不是正规的官方程序。在市场经济逐渐崩溃的情形下,像工人运动这样大众欢迎的组织,已经建立起组织体系和正规经济制度,也不得不面临成员不断减少的困局,而流向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在更加艰难的处境下勉强维生。国家框定一些特定群体,以维护主权为名将其妖魔化,反对党和民间组织随即提出对立的公民权和国家等理念。在政治斗争中,执政党厉行压制性的民族主义,推崇扩大泛非主义传统,反对团体则以权力、民主问责等自由观念与之抗衡。对于不久前才脱离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地区,要让穆加贝政权专政的现实问题成为重要讨论的一部分还有待时日。津巴布韦危机殃及其他南部非洲国家,津巴布韦人道主义灾难在该地区蔓延,迫使该地区尽快找到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方案。

232

2009 年初达成了一项正式政治协议,但津巴布韦仍面临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挑战。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新的、更宽容的公民权和国家,因为数百万人曾遭受民盟政权的暴政,极其渴望将民主引入主权政治。

---

① A. Hammar, 'Reflections on displacement in Zimbabwe', *Association of Concerned African Scholar Bulletin*, 80, 2008, pp. 28 - 35, available at < http: //concernedafricascholars. org/docs/acasbulletin80 - 5. pdf>, and 'In the name of sovereignty: Displacement and state making in post-independence Zimbabw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26(4), 2008, pp. 417 - 434.

索　　引

（本索引中的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D

E

N

R

S

T

U

X

Z

译 后 记

作为专业的历史著作，本书首次以单卷的形式撰写津巴布韦通史。面对浩大的文献和众多的专有名词，译者参考了国内有关津巴布韦词汇的译法，在人名、地名、事件名称等翻译上，基本采用了约定俗成的译法，在无例可依的情况下则采取了音译的方法，试图准确、清晰地转达书意。

本书得以在短时间内翻译、校对和出版，有赖于众多师生的通力协作。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黄玉沛、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刘荣飞、赵曈曈做了部分章节的前期翻译、整理，浙江师范大学王华璐老师、姚国松老师、赵俊老师和刘云教授给出了很多有益的校对建议。译校者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同时，要感谢东方出版中心不吝厚信委以重任和众多同仁对本书的细致审读。没有大家的辛勤劳动，本书无法呈现。

我的父母陪伴了整个翻译过程，并为我减轻了诸多负担。“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本书的英文版由津巴布韦学者、南非学者、尼日利亚学者、英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合作编写，翻译成中文出版，主要供国内研究人员参考，内容未作删减，其观点不反映译者和出版者的立场。译者自感才疏学浅，尽管多方求教并力图使语句“信达雅”，但完稿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些错漏概由译者负责，敬请诸位专家不吝赐教、斧正。

张 瑾

2013年7月于昆明